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总第**32**辑
2017年秋季号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民国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民国研究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2017 年秋季号 总第 32 辑

主 编 / 朱庆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研究. 2017年. 秋季号: 总第32辑 / 朱庆葆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201-2156-9

I. ①民…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民国 IV. ①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8090号

民国研究 (2017年秋季号 总第32辑)

主 编 / 朱庆葆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徐成志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01千字

版 次 /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156-9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民国研究》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张宪文

副 主 任 陈谦平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吕芳上 朱庆葆 刘金田 江 沛
李 玉 杨冬权 吴景平 汪朝光 张 生
张连红 张宪文 张瑞德 陈红民 陈谦平
金冲及 胡德坤 姜良芹 徐思彦 臧运祜
久保亨 方德万 (Hans van de Ven) 罗梅君 (M. Leutner)
柯伟林 (W. C. Kirby) 高念甫 (Andrei N. Karneer)
萨马拉尼 (Guido Samarani) 裴京汉

主 编 朱庆葆

执行主编 李 玉

目 录

抗日战争

-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以《支那事变画报》为例…………… 侯 杰 孙巍溥 / 1
- 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因应与走向
——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 张仰亮 / 15
- 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梁 远 王湘云 / 29
- “李顿调查团”研究的回顾与深化…………… 黄金宽 / 40
- 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 英 / 48

经济与社会

- 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以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 张福运 / 56
- 从走私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掠夺与破坏…………… 许梦阳 / 67
-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王雪梅 / 79
-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综述
…………… 聂庆艳 / 92
- 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1910~1937）…………… 李恒俊 / 104
- 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
…………… 陈 蕊 邢 颖 / 116

民国政治

- 1927年蒋介石“驱鲍”过程中的心理困境及其应对…………… 赵晓红 / 127

仪式展演与政治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双十节”与统治合法性
建构 姜瑞学 / 138

张君勱与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成立及运作 王允清 / 149

民国法官制度研究的检视与拓新 李凤鸣 / 161

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回顾与展望 奚庆庆 / 169

专 论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再审视 吴梓明 / 178

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比较研究评析 赵晓阳 / 187

学科探索

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田永秀 / 202

地方视野与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取向 马陵合 / 209

书 评

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读郭双林《“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
..... 余 露 / 218

《东北流通券：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1945~1948）》
评介 王春林 / 226

从档案到历史：富含开创性和思想性的史料集
——评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 杨向昆 / 233

新史料、新契机、新视野：《刘国钧日记 1945》与刘国钧及大成
企业史研究 赵 伟 / 241

史料视窗

美国驻华使馆 1935 年 12 月政治报告
..... 高萍萍译 以 清 审校 / 248

稿 约 259

Studies on Republican China

Autumn 2017 No. 32

Contents

Stud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The Propaganda Strategy of Japan during the War of Aggression upon China:
A Case of “China Incident Pictorial” *Hou Jie & Sun Weipu / 1*
- The Dilemma, Response and Tendency of KMT’s Guerrill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ased on the Zhongtiao Mountains Counter –
Japanese Base Area *Zhang Yangliang / 15*
- Rana Mitter and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Liang Yuan & Wang Xiangyun / 29*
- A Review and Broadening of Researches on Lytton Fact *Huang Jinkuan / 40*
- Some Thoughts of the Study on the Burma Road Crisis Research
Wang Ying / 48

Economy and Society

-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Rur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Modern China: Focusing on Conflict in Jiawang Mining Area
Zhang Fuyun / 56
- A Research on Japan’s Theft and Destruction on Chinese Economy through
Copper Cash Smuggling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Xu Mengyang / 67*
- A Research on Anti – Smuggling Activities against Japan before Total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in Sichuan *Wang Xuemei / 79*
-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Monetary Reform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ie Qingyan / 92*

- Social Groups and Anti - Tuberculosis Movements in China, 1910 - 1937
Li Hengjun / 104
- Gender Economies and Moral Crisis: the Women's Response to the Rural
Crisis of Modern Jiangnan and Huaibei *Chen Rui & Xing Ying / 116*

Politics of Republican China

- The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Chiang Kai - shek during the
Expel of 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Zhao Xiaohong / 127*
- The Ritual Performances and Propaganda Politics: A Study on the Double
Tenth Day of Earl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It's
Construction of Ruling Legitimacy *Jiang Ruixue / 138*
- Zhang Junmai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Work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Wang Youqing / 149*
- The Examin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he Study on Judicial System of
Republican China *Li Fengming / 161*
-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he UK's Policies on CCP in the Early Years after
World War II *Xi Qingqing / 169*

Special Topics

- Re - examining on Christian Colleges in Republican China *Wu Ziming / 178*
- Comment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Zhao Xiaoyang / 187*

Subject Exploration

- Some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Railway History
Tian Yongxiu / 202
- Local Horizon and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ailway
History *Ma Linghe / 209*

Book Review

- Represent the Depth and Interaction of Jia Yin Pai's Thoughts: A Review
on Guo Shuanglin's Book *Yu Lu / 218*

- Commentary and Introduction on the Book *Manchuria Notes: A Reg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1945 to 1948* *Wang Chunlin* / 226
- From Archives to History: A Set of Groundbreaking and Thoughtful Historical Collections
—A Review on the Book *A Compilation of Weng Wenhao and Archives of the Counter – Japanese War* Compiled by Chen Qianping
Yang Xiangkun / 233
- New Historical Data, New Chance, and New View: Diary of Liu Guojun in 1945 and the Study on Liu Guojun with Da Cheng Enterprises
Zhao Wei / 241

Historical Data

- Political Report about China of December 1935 by US Embassy in China
Translated by Gao Pingping & Revised by Yi Qing / 248

Call for Papers

/ 259

[英文翻译: 以清]

【抗日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

——以《支那事变画报》为例

侯 杰** 孙巍溥***

提 要 《支那事变画报》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之一，也是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直观铁证。炫耀武力进而鼓舞、提升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画报》最为重要的宣传使命。《画报》极尽炫耀之能事，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行径。由于《画报》以美化日本侵略为职责，因此对日本占领区“解放”“复兴”之类照片的编排也是煞费苦心，在宣传和树立日本“道义”形象方面更是绞尽脑汁。本文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为配合日军军事进攻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将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乃至报刊史的研究。

关键词 《支那事变画报》 抗日战争 占领区宣传策略

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与新闻传播媒介，报刊不仅与人类社会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战争中，它还往往成为交战双方掌控舆论，拉拢盟友并在非军事领域打击对手的重要武器。而在众多的报刊媒体中，“画报”与战争的关系尤为紧密。这是因为，“画报”的内容以图片为主，一方面，相较文字为主的报刊，具备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 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日常生活”（项目编号：14JJD770010）的阶段成果。

**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适合战争环境下最大限度发挥宣传作用的需要；另一方面，读者可以从中更快速、更方便地获取信息，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而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就曾利用画报这一舆论宣传形式，配合侵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画报又成为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在这些画报中，《支那事变画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份。

1937 年 8 月 3 日，《支那事变画报》（以下简称《画报》）创办，初名《北支事变画报》，因创刊时日本侵华范围尚局限于北平、天津两市及周边区域，“北支”系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蔑称。“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范围扩大至华东地区，《支那事变画报》遂从第 4 辑起改为此名，直至 1941 年 10 月发行至第 101 辑止。《画报》为日文八开印刷，每辑计 32 版，除封面和封底广告占去两版外，其余 30 版以专题的形式，按照侵华战争的不同区域、主题排列。如第 3 辑第 2~19 版为上海、南京专题，第 20~31 版为华北专题。再如第 76 辑第 2~17 版为战局专题，第 18~25 版为占领区“复兴”专题，第 26~31 版为“欧洲大战”专题。

《画报》记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侵华过程中的主要战线、战役和战况，甚至还包括同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部分情况。《画报》自 1937 年 8 月 3 日创刊以后，采用的照片和文章均为大阪和东京新闻社特派员的随军记者拍摄、撰写。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兵锋正劲，在此后大约 15 个月的时间里，其华北驻屯军沿平汉、津浦、陇海 3 条铁路推进，几乎占领了华北全境；华中派遣军沿长江两岸逆流而上，先后攻取上海、南京、安庆、九江和武汉，基本上囊括了华东和华中的全部地区；在华南，他们还占领了广州。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画报》的编辑者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最终会战败投降，因此对日军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毫不隐晦的宣传和记录，不打自招，故而成为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资料。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份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证据，国内外关注的学者并不太多。^①《画报》图片总数超过 1 万余幅（含图中图），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配合侵华日军侵略行径和在传媒领域配合军事进攻所采

^① 学界对《支那事变画报》少有关注，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仅有 3 篇，且都为介绍性文章，分别为田长林《滴血的日军侵华画报》（《收藏》2010 年第 5 期），张天璐《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寇〈支那事变画报〉》（《东方收藏》2010 年第 7 期）和江泽丰、禹媚《两本〈支那事变画报〉记录日军侵占中山的罪行》（《中山日报》2014 年 7 月 8 日，第 4 版）。

取的宣传策略，将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乃至新闻传媒史的研究。

一 树立侵华日军的“不可战胜”形象

炫耀武力进而鼓舞、提升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画报》最为重要的宣传使命。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肆无忌惮地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画报》借机极力宣扬日军所谓的“军力强大”和“不可战胜”，希望以此提振侵华日军的军心、士气，并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威慑。为此，《画报》极尽炫耀之能事，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行径。如表1所示。

表1 《画报》刊登的日军重要侵华“战果”一览

辑数	发行日期	主要内容
第2辑	1937-8-15	廊坊、天津、大沽口
第3辑	1937-8-30	北平、南口山地
第6辑	1937-10-11	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
第8辑	1937-11-1	德州、石家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第9辑	1937-11-11	包头、上海
第11辑	1937-12-1	太原、榆次
第13辑	1937-12-21	苏州、湖州、常州、无锡
第14辑	1938-1-1	江阴炮台、南京
第16辑	1938-1-21	济南
第17辑	1938-2-1	青岛
第18辑	1938-2-11	潍县（今潍坊）
第19辑	1938-2-21	芝罘炮台、临淮关、蚌埠
第28辑	1938-5-21	威海卫
第31辑	1938-6-21	徐州、厦门
第32辑	1938-7-1	开封、安庆、桐城
第34辑	1938-7-21	马当要塞、彭泽、曲沃
第35辑	1938-8-1	湖口
第36辑	1938-8-11	九江
第40辑	1938-9-21	南浔铁路、马回（迴）岭、东弧山（江南），六安、霍山城（江北）
第41辑	1938-10-1	固始、广济、富金山、商城（江北）

续表

辑数	发行日期	主要内容
第 42 辑	1938 - 10 - 11	武穴、光州 (江北)
第 43 辑	1938 - 10 - 21	田家镇、商城、蕲春 (江北), 簪溪、排市, 半壁山炮台 (江南)
第 44 辑	1938 - 11 - 1	大亚湾, 信阳 (江北), 汉冶萍铁山 (江南)
第 45 辑	1938 - 11 - 11	惠州、增城、虎门炮台、广州
第 46 辑	1938 - 11 - 21	黄石港、石灰窑、鄂城、蕲水、汉口、德安、阳新、大冶铁山、平靖关
第 47 辑	1938 - 12 - 1	武汉三镇、咸宁、蒲圻、通城、崇阳城、岳阳城
第 49 辑	1938 - 12 - 21	莲华炮台
第 53 辑	1939 - 2 - 20	海南岛
第 55 辑	1939 - 3 - 20	海州 (今连云港)
第 57 辑	1939 - 4 - 20	南昌
第 62 辑	1939 - 7 - 5	汕头
第 70 辑	1939 - 11 - 5	中山
第 72 辑	1939 - 12 - 5	钦州
第 73 辑	1939 - 12 - 20	南宁
第 84 辑	1940 - 6 - 20	襄阳、沙市
第 85 辑	1940 - 7 - 20	宜昌、龙州
第 95 辑	1941 - 5 - 20	福州、温州、宁波
第 100 辑	1941 - 10 - 20	长沙、郑州

说明: 表中地理名词系日军占领的重要地区, 包括重要城市、关隘和炮台等, 皆来源于《画报》中“××占据”“××入城”等主标题。

如表 1 所示, 日军侵略中国乃至印度支那地区的整个过程, 被《画报》用照片的方式记录下来。

不仅如此, 《画报》为了获取最大的宣传效果, 还对日本武力大肆炫耀, 而非平铺直叙或是泛泛描述, 充分利用图片直观、形象和纪实性强等特点, 在图片的选择和空间排列上费尽心机, 令人印象深刻。以 1937 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画报》第 2 辑中“轰炸天津”那组照片为例, 其集中展现了日本侵略者在 7 月 27 日对天津市进行大规模飞机轰炸的场景。中间的那张照片占据了 70% 的版面, 从照片中海河形状可以判断其为天津城最核心的部分, 照片采取俯视图的形式, 呈现了那一望无际、鳞次栉比的房屋建筑, 在日军飞机炸弹的轰炸之下烟尘四起的场面。这张主要照片的右侧和左上方不规则地摆放了 3 张侧视图形式的辅助照片, 像是特写, 再现了

日军轰炸天津的某些重要环节及其效果。右侧最下方的照片是日军正用大炮对天津进行轰击，左上方的照片记录下建筑物在轰然爆炸之后浓烟四起的瞬间，右侧上方的照片是遭到日军轰炸之后房屋倒塌的凄惨景象。4张图片相互配合，让读者既整体感受到日军轰炸所产生的破坏力十分巨大，受到震撼，又透过微观的具体、局部特写，看到建筑物坍塌的场景，感受到战争的无情与暴力。

除了这些具有强大威慑力的轰炸图片，日军侵占中国大中城市的进城仪式也被《画报》的编辑者们充分利用。无论是第3辑中的北平、第6辑中的大同、第14辑中的南京还是第17辑中的青岛，以及上海、济南、广州、武汉各个城市的入城照片，展示的无不是日本侵略者骑着高头大马，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至于对中国广大乡村的侵略，《画报》的编辑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选用《“皇军”奋力进击，华军一溃千里》^①之类的标题来凸显侵略者的不可一世。如此一来，一个问题便摆在了《画报》的编辑面前，那就是，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日本军队的侵略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就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了制造“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画报》的编辑采取了或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淡化处理的方式加以掩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画报》对“万家岭大捷”的处理。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7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九江之后，沿长江南北两岸分兵齐进，计划会师之后合围武汉。为了配合日本侵华大本营的这一战略构想，《画报》在第36辑“九江攻略特辑”之后一共用了8辑连续报道。其中，有6辑都是将江北战线和江南战线的“战果”分别开出专栏，同时报道。但在发行于1938年10月1日的第41辑和发行于同月11日的第42辑《画报》里，却只有江北战线方面取得“战果”的宣传、报道。原来就在9月下旬，沿长江南岸进逼武汉的日军106师团冒进，在万家岭进入薛岳所设计的埋伏之中，被歼1万余人。对于这样的战场失利，《画报》当然不会如实报道，更不能肆意宣传，只能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宣扬日本士兵不怕牺牲的武士道精神，也是日本侵略者利用《画报》宣扬“皇军”无敌、激发官兵效忠天皇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画报》的拍摄者甚至不惜制造假新闻、伪造战时场景。其中以1939年2月5日发行的第52辑中刊发的一幅图片最为明显。该图片表现的是在进攻

^① 《“皇军”奋力进击，华军一溃千里》，《支那事变画报》第52辑，1939年2月5日，第9版。

山西运城的一次战斗中，一队日本士兵在烟尘和战火中“不畏生死危险”“勇猛冲锋”的景象。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照片中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在“艰难”地匍匐前进，可偏偏在队伍的左侧第二排，有一名士兵竟然“毫不畏惧”地站在那里，不仅毫发无损，而且从身体动作和姿势来看更像是在指挥周围的士兵摆出符合照片主题的动作。更为有趣的是，在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环境中，最后一排右数第二名士兵竟然隐约面带笑容和身边的士兵窃窃私语！

无论是为了宣扬侵华日军的破坏力如何惊人，还是炫耀侵华士兵多么勇猛顽强，《画报》编辑者们均采取了大肆渲染、不惜造假的手法，希望以“皇军”卓越的战绩达到他们在思想、传媒领域配合军事进攻中国、侵略中国的目的。然而令日本侵略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些记录昔日军国主义“战绩”的照片和解说文字，所采用的无耻虚假手段也被后人识破。常言道，手段的卑鄙，暴露目的的卑鄙。

二 树立沦陷区的“复苏建设”形象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广州、武汉，本来有利的战争局势，却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①在中国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军事战场上出现了日本侵略者最为担心的持久战的态势。随着日军对华进攻的势头有所减弱，对占领区的巩固和控制成为其更为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因此，这一时期的《画报》在发刊频率上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由1个月3辑，变成2辑、1辑，其后的照片标题也大多由“攻略战”变为“扫荡战”。如表2所示。

表2 《画报》发刊频率

辑数	发刊频率	起止时间	起止事件
第1~49辑	一个月3辑	1937年8月~1938年12月	七七事变至广州、武汉相继失陷
第50~83辑	一个月2辑	1939年1月~1940年5月	广州、武汉相继失陷至汪伪政权成立
第84~101辑	一个月1辑	1940年6月~1941年12月	汪伪政权成立至珍珠港事件前夕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404~405页。

与发刊频率变化相对应的是,《画报》在宣传策略上由炫耀武力向稳定军心、民心等方向转变,主题也随之有所变化。早在《画报》的第1辑中,日本侵略者就用了两个版面的照片,制作了题为《举国一致支援前线》的专题报道。在这之后,几乎每逢日本重要节日,相关的报道都赫然在目。不过相较于对日本国内情况的报道,《画报》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占领的中国城市、乡村地区被“解放”“复苏”的再现上。由表3的统计可以看出,以占领区“解放”“复苏”为主题的图片一方面随着日本占领区的扩大而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在如中国传统节日元旦、春节和日本重要节日、“沦陷周年纪念日”等特殊时间节点都会集中出现。

表3 《画报》中占领区“解放”“复苏”类图片占图片总量的比例

辑数	总图片数	相关图片数	比例(%)
第1~26辑	约2582	396	15.3
第27~51辑	约2184	409	18.7
第52~76辑	约2169	514	23.7
第77~101辑	约2245	426	19.0

说明:本表统计数据包含《画报》中的全部图片,即包括封面、广告和地图。

在各占领的城市中,日本侵略者最在乎的是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反复出现了16次之多,篇幅占比高达32%。其次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和青岛。如表4所示。

表4 《画报》中占领区“复苏建设”专题一览

辑数	发行日期	相关内容
第15辑	1938-1-11	占领区过年景象(南京、天津等地)
第17辑	1938-2-1	杭州“复苏”景象
第18辑	1938-2-11	炮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复苏”景象
第19辑	1938-2-21	占领区旧历春节景象
第20辑	1938-3-1	日军登泰山,邯郸和镇江等地“复苏”景象
第21辑	1938-3-11	苏州“复苏”景象
第22辑	1938-3-21	北京、苏州祭祀孔子,南京春景
第24辑	1938-4-11	炮制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第25辑	1938-4-21	北京、天津植树节庆典,济南“复苏”景象
第26辑	1938-5-1	沦陷后的扬州景象,各地“复苏”景象
第27辑	1938-5-11	上海、蚌埠等地的天长节庆典

续表

辑数	发行日期	相关内容
第 33 辑	1938 - 7 - 11	占领区各地“复苏”景象
第 34 辑	1938 - 7 - 21	伪蒙疆自治政府“商业繁盛”的景象
第 37 辑	1938 - 8 - 21	徐州“复苏”景象
第 48 辑	1938 - 12 - 11	武汉、广州的“复苏”景象
第 51 辑	1939 - 1 - 20	占领区各地“欢度”新春
第 52 辑	1939 - 2 - 5	青岛“复兴”景象
第 54 辑	1939 - 3 - 5	广州、南京、北京、汉口“复兴的曙光”
第 57 辑	1939 - 4 - 20	各线铁路相继修复
第 59 辑	1939 - 5 - 20	新开通铁路线, 湖北前线夏景
第 63 辑	1939 - 7 - 20	各地“复苏”景象
第 71 辑	1939 - 11 - 20	北京新市街建设, “新生”的南京
第 79 ~ 80 辑	1940 - 3	汪伪政权成立庆典
第 81 辑	1940 - 4 - 20	南京市容建设

说明: 内容直接取自《画报》中相关报道的大字标题, 相似的标题在保留原文状态的前提下合并处理, 原文系日文, 翻译过程中如伪政权名称和日本对华污蔑用语等特定称谓, 或以对应汉语常见词替换或加引号注明。

由于《画报》以美化日本侵略为职责, 因此对日本占领区“解放”“复兴”之类照片的编排可谓煞费苦心。通常的编排顺序是: 在获知日本军队将要某一城市发动进攻后, 《画报》便会先刊登一些当地的美景图片, 或为自然景观或为城市街景或两者皆有; 待战争爆发之后则刊登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对这些美丽、和平景致的“破坏”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死亡的惨状; 待战争结束再刊发大量日军维持秩序, 百姓生活安定和城市状况得到恢复的照片; 最后, 每逢年节, 特别是中国的元旦、春节以及日本的重要节日、“事变”发生周年纪念日与当地“沦陷周年纪念日”, 《画报》都会刊发中国各界人士和日本人一起或单独热烈庆祝和“欢度节日”的照片, 并且选择的场景一定好于沦陷之前。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日本军队的锐气和锋芒相对防御阶段已经有所下降, 无论《画报》的编辑者们怎样用心粉饰太平、美化日军侵略行径, 希望以此稳定军心、民心, 这种情形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从表 5 中可见, 在《画报》前 51 辑的广告中, 酒类广告最多, 所占比例高达 41.2%; 在后 50 辑的广告中, 药类广告最多, 所占比例高达 76%。《画报》广告从“酒”到“药”的转变, 虽不能说完全根源于侵华

日军由激烈、亢奋、疯狂的杀戮到医治创伤的内在转变，但是反映了战局某些细微的变化。这种微妙暗合之处，最易为人们所忽略，隐含其间的价值与意义却不能轻易忽略。

表5 《画报》广告一览

辑数	广告标题	广告词
第1、4、6、50辑	忠勇牌铭酒	御用出征祝捷酒
第2、7辑	《北支事变画报》	特派写真班摄影
第3辑	赫尔墨斯牌高级收音机	时刻收听“事变”新闻的收音机
第5辑	菊御代国旗	国旗菊御代，国威八千代
第8辑	红宝石波尔多葡萄酒	喝了比平时元气倍增
第9辑	牛肉宝来煮	慰问前线“皇军”专用
第10辑	喇叭多赛	强壮补血，不再体弱
第11、13、14、17、19、25、27、30辑	三得利株式会社产威士忌	纯国产，二十年陈酿
第12辑	《苏联人会参战么》	新书发售——来自红军的心脏的决策
第15、21辑	东丸牌淡味酱油	用美味“占领”你的嘴
第16辑	日本古拉究阿油墨工业所、三荣化学工业所	(承接相关业务介绍)
第18辑	国民牌收音机	听国策、听战报必备首选
第20辑	纸窑印刷株式会社	大藏省专卖局御用
第22辑	山本报纸油墨工厂	承接各种印刷任务
第23、26、29、32辑	中岛正露丸	“歼灭”各种恶疾
第24辑	特制樱花啤酒	祝捷干杯最佳陈酿
第28辑	战捷祈愿集印帖	最佳纸质印刷，欢迎团体批量购买
第31、37辑	曼秀雷敦	世界家庭必备良药，“皇军”驱赶南京毒虫和困意
第33辑	夏季胃肠病康复丸	天皇御备药
第34辑	高级卡特尔(粉末杀虫剂)	对付南京毒虫必备
第35辑	健胃固肠丸	军队健康的保障
第36、38辑	卢梅格贝慰问袋	慰问袋必须用国货
第39辑	指南针	原装进口
第40辑	战地毛巾被	应对(中国)大陆三伏暑热早起寒凉之气候必备品

续表

辑数	广告标题	广告词
第 41 辑	福美人牌铭酒	为勇士出征望风披靡干杯
第 42 辑	七德小洋刀	“皇军”慰问品
第 43 辑	炼羊羹	前线将士慰问品
第 44 辑	月桂冠牌清酒	新东亚建设祝愿酒
第 45 辑	战胜丸	胃肠肺肋膜药
第 46 辑	白鹰酒	酒界最高权威
第 47、49、51 辑	贺茂鹤牌高级铭酒	日本铭酒贺茂鹤有着配合“皇军”经营大陆的底气
第 48 辑	白鹿牌铭酒	有旭日旗的地方就有白鹿酒
第 52、55、57、59、61、63、65、66、68、70、72、74 辑	刷牙俱乐部	健康的牙齿是“兴亚”建设成功的基础
第 53、54、56、58、60、62、64 辑	便携式口粮——高热量食品	依据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制成的兵粮：一食千人
第 67、69、71、73、75 辑	国民牌灯泡	为国家节省电力用于前线
第 76 辑	“共桐便”牌胃药	养护肠胃是后方建设的需要
第 77、78、80 ~ 101 辑	“泊莱乌”牌药膏	纯正的现代化学疗法，用于中耳炎、扁桃体炎和丹毒等
第 79 辑	“空桥坤邦”牌皮肤病治疗剂	专治疥癣、顽癣、白癣、水虫、阴囊顽癣

三 树立日本国家的“道义”形象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是典型的非正义战争，因此为了“出师有名”，《画报》在宣传和树立日本国家层面的“道义”形象方面也是绞尽脑汁。如前所述，在占领每个城市的过程中，都一定将日军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的景象摄入镜头，当然也少不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夹道欢迎”，以营造出日本侵略军“正义之师”的形象。实际上，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一直用刺刀威逼，制造各种假象。例如“北宁铁路三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反在其背上强插‘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

往南关枪决”。^①为了削弱中国抗日军民的抵抗决心和意志,《画报》还采用了更为“巧妙”的手段。

《画报》刊登了大量表现“皇军”“仁慈”“善良”的图片,借此使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日本侵华军队不可能在占领区从事烧、杀、淫、掠等罪恶活动,以增加占领区的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皇军”的认可度和接纳度。在这类照片中,最为典型的一幅是刊登在第30辑上的名为《穿军装的天使》的照片。照片展示的是徐州会战中两名日本军人捡到一名在战争中与父母失去了联系的中国婴儿之后,其中一名士兵抱着孩子,另一名士兵在认真地用类似军用水壶的容器给孩子喂水或牛奶。整个画面看上去充满人情味,非常感人。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张照片拍摄的1个多月之前,疯狂的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残杀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及其父母、家人,制造了人间惨剧。对此,《画报》的处理方式是刻意回避南京大屠杀,以“(1937年)12月17日南京入城仪式”,加以掩饰。南京陷落的时间为1937年12月13日,如果日本军队和照片摄制者、《画报》编辑者真的如前述照片中所反映的那样充满慈悲仁爱之心,《画报》为何对那些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日军在南京城滥杀无辜的行为回避和沉默呢?

《画报》采取的日本国家“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宣传策略还表现在对中国的大肆污蔑上,其中最恶毒的手段就是对中国军队为了抗击日本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予以大肆攻击。如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沿津浦线南下,前锋攻占徐州并沿陇海线西进,欲与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会师郑州。为了阻止已经侵入华北的日军突破黄河防线,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大堤,制造了黄泛区。《画报》只字不提此系因日军侵略行为所致,而是用了3辑多的内容(第32~35辑)连篇累牍地报道黄河决堤、河水泛滥给当地社会各界人士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皇军”对当地百姓的“救助”与“支援”。一年以后,当日军攻占武汉三镇并沿粤汉路南下同逼近长沙时,为了不将因为一直作为武汉会战大后方而囤积了大量战略物资的长沙拱手让人,国民政府被迫将其付之一炬。《画报》采取了相似的宣传、报道策略,就是一面闭口不谈造成“文夕大火”的根本原因和罪魁祸首,一面发表大量长沙被焚的惨景照片并附带一篇题为《可笑的“焦土抗战”政策》的解说文字。通过讽刺和挖苦国民政府,煽动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蒋介石和国

^① 郭述祖:《长城抗战第一枪——榆关事件的前前后后》,政协山海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山海关文史资料——日伪时期的山海关》,1991,第17页。

民政府的不满，乃至仇恨。

然而根据现代传播学理论，全凭自吹自擂和污蔑对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占据“道义制高点”，为了“坐实”日本“得道”的国家形象，《画报》的编辑还不惜借助外力，通过“多助”来替自己正名。为了表明自己“得道多助”，《画报》第 28 辑和 29 辑竟用了近 1/4 的版面专门报道了“伊太利（即意大利——笔者注）国使团访问日本”的活动，希望以此表明日军的所作所为也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所认可。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与日本同为与世界爱好和平各国为敌的国家。然而天理昭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除了这次意大利使团出访日本外，此后再也没有类似的访问活动为《画报》提供宣传报道的题材了。相反，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家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恶化。为了掩盖这一窘境，日本侵略者又使出上文中提到的宣传策略，用了大量的篇幅报道这些国家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往来。言外之意，这些国家的反日活动皆是受了蒋介石的蛊惑所致，都是他们这支“正义之师”的敌人。

1939 年 9 月 1 日，纳粹德国闪电般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战场正式形成。在战争初期，德国军队趾高气扬，肆行无忌；英法军队则静坐西线，无所作为。而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虽然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中国的广大土地被日军占领，但是日本侵略军也因占领区域过于庞大而分兵乏术，再难有占领新的具有战略地位城市之武力及其“战果”加以炫耀。于是，盟友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就成了《画报》的舆论宣传重点，一是希望借重盟友的强大延续自己此前炫耀武力的余脉；二是由此提高德国、意大利两国在中日社会各界人士心中的地位，进而减少因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与日交恶所带来的形象贬损。

自 1939 年德国向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战场形成起，至《画报》停刊止的 34 辑中，设有“欧战专题”的《画报》多达 28 辑，亦即平均 5 辑里面只有 1 辑不设此专题，反映了日本法西斯对其强大的德国盟友的倚重和精神寄托。这是为了向读者显示强大的德国都愿意与日本为伍，旨在彰显自己所谓“得道多助”；同时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自己盟友的强大实力，掩饰自己在相持阶段战果明显大不如前的窘境。当然为了不在节节胜利的盟友面前太过窘迫，日本军队也在德国攻占巴黎的同时发动了对宜昌地区的进攻，希望以此表明自己仍旧同战略防御阶段时期一样保持强大的军力。为此，《画报》还专门出版发行了《宜昌攻略战》

特辑（第84辑）。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枣宜会战中，虽然中国方面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是为抗战时期中国牺牲的最高将领，但是日本侵华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中国学者指出：“枣宜会战中国守军丢失了一些城市和地区，但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有利于长期抗战。而且，日军战线拉得更长，敌第十一军已无机动力，驻守宜昌地区更显兵力不足……从整个战局来看，襄西宜昌地区的日军，孤军深入，处在中国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中国军队不断地发动攻势作战，从战略上说，日军陷于被动之中。”^①

结 语

《画报》创办的宗旨是配合七七事变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亦即配合军事侵略进行舆论宣传，希求在军事占领、稳定占领区和树立道义形象等三个方面，利用画报媒体直观、形象、纪实性强等特点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然而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历史的走势与《画报》的创办者的目标越来越远，其发刊频率也一降再降。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抗日战争进入英国、美国等国家向日宣战并支援中国抗战的新时期。

从炫耀武力的角度来说，《画报》的编辑无法回避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他们一直努力避免的持久战的深渊之中的事实，在太平洋上又必须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的反制。为凸显“解放”“复兴”占领区的议题，千篇一律的报道已经不能起到有效的宣传效果。在树立“道义”形象的时候，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轴心国集团在世界上日渐孤立。《画报》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即退出了历史舞台，绝非偶然。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研读《支那事变画报》，感触良多。《画报》不仅画面清晰，照片含义丰富且少有隐晦，就连其中的封面、地图和广告都不同程度地反映日本侵华的历史过程，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视觉文本。70多年前，骄横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在中国人民面前选择了无条件投降。然而7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日本右翼分子妄图篡改历史，粉饰战争罪行。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年日本法西斯为炫耀武力、稳定军心、推卸战争责任而发行的

^① 李占才：《焦土热血——枣宜会战纪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130页。

《画报》，在今天却成为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笔者真诚地希望国内外学者能够对此予以关注，在解读《画报》主要议题和宣传策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仔细探索。相信经过更为细致的总结和归纳，《画报》所蕴含的更多的议题能够得到探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添砖加瓦。

抗战期间国民党游击战的困境、因应与走向^{*}

——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

张仰亮^{**}

提 要 中条山根据地作为国民党首批游击根据地之一，其兴衰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中条山根据地在创建之初，面临着军心涣散、防线不稳、物资匮乏、县政瘫痪和军民关系紧张等困境。为此，中条山军政各方多措并举，如加固防御工事、推行政工工作、加强后勤保障和开展县政建设等。中条山军政各方的应对举措为国民党游击作战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并取得了中条山保卫战的胜利，根据地一度被誉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但中条山战役的迅速惨败使根据地基本丢失殆尽，蒋介石甚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根据地的坚固程度令人颇为怀疑。

关键词 抗战 国民党 游击战 中条山根据地

近20年来，学界对于国民党游击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成果丰硕。但关涉国民党游击战研究的空白点、薄弱点依然不少，不管是对国民党游击战的宏观审视，还是对根据地的微观考察，均有待深入。譬如在抗战期间，国民党规模较大的根据地（或游击区）就有十几块，但扎实精详的个案研究却屈指可数。^① 本文欲从中条山根据地切入，为探究国民党游

* 本文受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国民党中条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20143067）的资助。

**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从研究现状看，学界主要对中条山、苏北等有限的几个游击区（或根据地）进行了深浅不一的研究，以论著较多的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其研究也仅限于中条山战役、根据地民众运动等几个视域。笔者管见所及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杨奎松《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与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张仰亮、李常宝《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山西档案》2015年第2期。

击战的兴衰脉络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个中原因在于，中条山根据地作为国民党首批根据地之一，亦是国民党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根据地之一，其兴衰演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 进驻之初的困境

1938 年 2 月中旬，卫立煌率部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阻击日军失败后，决定向中条山区域分散。3~4 月，李默庵第十四军等部队进驻垣曲、沁水、翼城一带的中条山山区，根据地初步建立。^① 3 月 11 日，蒋介石致电时任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称中条山驻军“一面发动游击，一面筹划补充兵员与就地给养及屯粮等事”。^② 可见，在根据地创建伊始，国民党高层便十分关注国民党军队（正式称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的游击作战与后勤保障事宜。问题在于，中条山根据地的作战条件远比预想的艰难，诚如李默庵所言：庞大的兵团进驻中条山，“首先是立足的问题”，“其他军需保障不说，仅吃粮一事就够让人头疼的”，“其次便是如何开展游击作战”。^③ 应该说，李默庵所言相当中肯，准确指出了问题要害。

对于国军而言，其主要任务便是阻止日军渡河西进，但中条山是一条浅山，地势狭长，坡度亦缓，阵地防守绝非易事。中条山为晋南主要山脉之一，全长 150 余公里，其西南侧紧邻黄河，自古以来便是军事要冲。对此，国民党方面认为：中条山为“西北屏障”，日军若掌握该山，“即能确保晋省，又可进窥长安，威胁陇海线”，国军若驻守中条山，可以“守河防，守河防，则守国防矣”。^④ 更为重要的是，中条山背靠黄河，属于背水结阵，曾任第三十八军机要室译电员的车国光就抱怨道：背水结阵“在 20 世纪的热武器时代，置于死地，除覆没以外，料无出路”。^⑤

由于国军迭遭败绩，军心早已涣散，希图尽早撤离晋省的官兵大有人在。其实在国军进驻之初，官兵军纪松弛、意志动摇等弊病乃是一种普遍

①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 209 页。

② 《蒋中正致李默庵刘戡电》（1938 年 3 月 11 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五），台北，“国史馆”，2014，第 492 页。

③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 210 页。

④ 《第二战区一九三九年作战经过概要》（1939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档案号：787-6521-165-5811。

⑤ 车国光：《中条山血战》，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 69 页。

现象，就连隶属中央军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亦是如此。据曾任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称：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军并无二致，军纪败坏，思想空虚，缺乏抗战信心，多“希望退到黄河以南”。^①

中条山就地形而言是“军事的要地”，但就物产来说却是“穷山”，唯一一般民众节衣缩食方可解决温饱问题。^② 十几万国军蜂拥而至后，需用浩繁，后勤保障的困难愈发凸显。除粮食不足外，部队官兵生活用品的匮乏程度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公报》就曾描述道：“因为前方大批部队的屯驻，对于日常用品的需要特别多。后方所运到少数的货品，无疑是供不应求的。”^③ 再者，住房问题也令国军一筹莫展，原因在于“山村房屋太少”，以致“大部队宿营困难”。^④

由于日军迅速向晋南推进，晋南诸县的县政几近瘫痪，县长多已无心职务，社会治安渐趋恶化。据称，晋南诸县仅“新绛李凯朋、永济王志彬愿意留任，余均呈请辞职”。^⑤ 令国军头痛的远不止于此，由于山中民众与外界交流甚少，当地民众对抗战形势往往一知半解。如在抗战之初，“山中人民除担负协助军运外，竟不知有抗战之举”，民众信息之闭塞可见一斑。此外，由于日伪汉奸与游兵散勇的任意滋扰，民众的生产生活亦无所保障。以日军侵扰下的垣曲、阳城、高平等县为例，民众的“房屋、器具、粮食多被敌军焚烧抢掠殆尽”，^⑥ 民众对突如其来的战祸往往心存恐惧，不少民众携家带口南渡黄河，更遑论支持抗战了。

二 危机下的因应

按照国民政府要求，中条山根据地由第一、第二战区“协力固守”，“作为向华北采取攻势之支撑点，亦为支援对日军后方游击作战之基地”。^⑦ 卫立煌在1939年初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之前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如此一来，中条山根据地在军事上实受第一战区辖制，但民政

①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99页。

②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③ 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④ 晋震梵：《抗战中固守中条山的日日夜夜》，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第91页。

⑤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40页。

⑥ 《晋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1939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13704。

⑦ 蒋纬国：《抗日御侮》（六），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51页。

依然归属阎锡山之山西省政府领导。国军进驻初期面临作战、生存多种考验，在此困境下，国军与地方当局不得不以军事为先导，多措并举，以应对困局。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地的坚固与否牵涉自身诸多因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防御工事一项所能完全解释，根据地的政训工作、后勤保障、民政建设等皆应考虑在内。

(一) 军政方面

军政建设直接关乎根据地的稳固程度与军队战斗力的高低，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国军在防线构建、政训建设、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统一规划和必要调整。

划定防区。十几万国军相继涌入中条山后，难免会出现驻军分布混乱、厚此薄彼的问题。卫立煌根据作战需要、地势地貌等因素，对国军防区进行了多次调整，及至 1939 年初大致稳定了下来。总体而言，卫氏将中条山划分为三个防区：东段横岭关至绛县由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驻防，中段夏县、闻喜一带由曾万钟第五集团军驻防，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驻防。^①

修筑防御工事。由于中条山国军主要肩负着阻止日军渡河、保卫大后方的重任，那么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就显得不可或缺。国军进驻中条山后，卫立煌对防御工事颇为重视，据曾任第一战区参谋长的郭寄峤回忆：前敌总司令部“对太行山南段及中条山全线，秘密部署”，“保有相当纵深，一切均作长期固守诱敌歼敌打算”。^② 与国军长期对峙的日军亦称：以卫立煌为首的国军“利用险峻的山地，构筑着坚固阵地”。^③

推行政训工作。一般而言，游击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其政训水平的高低息息相关，国民党高层对此亦早有认识。1938 年 11 月，时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就向蒋介石建言：“政治工作人员，尤亦深入游击区域，直接可增进游击部队之精神，而维持风纪，联络民众。”^④ 蒋氏对于政训工

①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 270 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郭寄峤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 73 页。

③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2 分册，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83，第 56 页。

④ 《上蒋委员长》（1938 年 11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1996，第 78 页。

作也颇为重视，他认为：“政训工作的目的在实施部队政治教育，以改造军队为中心，进而感化民众，转移风气，改造社会。”^①此后，偏废已久的政工工作再次得以在国军中广为推行，中条山驻军在1939年左右开始试行，其触角逐渐延伸至营连基层作战单位，在军、师一级设有政治部主任，在团一级设有指导员，在连一级设有政治干事。^②

后勤保障建设。对国军而言，物资供应与住房问题显然是头等大事。在进驻之初，各部队通过到山下平原地区采购粮食，尚能解决温饱难题。但日军将中条山山口严加封锁后，国军下山采购愈发艰难，所以只能主要依靠后方接济转运。问题是，根据地与大后方有黄河天险相隔，须有渡口并设立运输站方可施行，难度可想而知。为此，第十四集团军在垣曲一天然渡口设立运输站，第四集团军在尖坪渡、茅津渡设立运输站，第五集团军则在白浪渡设立运输站，负责转运物资。这样一来，国军粮食等物资大都由兵站供给，辅之以就地采购。对于住房问题，国军通常是租住民房与自建房屋相结合。如第三十八军就在防区内挖了许多窑洞，尤其是在望远村的西沟修建了成排的窑洞，“每班先挖一个”，住房紧张难题得到一定的疏解。^③此外，各军、各师均设有随军医院，基层作战单位设有卫生队或卫生员。为方便集中救治前线伤员，第一战区除在洛阳设有两所后方医院外，另在“沿河各屯积所所在地，每处设伤病官兵收容所一个”。^④

（二）地方民政方面

抗战不久，阎锡山为适应抗战需要，将晋省划分为七个游击行政区，各设主任一人。^⑤按照规定，中条山诸县多划归第七区，政治主任为关民权，晋东南的晋城、阳城、沁水等县划归第五区，主任初为续如楫（后为戎伍胜）。阎锡山认为：地方政权应作为“军民化合的枢纽，将广大的民众，结合在我们周围作我们抗战与复兴的基础”。^⑥需要说明的是，在抗战

① 《改进政训工作的要务》（1939年2月1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六），第18页。

②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第364页。

③ 邓云温：《记赵寿山军长二三事》，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第151页。

④ 胡璞玉主编《抗日战史》（运河垣曲间黄河两岸之作战二），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63，第140页。

⑤ 阎锡山：《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讨》，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秘书处，1939，第10页。

⑥ 《阎会长对临时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1939年10月29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旧政权类档案，类号：B，册号：167。

大背景下，国军对地方民政的影响无所不在，且职权多有交叉。由于原任县长对县职多望而生畏，委任游击县长的重任就落在了实受中共影响的牺盟会身上。对此，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的刘戡认为，牺盟会把持了山西的军政，以至于各级政府均有牺盟会特派员，并直言“他们完全代替了国民党的地位”。^①

如此一来，较多的牺盟会特派员履职县长岗位，且不少为中共党员。中条山区域亦是如此，如李涛、景思闵、王宿人、张呼晨、张培民等中共党员分别被任命为夏县、闻喜、平陆、虞乡、垣曲的县长。^② 由于中条山区域的县城多在日军控制下，所以游击县政府只好设在隐蔽的山间或偏远的乡村。应该说，大多数游击县政府仍可以正常运转，如解县、虞乡两县的县长时常派人到中条山北侧开展活动，“或亲自巡视属土，抚慰民众”。^③

对民众进行抚慰宣传。鉴于民众对抗战知之甚少或者惊恐万分的现状，国军与地方当局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抗日宣传，以安抚民心。如驻地国军将抗日标语贴遍大街小巷，并严禁官兵滋扰民众，使其安心生产与生活。^④ 此外，国军还组织民众恢复农业生产，救济灾民，以图缓和本身已紧张的军民关系。如在 1940 年初，卫立煌致电蒋介石，查晋南抗战以来“兵灾之重，历来未有，军民生机全被断绝，春耕种子又无力购办，如不设法准备救济，前途不堪设想，拟恳请能予饬主管部会按照上列各县各放款十万元”，^⑤ 并获批准。

组训民众。早在抗战之初，徐永昌就认识到游击战与民众结合的重要意义，认为“游击战须配上民众，能得民助矣，则我明敌暗，否则反”。^⑥ 需要说明的是，以“晋西事变”为转折点，根据地之前的民众运动多由牺盟会领导，之后民众运动主导权渐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及阎锡山获取。^⑦

① 《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转发牺盟会组织与活动公函》（1939 年 6 月 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政治 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 439 页。

② 杨圣清、段玉林：《巍巍中条山——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 82 页。

③ 周延：《中条山通讯虞乡解县视察记》，《大公报》1939 年 11 月 28 日，第 2 版。

④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 104 页。

⑤ 《经济部关于卫司令长官请拨款办理晋南冀闻夏平等九县农贷及有关文书》（1940 年 1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2322。

⑥ 《徐永昌日记》（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 193 页。

⑦ 《山西省民运通讯》（1939 年 12 月~1940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2-3440。

尤其在前期，民众运动在牺盟会领导下，日渐高涨，由县城至乡村普遍建起各行业、各群体的民众组织。^① 抗战军兴，1938年初山西省政府令“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及公安局警察均编为游击支队，县长兼任支队长……协助正规军于全省各地，普遍发动游击战”。^② 除各游击县政府组织的民众武装外，普通民众亦组织起名号各异的武装组织，规模较大的有杨振邦晋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及散布于中条山内外的红枪会。其中，标榜“保卫家乡安宁”的红枪会在中条山区域发展颇速，至1939年“共有红学（会）八万余人”。^③

发展战地急需的工矿业。在根据地，军民生活用品极度缺乏，虽有后方补给，但缺口依然不小。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于1938年下半叶开始推行工业化合作运动。国民政府对于游击区的工业化合作社比较重视，中国工业化合作协会在中条山东部设立晋东南事务所，之后，“各地小手工业均纷向该事务所贷款，组织各种手工业合作社”。^④ 中条山区域的工业化合作社得到一定的发展，至1940年底“已设有工业合作社六十所”，著名的有阳城后河造纸合作社、南个面粉合作社、沁水纺织合作社、垣曲冶煤合作社等。^⑤ 应该说，各手工业合作社对保障驻军日常所需有着一定的补充作用，如夏县脉岔造纸厂的产纸虽无法完全解决中条山军政机关的纸荒问题，却可以救济一部分。^⑥

三 “成功” 还是 “失败”？

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建设举措，国民党军事高层颇为自得，卫立煌甚至将中条山自诩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⑦ 这让人不禁会问，根据地的建设举措对支持中条山抗战究竟成效几何？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走向与评价问题，学界往往以失败的标签定论，不无偏颇。笔者认为，对中条山根

① 张仰亮、李常宝：《1938~1941年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考察》，《山西档案》2015年第2期。

② 阎锡山：《第二战区二年来抗战工作报告与检讨》，第18页。

③ 金在镛：《晋南前线的红学会》（上），《申报》1939年6月9日，第3版。

④ 《山西省民运通讯》（1940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3440。

⑤ 《晋冀两省游击区合作运动甚发达——晋南设工业合作社六十所》，《申报》1940年12月16日，第4版。

⑥ 周延：《中条山的手工业——中条山通讯之一》，《大公报》1940年2月15日，第3版。

⑦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248页。

据地的研究, 应以在全局视野观照下将中条山保卫战的价值与中条山战役的失利区别开来为宜。

(一) 中条山保卫战阶段

及至 1939 年 1 月上旬, 军委会对游击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并将游击战分为反扫荡战、破坏敌伪政治经济设施战、策应战三种形式。^① 援引至中条山根据地莫不如此, 其差别仅在于三者各有侧重。因为中条山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为阻止日军渡河西犯, 那么反扫荡战就成为中条山国军的主要职责, 中条山保卫战由此得名。该阶段涵盖根据地建立之初至中条山战役之前, 时间跨度三年有余。

反扫荡战。1938 年 3~4 月, 国军在中条山建立根据地后, 与之相持的日军第一军则“一直在企图击败晋南一带的重庆军而后向前推进”,^② 从而为进攻大西北打开方便之门。及至中条山战役前, 日军先后对中条山进行了 13 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又往往将中条山西段作为进攻的重点。在 13 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中, 又以“三二九”“六六”“四一七”战役最为惨烈。以国军损失最为惨重的“六六”战役为例, 1939 年 6 月上旬, 日军一度突破了国军在中条山西段的防线, 并将李兴中第九十六军、孙从洲第四十六旅包围, 形势岌岌可危。最后, 第四集团军在内外联合策应下才艰难夺回阵地, 据曾任第三十八军作战科科长于景祺称, 是役第四集团军伤亡人数高达 9000 余人, 其中第九十六军占半数以上。^③

当然, 中条山国军除配合正面战场与反击日军大扫荡外, 自身也广泛开展了形式不一的游击作战, 以牵制日军。曾任第三军副官处处长的车学海表示: “至其他局部的遇机出击或敌后游击和破坏铁路等战斗, 几无日无之。”^④ 在日军看来, 中条山国军“反复袭击平原交通线, 特别是对铁路进行袭击”。^⑤ 毋庸讳言, 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前, 国军在中条山保卫战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并一度牵制了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 中条山被日军称为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六), 第 59 页。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2 分册, 第 56 页。

③ 于景祺:《三十八军抗日战场战地见闻片段》, 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 第 121 页。

④ 车学海:《第三军战斗在中条山》, 陈长捷等:《正面战场·晋绥抗战》,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第 274 页。

⑤ [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第 120 页。

“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①成为日军的“盲肠”。

（二）中条山战役阶段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发生于1941年5月间，在战役中国军惨遭失败，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

其实，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是经过精心谋划和悉心准备的，极具战略意图。日军认为在其占据地区中华北治安最差，尤其是“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1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②但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就中共与卫立煌两者的进攻次序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最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扫荡盘踞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国民党中央军，以清除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③方案确定后，日军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充实驻晋日军第一军的实力，并多次进行战前演练。

较之于日军的精心准备，中条山国军的战前应对明显疏忽了许多。在1941年3月举办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鉴于卫立煌未尽力压制中共而对其埋怨一通，甚至扬言撤去卫氏河南省长一职，以致卫氏索性远走峨眉山休养，导致中条山根据地临时换帅，由何应钦代理。^④何应钦抵达洛阳后，召集前线将领开了两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并制定了巩固河防、加固防御工事和主动出击的应对方案，但未及计划完工或实施战役就已打响。

5月7日傍晚，日军集中六个师团又三个旅团的兵力由东、北、西三个方位，采用钳形夹击、中央突破与分割包围的战术，全面进攻中条山及豫北道清路西段的国军。中条山防线不几日就被日军攻破，行动异常迅速，国军经营三年有久的根据地丢失殆尽。直至6月15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战役正式结束，并宣称取得了“赫赫战果”。据日军统计，国军被俘约35000人，遗弃官兵尸体约42000具，日军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⑤为此，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甚至斥之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

①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629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629页。

③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3页。

④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266页。

⑤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2页。

辱”。^①可见，蒋氏对中条山战役惨败的极度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对于中条山根据地的走向与评价问题，若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的标签来衡量，未免有失公允。正如台湾原“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所言：“中条山区，国军坚守黄河北岸，牵制日军不得渡河，实已完成重大战略任务，稳定华北战场四年之久。”^②即使在中条山战役后，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精力日趋分散的日军对于渡河西进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直至抗战结束亦未能实现渡河西进的夙愿。但是，国军在中条山战役中无疑是惨败而归，其中原因引人遐思。

四 令人生疑的“马奇诺”防线

昔日“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迅速攻破，甚至被蒋介石斥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根据地的坚固程度让人颇为怀疑。笔者在这里想探讨的是，在中条山战役中除却日军实力强大、准备充分以及国共协同抗战走低等客观因素外，尚有哪些根据地自身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

防御工事单薄。事实上，中条山防御工事远非国军所言的“固若金汤”。由于中条山防线多为单线防御，缺乏纵深配置，若一点被破极易造成全线随之崩溃，“六六”战役即为前车之鉴。对于卫立煌引以为豪的“马奇诺”防线，苏联顾问却不以为然，认为国军对构筑防御工事“太儿戏”，“马奇诺”之名虚有其表。^③在战役中，中条山防线形同虚设，日军突破一点后其余防线即成崩溃之势。战后，卫立煌不无自责地表示：阵地纵深过小，又缺乏兵力守备，“是徒具有阵地之躯壳，并无阵地战之条件也”，^④此番话多少道出了阵地缺失问题。

根据地存在派系纷争与不公之举。毋庸讳言，卫立煌对中条山驻军可谓一视同仁，其本人也颇具威望，常被称为“好好先生”。^⑤问题是，国民党一以贯之的派系纷争与不公之举在中条山根据地远未断绝。即使在中央

① 《蒋介石为检讨晋南作战经验教训电》（1941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第405页。

② 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766页。

③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陈长捷等：《正面战场·晋绥抗战》，第284页。

④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出版社，2005，第1073页。

⑤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15页。

军内部同样存在人事纠葛，如卫立煌与李默庵就因所属部队人事任免的问题而关系僵化，令蒋介石“难于处理”，最终蒋氏只好将李默庵调离，方平息了这场人事纷争。^①另外，原属西北军的冯钦哉对军费与指挥权问题亦颇有微词，冯钦哉甚至向国民党高层当面要求“加勉之部之增加经费与渠直接指挥军队云”。^②作为根据地统帅的卫立煌对此也颇感无奈，认为晋南各军担负同一作战任务，“待遇间不平均，相形见绌，啧有烦言”。^③

后勤保障难以为继。虽然中条山国军的粮弹多由后方补给，但在贫瘠的山间生存并非易事。在根据地内发动士兵参与后勤保障之事屡见不鲜，难怪卫立煌抱怨：各部队用于运粮、磨面、挑水、打柴各种勤务，“实占全连三分之一以上”。^④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国军饮食状况，据曾任第三十四师师长的公秉藩称：根据地“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且士兵“劳动繁重”。^⑤此外，根据地的穿住问题也未得到完全解决，冬天士兵仅有一套棉衣，昼夜不脱，以致遍身生虱，尤其是前线的官兵不论刮风下雨，日夜坚守战壕，“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住所”。^⑥不难想见，由于官兵营养不良，体质自然较差，在与日军近距离搏斗时往往落于下风。

在中条山驻军中，除中央军第十四集团军的武器装备较为优良外，实际从属于地方军的第四、第五集团军的武器装备往往量少质劣。对此，日军就曾在画报上对第四、第五集团军进行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士兵“穿着破旧衣服，肩着破枪，身上标着‘杂牌’两字”，^⑦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地方军艰难的生存图景。

兵员缺额现象司空见惯。抗战期间，由于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弊病百出，普通民众对于当兵一事往往讳莫如深。役政部门在将新兵由大后方送至前线途中，病死、逃亡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最终能够真正服役者甚至不及半数。^⑧此外，由于前线生活艰苦，士兵即使服役后仍会出现大量

①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16页。

② 《徐永昌日记》（六），第50页。

③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74页。

④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074~1075页。

⑤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陈长捷等：《正面战场·晋绥抗战》，第284页。

⑥ 《中条山将士战斗生活》，《中央日报》1940年9月13日，第2版。

⑦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第359页。

⑧ 据军委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1944年11月27日国府纪念周中称：“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一百余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参见公安部档案馆藏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474页。

逃兵，公秉藩即感慨道：前线各部队“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也有之”。^① 如此看来，中条山国军虽号称十六万之众，但实际人数不禁要大打折扣，李常宝认为，若按照士兵逃亡的比例来换算，中条山国军的实际人数不超过十万人。^②

政工工作乏力。国民党当局虽努力恢复政工工作，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还遭到地方军的强烈抵制。以原从属于陕军的第三十八军为例，由于军长赵寿山对带有监督意味的政工体系心生不满，故对政工工作极为抵制，以致张泰祥为首的政治部不得不设在黄河南岸的会兴镇，最后进而演变为“全军普遍地与团指导员、连政治干事开展了斗争”，^③ 政工工作自然徒有其名。

与地方民政系统隔阂较深。由于军事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卫立煌与阎锡山之民政系统的合作并不顺畅。在进驻之初卫立煌就曾将一纸诉状递至中央，“报告山西党政反对中央军云云”。^④ 尤其在“晋西事变”后，两者围绕晋东南行政大权纷争不断，并在晋东南各自为政，以致晋东南各县一般都有三个县长，分别隶属中央军、阎锡山、日伪。^⑤ 在中条山战役事发后，阎锡山自然未尽力支援，除所属赵世玲第四十三军直接参战外，其晋西南的晋绥军只进行了有限的策应与接济。对此，卫立煌认为：“晋南军因环境关系，甚难获得政治上配合。”^⑥

民众运动不佳。在“晋西事变”后，牺盟会在中条山根据地的影响力大为削减，民众运动领导权进而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与阎锡山取而代之，民众运动日渐消沉。以 1941 年 1 月晋南部分县的农会会员统计为例，平陆 196 人，夏县 20 人，闻喜 600 人，解县 12 人，虞乡 150 人，沁水 1310 人。^⑦ 不难看出，除沁水、闻喜成绩尚可外，其余各县多者百余人，少者仅十余人，民众运动状况之差可见一斑。战后军委会亦承认：“政工人员工作不力，致军纪败坏，民众离心、离德，反为敌用。”^⑧

① 公秉藩：《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陈长捷等：《正面战场·晋绥抗战》，第 284 页。

② 参见李常宝《1941 年中条山根据地沦陷原因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③ 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段景礼等主编《赵寿山将军》，第 365 页。

④ 《徐永昌日记》（四），第 427 页。

⑤ 岳寿椿：《阎军参加中条山战役的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印《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 3 卷第 30 辑，1998，第 447 页。

⑥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 年 10 月 28 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 1074 页。

⑦ 《山西省垣曲县党部呈送垣曲民报一份给社会部》（1941 年 1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社会部档案，档案号：11-1-10227。

⑧ 《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及陈述意见书》（1941 年 5 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军事 3，第 412 页。

此外，中条山根据地甚至还存在走私牟利等腐败行为，在此不再赘述。对于根据地本已存在的痼疾，蒋介石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39年12月蒋氏在致卫立煌电函中即指出：“黄河北岸各部队，据外人实地视察报告，我军士兵伙食营养不良，官长对士兵民众，更多不能时刻接近，军风纪亦不见优良。”^①问题是，由于国军上下正沉浸于中条山保卫战胜利的喜悦之中，对自身业已存在的痼疾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地的各种痼疾在中条山战役中一一暴露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 语

综上，中条山根据地的兴衰轨迹可谓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不可否认的是，根据地在保卫大后方、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日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中条山战役的失利，中条山一度由炙手可热的“媒体宠儿”迅速沦落为令国民党高层难以启齿的“心头之痛”。中条山根据地的丢失无疑有客观因素居于其中，如日军过于强大等，但根据地自身的弊病更值得玩味。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根据地诸多弊病恰是与国民党业已存在的体制缺陷难解难分，如国民党内积弊已久的派系纷争、一向孱弱的政训体制、抑制民众的统治观念、久已有之的政治腐败等弊病在根据地得以滋生蔓延，成为根据地发展的无形桎梏。^②事实上，中条山国军名义上开展的是游击战，却在战术上更多倚重阵地战，此点亦值得深思。

其实，中条山根据地的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衍射了国民党游击战的兴衰脉络。国民党游击战在1938年前后大量推行，及至1939年前后游击队人数高达80余万（不含中共），态势喜人。但是，以中条山战役的失利为重要标志，国民党游击战明显转向衰弱，在1944年4月游击队人数骤降至27万左右，^③及至抗战结束时仅留有吕梁山等少数根据地。而中共武装力量从入晋之初的三四万人至抗战结束时成长为上百万的正规军，相较之下国民党游击战的成效无疑不大。

专家荐语：

学界以往对于中共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关注较多，对于抗

① 《蒋中正致卫立煌电》（1939年12月4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六），第205页。

② 陈默：《战时国民党军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民国研究》总第30辑，2016年秋季号。

③ 参见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战期间国民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之研究相对不足,尤其对根据地个案缺乏精详的实证研究。该文以国民党中条山根据地为研究对象,对中条山根据地的成长演变及由兴转衰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归结出中条山根据地的陷落缘于国民党自身的痼疾。文章较多使用了海峡两岸的新史料,为论文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为文章增色不少。

推荐专家: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常宝副教授

拉纳·米德与中国抗战史研究*

梁 远** 王湘云***

提 要 西方关于二战的史学研究成果颇丰，但近年才对中国在二战中做出的功绩予以重视，并将中国的抗战史纳入二战的整体史学研究中。作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拉纳·米德教授通过其学术成果证实了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抗战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以该中心为平台，米德通过积极广泛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 拉纳·米德 中国抗战 牛津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抗日战场成为二战战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军民坚持长期抗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国际学术界，虽然中国军民的抗战也时常被西方学者提及，但其大多注重对中国抗日战争本身的考察，而较少将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研究之中，更谈不上对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给予公正与客观的评价。不过，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研究热潮在英美学界的兴起，这种状况逐渐得以改变。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德（Rana Mitter）教授，是新一代西方中国史研究权威，他近年发表了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700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6M592169）、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2015SD0063A）的阶段性成果。

拉纳·米德于 2017 年 5 月在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系列讲座，本文部分内容根据讲座后作者对米德进行的采访整理而成。

**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访问学者。

***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教授。

大量有关中国抗战史的论著。米德从全球史观视角考察了中国抗战的各个层面,进而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民“20 世纪 30、40 年代所进行的这场巨大灾难性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生存,还是为了东西方同盟国能够战胜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① 米德近年所从事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代表着当今英国学界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基于此,本文将着重考察拉纳·米德的学术经历、其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特点以及其领衔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活动,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抗战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东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交流与互动。

—

英国是西方汉学研究大国之一,除了历史悠久的牛津、剑桥大学之外,还有 20 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研究的相关课程,并设有相关研究机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久负盛名的机构之一。该中心现任主任为拉纳·米德教授,其走上中国抗战史研究之路,既得益于英国浓厚的汉学研究传统,也与其家庭背景和个人兴趣密切相关。

拉纳·米德 1969 年出生于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是孟加拉移民后裔。他的父亲帕尔塔·米德 (Partha Mitter) 是著名的印度艺术史学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术氛围是促使米德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重要因素。而米德对中国的兴趣,来自他对故土的关注。他发现,近代以来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印度 (二战时孟加拉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都受到二战的影响,那场战争改变了各国命运,并使得各国之间产生相互影响。^② 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发展迅猛,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使得他对“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中国”这一问题产生浓厚兴趣。

出于对中国问题的兴趣,米德投师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方德万 (Hans van de Ven, 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第十任汉学教授) 门下,后者则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米德在剑桥大学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米德来到牛津大学圣十字

^①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3, p. 14.

^② 拉纳·米德访谈节目: “China's War with Japan, a Conversation with Prof. Rana Mit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URDAT150Bs>.

学院 (St. Cross College) 下设的“东方研究院” (The Oriental Institute),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并于 38 岁时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牛津大学历来是西方汉学 (亦称中国学) 研究的重镇。1873 年, 著名传教士、汉籍翻译大师理雅各 (James Legge) 受聘担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牛津大学于 1939 年设立汉学院 (The Honor School of Chinese), 1961 年又新成立东方研究院, 其中的汉学系整合了原汉学院以及牛津大学其他院系的汉学研究机构。1994 年, 牛津大学建立中国学术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第八任汉学教授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教授担任研究所所长。^① 2006 年, 牛津又成立了跨学科性质的中国研究中心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re), 拉纳·米德自 2012 年起担任中心主任, 以此为平台大力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 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抗战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二

拉纳·米德认为,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登上世界舞台, 承担起区域和全球性的责任”。“想了解变革中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感, 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其不为人知的一面, 研究中国的二战史至关重要。”^② 因此, 米德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抗战史而展开, 大体分为三类。

首先是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在书写中国抗战史之前, 拉纳·米德于 2008 年率先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史概略》^③。这本书主要对“现代中国”进行了定义, 并对引发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各种要素进行探讨。米德的主要观点之一是: 中国的“现代”与“传统”不能被割裂看待, 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与其之前的历史息息相关, 实现“现代化”的种种要素在 1949 年已然出现。米德认为“现代性”起源于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抗日战争, 这也是他日后对中国抗战史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

①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 学苑出版社, 2007, 第 244~246 页。

② 《拉纳·米德: 一个西方人眼里的抗日战争》, <http://news.163.com/14/0823/22/A4C91NKS00014AED.html>。

③ Rana Mitter, *Modern Chin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同样是在 2008 年,米德还在《东亚研究之欧洲学刊》上发表《描画胜利:抗战的视觉映象,1937~1947》^①,以及在《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上发表了《书写战争:国民党时期的自传、现代性以及战时叙事,1937~1946》^②。在前文中,米德通过梳理 1937 年上海淞沪会战期间出版的《上海日报》及《中华日报》上刊登的内容,揭示了媒体在中国深陷战争、胜利遥遥无期之时所发挥的激励民心的积极作用。在后文中,米德通过分析两份自传式文本材料——杜重远关于早期战事的报道以及许晚成在战后写成的《笔记》,论证了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前者认为现代化可以建于战后废墟之上,后者则认为现代化的战争带来了混乱。从这些早期成果来看,米德此时关注的主要是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其研究视野也仅限于中国本土。

经过不断地沉淀、思索以及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后,米德 2013 年在英国出版了他最为世人熟知的《中日战争 1937~1945:为生存而战》一书,其在美国出版时名为《被遗忘的盟友:中日战争 1937~1945》,并随后以《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为名,于 2014 年在中国出版。^③这本书一经问世,即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并获得《纽约时报》及《泰晤士报》等多国媒体的盛赞。而随着其在中国的出版,中国各界也不吝赞美之词。此书以英语为载体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貌,使得西方读者深刻体会到中国在二战中付出的惨烈代价、进行的英勇抵抗以及其对欧洲战场胜利的重大意义。米德具备娴熟的繁简体中文阅读能力,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原始中英文资料,尤其是 2006 年起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陆续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以及战时在华外国人的描述与回忆录。而正是由于语言障碍以及二战后冷战带来的东西方对立,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这个战时盟友及其对二战的贡献鲜有了解,米德的著作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

在书中,米德从多个视角分析了中国抗战对世界二战胜利的重要作

① Rana Mitter, "Picturing Victory: The Visual Imagina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7,"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 2 (December, 2008), pp. 167-192.

② Rana Mitter, "Writing War: Autobiography, Modernity and Wartime Narrative in Nationalist China, 1937-1946,"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8 (November, 2008), pp. 187-210.

③ 英国版本: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美国版本: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中译本: [英] 拉纳·米德《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蒋永强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

用。米德认为，“如果中国放弃抵抗，其可能在1938年即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会使得日本全面控制大陆，东京（即日本方面）也可以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从而更加迅速地在东南亚扩张势力且后顾之忧大为减少”。而“（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四年，同盟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中国的参战至关重要”。^① 在二战开始的时间点上，米德也提出了有别于其他西方学者的看法。在米德看来，“尽管中日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但1937年7月7日双方在宛平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标志着二战在亚洲已经拉开了序幕”。^② 与以往欧洲学者多认为二战始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相比，米德的二战起点论肯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是对二战史研究“欧洲中心论”倾向的一种匡正。对此，中国抗战史学者周勇教授等人认为：“这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准确判断，是以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战的科学结论。”^③

其次，除对抗战史本身重点研究以外，米德还对中国抗战的后续问题及战争的影响予以特别关注。

米德于2010年在《中国历史评论》杂志发表《为战争所变：战时中国历史编纂的变化及现代中国史的新解读》^④一文。米德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事实上通过武力消解了战前国内的分裂主义（separatism）和军阀主义（warlordism），日本的占领也破坏了与国民政府不断进行对抗的区域割据势力（regional fiefdoms）。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一个主权国家的崛起，其转折点即为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条约取消美、英在中国的治外法权。这意味着战后的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战时盟国可以平起平坐。5年之后，米德又在《英国皇家国防联合研究院特刊》上发表《二战的结束与东亚地缘政治的塑造》^⑤一文，提出了当今东亚政治局势与二战的“未竟事务”（unfinished business）息息相关这一论断。米德认为，二战后欧美虽然一度出现僵局，但对于纳粹德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其对欧洲安全造成了威胁，必须被彻底击败。而同时期的东亚

①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p. 387-388, 6.

②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p. 69.

③ 周勇、吴兵：《名至实归：评米德著〈被遗忘的盟国〉》，《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Rana Mitter, “Changed by War: The Changing Historiography of Wartime China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7, No. 1 (January, 2010), pp. 85-95.

⑤ Rana Mit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Shaping of Geopolitics in East Asia,” *The RUSI Journal*, Vol. 160, No. 4 (July, 2015), pp. 14-17.

各国并没有就战后问题进行多国会谈,也没有签订和约以组建类似于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华约的组织。冷战进一步带来了中国与西方的隔绝以及亚洲内部的分化(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成为美国的同盟),从而导致了当今东亚与欧洲相比并不够和谐的政治局势,如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仍存在争端。米德对中国抗战后续问题及其影响的研究,延续了其将中国抗战问题放在世界格局中进行考察的特点,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认识当今中国及东亚国际格局。

最后,拉纳·米德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考察民族主义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将民族主义研究与中国抗战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尽管当时中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军阀割据局面,但在国家危亡时刻,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由此铸就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米德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1999年,米德就在《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同谋、镇压及区域主义:闫宝航与向心民族主义,1931~1949》^①一文,关注了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及其构建过程中的矛盾现象。通过考察沈阳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闫宝航的生平及著述,米德认为,由于战争的冲击,以闫宝航为代表的拥护东北自治的区域主义被迫转变为向心的民族主义,即建立中央集权国家。2000年,米德又出版了《满洲谜史: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与通敌》一书。^②尽管此书研究的时段在1928~1932年,但米德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这一早期阶段,抗日活动并未受到“民族主义”驱使,而是出于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认同。而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活动起到了将“现代民族主义”概念引入抗日战争的作用,从而成为抗日宣传的有力武器。

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都有遭受殖民入侵或殖民统治的经历,其民族主义的兴起多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历相关。米德不仅详尽考察了中国民族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兴起,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了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异同,进而为学界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提供了参照系。2013年,米德发表《东亚的民族主义,1839~1945》^③,对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进

① Rana Mitter, "Complicity, Repression, and the Regionalism: Yan Baohang and Centripetal Nationalism, 1931-49," *Modern China*,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p. 44-68.

②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③ Rana Mitter,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1839-1945," John Breuill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行了比较研究。米德认为，民族主义是塑造现代东亚最有力的意识形态，三国都在19世纪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吸收至本国的政治思想中，并将其应用于20世纪的各种改革和革命活动之中。日本的民族主义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成为国家经济振兴的基础，而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都主要由二战中的抗日活动所塑造。米德认为，日本的“反理性（anti-rational）民族主义”过于重视本民族的特性，而忽视了与东亚其他政体（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韩两国）的共性，因而日本最初“看似成功的民族主义”经过“泛亚主义”（pan-Asianism）阶段后事实上演变为“帝国主义”，最终成为其自我毁灭性战争的重要根源。中国的民族主义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在二战中则历经了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伪满洲国提出的“王道主义”（The Kingly Way）以及汪伪政权提出的“事仇民族主义”^①（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与日本“背离现代性的理性与科学”而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以及韩国二战后仍未完善的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看似失败的民族主义”经过二战的洗礼，以二战中“1500万~2000万人死亡、8000万~1亿人流离失所”为惨重代价，却最终在1949年造就了崭新的民族国家。

总体而言，拉纳·米德的研究，不仅是中国抗战史本身，还包括与抗战相关的各个领域，如民族主义等。米德的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他注重将中国抗战以及社会变迁放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来考察，由此凸显中国问题的世界性意义。例如，米德对“中国为世界二战做出重大贡献”的论断，不仅建立在中国为东方战场的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基础上，还包括“中国的抗战极大消耗了日军力量，为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行动赢得宝贵时间”，以及“积极参与开罗会议、创立联合国等重大国际活动”等方面。由此可见，米德强调指出，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源自其“战时和战后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做出的所有贡献。^②米德的这一论断，建立在翔实的史学分析基础之上，因而在西方乃至中国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

三

拉纳·米德除了本人在科研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之外，还以牛津大学中

^① “事仇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汪伪政权的通敌主义或投降主义。

^② 周勇、吴兵：《名至实归：评米德著〈被遗忘的盟国〉》，《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

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通过开展“中国抗日战争项目”,积极推进西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以及各国学者的合作交流。

自 2007 年起,中国研究中心得到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 (Leverhulme Trust) 的资助,设立了“中国抗日战争项目”(China's War with Japan Program)。该项目由拉纳·米德主持,团队成员包括加拿大学者赖小刚 (Sherman Lai)、美国学者海伦·施奈德 (Helen Schneider) 和马修·约翰逊 (Matthew Johnson)、来自中国的聂洪萍 (Annie Hongping Nie)、来自澳大利亚的詹姆斯·莱利 (James Reilly) 等十余人。作为该项目主持人,米德除本人发表了大量著作外,还致力于与各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合作,具体活动包括共同搜集整理相关史料、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开展交流项目等。

在国际学术会议方面,米德在牛津大学筹办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学术论坛,吸引了东西方各国学者的广泛参与,主要包括:2009 年的“如何讲述故事:东亚战时一代及其战后历史记忆”讨论会,2010 年的“中日关系长弧:三个时代中国看与日本战争、合作和冲突”和“全球化世界中的跨国历史:过去与现状”研讨会,以及 2011 年的“1937~1949 年战时和战后中国的救济与重建”研讨会。2011 年研讨会结束后,拉纳·米德与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海伦·施奈德作为共同主编,在《东亚研究之欧洲学刊》出版了一期名为《战时中国的福利、救济和重建》的专刊,共收录了 7 篇此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涉及社会生活、救济、工业、妇女、重建等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①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2010 年,牛津大学与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合作,在威尼斯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会后,拉纳·米德与曼彻斯特大学的艾伦·威廉·摩尔 (Aaron William Moore) 作为联合主编,在《近代亚洲研究》上策划了题为《二战中的中国,1937~1945:经验、记忆与遗产》的专刊。这一专刊共发表研讨会上的 9 篇文章,米德在引言中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在塑造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② 专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体验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Experiencing China's War with Japan: World War II, 1937 - 1945);第二部分题为“牢记中日战争:战后中国及东亚的战争一代”(Remembering China's War with Japan: The Wartime Generation in Post-war

① 王爱云:《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2015 年第 9 期。

② Rana Mitter and Aaron William Moore, "China in World War II, 1937 - 1945: Experience, Memory, and Legac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2 (March, 2011), pp. 225 - 240.

China and East Asia)。这9篇文章的作者来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内容则涵盖中日战争中难民安置、行政改革、情报宣传、日军暴行、战争回忆等方面，体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跨国合作新趋势。

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合作交流，更是拉纳·米德与中国研究中心工作的重心。2012年12月，米德代表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重庆图书馆就共同开展“西方视域中的抗战重庆（1937~1945）”研究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牛津大学将协助后者搜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与同盟国进行合作抗战的档案资料，双方共同整理现藏于英国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档案，并开展战时中英关系研究等学术活动。2013年9月，米德又代表牛津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西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在重庆联合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研讨会。^①2015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米德受邀参加这次会议，并做了题为《抗日战争记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的报告。米德认为，与前辈学者相比，目前西方历史学家对于中国在亚洲对二战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更高评价。2016年4月，米德邀请中国著名导演陆川访问中心，陆川围绕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南京！南京！》发表演讲并与中心师生进行座谈。201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代表团访问“中国研究中心”并与米德进行座谈，米德为代表团介绍了英国学界在二战史研究方面的重点和方法。^②米德所主持开展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国际性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除了推动中国抗战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外，米德还在牛津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近现代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米德所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的政府与政治”“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近代中国政治与历史”等。他所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为其学术团体的骨干力量，为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增添了新鲜血液。“中国抗日战争项目”中的成员弗雷德里卡·弗兰提（Federica Ferlanti）、马德云（Tehyun Ma）以及艾伦·威廉·摩尔都是米德的博士后。弗兰提任教于卡迪夫大学，研究方向主要为抗战时期国民

① 周昌文：《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动态》，《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官网：<http://www.chinacentre.ox.ac.uk/category/news/>。

党政府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马德云任教于设菲尔德大学，她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战后的重建问题。她还策划了“视觉中国”项目，对中国历史照片进行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使得现代人可以直观面对历史。摩尔现任教于爱丁堡大学，他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抗战时期的青少年问题，包括对英、日、中、俄等国战时青少年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中国抗日战争项目”成员还包括米德的博士生，他们毕业后都任教于知名科研院校，继续从事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和教学。常丽丽 (Lily Chang) 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她的研究兴趣为抗战时期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以及战争对其的影响。艾利娜·辛肯恩 (Elina Sinkkonen) 任教于芬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领域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东亚安全以及中日关系。托比·林肯 (Toby Lincoln, 林涛) 任教于莱斯特大学历史学院城市史中心，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抗战时期的城市史。他于 2015 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时期中国的城市化》^① 一书，以无锡为案例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林肯认为，20 世纪之前，中国城乡之间并不存在“鸿沟” (gap)，而是一片“连续区间” (continuum)，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生活逐渐延伸至乡村地区。林肯还发表了《从暴动到救济：中国敌占区的大米、地方政府与慈善》^②、《战争中的乡村与城市：中国抗战时期的侵略与重建》^③ 和《逃离烽火：抗日战争期间的政府、城市、同乡会和难民》^④ 等论文。

米德所培养的博士生或博士后，在各自高校均开设了中国抗战史方面的课程，譬如弗兰提在卡迪夫大学开设“民国时期的冲突、压制与全民动员，1911~1945”“中国政治与社会史：1840~1919、1919~2000”等课程；马德云在设菲尔德大学开设“为中国未来而战：1839~1949”和“东亚日本帝国：1895~1945”课程；林肯在莱斯特大学开设“走近巨龙：近代中国史，1839~1989”以及“两强相争：20 世纪中日之战”等课程。

① Toby Lincoln, *Urbanizing China in War and Peace: The Case of Wuxi Coun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② Toby Lincoln, "From Riots to Relief: Rice, Local Government and Charities in Occupied Central China," Katarzyna J. Cwiertka ed., *Food and War in Mid-Twentieth-Century East Asia*, London: Ashgate, 2013, pp. 11-28.

③ Toby Lincoln, "The Rural and Urban at War: Invas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38, No. 1 (January, 2012), pp. 114-132.

④ 林涛：《逃离烽火：抗日战争期间的政府、城市、同乡会和难民》，喻满意、许哲娜译，《城市史研究》第 28 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 143~163 页。文章英文标题为“Fleeing from Firestorms: Government, Cities, Native Place Associations and Refugees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与米德侧重在政治领域研究中国抗战相比，其学生则致力于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方向扩展到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更广阔的领域，由此推动了中国抗战研究在西方高校和学术界的扩散，让更多人关注中国的抗战以及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

由此可见，拉纳·米德以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为学术平台，通过积极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增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史以及战时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中国研究中心也由此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居于突出地位”。^①也正是基于米德在中国抗战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2015年，他当选为英国国家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综上所述，作为西方新生代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拉纳·米德以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科研成果，证实了中国抗战在世界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对中国抗战予以高度评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界忽视二战中中国战场的局面。米德所促成的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中国学界不懈的努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正逐渐突破中国的国家范畴，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②但客观而言，米德及其团队的学术成就并不意味着西方学界主流或普通民众对中国抗战史拥有相似的学术观点和感情倾向。例如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就认为，米德的论断“只反映了部分关注东方战场的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尚不能说明西方学界已经普遍认同中国抗战的地位”，而且西方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尚非“显学”。^③由此看来，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深化以及促成中国抗战贡献在全世界范围的认同，仍需要国内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而拉纳·米德所做出的学术贡献非常值得中国学界借鉴。

① 周昌文：《西方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动态》，《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 周勇、吴兵：《名至实归：评米德著〈被遗忘的盟国〉》，《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

③ 梁占军：《二战论功，中国为何被忽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906/15/17132703_497264209.shtml。

“李顿调查团”研究的回顾与深化

黄金宽*

提 要 作为抗战初期国际联盟调解中日纠纷的重要举措，“李顿调查团”从成立起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升温以及有关资料的整理和应用，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不断深入，“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得到更为客观的分析。与此同时，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探索空间。如何从研究资料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出发，突破既往研究形成的学术瓶颈，仍是该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李顿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成立调查团专门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所谓“满洲问题”和中日矛盾做调查。由于该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Victor Bulwer-Lytton）任团长，故常被称为“李顿调查团”。1932年2月初李顿调查团从欧洲出发，首先途经美国访问日本，3月14日抵达中国开始调查活动。虽然调查团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受到日本的严密监控和安排，但还是接触到大量中国民众、士兵和学术团体。1932年10月，调查团发表了共计十章、十几万字的报告书。在重重压力下，《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最终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并提出国际共管计划。这一调查结果对当时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从“李顿调查团”的成立、其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到最后报告书的发表，都是中、日、国联等各方角力的结果。有关“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研究，成为远东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日、英三国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于“李顿调查团”，西方学界的研究较早，且大多侧重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和条约体系等方面展开。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7年和1964年出版了美国学者韦罗贝（Westel Willoughby）的《中日纠纷与国联》^①和英国学者华尔脱斯（F. P. Walters）的《国际联盟史》^②。前者是这一时期研究民国政府对外关系的较有影响力的著作，该书介绍了当时国联和国际条约在处理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着重探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联处理中日纠纷的活动。后者是研究国联历史的重要著作，在第40章“满洲”中，作者肯定了国联的这次行动，认为李顿调查团的活动确有种种不足，但“他的最后报告将证明对中国的事业是一个这样出色的贡献，以至于补偿它开始的缺点而绰有余裕”。^③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索恩（Christopher Thorne）的《有限的外交政策：1931～1933年的西方、国联与远东危机》^④分析了在“满洲危机”时英美法的外交政策。伊恩·尼什（Ian Nish）则更加侧重在日本内政和外交以及英日关系方面进行研究，他的《日本与国际主义的斗争：日本、中国和国联（1931～1933年）》是相关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⑤相关研究还有：萨拉R·史密斯（Sara Smith）的《满洲危机（1931～1932年）：国际关系的一场悲剧》^⑥、贾斯特斯·德内克（Justus Doenecke）的《外交挫折：斯坦利·K·霍恩贝克文献中1931～1933年的满洲危机》^⑦，等等。总体而言，西方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重点放在国际外交的层面，英美等大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态度和决策以及英日、英美国际关系是其研究核心，中国民众在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被忽视。

海外研究的另一中心是在日本。作为当事的一方，日本国内关于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研究成果颇丰。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⑧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著，该书第10章专门探讨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① [美] 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薛涛衡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

② [英]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卷，封振声译，商务印书馆，1964。

③ [英]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卷，第27页。

④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2.

⑤ Ian Nish, *Japan's Struggle with Internationalism: Japan,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1-1933*,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⑥ Sara R. Smith,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1932: A Trage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⑦ Justus Doenecke,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 Hornbeck*, Palo Alto: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1.

⑧ [日] 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李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与日本外交政策转变的关系。《日本外交史》是日本官方编纂的一套近现代日本对外关系史丛书。其中第 18 卷《满洲事变》系统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到日本退出国联之间的中日关系史。^①此外,海野芳郎的《国际联盟和日本》^②、臼井胜美的《满洲事变》^③、加藤阳子的《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④等书,也是相关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日本学界研究的特点是多从国内危机出发解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学界普遍将之与日本外交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外交失败的结果。

国内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起步较早。如王造时在 1932 年国联介入中日争端后就编写了《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⑤一书,对国联及其调查团在中国的活动做了介绍,并呼吁民众不要过分依赖国联的调解。1966 年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撰的《台湾中日外交史料汇编(五):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⑥,是研究国联处理中日纠纷的重要成果,该书的第 2 章“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行为之处理”,从中国的申诉、国联的讨论、调查团的成立与调查、调查结果等方面入手,详细考察了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过程。20 世纪 30 年代曾担任过中国驻国联行政院副代表的金问泗在 1967 年发表传记著作《从巴黎和会到国联》^⑦,记录了国联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纠纷。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⑧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史料。九一八事变之后,顾维钧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李顿调查团,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直接相关人,他在回忆录中较为翔实和客观地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实还原上,对调查团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研究尚不充分。

在评价李顿调查团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国内相关著作较多地强调李

① [日]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 18 卷《满洲事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3。

② [日]海野芳郎:《国际联盟和日本》,原书房,1972。

③ [日]臼井胜美:《满洲事变》,中央公论社,1974。

④ [日]加藤阳子:《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岩波书店,2007。

⑤ 王造时:《国际联盟与中日问题》,新月书店,1932。

⑥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撰《台湾中日外交史料汇编(五):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6。

⑦ 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⑧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

顿调查团的软弱妥协性，对其整体评价多为负面。^①事实上，李顿调查团的调查结果中，不少结论是客观并对中国有利的。仅就李顿调查团最终形成的报告书而言，我们就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其中虽有罔顾事实、从西方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有利于英美等列强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分析和判断，如对中日冲突的原因分析以及对“满洲”未来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等，但更多的是较为客观公正的论述，如在对待“满洲国”合法性的核心问题上做出的否定结论、否认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是出于自卫、要求日本侵略者撤出东北的提议等。可以说李顿调查团对于事件的真实陈述部分，大大有利于当时中国对日斗争和赢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正因为如此，日本在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即表示强烈抗议，并宣布退出国联。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抗战史研究的升温以及有关历史事件的档案、书信和笔记等的整理，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开展。国内学界开始对一味否定李顿调查团的既有观点进行反思。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得到一分为二的分析，积极评价也日益增多。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其一，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不断有创新观点涌现。徐蓝在《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②一书中认为，李顿调查团揭示了英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既希望不过分得罪日本又要防止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矛盾心态，报告书的最终结论也受到英国维护在华全局利益和国联威信这些需求的影响。1997年，俞辛焯的《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③出版，该书运用大量中日双方的原始档案，着重研究和阐述1931年9月事变发生至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期间的中日外交。该书从欧美列强对待中日实行双重外交政策的角度来阐释九一八事变期间国联周旋于中日之间的外交活动。在讨论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时，作者用“双重性”这一概念指出调查结果是由欧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既袒护日本又与其争夺利益的双重性决定的。

其二，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积极意义得到肯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当给予李顿调查团更加积极和客观的评价，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调查团报告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使中国在道义上获得国际支持方

① 相关评价，可参见刘陵、洪育沂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简编——半个世纪世界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和方连庆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等通史著作中的有关章节。

②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③ 俞辛焯：《唇枪舌剑——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面所起的作用。如周美云就认为部分研究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否定态度有欠公允，只看到该报告书妥协软弱的一面，而未能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分析其积极作用”，“毫无疑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所陈事实和调查结论主持了公道，意义很大”。^①张敬祿的《评〈李顿调查报告书〉》、洪岚的《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董亮的《重评李顿报告书》等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积极意义。^②这些研究大多从调查报告本身及其实际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出发来进行探讨，突破了过去单纯从大国关系来定义和评价李顿调查团的理论束缚。

其三，注重研究当时国内社会各界对调查报告的态度。如杨淑新的《李顿报告团赴华调查及中国社会各界反响》^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精英为主的舆论界对调查的看法；陈积敏、赵金金的《中国公众舆论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反响》^④、王兴全的《中国新闻界对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评价》^⑤和石威的《知识分子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回应的历史考察》^⑥，则分别研究了国内民众、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对报告书的态度和评价。2010年出版的洪岚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⑦是研究中国与国联关系的专门性著作，在其第4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各界的反响”中对中日各阶层以及美苏和国联的态度有着细致的考察。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史学界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一些历史遗留的成见也得到一定纠正，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总体上对当时中国是有利的”这一观点上基本上达成共识。不过，笔者认为，在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化与多元化的今天，关于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首先，研究对象应该更广泛，应给予当时国内民众活动更多关注。李

① 周美云：《重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② 参见张敬祿《评〈李顿调查报告书〉》，《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洪岚《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董亮《重评李顿报告书》，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0。

③ 杨淑新：《李顿报告团赴华调查及中国社会各界反响》，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

④ 陈积敏、赵金金：《中国公众舆论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反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⑤ 王兴全：《中国新闻界对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评价》，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

⑥ 石威：《知识分子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回应的历史考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⑦ 洪岚：《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顿调查团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企图调解中日矛盾的一次尝试，不仅英美法等大国严重关切，在当时中国国内，上至国民政府，下到地方军队、人民群众都对调查团寄予厚望。李顿调查团在华活动期间，虽然受到了日军的严密监视，但中国的党政机构、地方军队、社会团体和地方民众还是通过大量的陈情书、函电等方式向调查团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期望其能维护正义。近年来，学界对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但目前对李顿调查团来华期间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民众活动的研究还显单薄。深入研究中国民众在调查期间的活动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方面，中国民众的热情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民众爱国热情的高涨、民族认同的加深，而民众是对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根本力量来源；另一方面，民众的活动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为，直接影响到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撰写，为中国在东北地区对抗日本侵略提供合法性。

2010年，沈阳“九君子”之一的巩天民的后人从日内瓦将当年由“九君子”冒险上交给李顿调查团的TRUTH（《真相》）史料复印后带回国内，使得这份尘封近80年的文献得以重见天日。TRUTH是“九君子”经过40余天的搜集整理上交给国联的揭露日本侵华事实的报告，该报告在李顿调查团最终定义九一八事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研究TRUTH的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深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爱国民众抗日救国活动的研究。此外，最近由文俊雄选辑出版的《中国东三省各界人士致国联调查团函电选》和《国联调查团收函电选》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民众抗日运动的重要史料。

其次，应当更加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以便我们更为深入地还原史实。目前而言，国内关于李顿调查团一手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国内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的当时国内的报刊、官方和私人信件、日记和回忆录等。但在整理和研究国内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应多注重国外相关主题史料的收集。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国外资料的收集应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是国联档案和国联调查团成员在当时留下的备忘录、日记和私人书信等外文资料。国联的相关档案部分，包括“李顿调查团”来华期间所搜集到的各种档案，连同国联存续期间所产生和保存的档案，现在都保存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图书馆档案部。这些材料不仅包括调查团在上海、北平、东北等地收到的来自中国官员、军队、民众的信函、电报、申述书等重要历史资料，还有李顿调查团工作档案、调查团收到的日方档案、国联有关东北问题的文件等方面档案。目前这些档案已有部分收集回国，有待深入研究。

此外,在英国赫特福德郡内华斯庄园存放着李顿本人的大量书信手写稿。原件已被抄录,近年来一些翻译稿也相继在国内发表,这些资料应当注意应用。调查团在调查时期形成了除《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外的其他多种资料,这些资料在战后成为指控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证据和判决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资料的深入研究和挖掘还未广泛展开。

另一方面是英国和日本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英国是当时国联的主要成员,国联来华调查团李顿团长是英国人,可以说英国的政治意图对调查团有着很大的影响,研究当时英国外交政策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的形成。有关英国政策部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献》(*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等系列档案文献集都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在《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中,《英国外交政策档案(1919~1939)》系列二之第7~11卷分别是“1929~1931年的中国事务和日本在满洲里的行动”“1929~1931年的中国问题”“1931~1932年的远东危机”“1932年3~10月的远东事务”“1932年10月13日~1933年6月3日的远东事务”。这些档案卷宗中不仅包含英国在制定处理中日矛盾政策时的背景、制定过程和影响等方面内容,还有大量档案直接涉及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在《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献》中,其第二部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系列E(亚洲)总计50卷,共有48卷涉及1914~1939年的中国和日本,其中第39~41卷包含大量有关1930~1933年中日矛盾及调解的备忘录、信函、电报等,是研究李顿调查团问题不可或缺的材料。

作为当事国,日本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军部、内阁、重臣的书信、电报、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日本方面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印证和补充作用。日本方面重要的原始文献包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情报》等。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学者运用大量日方资料进行佐证,从日本视角反观“李顿调查团”,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最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应当更多元化。研究方法上,不仅要有考证史料基础上的实证性研究,还可以借鉴相关的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对诸如“国际调解、民族危机与中华民族认同”“大国关系与区域纷争”等问题进行探索。在研究视角上,不仅可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还可以从当时重要的英、美、日、苏等大国的视角进行探寻。

这方面，国内的学者已经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郑晓容的《论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①一文从防范苏联的角度解释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行为，认为国联对日本侵华态度的根本动因在于反苏和压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董亮的《重评李顿报告书》则侧重从日本对李顿报告书的態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此外，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还应该有全球性的视角。调查团的中国之行是国际力量和东亚国家的一次互动，其内涵不仅包括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美关系、英日关系、英美关系等都应当被纳入该研究的考察范围。可见，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可以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以国别的、区域的甚至全球性的视角进行审视和探究。

总之，李顿调查团来华是抗战前期国际调解中日矛盾的一次尝试，其调查结果对中日双方和国际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国内学界对此虽已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仍有很大空间可深入挖掘。有必要在占有更多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多样的视角出发进行发掘探究。

^① 郑晓容：《论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9年第2期。

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 英**

提 要 滇缅公路危机是海内外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国内学者主要从厘清英国与危机关系、国民政府外交行为、中英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远东政策、日本战争决策等视角进行观察，他们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海内外学界，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仍存在歧见，未来的研究需要注意加强与危机相关的细节性探讨，同时转换研究视角，加强发掘、整理及利用与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相关的一切史料，在充分占有及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对滇缅公路危机做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 滇缅公路危机 中英关系 抗日战争

1940年6月，日本为加快攻陷中国、打通“南进”通道的步伐，武力胁迫英国封锁由其控制的中国接受外援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此引发英、日、中三国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外交危机，史称滇缅公路危机。滇缅公路危机对于远东战局产生深远影响：英国暂时免于两线作战的境地，日本获取进攻中国和东南亚的绝佳战机，中国抗战陷入困境。滇缅公路危机，长期以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英国是滇缅公路危机的重要决策方，因此厘清英国与危机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研究的起点。徐蓝在《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①一文中，将考察视角对准中、英、日三方，通过对大量英文、日文外交档案的梳理，较全面地呈现了英国处理危机的进程。在她看来，英国对于滇缅公路危机的态度，是其长期对日绥靖政策的必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英国对中国台湾政策的演变研究（1945～1958）”（15CZS054）的阶段性成果。

** 王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徐蓝：《英国与滇缅公路危机》，《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结果。在《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①一书中，徐蓝通过对1931~1941年中日战争期间不同阶段的典型事件进行分析，说明英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强调滇缅公路危机是抗战以来英国最后一次对日实行绥靖政策。徐蓝对于滇缅公路危机的评价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对于滇缅公路危机也有不同层面的探究。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②，将滇缅公路危机置于中英关系历程中加以考察，其结论是：中国国力虚弱，力争英国支持，而英国却只根据自身实际利益来制定对华政策。王建朗的《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考察之二》^③一文，从英国所处环境、禁运造成的实际危害、危机中要求议和的对象、英国决策人物对议和的想法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过程，认为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内容来讲封闭滇缅公路与“慕尼黑”都有很大差别。总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学界几乎都是将滇缅公路危机置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因而对于危机前后英国的态度或政策加以批判。

抗战时期，中国战争物资主要靠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援助，因此争取外援、保证外援输入安全是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点。滇缅公路危机主要关涉外援输入通道问题，因此妥善处理危机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国民政府如何处理滇缅公路危机呢？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④，利用国民政府的外交档案，分析这一时期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的政治行为，阐释了他在英美之间谋求滇缅公路危机解决的努力。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⑤一文，利用《王世杰日记》《王子壮日记》《冯玉祥日记》《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徐永昌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等丰富的一手文献，从外交史角度分析滇缅公路危机期间国民党高层的外交谋略和应变之举，对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②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③ 王建朗：《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④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⑤ 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进入 21 世纪后,英国档案文献尤其是外交文献的大规模解密有力地推动学界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的研究,出现了以杨东《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① 为代表的新成果。该文通过解读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还原了英国外交部面对危机时内部冲突、态度变化以及处理此事件的原则和妥协,认为在危机中英国通过对日妥协换取远东和平,做出了特殊努力,与《慕尼黑协定》有本质不同。该文建立在非常翔实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分析深刻,说服力较强。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滇缅公路危机的研究比较深入,资料运用翔实,其研究内容和范式由厘清危机发生的本源转向分析中英(外)关系、中国外交特点,并再次转回事件本身。具体来看,滇缅公路危机发生时,英国对策及其演变、国民政府外交转向、日本战略谋划得以厘清并有新进展。在中英关系方面,学界普遍认同危机发生时,英国牺牲中国利益是其对日妥协的表现;日本对华战略方面,日本是结合当时国际战争局势,在“南进政策”指导下,利用英国外交特点实施尽快占领中国的政策。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中,国内学者也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英国在危机中,曾尽量争取自主权并为中国谋取部分利益,并且希望中日之间达成“和解”;二是美、苏两国也都不同程度介入危机,并对危机的走向产生一些影响力。不过,学者对于这些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关注相对较少,长期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式”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审视。

以上是对国内学界研究成果的一个简要评述。事实上,国际上尤其是英、日、美等国学者对滇缅公路危机问题也有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做了一些开拓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轰炸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英、美与日本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滇缅公路危机正处于英、美与日本关系转变的关键节点,它因此成为英国学者考察的一个重点。彼得·洛在《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1937~1941)》^② 一书中,对滇缅公路位置、作用、地位以及英国处理危机时本土与殖民地、外交部与战时内阁意见及分歧,英国与日本关系变化等做出全方位透视,最后作者认为,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这一决定“虽然是不必要的,但是在

① 杨东:《再谈滇缅公路的关闭——英国外交部决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②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欧洲战事紧张的情况下，避免冒险依然是明智之举”。^① 安东尼·贝斯特在《英国、日本和珍珠港（1936～1941）》^②一书中，按照危机发展进程，将其分为六个阶段；通过英国与日本在这六个阶段的交涉，说明滇缅公路危机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证明日本难以被“绥靖”的危机。该书特别将视角对准克莱琪，以及英国与苏联、美国、日本的互动，通过比较形成对当时历史背景真切的叙述。

滇缅公路危机处于英美在远东“主导”地位更换的重要时期，美国学者尼古拉斯 R·克利福德在《撤离中国（1937～1941）》^③一书中，通过分析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举措，说明英国一直将远东置于欧洲事务之下；滇缅公路危机发生的过程也是深陷欧战危机的英国谋求将美国推上远东主导地位的过程，滇缅公路的封锁预示着英国退居“幕后”，美国走上“台前”。日本是引发滇缅公路危机的主要国家，该国学者主要是将其置于“南进政策”之下进行阐述。其中有相当影响的是《重光葵外交回忆录》^④。该书虽是回忆录，但笔触严谨，提及了近现代日本外交史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外务省要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然而对国际形势误判的军部在控制日本局势后，却主动挑起危机，其应负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海外学者较早就从不同角度入手，对滇缅公路危机进行研究，其中对危机发生时的国际形势、各方决策细节都有相对深入的考察和评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同时，不足也是存在的。首先，他们在研究中，较少关注中国方面的行为，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存在片面性问题；其次，研究的视野仍受限制，各国学者因立场不同对危机的评价，尤其是对英国的评价有较大差异。总之，厕身于不同环境之下的海内外学者对危机的叙述和论断仍存在歧见。有鉴于此，笔者就如何深化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首先，要加强对滇缅公路危机的细节性探究，进而为研究的深化提供基础。细节性探究绝非将与危机有关的细枝末节史料进行简单堆积，而是通过对危机相关的重要细节进行剖析，挖掘危机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使

① 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 p. 174.

② Antony Best, *Britain, Japan and Pearl Harbor: Avoiding War in East Asia, 1936-1941*, London: Routledge, 1995.

③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6.

④ [日]重光葵口述《重光葵外交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知识出版社，1982。

相关研究更加充实、有说服力。正如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所言：“期望发现重要细节并准备向它敞开心扉，从而让细节披露事件的真相，这是历史学家一半的研究装备。”^① 在此强调的细节，主要是滇缅公路运输量变化，重要外交官以及最大援华国苏联在危机中的表现等。

封锁滇缅公路使援华物资输入受限是日本挑起滇缅公路危机的主要目的，^② 英国也因同意日本此要求而饱受批评。滇缅公路封锁后，援华物资量的变化，直接关涉我们对滇缅公路危机本身的评价，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援华物资量的变化都只是推测，并没有准确数据。^③ 因此，未来我们需要调查清楚在封锁期间，每月通过滇缅公路输入的援华物资量如何、同比和环比有何变化，封锁期间中国接受的所有援华物资又是多少、同比和环比是怎样，受危机影响而减少的援华物资又有多少。这些细节研究清楚后，我们才能对危机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做出更客观的评价。

在滇缅公路危机中，著名的外交官如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 (Earl of Halifax)、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 (Robert Craigie)、日本外相有田八郎 (Hachiro Arita)、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 (Mamoru Shigemitsu)、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蒋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等彼此间的交涉与个人行为，对于危机的发展走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这些外交官考虑的重点是什么，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又是怎样，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目标达成如何，在危机的爆发、延续和解除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厘清这些关键人物的行为特征，有助于把握各国外交和决策的特点，实现历史研究的价值。

在滇缅公路危机中，英、日、中三方处于矛盾的中心，美国是重要的“第四方”，他们的关系和作用已经明确，但是还有一个大国对于危机的影响不容忽视，那就是苏联。1937 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就

① [美] 巴巴拉·塔奇曼：《实践历史》，孟庆亮译，新星出版社，2007，第 38 页。

② 1947 年 8 月 14 日，泽田茂 (Shigeru Sawada) 在东京审判庭提供的证词中声明切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主要是因为它们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外援输入通道。见“Tuesday, 26 August 1947”，“庭审记录”，“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第 43 卷，第 503~744 页，微缩页码：26754-26889。(注：为行文一致，日本人名统一标注罗马音)

③ 关于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导致援华物资受限的问题，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援华军用物资全部受限 [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1941)》，第 350 页]；第二种认为军用物资受限较小 (见王建朗《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1 期)；而第三种认为“公路封锁的三个月期间，由于北缅掸邦的英国监督暗中通融，中方军用物资仍能照常输入国内” (见施曼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西北的国际公路》，台北，正扬出版社，1983，第 108 页)。

大幅度增强对华援助力度，不过其与日本也有联系，同时与中日双方又都有嫌隙，英国在对日谈判中曾试图用苏联制衡日本，苏联是第一个批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的国家。危机之中，中国是否争取苏联来支持自己，滇缅公路被封锁后苏联援华物资如何输入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苏联与各方之间复杂奇诡的外交关系又是如何变化，各方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争取有利局面，这就需要结合各国档案进行深挖，以实现危机研究的深化。

其次，需要转换视角，关注中英两国社会各方在危机前后的真实反应，尤其是了解英国政府、议会和民间对危机的实际应对，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分析英国的行为，进而对滇缅公路危机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透视和分析。

一般谈到滇缅公路危机，国内学者即批评英国不顾中国抗战需求对日妥协，甚至指责英国推行对日绥靖政策；而英国学界则强调英国是在万不得已之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诚然，在危机中英国确实从自身利益出发，为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而不断妥协退让。然而，因为中英两国国情和受危机影响程度不同，所以我们只有将英国的行为放回历史场景，在国家政策行为的语境下推敲英国为何制定这般政策，尤其是其政策制定过程中是否照顾到中国“情感”，出台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进行利益倾斜，政策的执行是否考虑到尽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不良影响；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滇缅公路危机解决方案的最低预期是什么，英国的解决方案多大程度上偏离中国的预期以及滇缅公路的封锁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事情本质，推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更加深入。比如英国外交部在进行决策时宣称雨季封闭滇缅公路对援华物资输入影响有限，这一说法是为了敷衍中国政府，还是经过了严密的考察？因为封闭滇缅公路而减少的运量，英国是否考虑到解决方案？英国在与日协议中说明封闭公路三个月是希望中日在此期间能够商讨出解决战争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英国基于哪些思想的影响而要求中日和谈，其是否确信中日之间有和谈可能，其对日本、对中日关系、对英日关系的定位又是怎样的？笔者从英国战时外交档案中发现，在制定滇缅公路危机政策时，英国外交部关于滇缅公路三个月雨季的运量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实。^①可见，英国在危机处理中

^① 1940年7月10日，克莱琪发给外交部电报，确认滇缅公路运量以及当年雨季情况，见“Sir R. Craigie to Special Distribution and War Cabinet”（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F03568/93/10, No. 1206, F. O. 371/24667, p. 34）；7月13日，战时内阁给克莱琪发电说明因缅甸海关的关系之前的运量数据有误，需要重新分析。见“Foreign Office to Sir R. Craigie”（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F03568/43/10, No. 702, F. O. 371/24667, p. 49）。

极其审慎。当然,对此我们还需要再进行综合分析考证,才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答案。

抗战以来,英国一直有一股支持中国的民间力量。商人团体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壳牌石油英国分公司(Shell Chemical UK Limited)、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Group)等一贯要求英国对日强硬;社会团体如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英国国联同志会(The British League of Nations Union)等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对于封锁对中国抗战极其重要的滇缅公路,这些民间团体极其反对,他们不断提出抗议。对于英国社会各方对危机的真实反应,目前较少关注。英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意会影响政府行为,这些民间团体在英国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英国议会讨论中,这种民意是否被有效代表?中英之间是否在进行民间外交活动,这种民间外交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这些内容都关涉危机对英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以及中英关系,值得继续探讨。

最后,在史料方面,要加强发掘、整理及利用滇缅公路危机研究相关的一切史料,在充分占有及研读史料的基础上,对于滇缅公路危机做出客观评价。众所周知,“论从史出”,只有拥有丰富的史料,关于滇缅公路的众多研究设想才有可能实现。虽然滇缅公路危机只有四个月时间,仅涉及两方五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中、日、英、美、苏,但其包含的内容却比较丰富。因为危机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传统史学隐含着民族主义价值倾向,所以我们在搜寻资料时要保持客观理性,不因个人偏好而摒弃某些材料的寻找和使用,尽力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实现资料搜集的全面、准确。以英国处理滇缅公路危机的性质研究为例,国内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英国牺牲中国利益的绥靖政策,然而杨东在大量研究英国外交部档案后,梳理了英国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相应细节,最后认定英国并没有退让,而是不断与日本周旋以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不应等同于“绥靖政策”。正是因为作者大量收集并翻阅了英国外交档案中的官方信件、电报往来,最后才能“修正”传统观点。

目前,英国官方关于滇缅公路危机的档案集中在“1919~1980年外交部中国文件”数据库(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①、“英

^① “1919~1980年外交部中国文件”数据库收录了英国国家档案馆、英国政府收集的关于19~20世纪中国方面的档案,具体包含外交信函、报告、调查、数据分析、报纸新闻等多个方面内容。

国国会下议院议会文件”数据库（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①，美国主要是国务院核心机密文件系列（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中的远东及中国系列等，日本此方面资料主要藏于国立公文书馆、亚细亚史料中心等。同时，《日本外交文书》《现代史资料》和其他与有田八郎等战争罪犯相关的资料集以及众多日本相关人员的日记和回忆录都已经出版，比较方便获得；“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②、英国外交文件系列和英国国会下议院文件，部分高校和研究中心已经购买。国民政府外交、军事、内政等档案大部分已经公开，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皆有国民党档案纸质和电子版。同时胡佛研究院（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藏有包括《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等蒋宋孔三大家族近 300 万件资料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关资料，部分也已经对外开放并能够进行网上检索，这部分资料要充分利用。

同时，还有其他的资料散见于所涉各国的官方和私人文件、外交备忘录、总统及首相备忘录、日记、回忆录、个人著作以及报纸杂志等，这是应注意之处。一些散落在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以及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图书馆的资料，因语言问题和开发程度不足，并未被充分利用。台北“国史馆”在 2016 年出台了严格的查阅规定，在此我们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尽快挖掘利用其馆藏资料，以期深化对滇缅公路危机的探究。

总之，关于滇缅公路危机，前人已有突出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范围仍相对狭窄，还有新的空间。未来要加紧对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增加重要细节研究，同时注意从英国视角进行分析，促进研究内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拓展。

① “英国国会下议院议会文件”数据库收录了英国上下议院相关的多种类型的政府文件，其中有议会提案和通过的法案（1695～2004）、英国政府公布的政策性报告或文件（1802～2004）、下议院文件（1715～2004）、上议院文件（1714～1909）、英国议会议事录（1803～2005）等。

② “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日文版）、台湾档案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笔录案卷》扫描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以及东京审判庭审现场、人物等照片和庭审相关视频文件等丰富资料，是目前唯一的全文检索东京审判历史文献的综合数据库。

【经济与社会】

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利益实现

——以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

张福运*

提 要 从近代贾汪矿区的工业化进程来看，传统“小农”既没有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压碎”，亦非被动卷入，而是表现出高度的自主灵活性。他们不仅能依据既有文化传统和行为逻辑、利用群体和地域优势主动挑战，以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还注意借助现代公权力向工矿业施压。由此以“赎富”为指向的乡村利益扩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将煤矿包围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这说明，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生态和文化传统，单纯理论分析和学理探讨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关键词 贾汪矿区 工业化 矿区冲突 乡村利益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工业化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在此过程中，传统“小农”必将被工业化大生产所“压碎”，面临着“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的命运。^① 由此，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民乃至整个农业社会，长期被视为工业化中的消极存在，即工业发展的障碍或社会转型中的一份历史遗产。^② 20世纪70年代后，该理论受到挑战。费正清、彭南生、马俊亚等学

*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7、501页。

② 王立新：《工业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反思和重构》，《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者的研究发现,现代工业与自然经济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机械工业的兴起和机制纱的推广,反而巩固了手工织布业的地位;^①“石磨+蒸汽机”技术的运用,为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并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兴起;^②这在近代江苏乡村经济转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实现了和谐发展,区域资源得到优化配置。^③如果将乡村视为一支整体性社会力量的话,它与现代工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其不愿接受“灭亡”之命运安排的话,又该如何显示自己的存在和表达自身的诉求?为回答这一学术界尚未专门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清末民初贾汪矿区冲突为中心,^④从乡村利益主张及其实现路径和逻辑等层面,展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历史主体性。

一 矿区冲突:乡村利益实现的基本方式

位于江苏铜山、山东滕县交界带的贾汪矿区,见证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历程。该矿区的历史,通常追溯到1882年胡光国父子在铜山北部创办的利国矿务局。最初的布局以利国驿冶铁和青山泉采煤并举,1898年粤商吴味熊接手后专事采煤,将矿场移至靠近滕县的贾汪,企业更名为贾汪煤矿公司。1912~1926年袁世传经营时期,煤矿扩张迅速,形成覆盖铜山县东北境、面积达18729亩的大型矿区;同时因机械动力的广泛使用,很快便摆脱了年产量长期在3万吨左右徘徊的局面,其中“出煤最旺”的1921年达到24万吨。^⑤1933年,刘鸿生注资的华东煤矿公司成立2年后,矿场延伸至滕县夏桥,矿区面积增至22586亩,煤炭产量于1936年达到34.7

① [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5~33页。

② 彭南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 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④ 此前笔者曾依据近代贾汪矿区冲突的档案文献资料,讨论过“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力和秩序”(参见《民国档案》2014年第3期)及“‘道义—理性’背后的社会逻辑”(参见《民国研究》2014年第2期)等问题,分别揭示了民初国家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的调适对矿区秩序的影响,以及制度、权力和文化相交织的社会网络对乡村行为选择的制约。本文则从矿区这一煤矿与乡村紧密互动的特殊场景出发,揭示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可视为前期研究的接续。

⑤ 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志编纂委员会:《韩桥煤矿志(1882~1986)》,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2,第78页。

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①

这一时期贾汪工业化的推进，主要靠矿主更替所带来的外部资金的注入，而非企业内涵式增长。煤矿之所以迟迟未走向良性发展之路，除战乱、市场波动对煤炭运销的影响外，主要受制于乡村的干预。首次大规模矿区冲突，发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胡光国经营近十年之际。这场“强行阻止开矿”“气势汹汹地要求赔偿巨额损失”的冲突，起于地表塌陷等煤炭开采负效应的显现，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煤矿“一度获利颇厚”，“一些土豪劣绅感到眼红”。^② 矿方被迫接受“通商惠工，保民振业”的要求，并对乡绅施与“出场犒劳，节日馈赠”的礼遇。^③ 受此激励，乡村的利益表达方式更为激进，到吴味熊经营时走向极端。余明侠的调查显示，吴因“人生地疏且缺乏应变之才”，接连遭到“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最终酿成两败俱伤的惨局：1906 年吴忧郁而死，煤矿倒闭，乡村经济重陷低迷。^④ 过犹不及的严重后果，促使地方领袖调整利益实现方式。

其后，他们以维护矿区秩序的方式分享工业化成果。经其盛邀重理矿业的胡光国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袁世传扩建矿井包括修筑运煤专线贾（汪）柳（泉）铁路的计划均得到他们的支持，1918 年铺设通信电杆时还一度出现“地方人民赞助交通”、矿方“设宴款待”的其乐融融之景。^⑤ 此期矿区关系的改善，还得益于煤矿对乡村利益的主动关照。袁世传时期对乡绅的犒劳和馈赠渐成定例，1917 年贾柳铁路通车后为乡民提供搭乘之便，次年建成的贾汪煤矿医院对矿区乡民义务接诊。1927 年开始“代办”贾汪煤矿的上海远记公司，不仅将惠民设施全部开放，知名乡绅还在煤矿挂名领薪。

1931 年华东煤矿公司成立后，矿区秩序再度失衡。变化起于矿方的革新行动。在总结远记公司代办失利教训时，华东煤矿公司认为经营实业“非如慈善机关贵在布施”，不能无条件地迎合地方，^⑥ 笼络乡绅的积弊“势非彻底革新，不足以期整饬”。^⑦ 该公司成立伊始，便废止了馈赠犒劳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 122 页。

② 余明侠：《徐州煤矿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 98～99 页。

③ 胡光国：《灌叟撮记》，江宁胡氏排印本，1925，第 7～11 页。

④ 余明侠：《徐州煤矿史》，第 124 页。

⑤ 《华东煤矿公司呈铜山县党部文》（1931 年 12 月 5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26-3。

⑥ 《华东煤矿公司总经理程文勋致实业厅王剑杰科长函》（1932 年 5 月 19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1。

⑦ 《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 256 页。

成例，并借改组之机赶走了挂名领薪的乡绅。既得利益受损的地方势力随即组织反击，重新挑起矿区冲突。

1931年11月19日，一场时称“贾柳路乡民暴动”的矿区冲突爆发。是日晨，乡民砍毁矿方80余根通信电杆，“旋即星散”。^①真正的较量发生在试探性进攻后。次年2月1日，在铜山县政府、县党部主持的协调会上，就“电杆占地”问题顺利达成由华东煤矿公司一次性补偿300元“过去损失”，此后“每年每根电杆用地由公司出租金一元”的赔偿方案，但在矿井排水问题上谈判陷入僵局。第二区原区长薛允生为首的乡民代表先是坚持“井口汲出之水由公司购地修理水道”，被驳回后转而要求“地方出地、矿方出资”联合疏浚贾新河，最后在调解方支持下强行通过矿方承担全部施工费用的议案。^②

横穿矿区的贾新河经年失修，加以矿井排水的渗入，每逢夏季山洪暴发便有大片农田被淹，“应需修挖”，但工程浩繁且“中隔滕县境地”，确非煤矿单方所能为。^③华东煤矿公司认为此事“纯属节外生枝”，耗资巨大且将引起更多纠纷，故甚为消极。而薛允生等抓住此问题不断向矿方施压。在第二次协调会上强行通过1932年4月24日开工的提案，随后通过铜山县政府发出警告：如继续拖延，“迫于饥谨，激于义愤”的民众“发生抵抗侵害之事”，“应由华东公司负其全责”。^④当矿方迫于压力应允“可随时将浚河之款半数拿出，交地方人民从事开工”时，又因下游滕县第九区反对浚河表示左右为难。更为激烈的冲突随之爆发：1932年5月26日300余名乡民围攻矿场，六七月间煤矿交通和矿井水道屡屡被堵。

矿区冲突的不断升级，终于使矿方意识到问题症结在于“平日与地方士绅毫无联络，以致每遇毫末之事，因双方各不相让，使交涉扩大陷于僵局”；由此华东煤矿公司确立了“睦邻息讼”原则，及“商明地方士绅将浚河案自动撤消”的方案。^⑤随后矿方抛出预付600元“权作地方暂时之用”的橄榄枝，但薛允生等并不为之所动，继续鼓动乡民肇事。其间，在

① 《贾汪贾柳路民众昨砍毁华东公司电杆》，《新徐日报》1931年11月20日，第1版。

② 《补送本年二月解决地方各悬案决议录全文》（1932年12月10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1。

③ 《铜山县政府训令》（1934年8月9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④ 《铜山县政府训令》（1932年5月14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1。

⑤ 《华东煤矿公司董事会致许静侯函》（1932年7月5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矿方表示再追加 600 元预付款时,薛允生一度同意和解,但领款后次日又发生阻止交通之事。面对矿方质问,薛允生顺势提出附加条件:以塌陷赔偿和土地回购方式为各“代表”提供补贴,各类补偿的发放由其承揽。^①矿方再次妥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以土地塌陷的名目每年赔偿薛允生 1290 元,以每亩 90 元即高出市价一倍的价格回购薛继铭 29 亩土地,另以“桥口冲地损失费”之名补助朱润东和组织暴动的薛继杭、庞德修等 1600 元。^②

对地方势力的让步,虽暂时平息了这场冲突,但矿方由此陷入“岁耗巨款,而纠纷愈多”的怪圈。一方面,薛允生等人的巨额收益,^③激起“有力好动”者“得寸进尺之心理”。仅隔一年,薛鼎臣便要求“援照”前例赔偿其 3600 元“贾柳路桥口冲地损失”,当矿方准备应诉时旋即表示只要 2000 元即可“和平了结”。^④1937 年初赵继武等继续炒作浚河概念,要求矿方将“煤井之水设法容纳别处,或停止汲水”,以免影响其“自动浚河”。^⑤另一方面,由于赔款发放被薛允生和薛继铭垄断,矿方每年“赔款过巨”,但不少乡民并未得到应有赔偿,“庸懦无能之百姓因此吃亏被冤者亦复不少”,以致“诉讼连年,迄难止息”。^⑥

在矿区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与乡村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应对地方势力无休止的索取,一直是困扰煤矿的难题。胡光国遇到过“既忧外侮之凭陵,复虞内用之空泛”的困扰,^⑦华东煤矿公司一直面临“仅言用恩,有难填地方人士欲望之虞,若仅用威,似又有激成事变之嫌”的困境。^⑧

① 《函陈许顾问对地方接洽情形》(1932 年 9 月 23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② 《矿长江山寿致董事会函》(1933 年 1 月 14 日)、《1933 年支付地方赔偿款清单》,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③ 薛允生等人获利之多,足以令寻常百姓瞠目结舌。当时华东煤矿公司井下矿工的月收入仅 6 元 [《华东煤矿自召罢工的烦扰》,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二),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6,第 1052 页];当地农民的年均生活费仅二三十元(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 3 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第 176 页)。

④ 《函报地方纠纷民众愿私了请指示方针》(1934 年 5 月 15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⑤ 《呈报乡民借端开河无理要求仰祈鉴核迅予制裁事》(1937 年 4 月 4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3)。

⑥ 《铜山县政府训令》(1934 年 8 月 9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⑦ 胡光国:《灌叟撮记》,第 7 页。

⑧ 《矿长江山寿致总经理顾宗林函》(1932 年 9 月 28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易言之，没有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感情联络”，工业化进程难以顺利展开；遵循“惯例”或为息事宁人而妥协，又会“时被敲诈，任意骚扰”。^①近代煤矿生存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夏明方从灾害史研究中得出“早期的现代化受到了广大农村挤压”的结论，^②更适用于解释近代中国矿区工业化的困境。

二 乡村对现代公权力的借助

乡村对矿区工业化进程的干预，既非西方现代化理论所称小农制对现代工业的不适应性导致“工业化往往引起小农群众有意的破坏”，^③也非宏大叙事中所指农民因天然保守落后对现代文明抱有本能的敌意与排斥，而是出于分享工业化成果的需要。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和社会转型加快，乡村利益表达方式出现了新变化：除注意强化行为合法性、利用浚河这类公益事件外，还与进入乡村的国家权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媒体结合起来，借助现代公权力向煤矿施压，由此矿区工业化进程变得更为艰难。

为强化社会控制和资源吸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扩张国家权力，重置区公所，由省政府直接委派的官员控制乡村司法、警务和征税、摊派。在新的权力结构下，乡村利益实现无疑先要通过区政权这一关。尽管地方势力因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与新政权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对付矿方问题上二者找到结合点，因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进入乡村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利益扩张欲望。1931年秋铜山县第二区区长刘鉴秋借故敲打华东煤矿公司，试探权力寻租空间时，薛云生等迅速与之结成利益联盟。

1931年8月15日，在运煤“列车临开之际妄开车门”所致人命案发生后，刘鉴秋“妄加干预”，“力主拘押矿长”。因矿方拒绝“通融”，薛允生等成立“反对华东煤矿委员会”，第二区公所组成“反对华东煤矿后援会”，联盟初步形成。9月25日因“其地未获租用”而心怀忌恨的户主

① 《矿长江山寿致总经理华润泉函》（1937年1月29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3）。

② 夏明方：《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英] H. J. 哈巴库克：《关于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历史经验》，罗荣渠主编《现代化——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205页。

率众阻止矿方钻探时，第二区以“乡民控告被殴受伤”为由“拟拘捕工头”；矿方“又请县派员莅验”，矛盾激化，随后两组织合并为“贾柳路民众反对华东煤矿侵害权产委员会”，薛允生等公开声讨矿方侵权。11月8日因乡民突扳道闸致火车脱轨、一乘车乡民毙命案发生后，矿方再度“越级”上报；刘鉴秋被激怒，当着县政府处理事故人员之面“肆口谩骂，拍桌咆哮，饬其武装随士立拘公司职员”。^①矛盾全面激化，“暴动”预案随之启动。

贾柳路乡民暴动的顺利展开和善后过程中向矿方的有效施压，皆赖于第二区公所的支持。暴动前夕，刘鉴秋“亲到各乡镇公然宣言公司压迫民众”，声称只要乡民“取直捷破坏行动，自有本区长负责”，并要求保卫团如遇矿方抵抗“开枪射击”。^②薛允生等也积极协助“盟友”实现利益主张。1932年2月10日，矿方按约重装电杆时，遇到乡民“蛮横无理”的阻止，薛允生以内部意见不一为由相推诿。当矿方求助铜山县政府并依其指点与第二区公所“接洽”时，刘鉴秋提出每月补贴第二区教育、警备费各100元的要求。^③被拒绝后，第二区公所鼓励薛允生借浚河案向矿方施压。直到华东煤矿公司调整政策，刘鉴秋“月助200元”的要求被接受后，才同意不再支持乡民肇事和重提浚河案。^④

鉴于区政权滥用权力和“推行政令之不足，压迫民众则有余”问题的普遍性，1933年南京政府剥离区公所的警务权，并将其行政权下移到乡镇公所。^⑤国家在分散配置基层权力时，还以“义务职”定位及“以人格、知识和做事能力为标准”的乡民推选、县长任命的制度设置，强化对乡镇长的权力约束，推动其与地方利益的结合。^⑥这批亦官亦民的乡镇长，基于确立公共身份的需要，成为乡村的代言人，乡村利益实现方式随之发生变化。1933年滕县大泉乡乡长刘海秋组织的塌陷索赔案，可谓借助媒体实现乡村利益主张的典型案列。

① 《为区长鼓动乡民阻挠矿业恳请派员彻查以资维护》（1931年11月21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26-3。

② 《贾汪柳路民众砍毁华东公司电杆后该公司控辞呈报县府》，《新徐日报》1931年11月21日，第1版。

③ 《为乡民不遂决议案阻挠树立电杆恳请派员监视树立》（1932年2月13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26-3。

④ 《函报乡民于7月15日又聚众百余人在泉旺头地方搬运石碾放置铁道阻止交通》（1932年7月19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1。

⑤ 程方：《中国县政概论》，商务印书馆，1939，第56~59页。

⑥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第72页。

这年初因六七号矿井煤炭储量殆尽，华东煤矿公司一面着手开发夏桥矿井，一面回采六七号矿井的保护煤层，造成大泉乡一带“民田坟墓多处塌陷”。^①6月初刘海秋与矿方交涉，停止回采的要求被拒绝，但对方承诺赔偿。不料随后“两月连次大雨，平地浸水，不能插足”，塌陷勘测一再推迟，矛盾开始激化。村方既担心对方食言，亦为增加讨价筹码，决计采取行动。8月29日，该乡“老少妇女三四十人，拦住六七号大门，不许通车。虽经（矿方）派员多方劝导，终归无效，以致材料、煤斤无法运输。六七号井口是夜10点班被迫停工，不能产煤”。^②矿方随即“延请该乡乡董、耆老设法调停”，并急电山东省政府和滕县政府“先以制止再予调解”。^③经滕县政府出面调解，赔偿标准在初定每亩3元基础上“暗加一元”，赔付面积从原计约150亩增加到274亩。^④

在最后赔付环节，此案又出变故。这年因夏桥矿井开建包括为铺设运煤轨道征购路基用地耗资巨大，赔款迟迟未到位。乡民以为矿方又在拖延，集议后决定通过媒体施压。1933年12月8日，徐州地方媒体《新徐日报》头版刊登的《开矿影响民田，时起纠纷》一文，描述了该矿区的严峻局势：华东煤矿公司对大泉乡造成民田、坟墓严重塌陷的问题后，又迟迟不兑现赔偿承诺，“民众极为愤慨，咸愿与之一拼。现已秘密集合民众数千人，拟与以武力争斗”。该报道随后被上海《新闻报》《晨报》和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转载，形成轰动一时的新闻风波。

结合《新徐日报》“并无访员”，此前矿区冲突稿件均为乡民代表“自行送登”之事实，^⑤及12月19日《申报》记者调查时“该处农民，方在乡公所开会，集议索款”的巧遇，^⑥可基本断定刘海秋在整个事件中起主导作用，且该报道很可能出自其手。但刘与此案件并无直接关联，赔偿清单上未见其名，且发放额与总公司核拨数相吻合，即其从中渔利的可

① 《矿长江山寿致总公司函》（1934年1月4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② 《函报大泉乡民拦住六七号大门运输停顿不能产煤正在设法调停》（1933年8月30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③ 《矿长江山寿致总公司函》（1933年8月30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④ 《矿长江山寿致总公司函》（1934年1月4日）、《1933年第六七号井塌陷地赔偿清单（滕县部分）》，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9-19（2）。

⑤ 《华东煤矿公司总经理程文勋致江苏农矿厅函》（1931年11月27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26-3。

⑥ 《贾汪矿区视察记》，《申报》1933年12月22日，第7版。

能性微乎其微。正因为没有掺杂私利，刘海秋才敢将事件公之于众。此外，此案与之前的矿区冲突不同，其正当性更为明显，此亦该报道引起国内主要媒体关注的原因所在。当然，正如薛允生等与第二区公所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对基层国家权力的认同，大泉乡借助媒体也不能说明其已具备现代观念，因为这仍属威慑手段，带有功利主义取向。简言之，乡村与现代公权力的结合，并没有改变其利益扩张的性质。

三 “赎富意向”与“共有的习惯”： 乡村利益实现背后的逻辑

煤矿与乡村可谓一对典型的矛盾体。尽管二者有互惠的一面，但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尖锐的矛盾和对立。这其中既有煤矿危及乡村生存资源时正常的利益博弈，也不乏地方势力以利益扩张为目标的“借端滋事”“蓄意敲诈”；后者实质为一种“吃大户”的习惯，即财富占有不均衡格局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传统的延续，周晓虹称之为“赎富意向”。^①

为便于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先来看看周梅森在其成名作《沉沦的土地》中讲述的刘四爷发迹的故事。民国初年，贾汪煤矿公司准备铺设贾柳铁路。刘四爷得此消息后，用双倍价钱买下铁路必经之地的 15 亩薄地，并连夜撮了几堆黄土充作坟茔。公司购置了所需土地，唯独买不下这 15 亩，工程被逼搁浅。四爷声称：祖坟在此，这块地千金不卖。最后通过当地乡绅出面调停，矿方以高出原价 20 倍的价钱买下，并答应他做挂名的土木股副股长，每月 10 块大洋，一袋面粉，一直养了他 5 年。^②

该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贾汪矿区确不乏类似案例。1933 年初华东煤矿公司为铺设夏桥矿井运煤轨道，着手购买路基用地。就在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开始发款时，滕县南乡大泉村刘氏家族“借口六七号矿井东北刘姓坟墓塌陷，突然反悔，把持不卖，并提出不近情理无法接受之条件”，“虽经百般协商，均属无效”。^③此案中，刘氏家族同样利用矿方选定路线的不易变更性、己方土地的区位优势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祖坟来胁迫对

①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第 70 页。

② 周梅森：《沉沦的土地》，小说月报编辑部编《小说月报第一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 86~87 页。

③ 《华东煤矿公司致实业部、山东实业厅函》（1933 年 5 月 17 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6。

方，且“恃顽要挟”的特征更为明显：祖坟塌陷的借口与征地并不相干，“坟地四周千尺以内直下之煤不准采挖”的条件过于苛刻。对此，熟悉当地人情世故的山东省实业厅王芳亭厅长在复函中一语道破天机：“似不妨与地主切实接洽，优给代价，俾归妥协”。^①

在近代贾汪矿区，这种带有讹诈性质的赎富意向，成为煤矿与乡村矛盾的焦点。该矿区首次冲突起于此，在吴味熊时期发展到极致。其后基于乡绅反省后的自律，这种取向得到控制，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既有利益格局被打破后再次泛起。薛允生等“无论该公司财势怎样强大，我们仍不得不自动的联合起来，与之斗争到底”的呐喊，^②大泉乡“该矿势力既大，资本充足，官厅、富绅莫不与之往来”而乡民“咸愿与之一拼”的誓言，^③包括日常索赔中“乡民一见地面稍有低洼，即指为塌陷，且于低洼以外往往量出数百尺，并牵连上面坟墓，要求公司赔偿巨款”的要求，^④都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与通常的“揩油”行为不同，矿区乡村的“赎富意向”主要基于本地资源不容“外人”染指的权利意识，即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所说的“把异乡人排斥在外”的“共有的习惯”。^⑤在贾汪矿区的具体表达，一是“我们的土地，他们没有树立电杆和修筑铁路的权利，也不能够供给他们享受地下掘煤、地上挖沟的利益”；^⑥二是“乡民的路”矿方无权使用，“乡民的河”矿井不能排水。^⑦这种观念根植于华北乡村保守内聚的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此亦当地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便利的交通，但在近代不仅未融入沿海经济圈，反而“变成了一潭闭塞的死水”的重要原因。^⑧

在近代贾汪矿区，“赎富意向”及其背后的“共有的习惯”之所以有

① 《山东实业厅长王芳亭复函》（1933年5月30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6。

② 《铜山县贾柳路民众反对华东煤矿侵害产权委员会宣言》（1931年10月15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26-3。

③ 《开矿影响民田，时起纠纷》，《新徐日报》1933年12月8日，第1版。

④ 《函送应付地方纠纷节略》（1933年10月4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⑤ [英]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72页。

⑥ 《为贾汪华东公司蹂躏民命剥夺民权告同胞书》（1931年9月15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26-3。

⑦ 《函送应付地方纠纷节略》（1933年10月4日），徐州矿业集团藏华东煤矿公司档案，档案号：9-19（1）。

⑧ [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8页。

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能迅速得到现代公权力的支持，一是因为煤矿财富占有上的优势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乡村生存资源的破坏，中国传统中无商不奸的思维定式，赋予矿区乡村的赎富意向以正当合理性，即相关利益主张极易得到社会认同。二是因为土地私有产权为“共有的习惯”提供了制度保障。正如王芳亭在上述复函中所云，“租赁或购买土地，属于一般法律行为”，“官方对于任何方面均不能加以强迫”；亦即在私有制下即便乡民“恃顽要挟”，政府也无法干涉。三是因为与当地险恶的社会生态和农民进攻型的生存策略密切相关。近代贾汪地瘠民贫、生存资源稀缺，每遇灾荒往往“老弱填乎沟壑，壮者流于盗匪”。^① 脆弱的自然环境加剧了社会生态的恶化，民国初年“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当地竟“成了著名之匪区”。^② 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农民形成了以夺取资源和防止资源流失为目标的进攻型生存策略，^③ 而赎富意向及其背后的“共有的习惯”，就是这种生存策略的具体表现；易言之，在矿区工业化进程开启后，向矿方索取资源已内化为乡村的一种生存策略。

① 胡光国：《灌叟撮记》，第 11 页。

② 毛泽东：《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第 5 页。

③ [美]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 58～59 页。

从走私制钱看一战时期日本 对华经济掠夺与破坏

许梦阳*

提 要 一战爆发后，日本以出兵山东为契机大肆在华窃夺制钱牟利。随着欧战列强对铜资源需求量的激增，日本逐渐扩大走私规模，在华掠夺制钱与铜块数十万吨，造成中国铜材奇缺、币制紊乱。制钱走私是日本军、政、商界联合窃夺中国资源的开端，这种资源掠夺模式持续至抗战时期，其根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质。

关键词 日本 制钱走私 铜资源 经济掠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夺取德占青岛等地。金属铜作为制造武器的必要原料，成为当时日本在华窃夺的重要物资。恰逢民初弃用大量清代制钱，日本以民间与官方并进为手段，对中国制钱资源进行窃夺，并对经济造成恶劣后果。当前学界就近代日本在华走私与资源掠夺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①但研究时段多集中于抗战时期。韩国学者孙准植认为，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走私活动很早即开始，但初时规模不大，偷运货物种类数量有限。由于对中国海关法度与政府缉私有所顾忌，故其走私手段

*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目前涉及近代日本对华金属与货币走私掠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肖自力《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肖自力《战时日本对中国钨砂的劫掠与国民政府的应对》，《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赵守仁《日本从大连往河北、山东走私记述》，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编《大连近代史研究》第7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张淑生、齐春风《1930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等。

隐蔽。^① 黄尊严曾针对日人在山东“非法套购制钱”^② 进行论述。学界针对民国初年日本对华资源窃夺的缘起、方式、数额及对华经济破坏情况等研究仍有不足。故而笔者通过分析中、日档案与相关史料,对该问题进行探究,限于篇幅,将视域集中于日本在华以制钱走私为主的铜资源掠夺。^③

一 制钱走私之肇始

1912 年,“日本向欧洲各国出口铜块 61000 吨,并保持 16% 的年增长率”。^④ “辛亥革命后,中国急需大量铜材铸造新辅币”,^⑤ 因此日本铜业迅猛发展,其产量仅次于美国与墨西哥,成为世界第三大铜业产销国。^⑥ 由于军备竞赛激烈,铜资源受到欧洲列强的抢购,一时间价格陡增。日本铜业矿源不足,中国市面却有巨额清代制钱流通。清末民初已经有人将制钱偷运,“意图私毁渔利”,^⑦ 最初此举多是为“到作坊熔化制造器皿”。^⑧ 1914 年 7 月,财政总长周自齐称:“当下流通的铜钱总数约有 300 亿枚。”^⑨ 鉴于巨额制钱像一座极易开采的富矿,日本迅速将中国由铜产品输出地,转为“铜矿”来源地。

1914 年 8 月,日本对德宣战,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自潍县至济南完全中立地带,均有日本军队驻扎,而胶济铁路遂全归日本管理。”^⑩ 当年 12 月,胶海关作为山东对外经贸枢纽,被日军“强收卷宗、款项及一切产业与海关小轮等”。^⑪ 由于日本利用南满铁路进行毒品走私偷运,海关人士担心山东将重蹈东北覆辙。日本占据南满与胶东成犄角之

① [韩] 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1933~1937)》,台北,“国史馆”,1997,第 13 页。

② 黄尊严:《日本与山东问题(1914~1923)》,齐鲁书社,2004,第 185 页。

③ 王闯曾撰文评析北洋政府对于欧战时期日人贩运制钱的态度,见氏著《欧战时期北洋政府对于日人贩运制钱的态度》,《史学月刊》2015 年第 5 期。

④ “Copper in Japan,”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August 9, 1913, p. 5.

⑤ “Copper,”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June 7, 1913, p. 733.

⑥ 《世界铜市之趋势》,《神州》第 1 卷第 1 期,1913 年 8 月,第 3 页。

⑦ 《贩运制钱被获》,《新闻报》1913 年 11 月 8 日,第 10 版。

⑧ 《拿办私毁制钱》,《新闻报》1914 年 4 月 25 日,第 9 版。

⑨ “China’s Mints Output of Cooper Cents,”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ugust 1, 1914, p. 384.

⑩ 隐:《中国大事 记日本占据山东胶济铁路》,《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11 期,1914 年 11 月 1 日,第 1 页。

⑪ 《日军官占据胶海关》(1914 年 12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7-020-01-022。

势，又控制贸易机关与运输纽带，将蓄谋已久的资源掠取付诸行动。

1915年夏，湖北官钱局发现，“汉口现有商人，收买一文旧钱数千串备售。并时有他处负贩，收运此项旧钱到汉，私售洋庄”。中国官方亦希望利用制钱资源“改铸铜元，以杜漏卮”。^① 1915年6月，津、沪与青岛等地几乎同时出现“制钱贩运出境”现象。天津警方公示，偷运制钱铜元出境“殊于国家币制，大有妨害”，并要求警察“严行查稽”。^② 江苏官方也申令：“装运制钱一万枚以上未持巡按使或财政部护照者一律扣留。”^③ 欧战以来，“各国将国内之铜扣存，以应军需。洋铜之来源日短……欲求中国土产之铜接济”。^④ “某国人明目张胆收买制钱……每买制钱一吊尚可赚钱二千文，可谓厚利。”^⑤ 由于清代制钱“铜质极佳……某国人亦稔知此中利益，勾串不肖华人在沪收买运回本国”。^⑥ 以上史料中的“某国”，显然是指日本。

1915年7月，“日商佐伯次郎惠由开平火车站起运东钱三万一千五百吊赴奉，被锦站军警查明阻止”。与日领事交涉后，中方认为：“日人收买制钱出境，曾奉巡按使密电严禁。”日领却要求中方将收押的制钱“从速送还”。^⑦ 但外交部称：“此次贩运制钱本为贸易使用起见，尚未有私毁牟利。”最终的解决方案竟是对日商“在没收铜钱变价项下拨还原有成本，以示体恤”。^⑧ 虽然不敢采取措施激化矛盾，但中方的查禁使日人偷运制钱难度加大。

为防止中方缉私罚没，日商开始雇用日籍浪人武装押运制钱。1915年10月26日，外交部驻济南特派员杨庆堃急电称：“有日人五六名持械押运制钱两车，经巡警拦阻，日本人抗拒，棍击车夫前进，致伤头部倒地气绝。”同日在济南商埠外八里桥，“有日人十余名，手持枪械押运制钱十一车……马警已受枪伤，复被痛殴。日人愈聚愈伙，枪棍石块，肆意射

① 《湖北官钱局收买制钱致财政厅公函》，《崇德公报》第20期，1915年10月10日，第12页。

② 《严禁制钱出口》，《新闻报》1915年6月25日，第6版。

③ 《江苏财政厅饬第一千四百十二号》，《江苏省公报》第620期，1915年8月27日，第15页。

④ 《欧战期中之铜价》，《新闻报》1915年8月28日，第9版。

⑤ 《我国制钱消毁之近因》，《新闻报》1915年7月20日，第5版。

⑥ 《查禁私运制钱出洋》，《新闻报》1915年8月7日，第9版。

⑦ 《报告锦县查获日人佐伯次郎惠私运东钱与日领交涉情形由》（1915年7月3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2-01-001。

⑧ 《日人佐伯次郎惠贩运制钱一案查明尚无私毁牟利情事已饬将成本洋如数发还由》（1915年8月2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1-05-001。

击”。^① 此两案元凶均是日商早濑精一，其以武装走私制钱引起血案，两案人赃俱获，还致中方警民十余人伤亡。亲赴现场调解的日本领事也无力袒护，但仅能够“鉴于累召事端，近稍变其袒纵之态”。事后，日本领事出具告示称：“如再有以运输出口为目的的购买制钱者，必给予相当处分。”^② 日本外交官员看似合作的态度下，却包藏更大祸心。

1915 年底，舆论估计“今日人由胶济铁路将制钱一项输运往青岛，以‘古铜’为名报关出口运往日本……日人搜买我国制钱之总数已达四千吨之多”。^③ 日商收买制钱熔成铜块，“由青岛、烟台、龙口、天津、营口、汉口、九江、南京、上海等处出口，统计每日在三百吨上下”。^④ 日方统计的 1915 年 5 ~ 12 月由青岛运输出口的制钱与铜块总量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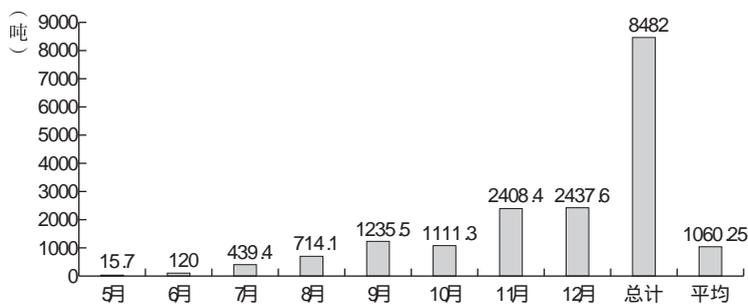


图 1 1915 年 5 ~ 12 月日本于青岛偷运铜货数量

资料来源：林久治郎「山東鐵道制錢及同熔解銅運送數量ニ関スル報告件」『制錢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1916 年 12 月 15 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3698200。

由图 1 可知，1915 年 5 月至 12 月，日本仅于青岛一地就输出制钱及铜块总计 8482 吨，其数量远高于当时国人的估计。1915 年底，任外交武官的多贺宗之陈述，“当下估算，中国制钱的输出量达到平均每日约 600 吨……若以日本当地行市，一日输出额约为 24 万日元，一年总额约为 9000 万日元”。^⑤

① 《日人私运制钱棍伤车夫枪伤马警两案已向日领交涉由》(1915 年 10 月 27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1-04-001。

② 《详报日领事禁日人贩运制钱照录告示请赐察由》(1915 年 11 月 19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1-04-003。

③ 《鲁省日人收贩制钱之利益》，《新闻报》1915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④ 《禁运制钱之公布》，《益世报》1915 年 11 月 17 日，第 3 版。

⑤ 多贺宗之「支那制錢問題ニ付テ私見」『制錢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1916 年 1 月 6 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3698200。

由于日人利用中国人收购制钱导致益都、昌邑两县乡民争执酿成血案，中方派员与驻青岛日军参谋长奈良等人多次交涉，日方终敷衍承诺对制钱施行“火车禁运、青岛禁化”。但外交官杨庆堃坦言：“以大利所在，日人不恤相率效尤。日军虽面允禁止，而在沿路丛生扣留或被劫制钱案件，其下级兵多尚私违法……多要演出凶斗或捕勒人民案件。”^①林久治郎电呈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指出：“由于青岛守备军在胶济铁路沿线买入制钱过于频繁，以至于制钱价格腾贵，同时军票价格下落。”^②由此可见，日军以毫无准备金和信誉的军票套购山东制钱资源，且直接参与了制钱的偷运。1916年后，制钱走私由原先的零星偷运，转为熔钱大宗偷运并且越发肆无忌惮。

二 制钱走私愈演愈烈

1916年，欧战的白热化使铜、钢等金属价格疯涨。当年5月，“铜价已经涨到百年来的最高点，仍呈现上涨态势”。^③“1915年日本铜之出口较1914年增加15%，而1916年较诸1915年则又增加19%。”^④多贺宗之认为：“欧洲战乱频仍，对铜等金属需量极大，日本矿产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中国制钱，恰含铜、锡等金属。为满足市场需求，就须借外力使资源转移，但这种正常转移，要使用非正常手段。”^⑤日本军、政、商界紧密相连，以军事、政治力量为后盾进行经济扩张和掠夺，故而制钱走私愈演愈烈。

制钱走私的加剧，首先体现在走私数量与范围的扩大。1915年夏，“日人由山东一省所购买者，已有三十万元。日本售于俄国之铜块，其三分之一，系得自中国之制钱……近来华人亦有经营此业者，常由青岛运至神户或其他港口，每一汽船抵日本，至少载有制钱三百吨”。^⑥1916年2

① 《请财部积极收买制钱并取缔张店日商营业由》（1915年12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3-01-001。

② 林久治郎「電送第二八二號」『制錢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1915年7月9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3698200。

③ “Record Price of Copper,”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y 9, 1916, p. 5.

④ 梁惠直：《译述：日本铜及白铅业之大活动》，《矿业杂志》第1卷第3期，1917年9月，第19页。

⑤ 多贺宗之「支那制錢問題ニ付テ私見」『制錢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1916年1月6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3698200。

⑥ 许家庆：《内外时报——中国之制钱出口》，《东方杂志》第13卷第9期，1916年9月，第8页。

月, 财政部官员巢凤冈递函称: “查自欧战以来, 五金价格陡然腾贵……日本商人由直、东两省入手, 勾通奸商, 竭力搜罗, 输出至数十万吨之多。据东省报告, 经营此业者约有三千余人, 天津经营此业者二千余人。近又深入河南、山西沿铁道一带, 暗设公司, 或用肩挑车载, 或雇苦力腰缠运送。”^① 最初的制钱走私, 其区域主要位于南满、胶济铁路沿线, 由铁路周边收运并由大连、青岛等地海运至日本, 后又扩展到河南、河北、山西及长江流域。兹将 1916 年 1~11 月日本从青岛偷运铜货数量图示为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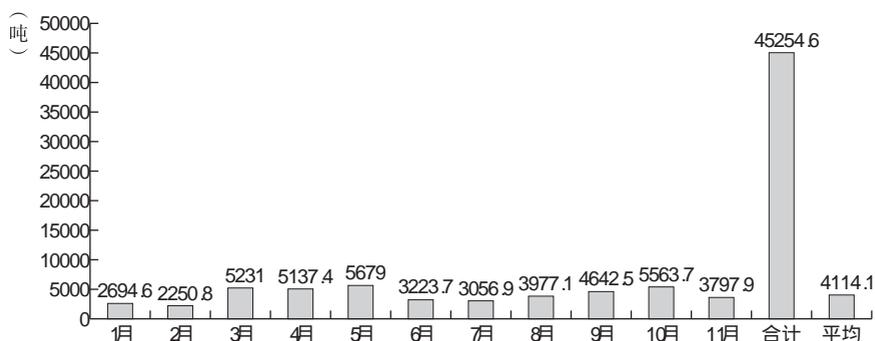


图 2 1916 年 1~11 月日本于青岛偷运铜货数量

资料来源: 林久治郎「山東鐵道制錢及同熔解銅運送數量ニ関スル報告件」『制錢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1916 年 12 月 15 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3698200。

由图 2 可知, 1916 年 1~11 月青岛所运出制钱与铜块数量是 1915 年 5~12 月的约 5 倍。“标准铜价在和平时期是 60 英镑每吨, 但 1916 年 6 月达到 120 英镑每吨……日本企业大量收购含有 50% 以上纯铜的中国制钱进行冶炼,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量的增长。”^② 大规模偷运带来的暴利惊人, “1915 年 4 月至 1916 年 5 月间, 仅山东一省搜刮运抵青岛的制钱约 25600 吨, 以当时铜价 400 日元每吨来计算, 总价值已经超过 1000 万日元”^③

当时中日形成了收购、熔毁、运输、销售的产业链, 以神户铃木商店出張所与中松洋行两家机构走私最为猖狂, 于制钱界几握霸权。除了在华各地分布数千直接从事制钱收购贩运业者外, “山东铁道沿线各旅馆、饭

① 《巢凤冈拟具急起收买制钱改铸铜元抵制奸商勾通日本商人私运利权外溢致财政部说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金融 (1),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第 282 页。

② “Janpan’s Copper Production,”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June 24, 1916, p. 5.

③ “Chinese Copper Cash - The Export to Janpan,”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July 29, 1916, p. 207.

铺均为制钱买卖而开放”。^① 1916年5月日本青岛市民会称，“大阪精炼业者，仅规模稍大者就有四十家，小者号称三十七家，从神户到冈山之间约三十家……祖国精炼业者已经获得二百五十余万元的利益。加上三菱、三井等具有电气化冶铜能力的大型企业，整个产业能从成本一千万元的制钱熔铜中，同时也获利近一千万”。^② 如此暴利，使日商乐此不疲。

制钱走私的加剧，还体现在日军不惜以武力制造血案抢夺制钱及外交官员的袒护上。1916年5月，日商在莱阳县店埠收购制钱被乡民扣留，日本宪兵枪伤乡民2人后，中方扣押宪兵1名及日商3名，并请日驻烟台领事出面调停。但日领以“宪兵归青岛司令管辖，不在该领管理范围以内为词。并力述此次起衅实因中国官署误解取缔贩运制钱之禁令，此种禁令仅可以施之于中国人民，不能使外国人遵守。要求将扣留日商及宪兵一并释放，同时将制钱发还”。^③ 直至中方释放所有被扣日方人员并退还钱款，危机才至消弭，可见中方对日人的罪行已经完全无法遏制。

1917年以后，每逢中方查扣制钱后日人毫不畏惧，“均相率赴县强迫发还，甚至有咆哮衙署鸣枪相对之举。各该县知事怵于以外不及请示来省，有径行发还制钱者，有仍易洋给还者，其他各县日人亦出入靡常”。1916年以来，在东昌、昌邑、潍坊等地，因为日人走私争端导致华人被杀的案件已有十余起，却均因为日人私付抚恤金而未能立案，地方官员亦多采用息事宁人之法。“日人在东贩运制钱，违背约章致我国利权外溢此不过表面损失，而附带发生之案如成群结队携带枪械深入内地架勒杀烧贻祸无辜。指不胜屈华人之被勒、被罚、被烧、被杀各案，日领一概抹煞置之不理，凡所处分日人者，不过无护照之薄罚。至于日人因贩钱而被劫、被伤、被杀者，该领事无一不索重偿，且或并无其事，日领偏听日人陈诉，代为讹索。”^④

适逢国人多不满袁世凯称帝，日本以煽动制造叛乱等手段，组建所谓“革命党武装”，制造混乱，借机谋取制钱。据主持中日“西原借款”的西原龟三回忆，其在山东考察时，曾辑纂军人渡濑氏的报告，报告相关山东

① 《制钱输出问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金融（1），第282~284页。

② 日本青岛市民会「制钱に関する陳情書送付の件」『歐受大日記』1916年5月2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25263300。

③ 《详报莱阳日人购买制钱日宪兵枪伤崔洪彦等一案情形并抄送全案乞鉴核由》（1916年5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2-01-008。

④ 《日人在鲁截抢私运制钱案》（1917年3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6-02-015。

省革命军以及套购铜钱之由来与现状。^①“自从革命军蜂起，由于中国人对日本的恐惧和反感，日本人用一般手段收买制钱是不可能了，于是从事收买制钱的多数日本商人，投入革命军，结成党羽，开始抢夺制钱。这种抢夺制钱以山东铁路为中心，直到其附近三四十里的山东省地方，有十数名日本人被中国人打死，主要都是这类结队去抢劫制钱的日本人……日本官宪和军队开赴该地，搜查‘凶手’，因与中国人不能互通意见，遂火烧全村而归。”^②日商经常勾结土匪与日军四处骚扰，档案记载 1916 年因反袁而形成的山东周潍民军被日人利用，“多为日人包办制钱，而日人在周潍一带对于贩运制钱更属行动自由，省署政权难施难及”。^③

1916 年 7 月青岛守备军参谋长森冈守成致函日本陆军次官山田隆一称：“山东革命动乱勃发以来，大量日本不良人从各地聚集而来，以团伙或个人身份加入‘革命党籍’，或从事制钱收买，或进行掠夺监禁。”^④史料中的“不良人”，即是原本星散各处的日本浪人，啸聚于山东后也并非从事革命事业，反而危害中国乡里，走私劫掠。1917 年 3 月，山东官方将在济南附近小清河一带扣压的吉泽洋行所收制钱贮存于新城兵工厂。在斡旋失败后日人纠合浪人四五百人，“将盒子炮藏于风衣之内，手持木棍同赴新城，意在夺回被扣制钱”。^⑤对此恶劣事件日方领事的解释显得欲盖弥彰，其电称：“有代表者五名同本馆巡查一名至兵器厂请谒厂长，询问没收制钱之额。并无何等之不稳行动，乃是日中国官宪震于风声鹤唳之报告。”^⑥事实上浪人抢夺制钱未遂，还在济南城中商埠三马路、万字巷等处引爆炸弹制造混乱。中国官方无法对日人执法，只能任其横行。

日本军政人员与走私者沆瀣一气，以济南领事林久治郎最为狂热，故而“极端奖励此种营业”，^⑦其称但凡日人因走私制钱被扣押或起暴力冲突，“在本馆的处理，按其程度，多系无护照游历者，依照通商条约规定，

① 《西原借款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38 号，中华书局，1979，第 122 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 1212 页。

③ 《鲁省日人截劫私运制钱案》（1917 年 3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6-02-017。

④ 森岡守成「不良本人の行動に関する件」『歐受大日記』1916 年 8 月 2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25263300。

⑤ 《日人在鲁收买制钱交涉之烦琐》，《大公报》（天津）1917 年 3 月 15 日，第 3 版。

⑥ 《济南吉泽洋行运制钱十万斤被扣情形》（1917 年 3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18-086-02-014。

⑦ 《制钱输出问题》，《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金融（1），第 284 页。

处二十元至三十元罚金，其他或仅予以处罚，所有制钱，由中国以银元交换后发还本人”。^① 当时整个日本舆论，都认为走私制钱贸易合理合法。“日本当局通过准许这些违法日人沿日本政府所控制的铁路线装运制钱，和对离开青岛装载对日出口铜货的船只发给出港证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违法的日人。”^② 1915年5月至1917年底，仅青岛一地，共运抵制钱及熔解铜块达101094.5吨。^③ 至于全国走私数额，并无详细数据，保守估计应有数十万吨。大部分制钱被铸成铜块，从正常渠道出口，其实也是制钱走私的一部分。

三 制钱走私对中国经济之贻害

欧战时期中国巨额铜资源外流，据海关统计1914年至1918年中国出口铜货总价值达到20951796海关两，其中1917年最高，达到10176583海关两。^④ 由于中国铜矿本不丰富，出口铜货主要为流通市面的货币与铜器熔化后铸成的铜块。铜资源的不均衡流通给日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在长时段内对中国国计民生造成了恶劣影响。

袁世凯病亡后，北洋当局为缓解财政危机，求财于居心不轨的日本，遂拟订一系列饮鸩止渴的借款条约。日本以允诺终止制钱走私为借口，试图控制中国的矿业与金融，双方最初达成的共识是施行“兴亚借款”。日本以借款500万日元为条件，要求控制湖南水口山、安徽太平山的矿业经营权，还要求两矿“因借日款经营之故，聘用日人为技术顾问，利益平分”。^⑤ “此五百万借款既为全国舆论及湘皖官民所反对，当局亦知力主废约”。日方鉴于中方的反对，“亦愿放弃合办两矿之权利另向政府要求在内地收买制钱之权利”。^⑥ 日方又要求在华设立精炼制钱工厂并提出甲、乙两

① 林久治郎「山东省制钱輸送禁止章程新訂ニ関シ報告ノ件」『制錢輸出問題ニ関スル件』1916年4月6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3698200。

② 《日人偷运我国制钱出口的获利情况》，《远东时报》第13卷第2号，1916年6月，第55页。

③ 《日本驻济南领事官补山田友一郎致外务大臣本野一郎报告》，《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第1227页。

④ 《出口货值分类统计表》，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第12页。

⑤ 《中日兴亚公司实业借款合同》（1916年5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23-135-03-013。

⑥ 《兴亚借款与制钱借款》，《丙辰》第1期，1916年12月，第58页。

项契约，一为《制钱借款契约》，另一为《制钱精炼契约》。制钱借款金额为 500 万日元，要求借款专供收买精炼制钱之用，由横滨正金银行提供，以三年半为期，用制钱精炼之利益偿还。精炼制钱借款金额为 600 万日元，由日本久原兴亚公司提供，在天津设立制钱精炼工厂，利益由中日均分，规定年收制钱以 6 万吨为限，并要求北洋政府不得与外国签订类似合同。契约内容被舆论披露后，国内一片哗然，日本妄图控制中国铜业生产之心昭然若揭。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书称欧战时期全国出口制钱数量有数十万吨，“各省鼓铸铜元，惟日不足，即属日人私运制钱出口致令辅币缺乏，所生之现象其苦痛，已不可胜言。况我国人民农工生活程度极低，今销毁制钱载在条约又无他法以济其穷。行见制钱绝迹于社会，饥荒大害被及全国”。^① 中国商界为挽回利权而组建保利银公司，要求自筹 500 万元借给国家，与国家合作收炼制钱之余利，大部呈献国家。尽管商界一片挚诚，保利银公司却因为战乱与筹款困难而未能实际盈利。

制钱与铜元缺乏导致各地大面积钱荒，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现象。1916 年 11 月，上海出现铜元骤涨，其原因是“某国人暗中贩运至东三省大连等处，以供收买中国旧有制钱销毁之用，并有一般不肖贪利华人代为购贩”。^② 钱荒致使湖北“各乡镇及场市中并找零之铜元亦不可得，于是各商纷纷发行一种小票，其值均在一串以下……以补铜元之穷”。^③ 再以河南周口为例，“十年前制钱充斥，出入口货、车船络绎不绝汇兑畅通，自从制钱屡经奸商私运销售，铜元又以南北银价缩小，奸商出口从中渔利”。^④ 日人起初在山东临朐收购制钱，“一磅卖者所获铜元数几多余制钱二倍，乡民贪其利争售之”，致使临朐市面制钱绝迹，“发行钱票者日多，物价逐年增长。自十一年至十二、三年之间，城镇四乡几于无商不发行钱票。甚至肩挑负贩，工匠杂流家无百元之储，亦篆刻图章号称出票，流弊所及公然类于诈欺取材”。^⑤ 由此可见，制钱匮乏已经影响市场流通并恶性循环。

铜资源与辅币匮乏最终还导致“轻质铜元”问题爆发，1917 年，各省官方为套购资源大量铸造轻质铜元，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湘、皖等省铜

① 《六百万元制钱借款》，《宪法公言》第 2 期，1916 年 10 月 20 日，第 42 页。

② 《沪市铜元骤涨之原因》，《新闻报》1916 年 11 月 30 日，第 9 版。

③ 《湖北之钱荒》，《申报》1916 年 12 月 15 日，第 6 版。

④ 《各埠金融及其商况》，《银行周报》第 1 卷第 7 号，1917 年 7 月，第 4 页。

⑤ 刘仞千编《临朐续志》卷 11，1935 年铅印本，第 84 页。

元含铜量低，“均不在本省使用，反而输往江苏各地”，^① 导致市场紊乱物价暴涨。《徐永昌日记》曾记载 1918 年参观铸币厂见闻，由于缺乏铜材，“购一批日铜，孰料即中国制钱所熔，不如川产多矣，其价则较贵，按川产每百斤约五十余元，滇产则六十余元，此日货七十余元”。^② 日本以低廉成本收购制钱铜块，再以高价回售中国，可谓走私制钱的遗毒。

北洋政府直至 1918 年 8 月才正式颁布《禁止金银铜出口办法》，“禁止金、银、铜三品出口，无论条块、钱币制造物均在其内”。^③ 此时欧战已近尾声，铜价在休战之时大为下滑，日本的走私数量已经大减。中方曾致力于收购制钱以防外流，但至 1917 年底，仅收购制钱 5985297.75 市斤，^④ 约合 2992.7 吨，尚不及日本在华走私制钱的月均数额。一战之后的日本商人仍旧紧盯中国制钱资源，1924 年国际铜价上涨，天津日商谷下坚夫等立刻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上呈请愿书，称：“希望得到官方支持，与海关及总税务司沟通，从而速速达成制钱出口解禁。”^⑤ 可见中国的制钱资源，在日人眼中一直是唾手可得的“肥肉”。

结 语

近代日本一直走在军国主义与商业扩张之路上，中国作为东亚近邻可谓饱受屈辱。面对日本在青岛等地的军事与经济欺凌，北洋政府边防处呈外交部函件中称：“又如制钱输出、吗啡输入，闻日人尝利用该港，此事乱我币制，毒我人民，苟得搜获其证据，亦可为收回青岛之一助。”^⑥ 可见北洋政府虽然羸弱，却亦希望摆脱屈辱收回利权，奈何中国早已国门洞开，成为列强刀俎下的鱼肉。日本对华制钱走私，其表面起因是欧战庞大的铜业订货需求，成为日本军、政、商界联合以规模化掠夺中国资源的嘴

① “From Day to Day,”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April 4, 1922, p. 12.

② 《徐永昌日记》第 1 册，1918 年 10 月 25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木刻本，第 226 页。

③ 《禁止金银铜出口办法》，《银行周报》第 3 卷第 2 号，1919 年 1 月 14 日，第 21 页。

④ 《造币总厂呈报十二月上中两旬收钱炼铜铸数目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 66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第 158 页。

⑤ 吉田茂「支那造幣廠下融化制錢廢料ノ輸出禁止並沒収ノ件」『各国ニ於ケル輸出入禁止及制限関係雜件/中国ノ部/金属並同製品関係（貨幣ヲ含ム）』1924 年 2 月 29 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9040613000。

⑥ 《有人陈述应付山东交涉节略录送查核》（1920 年 3 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档案，档案号：03 - 33 - 152 - 02 - 015。

矢, 已经具备了之后对华开展大规模走私与经济掠夺的基本形态。虽然制钱走私浪潮因一战的结束而告一段落, 但是以浪人武装实施走私, 在军队及外交人员袒护下劫掠中国资源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质, 是其对华走私窃夺资源的根本原因。

专家荐语:

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虽然 1931 年至 1945 年的抗战时期的经济侵略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但早在民国初年日本就开始对华进行规模化走私掠夺, 学界却对此关注较少。许梦阳同学的这篇文章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 利用大量中日两国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外文报刊史料, 非常详细地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走私掠夺铜钱资源的缘起、运用的方式、数额、资源流失以及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影响等, 对日本在华经济掠夺的初期状态展开了深入研究。此文是对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环节的一个有益补充, 该文结构严谨, 逻辑清晰, 内容丰富, 值得一读。

推荐专家: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忠教授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 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王雪梅**

提 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方面掀起了华北走私狂潮，地处内陆的四川也深受私货泛滥之害，商业秩序受到严重扰乱。四川各方面从政府机关，到商人组织、群众团体开展了自上而下的防私缉私活动，如成立防私会，从邮路陆路水路航空各渠道堵塞私货；制定并施行一系列防私缉私法规，加大惩治走私力度，奖励缉私；商会、同业公会和广大民众也参与其中。然而不久各地走私货品又卷土重来。其原因主要在于日货走私问题的侵略实质，国民政府防私缉私策略措施的应急性、被动性等方面。

关键词 华北走私 四川 防私缉私

从1933年开始，日本方面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1935年后走私得到日本军方的包庇纵容，达到猖狂的地步。私货不仅在华北一带和沿海泛滥，也开始大量涌入内地。目前关于华北和沿海一带日货走私缉私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对于同时期内地的日货走私及防私缉私活动情形，则少有涉及。^① 地处西南内陆的四川，其时也深受私货泛滥之害。

*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一般项目“1930年代四川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研究”（项目号：SC14B068）的阶段性成果。

**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① 主要论著有：郑会欣《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姚会元《1933~1936年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杨家余《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齐春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本文拟以 1936 年到 1937 年全面抗战前夕为时间段, 从其时四川各阶层的防私缉私活动入手, 对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在四川的实施情形进行梳理, 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及其原因进行探析; 指出日货走私问题的实质, 并结合四川防私缉私运动的实际情况对国民政府的相关策略和措施之得失进行分析。

—

从 1933 年开始, 为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利用《塘沽协定》后形成的特殊局面, 从陆、海两个方向向中国走私货品, 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1935 年后, 走私得到日本军方的庇护纵容, 采取武装走私的方式, 解除中国的海关缉私武装, 达到猖狂的地步。走私规模之大、范围之广, 前所未有, 走私货物包括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布匹、炼乳、啤酒、煤油、胶鞋、药品、颜料等, 出口私货主要是银元, 也有不少制造毒品的原料(如火酒、火油)。^①大规模的走私浪潮给中国造成了种种恶果, 如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 造成了巨额的关税损失, 同时严重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等。由于得到日本军方的包庇纵容, 这时候的日本对走私已不再讳言, 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特殊贸易”。1936 年 5 月, 外交部就日方怂恿日、韩浪人在河北走私, 并干涉中方海关人员缉私一事, 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济于事, 日本陆续在苏、鲁、闽、粤等地设特殊贸易协会, 分派武装掩护这些组织成立; 1936 年 8 月, 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议决, 有领事的地方“第一是扩充警权一倍以上, 第二保护特殊贸易”, 换句话说就是保障走私,^② 并拟“在九江、南昌、汉口、沙市、重庆等埠, 设立特务机关, 谋进一步之亲善”。^③这实际上是谋划以强硬手段将私货遍销中国。

齐春风《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走私贸易述论》,《民国档案》1999 年第 1 期; 齐春风《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地区的走私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3 期; 郑成林《抗战前商会对日本在华北走私的反应与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孙宝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 2004; 李佳豪《抗战时期四川缉私研究(1936~1945)》,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2015。专著有:〔韩〕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1933~1937)》, 台北,“国史馆”, 1997 等。

① 斛泉:《华北走私之全貌》,《东方杂志》第 33 卷 13 号, 1936 年 7 月 1 日, 第 241 页。

② 《同胞们, 快起来巩固我们的四川》,《救亡情报》第 16 期, 1936 年 8 月 27 日, 第 1 版。

③ 《日将在长江各埠设立特务机关》,《新新新闻》1936 年 7 月 21 日, 第 2 版。

随着私货在华北和沿海的泛滥，处于西南腹地的四川也开始受私货泛滥之害。当时私货入川途径有二，一是长江航运，由宜昌以上至重庆间沿岸各埠上岸。日本舰只“挟运私货开到四川巫山、云阳一带，便以无线电通知重庆奸商，用木船提运”，转运来渝，“在中途已将国货商标贴上，陆运来渝，缉私者无从确认其是否私货”；^①再由大商号批发给肩挑背负的小贩，销售到城乡每个角落，这是沿江一带数量最大的私货来源途径。在重庆，大批私货在百货商店改头换面，冒充国货低价售卖。据记者调查，陕西街、都邮街等百货商店、洋布庄等所陈列之商品，“几无一非私货”；还有大量沿街肩挟叫卖者，重庆市场“已为私货所占据”。^②邻近的江津、合川等县也发现有大量私货，价格奇低，数目惊人。涪陵等地，“曾有某国军舰二艘停泊涪陵荔枝园，深夜雇力夫运货上岸，据云多系绸缎洋瓷等”，除军舰包庇走私外，一部分则由奸商自西秀黔彭等地运入。^③在万县，私货“今年春间即已开始偷运来万，初起尚属少数，近一月以来，始逐渐增多，现已满街充斥，到处皆是矣”。^④

二是通过邮寄入川，数量也很惊人。1936年6月，“东川邮局转运处，经海关扣留，去成都及泸县之走私邮包，共达百余袋，现正依法处分中”；^⑤之后由华北寄来的邮袋越来越多，“昨日记者又至邮局调查，得悉可疑邮包，除陆续退换扣留者外，竟增至一千件左右……吾川已为走私货物所充塞矣”。^⑥海关以扣留邮包过多，特于6月底暂时停止检验，商托邮局凡有可疑邮件请予暂时扣留，待该关请示上级将既扣邮件处置完竣后，再行检验。在成都，主要是被由华北寄来的大量邮包类私货充斥，“近日由华北寄来之邮袋更为踊跃，至昨日截至海关认为嫌疑重大而扣留者，已达四百余袋，至前次扣留二百余袋之邮包，收包人已将包单寄来，经海关验明，并无海关检验印戳，又无进口派司，事实上已为走私货物无疑……至上项扣留之邮袋收包人经记者详细调查，大多均系成都交通公司、晋隆太、振兴号、晋义长、晋义生、益晋恒、宝源隆、同太长等家”。^⑦川北之南充，亦有人贩运私货，如脚踏车、苏货杂货、棉纱等。泸县商店的私

① 《某方用军舰偷运来川渝市私货日益增加》，《新新新闻》1936年6月16日，第5版。

② 《渝市私货日益充斥，市商会决制裁奸商》，《新新新闻》1936年6月9日，第5版。

③ 《各县走私概况》，《四川月报》第9卷第1期，1936年7月。

④ 《万县党部请商人勿买卖私货》，《新新新闻》1936年6月20日，第5版。

⑤ 《邮包私货概况》，《四川月报》第9卷第1期，1936年7月。

⑥ 《渝市邮局海关扣留可疑邮包数目惊人》，《新新新闻》1936年7月9日，第5版。

⑦ 《海关扣留可疑邮袋增至四百余件》，《新新新闻》1936年6月27日，第5版。

货,多数系从上海进货,用邮包直接寄来,某大商店在津更有特种进货机关,“泸县私货之多,恐不减于沿江各地”。^①

私货的大批涌入,给四川的经济、政治、社会风气等方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潮水般的私货因逃避了较重的关税,售价比国货便宜得多,因而买主络绎不绝;一些爱国商贩贴出“饿死也不卖仇货”的标语,但很多被挤垮了,如自贡的洋货广货匹头业及经营洋纱布店,“经此事影响,登门顾客寥若晨星……日渐萧条”。^②因私糖倾销长江上游各地,内江糖对外销路完全断绝,为此资内富糖业改造会请严厉查缉私糖,“近因走私猖獗,囤积宜沙之吾川橘糖,价值陡落,每万斤须亏折资本八十元,川糖商人,裹足不前”。^③川南商业中心泸县,1936年6个月来,各商家营业状况,极度衰落,不及去年4个月之营业数字,其中重要原因即是走私仇货充斥市场。^④私货的滥价倾销冲击各地的市场交易,严重威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发展。

1936年6月以来,日本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在成都设领事馆,并不管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于8月初派出日驻蓉代领事岩井一行赴蓉,拟强行在蓉设领。川地各界群众愤慨万分,纷纷通电反对,指出“成都一地,并非商埠,依据条约,不得设置领事”;一旦日本在蓉设领得逞,便会“沿长江设特务机关,走私货物如潮水涌入……彼辈去年在北平之一切行动,定将重演于今日之成都”;^⑤若任走私发展下去,将陷入从此“日货充斥,国货日弃”的局面,平津沪汉如此,各地亦莫不同受威胁,“行见正式商店歇业,工厂关门”,将使“西南半壁破产之农村、工业、商业,势必受其摧残而置于死地”。^⑥

二

面对日渐猖獗的走私情形,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严为防止,成立了查禁走私的各种机构组织,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政策法规。其中财政部在防私缉私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致来说,“有惩治

① 《泸县私货充斥》,《四川月报》第9卷第2期,1936年8月。

② 《自井洋广业生意萧条,仍然是受走私影响》,《新新新闻》1936年8月3日,第6版。

③ 《资内富糖业改造会请严厉查缉私糖》,《新新新闻》1936年8月18日,第6版。

④ 《泸县商业衰落,市面私货充斥》,《新新新闻》1936年8月11日,第5版。

⑤ 《四川空前之外患——设领与走私》,《新新新闻》1936年8月10日,第9版。

⑥ 四川省档案馆编印《四川档案史料》第2期,1985,第4页。

偷漏关税暂行条例，重者至处死刑；对于进口货物，则有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除航运加紧缉私外，对于陆路方面，则有防止路运走私惩治细则”^①等，并将关于查缉私货各项办法颁行各地。四川的防私缉私活动也就此开展起来。

1. 成立防私会，与海关等部门一起开展防私缉私工作

1936年7月，四川省政府召集有关机关团体组织建立全省防止走私委员会（简称防私会）。防私会组织机构的设置为：委员长一人，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委员由各相关机关团体指派之代表充任并互选常委5~7人；制定章程，规定下设业务、鉴定、调查三股。参加防私会的机关团体，包括四川省政府各厅处、银钱业公会、成渝两市政府、航业公会、公安局、重庆关监督、警备部、善后督办公署、市商会、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会、地方税局、营业税局、报界协会、东西川邮政管理局等。并要求各县市成立防私会分会，之后重庆、成都、宜宾、万县等大多数县市纷纷成立分会，由行政长官担任委员长。9月15日，四川省防私会奉省政府令改设为肃清仇货委员会，目的为“斩断仇货来源，肃清现有仇货，根绝将来永不贩运仇货”。^②

四川省防私会和各地分会成立后，积极行动起来，主要负责调查货品，搜集证据，鉴定走私货物，成为其时四川防私缉私工作的中坚力量，并先后制定了《四川省防止走私委员会计划大纲》和《各市县分会防止走私大纲》。重庆防私会开会议决，鉴定包裹由该会函请市政府转令商会、邮局，包裹到时，即将提单呈会，候派员鉴定确非私货，即予以提取。^③成都防私分会查得春熙路交通公司和西顺城曾泰产苏货店，由津沪邮寄来自自行车原料、麻织品及香妃绸等共若干包，查验税单有种种可疑之点，防私会当即飭令呈缴原售货家之有力证件。^④宜宾组织起缉私委员会，每日该会缉私股分派缉私人员，赴各轮船堆栈，检查进口货品，查获孙旭恒宝元通偷运的大量私货，并予以处罚。绵阳防私会十分注重调查，分为邮运、船运、车运、力运各组，清查私货入境；并责由商会制表登记存货。在各市县防私会工作人员的严密查缉之下，私货仍暗中运入川中，尤以人

① 《防止购销走私货物，渝商会忠告同业切勿存侥幸之心轻于尝试》，《新新新闻》1936年6月16日，第5版。

② 《为令知本会改名并规定分会登记检发组织大纲令仰遵照具报由》（1936年9月1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64，案卷号：024。

③ 《渝防私会近况》，《四川月报》第9卷第3期，1936年9月。

④ 《蓉分会扣私货》，《四川月报》第9卷第2期，1936年8月。

造丝、酒精两项为最多，省防私会特训令市县防止走私分会稽查货物种类酌予修正，规定以后如人造丝酒精之类，应从严考核其寄地，并厂名商标，以免私货充斥。^①

直接从事缉私工作的重庆海关，在防私缉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凡由华北运来之可疑邮包，均予以暂时扣留，并委托邮局代海关扣留了大量可疑邮包。到 1936 年 8 月中旬，重庆海关扣留的有走私嫌疑之邮包，前后已达 3000 余件，估值当在 200 万元以上，其中有寄至成都交通公司、晋泰隆等 8 家商号的大量邮包货品，交由省防私会处理。

2. 从邮路陆路水路航空各方面堵塞私货

针对四川私货来源的两个途径，四川省防私会和地税局、公路局等部门在邮路、陆路、水运及航空运输等渠道都规定了堵塞私货进入的办法措施。为严防邮包走私，省防私会议决，“凡自华北及上海各地由邮寄来之各种包裹，规定收件人须将提单呈实到会鉴定组，或各市县分会，请予派员同至邮局，当面逐包鉴定，如系私货，除没收外，并处以相当之罪”。^②陆路运输方面，四川公路、地税两局公布防止川黔路走私商货办法 11 条，布告川黔运输行商遵照，并制定颁发了《检查川黔长途车辆规则》，规定凡由海棠溪、綦江两车站向省外出发之行李货物各车辆，应于未装车前一小时通知该所，立即派员会同站务人员，一同执行检查，完税后方可放行。^③

水路航运方面，鉴于川省入口私货大多由轮船而来，省政府飭令川江航务管理处、省地方税局与重庆市政府三机关，拟定了江轮防私办法，对于应如何执行严密监视私货、各同业公会应如何切实联络、航务管理处应如何派舰随时流动稽查等关切最近缉私要务诸问题，会同妥议了办法。^④川江航务管理处、四川省地方税局、四川第一区公烟局，为防止川江上下航船夹运走私起见，特发布《航税稽烟三机关订合组检查航船规则》，规定“凡在川江停止，中外大小航船汽船，及大小木船，悉依本规则检查之”。^⑤针对四川下东沿江一带可以泊船地方常有私货起卸情形，省政府要求各县府抄发下东沿江一带泊船地名表，派员随时前往严密稽查，督飭当

① 《渝防止走私稽查货物种类》，《新新新闻》1936 年 10 月 26 日，第 6 版。

② 《省府通令严防邮包走私》，《四川月报》第 9 卷第 2 期，1936 年 8 月。

③ 《四川公路地税两局公布防止川黔路走私办法》，《四川月报》第 9 卷第 1 期，1936 年 7 月。

④ 《省府令渝三机关拟江轮防私办法》，《四川月报》第 9 卷第 3 期，1936 年 9 月。

⑤ 《航税稽烟三机关订合组检查航船规则》，《四川月报》第 9 卷第 4 期，1936 年 10 月。

地团警协同查缉，并具体拟定查缉各轮办法。省地方税局鉴于奉、巫、渝、万之外的沿江各县“未经设所地方，均可卸下私货”，要求下东各县征收局认真缉拿，并转饬各地团保尽力协助。^①

航空运输方面，特制定《川地税局检查邮船飞机规则》，规定在各停机地点的分局所如重庆、成都、万县、宜宾、遂宁站，指定人员负责办理。要求乘客携带应税货物，应于未上机以前，及下机时报完税款，否则一经查出，以漏税认罚；乘客报完税款，即由本分各局所派往之检查员就场征收；等等。^②针对奸商借包裹行李偷载私货，省府令省会军警检查航空客货，并由行营令布告周知：“令饬当地军警机关，对于飞机运载货客行李，务须一律检查，以儆奸邪而杜弊端。”^③

面对如此严密的水陆空各路和邮路检查办法，走私商也在不断变更走私手段，“奸民为避免检查，多将私货改由民船小轮拖驳或长途汽车装运内地推销，各地缉私机关尚未普遍注意”，或“以贵重货物，化整为零，改用轻便小包裹寄递，并能由邮局直送商号点收或交航空直寄”。^④为此省府通令各地缉私机关，注意民船小轮、公路汽车货运，严防私货；省地税局也规定了取缔轻便包裹办法，要求以后对于邮寄轻便小包，商人提取时，须先到稽征所或征收局呈报缴验提单，或航空公司提货单，经查核登记后，始准提取，并须立即到该管税所完税，否则一经察觉，无论是自取还是邮包送达，均将所寄货物，全部没收。^⑤

3. 规定土货运销办法，加大惩治走私力度，奖励缉私

财政部于1936年5月制定颁布《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规定了应行稽查进口货物的种类和办法；之后又规定了土货运销办法，对于在国内制造的如人造丝、酒精等26种货物，在运经海关时，应报由海关发给土货运销执照；在内地运输不经过海关者，应报由同业公会或商会，或工厂联合会，发给土货证明书。四川省方面，予以积极推行，省府一方面严令稽查进口货，一方面令登记商货，规定凡有海关地方，各商堆积之货物或新进货品，一律向海关申请登记；无海关地方，则向省地税局申请登记。^⑥并通令各市县防私分会执行已税货物分运办法三项，“各进口商人稽查货

① 《地税局令下东各征局严缉私货》，《四川月报》第9卷第5期，1936年11月。

② 《川地税局检查邮船飞机规则》，《四川月报》第9卷第4期，1936年10月。

③ 《省府令省会军警检查航空客货》，《新新新闻》1937年3月2日，第10版。

④ 《奸商变更运私方法》，《四川月报》第9卷第5期，1936年11月。

⑤ 《川地税局取缔轻便小邮包》，《四川月报》第9卷第3期，1936年9月。

⑥ 《省府令登记商货》，《四川月报》第9卷第3期，1936年9月。

物,持有重庆海关运销执照,或重庆市商会分销证明书,填证明书号数、日期,及分销货品种类、数目、地点等项者,即予放行;运销土货,如持有商会之土货证明书,亦请放行;凡小贩运销货物,其价值在三十元以下者,均准免于稽查”。^①

偷漏关税被查获,向例系由海关按照《海关缉私条例》处罚。随着华北走私日益猖獗,其已绝非纯粹经济性走私活动。1936年5月下旬,财政部突破权限,拟定《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行,对偷漏关税,持械拒捕,销售和藏匿私货等行为的处罚做了严格规定,其中有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判罚等项,量刑之重,前所未有。四川省方面积极响应,1936年8月,省高等法院高检处令检举偷漏关税案件,“近查川省各地私货充斥有加无已,影响国税至大且钜,各该地虽存防私机关严加取缔,依照该项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各地方法院负有制裁之责,各该检察官自应厉行检举以尽职责,嗣后如发现运销或藏匿漏税私货者,务须行使检举职权,依法严究”。^②

为鼓励查缉起见,财政部重新规定了《海关缉私奖励办法》。四川省方面,五成乃至更高的给奖成数为海关和其他部门所采纳。省府准地政局所请奖励巡查员缉私办法,除查拿偷漏关税私货另照财政部提奖办法办理外,该局关于查获进口偷漏货税罚金暨没收违禁物品变价之款,以五成提奖用示鼓励;省府在《查缉各轮船起卸私货办法》中也规定,“查没收私货变价之款应照财政部规定,系以百分之五十提为当事人,百分之五十汇交总税务司核收;盖为鼓励缉私起见,准对上项变价之款,以百分之六十提奖,百分之四十拨作该地公益之用”。^③省防私会、省地政局、重庆海关等部门还设立了密告柜,招人举发私货,如有查获,照章提成给奖,以资鼓励。

4. 商会、同业公会和民众的防私缉私活动

鉴于商会在商业活动中的重大影响,其时政府非常重视发挥商会在防私缉私方面的作用,在《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等条例中多次明确规定将转口洋货运销证之收存登记,及登记货物分销证之收存登记、填发等事宜,交予商会与同业公会办理。各地商会郑重劝告同业,一致拒购私货;积极协助政府,大力宣传政府的缉私政策和具体执行相关的政策法

① 《省府核定已税货物分运办法》,《四川月报》第9卷第5期,1936年11月。

② 《高检处令检举偷漏关税案件》,《四川月报》第9卷第2期,1936年8月。

③ 《省府指示查缉各轮办法》,《四川月报》第9卷第3期,1936年9月。

规，不管是在对进口货物的运输、稽查，还是在对私货的调查鉴定和惩处等方面，商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走私日炽的情形下，1936年7月20日，重庆市商会防止购私委员会成立，并拟订了组织大纲草案及制裁购销私货办法草案，协助政府缉私。委员会成立后，即函告叙、泸、蓉、内、资、井等市县商会注意邮包私货，以收缉私之实效。成都市商会于7月21日召集各行帮成立防止购私委员会，随即展开了防私缉私的具体工作，召开各股联席会议，协助办理会务，凡属已到未到之进口货，由各股分聘干事协助办理进口货详细登记。对于全国商会联合会提出的要求商店必须加入公会一事，成都市商会通电赞同，认为这有利于抵制私货盛行。各同业公会方面积极协助查缉私货，如成都五金公会召开会议协商处理走私办法，要求商家限一星期内自行来会登记本帮来货家，以搞清货物来源。^①重庆药材公会为防止会员销售私货起见，特订办法三种，“一经查获私货，决交众予以严厉制裁；分飭各组组长，严密稽查；进口药材抵埠时，须向公会报明花色件数，及提验海关税单”。^②自贡市组成私货查缉团，由商会主席任团长，挡获由隆昌运赴荣县、威远之嫌疑货挑，并打算搜查全市匹头洋广杂货，查证有无购买销售寄存私货之奸商。^③

各地民众也积极参与到防私缉私活动当中。在泸县，有爱国志士多人组织锄奸缉私团，专查走私仇货。^④旅居在外的川人对走私问题密切关注，四川旅沪同乡会电请政府严惩奸商，以儆效尤；为协助川政府缉私，旅沪川人组织起商、学、新闻各界共50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对日本在蓉设领后“深恐走私猖獗与种种之祸变”，共商应付办法。^⑤影响最大的群众反日走私、设领运动当属爆发于8月24日的成都事件（又称大川饭店事件），这一天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蓉设置领事、倾销走私日货，捣毁了留宿和掩护日寇分子的大川饭店、公安第四分局以及贩卖走私货的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晋恒等商号，毙、伤日本人各2人，军警伤亡10余人，群众伤亡30余人。这次事件，使日本在蓉设领、在川大规模进行走私倾销的企图受挫。

① 《五金公会昨开紧急会协商处理走私办法》，《新新新闻》1936年7月19日，第9版。

② 《重庆药材公会防止会员销售私货》，《四川月报》第9卷第1期，1936年7月。

③ 《自贡市私货查缉团搜查全市私货》，《新新新闻》1936年9月4日，第6版。

④ 《泸县奸商不知亡国痛，在沪订走私合同》，《新新新闻》1936年6月9日，第5版。

⑤ 《旅沪川人协助政府缉私，昨举行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救亡情报》第17期，1936年9月6日，第3版。

三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四川的防私缉私工作渐有起色，私货数量减少，税收增加。据报道，“走私事件，自经各方注意后，此间海关在月余当中，即扣获由平津运来之私货九百余件……目下川省走私问题，已远不如过去之猖獗”。^① 在灌县，此前运到的匹头类私货甚多，经防私会迭加警告，“并将全体匹头业商人召集商会，各自签押负责誓不贩卖私货，故现在在此间之绸缎匹头铺，所售卖者，复经防私委员会检查，确已皆属国货成品”。^② 税收方面，到 1936 年 10 月，自 9 月新津县防私分会成立后，“鉴于该分会防止偷税之严密，侦察查考之认真，不甘以血本为孤注，不特走私之货日渐减少，即偷漏关税之事，亦不敢冒昧举行，本月份本所税收，确有起色，大约可收三万余元，较之去年陡增二倍有奇”，为此省政府传令嘉奖新津县防私分会。^③ 到该年年底，省府据省防私会呈称，“查本会成立迄今，多赖有关机构之维系，及办事各员之努力，数月来税额逐有增加，走私渐告绝迹，省府传谕嘉奖”。^④ 四川的防私缉私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然而好景不长，1937 年春节过后，各地走私货品复又卷土重来。据报载，“截至本月份，海关方面报告，某国货品入口，已达二千万元以上，目前尚在大批陆续起运来华，多改头换面，冒充我国各厂家出品，混为国货物。并以六百万货物，运四川各地倾销，已经由沪转运汉宜换轮来川，其中以棉纱人造丝、纸及瓷器等次之，五金及教育用品又次之，短期及可纷纷运渝云”。^⑤ 一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又暗中购买巨量私货，源源不断运川销售，由城市及于乡村。省防私会以此种情形，恐商业前途不堪设想，先派该会检查组组长前往渝万两地视察，然后再赴各县视察。4 月，由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业已赴英，职务暂由日本人岸本代理，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走私将更猖獗。^⑥ 不仅是四川，全国各地的走私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很多地方的走私活动在稍事沉寂后，重又活跃起来。

① 《渝走私风渐杀》，《新新新闻》1936 年 8 月 19 日，第 6 版。

② 《灌县防私会查获走私海菜》，《新新新闻》1936 年 12 月 7 日，第 6 版。

③ 《各地缉私认真税局收入增二倍》，《新新新闻》1936 年 11 月 3 日，第 10 版。

④ 《省防私会工作努力近月来税额增加》，《新新新闻》1936 年 12 月 30 日，第 10 版。

⑤ 《某国货品来川倾销》，《新新新闻》1937 年 3 月 27 日，第 6 版。

⑥ 《岸本代总税务司后走私更将猖獗》，《新新新闻》1937 年 4 月 8 日，第 3 版。

抗战前夕四川各方面的防私缉私活动，不管是在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还是在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各级政府机关到商会团体、普通民众均行动起来，力图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遏制来势汹涌的走私浪潮，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日货走私问题，四川的情形同样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从日本走私问题的实质来看，1936年秋日本侵华间谍头子松石孝良曾做了一个震动各国的报告，在谈到对华走私问题时认为其原因是日本“痛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故于1931年‘九·一八’发动满洲事变而占据之，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已得缓和”。^①因此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其目的是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华北自治运动”，为此不惜造成日货充斥华北及内地市场。日本驻重庆领事馆于1937年4月下旬秘密召开了四川间谍会，会上拟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该计划表示，“特殊贸易”（即走私）在华北及福建等地获利颇佳，日本财政转佳实有赖于此；然而，“特殊贸易”在华中尤其四川不甚繁荣，因此该计划第一部分即强调要在四川等地也推行“特殊贸易”，并建议在这些地方制造中国著名品牌的假冒伪劣产品，然后以低价倾销。^②由此可见，走私问题不是单纯的偷税漏税行为，其实质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来看，基本是应急性的，处于被动的应对状态，在逐步适应日本对华走私步骤的种种变化。在华北走私愈演愈烈、已经威胁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统治基础之时，国民政府不得不强化缉私工作，成立了查禁走私的各种机构，制定颁布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政策法规，但仍未放弃妥协退让的总体政策，这就决定了当时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体现在各地的缉私成效，也就大打折扣。在四川，面对私货的泛滥，有记者问及外交部驻川康特派员吴泽湘如何看待四川私货猖獗一事，吴的回答颇值得玩味，“照此看来，走私延至四川，或者不能说绝无其事，不过报载某国军舰庇运私货一层，目下尚无事实上的证明，外传消息，或多传闻之误，深望新闻界同人慎加审复，俾免另生枝节”，^③可看出政府对走私一事讳莫如深的态度。从省府制定的《查缉各轮船起卸私货办法》来看，“一发现有轮船在江

① 钟鹤鸣：《日本侵华之间谍史》，华中图书公司，1938，第132页。

② 这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见1937年7月16日成都出版的《图存》周刊所附的单页文件，藏于成都市档案馆。

③ 《由天津寄成都大批邮包类私货》，《新新新闻》1936年6月17日，第16版。

中停泊装卸私货……如系外籍商轮，或外国兵轮，只派人暗中监视其所起之私货，俟该船驶行后或货已运至不能与该外舰取得联络地方，即将该项私货挡送县府处办，不得径扣留船只，或于该轮船尚能掩护走私者之地方与时间即行查拿，俾免发生意外事件”，^①其中“诚恐发生事端”的表述体现出对列强的消极、惧怕态度。

防私缉私工作牵涉海关、地税、运输等诸多部门，需要各部门协同解决问题。省防私会成立，宣称“以调查走私货品，筹划防止办法为主要任务，至关于执行事项，由本会签请四川省政府令飭有关机关办理”，将防私事务整合于一身，同时协调配合各部门行缉私之责。但防私会的地位又是尴尬的，名义上以各地最高行政首脑为防私会负责人（如省防私会委员长由省主席刘湘兼任），却又明确规定“其性质亦属社会团体之一种，法律上应受各该所在地市县政府之监督指挥”，^②这就决定了其防私缉私职权受各级政府之掣肘。舆论对于防私会的工作成效也甚不满意，“吾人对于防私运动，始终疑惑莫解者，为四川防私协会一贯持冷静态度，毫无表示，目前对象已得，目的既著，有海关提出发货，有舆论指出商家，既不烦防私会诸公之明察暗访，复不牢其搜集证据，何以不立即提出检举，妥筹防止之方？”^③其中指出四川防私会在据理弹劾、秉公检举方面还做得不够，无法“尽职责而收实效”。

同样，商会、同业公会做了很多防私缉私的具体工作，但对贩运私货者，只能尽劝告之责，虽也规定了制裁办法，但仅限于“开除会籍；通告同业，与之经济绝交；予以汉奸名义，宣布名誉死刑”等方面，^④无权对贩卖私货的奸商加以法律层面上的惩治。而执法部门却反应迟钝，从1936年7月起，重庆海关先后扣留了大量有走私嫌疑的邮包，其中邮寄至成都的大批涉嫌走私货物，渝海关却未能及时做出处置；后经省防私会搜集不少证据，查明真相，交通公司走私案被移交法院办理，而面对数量上千件、价值上百万的邮包走私案，“渝关久久不予处分，法院检察官竟亦噤若寒蝉，丝毫无所表示”，令社会各界大惑不解、议论纷纷，当时《新新新闻》的社论愤然指出，“据中央特颁法令规定：走私五千元以上者枪决示儆。四川的防私会及各机构，竟都承认本市没有一家是奸商，一个是走私者吧……就只说人闻名的八家奸商们吧，为什么未闻当局有何惩治以

① 《省府指示查缉各轮办法》，《四川月报》第9卷第3期，1936年9月。

② 《省府规定各地防私会与县府行文格式》，《新新新闻》1936年9月17日，第10版。

③ 《本市防私运动之两遗憾》，《新新新闻》1936年8月24日，第9版。

④ 《市商会再通告各帮一致拒购私货》，《新新新闻》1936年6月12日，第5版。

‘示儆’呢？货既被扣留，证据显然，难道中央的法令只特颁给老百姓们看的呢？还是为了顾全仁人君子的风度而不屑与之追究呢？”^①可见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夕对日本侵华的妥协退让态度，造成各级政府机关在对待日货走私问题上不够积极、不主动作为的姿态。因而一方面无法从源头上清除私货，另一方面对贩运私货者执法不严、惩治不力，奸商贩卖私货的行径屡禁不止，防私缉私的政策与措施也就无法真正有效落实。

总之，全面抗战前夕，华北走私浪潮蔓延到四川，面对日货在川地的泛滥，四川各阶层从政府机关，到商人组织、群众团体开始了自上而下的防私缉私活动，成立了防私缉私组织，颁布并施行了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法规和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不久之后各地走私卷土重来，其中原因，与其时全国性的对日防私缉私形势有紧密联系。从日货走私问题的实质来看，已不是单纯的偷税漏税行为，而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防私缉私策略措施的应急性、被动性，决定了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好日货走私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方面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其走私政策，以实现其“以战养战”之战略，中国的海关缉私全面崩溃，走私日货泛滥成灾，国民政府的战时缉私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① 《从走私说到在蓉设领》，《新新新闻》1936年8月20日，第11版。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综述*

聂庆艳**

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围绕金融危机与币制改革、币制改革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币制改革中的央地关系及币制改革中的外交关系等议题，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币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选题范围、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等方面来看，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方法更为科学，结论更为客观。同时，在研究内容深挖、研究方法创新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今后应注重过程性和系统性研究，以便提升研究的整体性和均衡性。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金融危机 币制改革

1927~1937年，国民政府不遗余力推进币制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通过改革，国民政府统一了货币发行权，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币制改革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币制改革的原因与意义、币制改革与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币制改革在国民党政权巩固中的作用、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维护货币主权中的作用等方面展开了探讨。为推动研究的深入，笔者在前人综述研究的基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研究（1843~1953）”（12BZS047）的阶段性成果。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①结合学界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评述,并就如何深化研究提出建议。

一 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针对当时币制混乱的现实问题,学界就币制改革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陈锦涛《中国币制问题之经过及展望》、杨荫溥《货币与金融(一)》、周伯棣《货币与金融(二)》、张素民《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等。^②这些研究对币制改革进行详细论述,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部分研究成果为币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但由于受时代局限及立场所限,评判难言客观、深入。自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相关研究处于沉寂状态,研究成果较少且零散。^③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币制改革的研究进入活跃期,研究成果主要有: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梅远谋《中国的货币危机——论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改革》、钟祥财《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等。^④这些研究大多从金融、货币史的角度对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进行探讨,视角较为单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档案资料的公开,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结论更趋向理性、客观,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洪葭管《20世纪上海的金融》、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贺水金《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石涛《南京国民政府

① 综述类研究主要有:郑会欣《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姚会元、孙玲《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综述》,《财经政法资讯》2007年第4期;徐锋华《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② 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陈锦涛:《中国币制问题之经过及展望》,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1934;杨荫溥:《货币与金融(一)》,中华书局,1935;周伯棣:《货币与金融(二)》,中华书局,1935;张素民:《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商务印书馆,1936;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1936;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

③ 据笔者所查,仅见符泽初《中国币制问题总检讨》(中国出版社,1948)、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编《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涉及币制改革。

④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1986;梅远谋:《中国的货币危机——论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改革》,张卫宁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钟祥财:《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中央银行研究 (1928 ~ 1937)》、史瀚波《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等。^① 另外，一些民国经济史著作，如虞宝棠编著的《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 ~ 1937)》(四)，张宪文、张玉法主编的《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6 卷《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等都对币制改革情况有所涉及。^①

在学术论文方面，也有大量成果问世。笔者以“币制改革”为主题，在知网上进行检索，1981 ~ 2015 年，涉及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论文共有 276 篇。其中，1981 ~ 1985 年只有 8 篇，2011 ~ 2015 年达到了 68 篇，研究成果数量呈现上升趋势。

在成果数量日趋增长的同时，研究质量也日益提高。笔者对以上 276 篇论文进行了梳理，提取不同时段的研究主题词（见表 1），据此勾勒、描述学术研究的演进轨迹，并予以简析。

表 1 1981 ~ 2015 年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研究论文的主题词

时 段	研究主题词
1981 ~ 1990	“废两改元”述评，“废两改元”档案资料选编，法币政策概述，法币政策评价，法币与官僚资本，美国白银政策，白银风潮，中美白银协定，李滋罗斯，日本对币制改革态度
1991 ~ 2000	银本位制度向纸币本位制度转变，中央银行，币制改革的原因、作用、意义及影响，币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云南“改两为元”，河北币制变迁，1936 年中美货币协定，中美白银外交，李滋罗斯与币制改革设计
2001 ~ 2010	金融统制，货币现代化改革，中央银行研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制度，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中国农民银行与法币改革，“废两改元”实施经过，法币在云南的推行过程，刘湘与四川地方银行，上海银行公会与废两改元，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与国际经济关系，币制改革与中美英日国家利益的选择，美国政府关于收购中国白银问题的争论

① 洪霞管：《20 世纪上海的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 (1890 ~ 193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贺水金：《1927 ~ 1952 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石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研究 (1928 ~ 1937)》，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美〕史瀚波：《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池桢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① 虞宝棠编著《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 ~ 1937)》(四)，人民出版社，2012；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6 卷《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等。

续表

时 段	研究主题词
2011 ~ 2015	蒋介石与法币政策, 蒋介石与四川财政整理, 阎锡山与“晋钞”, 宋子文金融改革的思想与实践, 钱俊瑞经济思想, 民国乡土币制, 北方农村钱票, 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 1935 年中国法币改革, 政治环境, 恶性通胀与币制改革, 货币法制变迁, 货币发行法制史论, 白银危机对中国农业、工商业的影响, 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 币制改革中的交通银行, 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

通过表 1 的梳理可以看出, 20 世纪 80 年代, 学界对币制改革的研究尚处于恢复阶段。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币制改革的原因、性质、作用及评价, 围绕币制改革中国国民政府与英、美、日等国的关系等。部分研究带有资料整理性质, 概述性研究较多; 另外, 部分研究受阶级斗争史观影响, 结论尚欠公允。

90 年代后, 学界对币制改革的研究逐步深入, 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部分研究涉及币制改革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 币制改革对抗战的影响,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 对币制改革的评价也逐步客观, 如有论文直接以《李滋罗斯并非 1935 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为题,^① 推翻了此前学界认为的币制改革主要由英国李滋罗斯主导设计的结论, 肯定了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自主性。

21 世纪头十年, 币制改革研究日趋升温。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 还是研究深度, 都有了长足发展。部分学者站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高度, 探讨了国民政府金融体制构建、国民金融统制政策、金融组织的设计及其运作等问题, 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部分学者对“废两改元”实施经过、法币的推行过程进行了考察, 币制改革的过程性研究、动态性研究明显增强。还有学者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 对银行公会与币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体现了研究的深入。

2011 年至今, 币制改革研究进入高峰期, 相关研究持续推进, 尤其是随着蒋介石日记等史料的公开, 精英人物在币制改革中的作用, 成为学者探讨的重点。部分学者还专门探讨币制改革在地方、基层、农村的实施情况, 体现了研究视角的下移。另外, 研究中多学科综合运用特点明显, 很多学者运用政治学、法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 对币制改革进行分析, 得出了较为新颖的结论。

^① 孟龙:《李滋罗斯并非 1935 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中国钱币》1991 年第 2 期。

二 专题性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 1929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与中国币制改革的关系,币制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外交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研究。

(一) 金融危机与币制改革的关系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快就传至中国。1931 年 9 月以后,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制,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发展,这给中国金融、经济等造成了巨大冲击,催化了币制改革的实施。

金融危机最先表现在农村。宫玉松叙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金融危机的表现、原因及后果,指出由于立场问题,国民政府和银行界设立新式农业金融机构等政策带有很大局限性。^①符长泉从金融业、民族工业、对外贸易等方面,分析了农业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影响。^②金融危机与法币改革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国学者杨格结合亲身经历,探讨了 1927~1937 年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其中涉及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以及中国币制改革的推行情况。^③台湾学者李宇平探讨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经济恐慌及其造成的物价下跌、贸易失调、交易停滞、现银外流等现象,认为经济恐慌是“废两改元”实施的直接原因。^④李爱分析了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银价震荡,及其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的影响。^⑤

1934 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使世界银价大幅度提高,这对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造成了严重冲击,大量白银以惊人的速度外流,国内金融枯竭,工商业倒闭,金融风潮频发。白银风潮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谢菊曾认为,美国的购银方案是其为转移国内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它对上海白银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⑥郑会欣分析了白银风潮的原因、危害及影响,认为国民政府以救济恐慌为借口,完成了对全国金

① 宫玉松:《三十年代农村金融危机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② 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③ [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 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④ 李宇平:《经济恐慌与废两改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9 年第 27 期。

⑤ 李爱:《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国民政府白银货币政策影响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

⑥ 谢菊曾:《1935 年上海白银风潮概述》,《历史研究》1965 年第 2 期。

融的垄断。^① 钟祥财认为美国白银政策严重摧残了中国社会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银本位基础,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② 吴敏超指出,当时经济学界对《购银法案》所引发的中国经济金融危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为法币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③ 赵留彦、隋福民运用统计数据和计量方法,描述了大萧条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揭示了1935年法币改革的时代背景。^④ 与强调白银风潮与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同,李培德认为世界大萧条对中国经济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袭击和世界银价的大幅波动。^⑤ 日本学者城山智子考察了大萧条时期中国与世界经济关联下市场、政府与货币体系的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全球性现象,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的分水岭。^⑥ 蒋清宏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危机的史实、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及经济危机的传导路径。^⑦

(二) 币制改革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币制改革是国民政府强化对民间金融控制、增强社会渗透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必然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小科布尔分析了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展示了双方围绕币制改革方面的博弈过程。^⑧ 吴景平从白银风潮与上海金融业、国民政府对上海银钱业的救济与控制、国民政府的两次币制改革及政府的金融立法与金融业的反应等方面,探讨了1927年至1937年上海金融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⑨ 侯桂芳指出了在1935年的金融危机中,上海银钱界不但经济受损,还被国民政府逐渐削弱与控制。^⑩

-
- ① 郑会欣:《试论1935年白银风潮的原因及其后果》,《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 ② 钟祥财:《试析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 ③ 吴敏超:《1934~1935年白银问题大讨论与法币改革》,《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 ④ 赵留彦、隋福民:《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 ⑤ 李培德:《略论世界大萧条与1930年代中国经济》,《史林》2010年第5期。
 - ⑥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孟凡礼、尚国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⑦ 蒋清宏:《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经济危机再探讨》,《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 ⑧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⑨ 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 ⑩ 侯桂芳:《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币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金融体系构建的过程。通过“四行二局”的金融体系的构建,国民政府的金融实力大增,在处理与民间金融关系方面日趋主动。赵秀芳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不仅统一了货币、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基础,而且建立了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金融体系,推动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刘慧宇从中央银行和国民政府货币现代化改革的角度,探讨了中央银行与币制改革的关系;潘晓霞探究了交通银行的成长发展因素及路径选择,分析了该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与币制改革中的得与失。^①

银行公会在当时重要的金融行业组织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其管控,不断尝试对其改组。银行公会虽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曾竭力反抗,但最终选择了与政府合作。学者们围绕双方互动的过程及银行公会作用的发挥展开了探讨。吴景平通过考察上海银行公会的改组风波,揭示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与金融组织控制和反控制的博弈过程,他还从银行立法的视角,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进行的一系列交涉过程,揭示了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郑成林分析了上海银行公会在币制改革中的作用及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互动;王晶研究了上海银行公会不同时期的组织管理及运作,探讨了政府与民间团体的互动关系;徐为结分析了汉口银行公会内部变迁及其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认为汉口银行公会在金融危机中通过与政府互动合作,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②

钱业公会也是政府整合的对象,双方的互动过程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邹晓昇探讨了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形态的演变以及组织运作,涉及了钱业公会的改组情况;李勇军、刘俊峰认为汉口钱业公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是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缩影;魏忠指出上海钱业公会通过组织协调和自我实施形成的多边声誉机制,可以增加钱业组织与政府进行博弈的筹码,使政府遵守承诺,扩大市场交易,增加社会利益;朱荫贵

① 赵秀芳:《抗战前十年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趋向》,《文史哲》2003 年第 4 期;刘慧宇:《中央银行与国民政府货币现代化改革》,《民国档案》2002 年第 2 期;潘晓霞:《1908 ~ 1937 年的交通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② 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 ~ 1931)》,《历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从银行立法看 30 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史学月刊》2001 年第 2 期。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史学月刊》2005 年第 2 期。王晶:《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 ~ 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徐为结:《汉口银行公会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互动性研究(1920 ~ 1938)》,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5。

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使得钱庄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李一翔认为在政府主导下，银钱业的关系严重失衡。^①

（三）币制改革中的央地关系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地方割据势力依然存在。由于中央与地方的亲疏关系不同，各地对币制改革的反应也不同。张连红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在币制改革中的博弈，认为各省对于币制改革的态度差异巨大。^② 币制改革在云南的推行并不顺利，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唐云锋分析了法币改革在云南的推行过程，认为云南对法币改革进行了抵制；史允揭示了云南抵制改革的原因，认为1935年新滇币刚刚在云南走上正轨，实施法币改革必然会对其形成冲击；李石以“滇币”为切入点，阐述了民国时期云南区域性货币金融体系的兴衰过程，探讨了币制改革中云南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及各自策略。^③ 四川地钞整理为币制统一奠定了基础。石涛考察了四川地钞整理过程，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整理和改革是币制统一的第一步，为法币改革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方勇考察了蒋介石对四川币制统一的过程，认为币制统一是四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④ 广东之前一直保持“独立”状态，抵制中央币制统一政策。曾涛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归属中央统治后，中央在广东推行币制的过程；王丽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省在金融领域的独立态势，与之在政治、军事方面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对峙互为依托；张晓辉

① 邹晓昇：《上海钱业公会研究（1917～1937）——以组织和内部管理制度演变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李勇军、刘俊峰：《汉口钱业公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探析（1928～1938）》，《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魏忠：《组织协调、自我实施与承诺博弈——基于近代上海钱业公会与政府关系的分析》，《商业研究》2010年第9期；朱荫贵：《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李一期：《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

② 张连红：《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27～1937）》，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③ 唐云锋：《论法币政策在云南推行时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史允：《从富滇新银行档案看1935年法币在云南的推行过程》，林超民编《西南古籍研究（2008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李石：《“滇币”始末——民国时期云南地方货币金融体系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3。

④ 石涛：《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方勇：《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探讨了宋子文与广东财政金融的渊源,叙述了两广事变后宋子文赴广东进行整顿财政、统一币制的情况。^①山西阎锡山发行晋钞及其对币制改革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刘峰搏认为,阎锡山变相发行“晋钞”的目的之一就是抵制法币改革在山西的推行。^②

(四) 币制改革中的外交关系

长期以来,英、日、美等国在中国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成为它们在华利益博弈的新支点。李爱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美、英、日等国在中国币制改革中扮演的不同角色。^③郑会欣、钟小敏、周春英分别探讨了 1935 年中国币制改革与英、美、日三国的关系问题。^④

美国在中国币制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迈克尔·罗素运用美国档案,探讨了美国白银政策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币制改革过程中中美之间的交涉问题。^⑤吴景平认为美国对币制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介入的曲折变化过程。^⑥任东来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白银外交,已从寻求稳定银价,转为争取美国支持和配合中国币制改革;美国在考虑中国的要求时,力图在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之间保持平衡。^⑦吴福红认为币制改革促使中美关系由平淡转向紧密,通过币制改革,美国改变了对华的经济、政治策略,加强了对华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⑧此外,李霞、张北根、李家智等也分别论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及其白银政策对中国经

① 曾涛:《三十年代广东省统一币制前后》,《广东金融》1990 年第 10 期;王丽:《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0 期;张晓辉:《宋子文与民国时期广东财政金融》,《暨南史学》2015 年第 2 期。

② 刘峰搏:《民国时期“晋钞”的发行及其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③ 李爱:《白银危机与中国币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④ 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 年第 1 期;钟小敏:《1935 年中国币制改革与英美日关系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3 期;周春英:《英美日三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2005 年第 6 期。

⑤ [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 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郑会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⑥ 吴景平:《美国和 1935 年中国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

⑦ 任东来:《1934~1936 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⑧ 吴福红:《南京政府币制改革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济及中国币制改革产生的影响。^①

日本对中国推行的币制改革进行抵制与破坏。郑会欣考察了日本在白银风潮中挤兑白银、走私白银等扰乱中国金融的行为，分析了其对中国币制改革采取的种种破坏措施。^②刘凤华从日本军方和日本银行的角度，探究了其对于币制改革的抵制与破坏。^③刘成虎、高宇运用日文档案，探讨了日本军部对币制改革的干预过程，以及币制改革对中日关系的影响。^④姚会元认为法币改革在抗日战争的胜利中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刘承斌、金正贤也对法币改革在抗战中的作用予以肯定。^⑤

英国希望通过支持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增强在华影响力并借以抗衡日本。吴景平认为英国最早介入1935年的币制改革，在币改方案的酝酿阶段和宣布初期，英国的态度最为积极，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最大，但在日本反对和美国插手的情况下，英国在对华贷款问题上一再拖延，最终未能把中国拉入英镑集团；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考察了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探讨了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化，尤其是对币制改革态度的转变。^⑥

三 研究特点与展望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从选题范围、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深度等方面来看，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广泛，结论日趋客观。前期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币制改革的原因、性质、作用、影响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内容得以拓

① 李霞：《美国的白银购买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张北根：《中美关于白银和币改问题的交涉》，《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李家智：《美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等。

② 郑会欣：《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③ 刘凤华：《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

④ 刘成虎、高宇：《论日本对法币改革的干预及其后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⑤ 姚会元：《法币政策与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刘承斌：《略论法币政策对抗战的作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韩〕金正贤：《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展, 学者们注重探讨币制改革的思想与理论、国民政府金融体制构建、国民金融统制政策、金融组织的设计及其运作等。21 世纪以后, 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 涉及法币改革组织机构、决策过程, 改革实施过程中国家与银行组织的互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等方面。对币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币制改革的意义与影响等, 学界大多予以积极评价, 研究结论日趋客观。

二是研究视角多元化。其一, 研究视角的国际化。这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日益国际化, 把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币制改革, 放在世界金融变革的进程中去审视、思考。毫无疑问, 研究结论更趋于客观。如在法币改革方案制定方面, 学界大致达成了共识, 认为方案主要由国民政府自主制定, 而非英美政府主导; 对币制改革的评价逐步提高, 充分肯定了币制改革对经济社会及抗战的积极作用。其二, 研究视角下移。关注改革在基层地区、边远地区, 甚至农村地区的实施, 是近年出现的一种研究趋势。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对币制改革的多重面相有了深入了解, 对币制改革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三是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其一, 跨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日益明显。近年来, 学界在研究过程中, 都非常注重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除货币学、金融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外, 还尝试运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 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其二, 注重总体性研究。部分学者尝试把币制改革放在世界金融体系变迁、中国币制变迁的进程中, 探讨币制改革的相关问题。还有学者尝试把币制改革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于币制改革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 但在研究内容拓展、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视角转化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加强研究的系统性。相关研究大多从经济、金融、中外关系等角度来谈币制改革, 一些研究成果虽然涉及了币制改革与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关系, 但未能有效整合, 显得支离破碎。对于一些重要问题, 如币制改革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探讨不足。事实上, 币制改革既是国民政府逐步建立独立金融体系、强化货币主权的进程, 也是国民政府强化统治、巩固政权的过程,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研究需要提高研究站位, 注重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

二是创新研究方法。币制改革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使得这一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金融改革、经济改革的范畴, 这决定了对其研究

要有多元化的视角与方法。目前对币制改革多重面相的揭示还不够。如对于币制改革决策过程中各方势力的角逐、政策推进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与参与、改革过程中的央地博弈、改革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改革的社会认知与认同、改革与地方金融生态变迁等问题,现有探讨还不多,研究还不够深入。就研究结论来看,大部分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现象较普遍。在今后研究中,要注重综合运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政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

三是深化过程性研究。目前研究过程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政策过程研究不够。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为推进币制改革,先后进行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从政策学的角度研究历次改革的议程设置、决策过程、执行过程、政策变迁与效果评估等很有必要,但是,目前这类研究并不多见。其二,改革的社会接受过程研究不足。币制改革涉及人们的货币接受心理与货币使用习惯,涉及币信的建立与维系,进而涉及政府信任等问题,因此,人们对币制改革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与之相对应,应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切入,以便更好地探讨民众、社会对币制改革的态度与反应、认知与认同、接收与接受的过程,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

四是注重研究的均衡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币制极其混乱,这一方面使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币制改革在各地推行的差异性。尤其是币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地方势力的经济利益,各地对币制改革的态度与反应相差较大,币制改革进程快慢不均。币制改革推进过程的复杂性、多样性、差异性,必然要求学术研究的视角下移,除对沿海省份、地区等中心区域给予关注外,还需要对基层、农村等边缘区域加强研究,唯有如此才能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这场改革的规模与范围、推进的力度与速度、改革的成效与制约等相关问题。

社会团体与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 (1910 ~ 1937)*

李恒俊**

提 要 结核病是近代中国最严重的社会传染疾病之一。1910年至1937年，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教会团体、中华医学会和协和医学院等社会组织相继介入并主导了中国的结核病防治运动，他们的参与有各自不同的动机，而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宣传和社区医疗两种模式，也对此后中国的防痨工作影响深远。此外，与西方不同，由于缺乏政府的参与，这一时期的结核病防治运动更多地采用话语建构的方式，将其与社会公德、民族国家等主流话语相联系，为运动的推行赋予正当性。

关键词 结核病防治运动 中华医学会 协和医学院 疾病防控

结核病防治是20世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它针对的是近代工业化以来世界最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结核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自古以来，结核病就是欧亚大陆、北非和美洲的地方流行病。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的来临，结核病开始了世界性的大流行，造成上千万人死亡。1882年，科赫发现结核分枝杆菌，证实结核病具有传染性。此后，结核病防治运动迅速成为西方各国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o. 30916013129）、南京理工大学特色应用型文科建设计划（AE91319/006）资助，为2015年度江苏省“双创博士”人才计划阶段性成果。

**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部分。^①

受欧美和日本的影响，20世纪初，结核病问题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结核病防治也由此起步。不过，与国家主义盛行的法、德、日等国由政府主导运动的做法不同，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结核病防治主要依靠社会化力量的参与，政府在其中几乎完全缺席。^② 社会团体的介入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和诉求，行动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并建构起了相关道德和社会话语，呈现与西方不同的特色。本文梳理了1910~1937年中国结核病防治的历史，探讨在政府力量不足时，社会团体如何介入并主导这一时期的结核病防治运动，及其相关话语建构，以此检视近代中国疾病防控与时代、政治和社会的密切关系。

一 介入：从教会团体、中华医学会到协和医学院

20世纪最早介入中国结核病问题的是当时的两大教会团体：中国博医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博医会是西方来华医疗传教士的全国性组织。事实上，早在入华之初，传教士就曾对中国各地的痨病状况进行过调查。^③ 1886年博医会在上海成立时，正值结核杆菌被发现，细菌学理论在欧美方兴未艾之际。因此，成立之初，博医会便有意愿地将西方结核病防治的理念和经验移植到中国，试图在公共卫生的框架下解决这一问题。1910年，博医会内设立了医学宣传委员会，将结核病应对纳入协会的日常工作之中。^④ 1895年进入中国的青年会是世界性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主张青年品格和技能的养成，倡导青年服务社会，改造社会。因契合国人对民族

① Dorothy Porter,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81-285.

② 政府缺席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卫生经费极为缺乏，1936年，国民政府的卫生预算仅占政府总预算的0.7%，人均2角4分，但与1931年相比，已增加10倍有余。因此，在卫生建设时，政府将重点放在卫生基础建设和急性传染病防控上，对肺结核这类慢性病无力顾及。1916年、1928年和1930年，中央政府三次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确定了法定传染病，均将肺结核排除在外。关于民国卫生建设，见 Yip Ka-che,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 Ann Arbor, Michigan: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1995, p. 63；三次传染病预防条例，见张在同编《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1912~1948）》，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第10~14、48~49、134~138页。

③ Hamilton W. Jefferys & James L. Maxwell, *The Disease of China, Including Formosa and Korea*, Philadelphia: P. Bakestone's Son & Co., 1911, pp. 30-43.

④ 胡宣明：《卫生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1921年，第98~101页。

复兴、国家富强的渴求，以及对西方文明进步的梦想，青年会入华后发展迅速，在城市学生和青年市民中颇具影响。^① 该会虽然不是专业医学团体，但在当时的中国，贫病已然成为社会的最大问题，因此，从 20 世纪初开始，青年会和各地绅商合作，在天津、上海、福州、南京等地举办过多次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活动。早年他们主要针对疟疾、霍乱、沙眼等急性传染病，20 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转向关注结核病问题。^②

博医会和青年会的宗旨、理念相似，因而很快便展开了合作。他们认为结核病在中国的蔓延，根源在于中国人卫生观念缺失，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民众教育。1912 年，博医会将一名干事派往青年会讲演部专办卫生教育，并邀请美国医学博士毕德辉 (W. W. Peter) 担任青年会卫生科主任。1915 年，博医会内成立了卫生教育部，每年拨 1500 银元作为活动经费。次年，博医会、青年会与中华医学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议将三会中的卫生教育部门合并，组成中华卫生教育会，仍由毕德辉负责。此后，基督教女青年会和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相继加入，共同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开展。^③

教会团体对中国结核病问题的注意，深受此时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社会福音运动是 19 世纪中后期英美基督教出现的新思潮，19 世纪 80 年代随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进入中国，它主张“整全的拯救观”，即基督教不仅要拯救个人，还要通过实际工作改造社会，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社会福音的传播。^④ 对于秉持这一理念的博医会、青年会来说，结核病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中国社会机能失衡的结果。毕德辉指出，在细菌学理论出现前，疾病只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事，但在此之后，包括结核病在内的多数疾病都是社会化的，因贫困、愚昧而起。疾病治疗也不能单纯依靠医学，而必须对整个社会有机体加以改造。^⑤ 因此，解决中国的

① 基督教青年会早期的在华活动，参见 Shirley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② W. W. Peter, *Broadcasting Health in China: The Field and Methods of Public Health Work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6; W. W. Pete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29, No. 4 (1915), p. 235.

③ 胡宣明：《卫生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6 期，1921 年，第 100 页。

④ 赵晓阳：《美国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立志传道团》，《宗教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

⑤ W. W. Pete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29, No. 4 (1915), pp. 236-237.

结核病问题，是教会团体传播社会福音，改造现实，推动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实践。

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后，中国本土医学精英正式介入结核病防治，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华医学会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华人西医专业团体，创办人颜福庆、伍连德、刁信德等均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医学人物，也是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中华医学会虽属民间团体，但成立之初便以一种“主人”的姿态谋划全国医药卫生事业，试图以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①这一时期，结核病的危害被不断凸显，自然成为医学会关注的焦点。1916年，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将“防癆”定为大会主题之一，并通过决议提请各省当局密切关注并设法阻止。^②

与教会团体一样，中华医学会解决结核病问题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对于中国医学精英而言，这一行动背后还有民族主义的考量。1915年《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上，伍连德就指出，近代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主因在于民众卫生意识淡薄。结核病因痰传播，故“各国人民从幼时即知吐痰为污劣之性，及长则痰自减少”，反观国人，“随处乱唾痰涎，居处闭塞，尘秽不除”，“吾国上流社会人物尚不如美国数龄儿童之讲卫生”，不仅使国民身体受损，也让国家蒙羞。要消除此歧视，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化俗移风，等到“厉疫不作，种族壮强”之时，则“列国之讥评自无形而消灭矣”。^③

最晚参与结核病防治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1917年，协和医学院在北京成立。1925年，在京师警察厅的支持下，协和在内城划定卫生示范区，开办第一卫生事务所加以管理。最初示范区人口5.8万，1928年扩展到12万。^④卫生区的设立为当时执掌协和公共卫生系的美国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提供了推行其社区医疗理念的场所。社区医疗来自美国。20世纪初，出于人口健康和富国强兵的考量，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美国开始了公共卫生的专业化进程。1912年，美国

① 陶飞亚、王皓：《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② 《中华医学会章程草案》，《中华医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1月，第5页。

③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中华医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1月，第23页。

④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5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71页。

政府成立“公共卫生服务部”。1916年,霍普金斯大学在洛克菲勒的支持下,成立公共卫生学院。随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相继成立公共卫生学院,开设人口学、统计学、健康调查、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健康照顾等课程,将公共卫生学带入专业化阶段。^①兰安生毕业于霍普金斯,他认为,公共卫生应以社会经济福祉为旨归,一方面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从技术上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另一方面拓展社会福利,满足个体从生到死的全部社会性需求。公共卫生部门必须成为政府的分支,有充足的预算和训练有序的人员,并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疾病预防和治疗。^②结核病防治虽然只是卫生区的众多工作之一,但社区医疗的引进,建立起了20世纪中国结核病防治的第三种模式。在此模式下,辖区内的分散个体被编织进了结核病防控的社会网络之中,实现对该病的预防、监控和救治。

1910年以来社会团体的努力,最终促成了1933年中国防痨协会在上海的成立。防痨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由青年会总干事杨怀僧负责,理事长由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牛惠生担任,理事中有颜福庆、伍连德、刘瑞恒、黄子方、李廷安等医学会重要人物。其中,刘瑞恒、黄子方、李廷安三人均出自协和系:刘瑞恒当过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黄子方任教于公共卫生系,李廷安从协和毕业后,担任过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所长,防痨协会成立时是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协会成立后,在各大城市举办过多次大规模防痨活动,如开展结核病检查、推行“劝止吐痰”运动、开办夏令儿童健康营、进行公共卫生教育等,基本都是此前活动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协和的卫生区模式还被推广到了全国其他地区,如上海高桥和南京汤山。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各地开展以街道、单位为基础的防痨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该模式的延续。换言之,社会团体的介入,不仅填补了中国防痨协会1933年成立前的空白,也推动了协会的成立及此后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二 行动: 结核病防治的公共卫生宣传与社区医疗模式

社会团体的参与,确立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结核病防治的基本模式。大体而言,早期教会团体和中华医学会的行动,以公共卫生宣传和社会教育为主,试图以口号、演讲、街头活动等形式普及结核传染和防治的信

① 王荣德等编《公共卫生学》上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第27页。

② 兰安生建设北京卫生区的相关理念,参见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134 - 161。

息，切断该病传播的途径。20世纪20年代以后协和医学院主导的卫生区，则尝试以社区医疗的模式来铲除这一疾病。

传单、海报、宣传册等书面材料是结核病防治宣传中最常用的方式。有学者统计，民国公共卫生宣传中超过85%都是这类材料。^①事实上，早在1907年，博医会华中分会就曾制作过14种常见病传单，其中“免传染肺痨症之法”14条，包括随地吐痰的危害、病室的通风消毒、病人的营养搭配，以及病后的恢复等，分发给到教会医院就诊的病人。^②采用书面宣传有两方面考虑：一是成本，博医会的防痨传单认购价为1美元1000份，民国时期一本10页左右的宣传册定价6分；^③二是宣传效果，书面材料主题明确，传播面广，易于民众遵照执行。中华卫生教育会甚至出版过肺结核相关的文理和国语教材供学生使用；同时为了照顾目不识丁的民众，制作了卫生图画和痨病月份牌。^④1915年，青年会印制了100万本防痨故事日历，由各地教会组织分发给当地民众。20世纪30年代，公共卫生方面专家高维针对结核病设计了七种标语，建议每年张贴一种，以增强宣传效果。^⑤中国防痨协会成立后，1933~1936年，在电车、公共汽车、马路、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共张贴超过15000份防痨标语、传单和海报；编制过40种卫生挂图，每种5000份，并向民众赠送《肺病指南》《肺病预防法》《肺病疗养法》等书籍，共3000册。^⑥

书面材料之外，结核病防治宣传还采用了演讲、歌曲、广播等口头形式。早年，教会团体的公共卫生运动，就曾要求传教士在各地举办演讲，普及现代卫生观念。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时，特邀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长史旦莱（Arthur Stanley）做《痨症防免及其治疗之法》演讲，并全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上。^⑦次年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制作了卫生演讲图画，标注中英文题目及内容大意，分发各地会员，配合演讲使

-
- ①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141页。
- ② W. Arthur Tatchell, "Leaflets on Hygiene in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1, No. 1 (1907), pp. 21-23.
- ③ W. Arthur Tatchell, "Leaflets on Hygiene in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1, No. 1 (1907), pp. 21-23.
- ④ 胡宣明：《卫生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1921年，第100页。
- ⑤ 高维：《卫生教育浅说》，《中华医学杂志》第19卷第3期，1934年3月，第415~417页。
- ⑥ 颜福庆：《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后计划》，中国防痨协会编印《防痨救国：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1936，第7~8页。
- ⑦ 史旦莱：《痨症防免及其治疗之法》，《中华医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11月，第49~55页。

用。^① 口头宣传在防痨协会时期大为普及。防痨协会成立的前三年内共举办通俗演讲百余场,听众七八万人。仅 1935 年 10 月至 1936 年 4 月,协会就在上海举办了 20 场演讲,其中 11 场面向中小学生,3 场面向大学生。^② 以学生为对象,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另一方面,也有培养其担任宣传者的考虑。每次防痨运动中,学生都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承担了向市民分发传单、表演和上门宣传的任务。电台也是重要的宣传工具。自 1932 年起,国民政府卫生署定期在中央广播电台演讲卫生常识,并将数千份讲演稿分发至各县政府、民众教育馆和地方日报社,对民众进行教育。^③ 1936 年,为配合国民政府“儿童年”,防痨协会针对儿童进行了专门的防痨广播。^④

卫生展览是结核病防治宣传的另一重要形式。1915 年 2 月毕德辉帮博医会在上海举办过一场展览,会场布置了超过 186 平方米的材料,包括卫生图表、漫画、印刷品、海报、布告、张贴画等。还准备了幻灯片和大型放映机,展示结核菌图片,解释结核病的成因及其危害。^⑤ 1917 年,胡宣明在厦门开办卫生展,布置了数十间陈列所,展览各类图画、幻灯和显微镜,放映卫生电影,解说肺痨、蝇虫和其他传染病知识,观众高达 3 万人。^⑥ 1921 年以前,中华卫生教育会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福州、长沙等地举办过十余次展览,“都极称一时之盛,数日之内,赴会者辄以数万计”。^⑦ 防痨协会成立后,1935 年 10 月和 1936 年 11 月分别在上海青年会总部和五洲大药房举办过两场防痨展览,展出痨病模型、图表、统计表、漫画、标语及 X 光片千余件,到会观众 3.3 万人。^⑧

① 胡宣明:《卫生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6 期,1921 年,第 101 页。

② 《本会防痨演讲宣传记录》,《防痨救国: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第 35~36 页。

③ 卫生署及卫生试验处:《卫生事业消息》,《中华医学杂志》第 20 卷第 3 期,1934 年 3 月,第 420 页。

④ 《本会防痨演讲宣传记录》,《防痨救国: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第 36 页。

⑤ Bu Lip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Picturing Health: W. W. Peter and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in China, 1912-1926,” David Serlin ed., *Imagining Illness: Public Health and Visual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27.

⑥ W. W. Pete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29, No. 4 (1915), p. 236; 胡宣明:《厦门卫生演讲会开会记》,《中华医学杂志》第 4 卷第 2 期,1918 年 2 月,第 55 页。

⑦ 胡宣明:《卫生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6 期,1921 年,第 100~101 页。

⑧ 颜福庆:《本会三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后计划》,《防痨救国:中国防痨协会第三届征募大会特刊》,第 7~8 页。

卫生宣传结合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手段，灵活运用视觉、听觉等多重展示方式，传递出极具冲击力的信息，成功吸引了民众对结核病问题的注意。但正如兰安生所批评的：这些活动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缺乏持续性，热闹两三周之后一切都结束了，难以留下任何长久的东西。^①因此，兰安生领导下的北京卫生区，试图在卫生宣传之外另寻出路，以预防医学为基础，建立结核病的社区医疗模式。

推行结核病社区医疗，首先是建立生命统计制度。生命统计是现代国家卫生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民出生、死亡和疾病分布的统计，政府得以掌握国民健康状况并实施干预。兰安生认为，现代公共卫生学的有效程度可由生命统计来衡量。死亡率越低，公共卫生系统越有效。^②因此，1925年北京卫生区第一卫生事务所成立之初便与警察部门合作，设置了生命统计股。统计显示，1925~1929年，肺结核是辖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1929年后略有减退，但仍居第二，仅次于呼吸疾病。^③其中，最高年份每10万人中有435人死于该病，最低年份也有193人，平均死亡率3‰，远高于西方，是日本的两倍。^④1935年事务所痨病门诊开展结核菌素检查436次，X光透视400次，其中，接受结核菌素检查的3155名中小學生中呈阳性反应者2127人，占受试者总数的67.4%；接受胸腔X光透视的2367名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学生中，活动性肺结核高达5.1%。同期，北平服务业的调查显示，全市剃头业中19.2%的人患有肺结核；澡堂业中，澡堂师傅的患病率高达27.3%，其他人员患病率为8.3%；饭店业中，5.8%的从业者患有肺结核。^⑤

日常工作中，卫生区诊疗所内除了常规的内外科和妇产科外，还设有痨病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安排。此外，针对结核这类慢性传染病，事务所有公共卫生组织进行家庭访视和地段管理。其目的，一是给病人的居家疗养提供专业指导，使家庭成为结核病疗养的主要场所，以弥补政府卫生经费及医护人员不足的缺陷；二是对结核病的流行分布进行监控，掌握病情，以便卫生部门及时应对。家庭访视的流程是，先由卫生劝

①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p. 142-143.

② 杜丽红：《制度扩散与在地化：兰安生（John B. Grant）在北京的公共卫生实践（1921~192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6期，2014年，第25页。

③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六年年报》，北平市公安局，1931，第2页。

④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一年年报》，北平市卫生局，1936，第14页。

⑤ 戴志澄、肖东楼、万利亚主编《中国防痨史》，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第4页。

导员会同地段护士进行, 每月至少一次; 次由地段护士做常规访视, 对于患者家庭, 视病人病情轻重, 有数日访视一次, 有一两月访视一次, 必要时再请医师前往进行访视; 对于暂未发现病人的健康家庭, 访视人员被要求注意平常可能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人群, 防患于未然, 并劝导疑似病人去诊所接受检查, 切断该病在社区传播的可能。1934 ~ 1936 年, 事务所共举行家庭访视 2159 次、2700 次和 3399 次, 平均每年每户访视 5 ~ 7 次。罹患结核病容易使一个家庭陷入困顿, 因此家庭访视除安排医护人员之外, 还有社会服务人员对病人家境进行调查, 帮助解决生计困难。^① 这些制度设计将原本分散的个人和家庭整合进了社区医疗之中, 结核病问题的解决也不再是单纯的医学行为, 而成为整个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三 话语：结核病防治运动的社会意义建构

在西方, 结核病被视为社会经济问题, 贫穷、营养不良和过度拥挤的环境都可能加剧该病的生成和蔓延, 因此结核病防治的重点在于制度建设, 如开展立法禁止随地吐痰, 改善民众生活和工作条件, 由政府提供肺病疗养院等。^② 相形之下, 虽然 20 世纪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但限于政府资金和人力的拮据, 以及社会团体自身强制力的缺乏, 中国的结核病防治更多地采用“非正式社会控制”^③ 策略, 通过话语建构将结核病问题与社会公德、民族国家等宏大议题相联系, 彰显防治运动重要性, 以道德习惯的养成来解决中国的结核病问题。

结核病问题与社会公德的连接, 建立在对中国人随地吐痰行为的批评上。痰是人体肺部和呼吸道常见的渗出物, 传统中医强调“化痰”“逐痰”, 认为痰应尽早排出, 否则会在体内淤积, 形成“痰病”。^④ 因此, 中

① 结核病家庭访视情况, 见《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 北平市卫生局, 1935, 第 26 ~ 27 页;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一年年报》, 第 26 ~ 29 页。

② Dorothy Porter,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 pp. 281 - 285.

③ “非正式社会控制”是社会学概念, 指在社会化过程中, 以文化、习俗、传媒和群体约束力等对社会成员施加控制。参见〔美〕詹姆斯·克里斯《社会控制》, 纳雪沙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第 25 ~ 53 页。刘文楠曾用此概念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 认为在制度性力量缺失的情况下, 倡导者成功利用宣传舆论、大众传媒、教育和社团自我约束力来推进这一运动, 形成戒烟的社会风气。参见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④ 朱曾伯:《论中医痰病学说》,《辽宁中医杂志》1980 年第 4 期。

国人向来不觉得随地吐痰有什么问题。不过，19世纪末细菌学兴起，揭示出痰在结核病传播中的媒介作用后，随地吐痰成了公众健康的大敌，西方各国纷纷出台法律规范个人卫生行为。^①相形之下，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自然成为时人诟病的对象。190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布防痨公告，直指华人随地吐痰是租界内华人痨病死亡率远高于西人的主要原因。^②1907年，博医会的卫生传单也指责中国痨病多发，根源在华人随地吐痰的陋习。^③

更多批评来自中国本土精英。民国时期，孙中山、蒋介石等高层政治人物都对中国人“不讲究整齐清洁，尤其是吐痰这一件事”痛心疾首，认为这证明了中国人道德和自控力的缺陷，是亟待洗刷的“国耻”。^④1914年《医学世界》上的一篇文章称随地吐痰为中国人的“秽德”，而且是世代相传的“秽德”。^⑤在文明和科学成为绝对价值的时代，这种行为还被赋予了中西道德竞争的含义。有论者明言，随地吐痰在西方诸国早已明令禁止，唯中国人依旧我行我素，“礼节何存？人格尽丧！”这不仅致使结核病蔓延，更使国家形象受损，“随地唾痰者，虽不自觉何等失仪，而旁观者，已觉其人格低下，存一种蔑视心理”。^⑥20世纪30年代的《防痨歌》将这层关系表现得更为直白。该歌首句即为“东吐痰西吐痰，坏习惯恶习惯。满地斑痕多难看，强国体面都丢完”，强调的是“满地斑痕”带来的不适感及对“强国体面”丢失的担忧。^⑦可见，对时人而言，随地吐痰背后的社会公德与国家形象的焦虑，是他们急于铲除这一恶习的重要原因，而吐痰与个人行为的连接，也为这一时期的防痨运动赋予了道德正当性。

① 1886年法国率先颁布公共场所禁止吐痰的法令，1904年日本公布《痰盂法》，规定公共场所必须放置痰盂，随地吐痰将受到法律惩处。不过，后来医学证明吐痰的危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结核菌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飞沫。参见 William Johnston, *The Modern Epidemic: A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in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1995, pp. 245-249。

② Arthur Stanley, "Hygiene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0, No. 6 (1906), pp. 235-236。

③ W. Arthur Tatchell, "Leaflets on Hygiene in Chinese,"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1, No. 1 (1907), pp. 21-23。

④ [美]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第14~20页。

⑤ 汤爱义：《论痨症之灭绝》，《医学世界》第5卷第2期，1914年2月，第6页。

⑥ 叶培初：《唾痰之警告》，《光华卫生报》第1卷第1期，1918年7月，第44~47页。

⑦ 《上海市卫生局防痨宣传材料》，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卫生局档案，档案号：Q400-1-329。

社会公德之外,结核病造成社会经济的现实损失,也为防痨运动增加了紧迫性和正当性。结核病高发人群为三四十岁的壮年,他们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以一个壮年人,一旦罹病在身”,不仅高额“医药调养费”会影响生计,“致家庭破产”,而且社会上多一个结核病人,就“少了一个生产份子”。中国有数千万痨病患者,“数千万人之消耗”最终会使社会经济“根本动荡”。^① 这样的论述在当时相当普遍,“痨病的侵袭,不仅限于体弱者或衰老者,即壮健之男儿,亦可蒙其传染,终致体质减退,精力消失。……青年患者因正在壮年生产之际,因痨病之侵入,匪但不能工作,且需要长期修养,及至病已痊愈,有为的青年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所以痨病流行实是影响国民经济,动摇民族经济基础”,^② “其影响于社会经济至大且巨,残伤国本,固未有甚于此者也。”^③

更有甚者,结核病蔓延还直接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存亡。新生活运动期间,蒋介石批评结核病使“中国人死亡率比外国人大得多,种族一天天的衰弱”,个人没有健康的身体,国家就没有健康的国民,不仅损害自身与家庭,更是对国家和全人类的不爱护。^④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略的加剧,在时人言论中也被归咎于结核病:虽然中国人口是日本的 12 倍,但每年因痨病死亡 160 万,感染者 1600 万,故“中国民族,个个都带着几分死气沉沉的样子。……无论男女老少,不管贫富贵贱,无不皆有痨病的神气”,^⑤ “细检国人,求其体躯雄健精神振作朝气盎然者,不可多得”。^⑥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以这样一个“满有病容的民族”去抵御强大的日本,结果自然可想而知。^⑦ 全面抗战前夕,《中央日报》更直言不讳地称“肺结核是亡国灭种的因子”,结核病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固不待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或经济的铁蹄和文化的利刃来宰割,中华民族已自己走上毁灭之途”。在这个意义上,推行结核病防治,不仅是对国民的拯救,也是为国家保留

① 伯平:《中国人的“贫”与“病”》,《防痨月刊》第 2 卷第 4 期,1936 年 4 月,第 49 页。

② 金慕农:《防痨运动和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之关系》,《防痨月刊》第 2 卷第 6 期,1936 年 6 月,第 11~14 页。

③ 谭世鑫:《发刊词》,《防痨》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 11 月,第 1 页。

④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28 册,台北,“国史馆”,2007,第 622~623 页。

⑤ 张君俊:《“从民族复兴运动”说到“防痨运动”》,《防痨》第 1 卷第 1 期,1934 年 11 月,第 3~5 页。

⑥ 乔树民:《防痨运动与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之关系》,《防痨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6 年 1 月,第 12 页。

⑦ 叟菴:《防痨与教育》,《防痨月刊》第 2 卷第 5 期,1936 年 5 月,第 20 页。

足够的劳动者和战士，巩固国家民族自救自强的基础。“诚能如此，则防痨运动之举行为不虚，而民力国力亦可增其强厚。人民康乐，民族复兴，盖将基于此。”^①

四 结语

1910～1937年，社会团体主导了中国肺结核防治的进程，论其成效虽然难言成功——在缺乏政府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的情况下，社会团体的行动被局限在了几个大城市之中，受益人群有限，但社会团体的参与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在近代中国，当国家力量不足以覆盖所有疾病防治领域时，社会力量如何填补空缺，并从中发展出与西方不同的特色。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开始，教会团体、由中国医学精英组成的中华医学会，以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医学院，相继介入中国的肺结核防治运动。他们的参与有各自的动机和诉求：教会团体试图通过这一运动来传播社会福音，改造社会；中国医学精英则多了一层民族主义的考量，结核病防治并非单纯的卫生事件，背后也有提升中国形象、消除国际歧视的目的；协和医学院在北京卫生区的行动，则是美国社区医疗理念和公共卫生专业化在中国的推行。

社会团体的参与，使结核病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一种高能见度的社会问题，而此时形成的两种防治模式——公共卫生宣传和社区医疗，也成为此后中国防痨运动的主要形式，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推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中国以基层社会网络为基础的多级防痨体系的建立。不过，近代中国的结核病防治运动，由于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支持，更多地只能诉诸“非正式的社会控制”，通过一系列社会话语的建构，将这一运动与社会公德、国民性及民族国家等流行观念相联系，赋予其正当性。与其他急性传染病的控制不同，结核病防治中的道德化与政治化倾向，呈现了近代中国疾病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

^① 《防痨运动之意义》，《中央日报》1937年3月15日，第3版。

性别经济与道德危机：近代江南淮北乡村危机与女性应对^{*}

陈蕊^{**} 邢颖^{***}

提 要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中，江南与淮北两域女性多倾向于自发性地应对危机，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承担者，但就具体做法、影响与前景而言，两地有本质差异。江南乡村女性离村进厂与乡村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这也成为女性从自发走向自觉、挑战传统道德、营造赋权环境、获得发展与解放的契机之一。而淮北女性则多处于以身体牺牲换取经济回报的自发性应对状态。两域社会生态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导致两地女性性别经济、道德危机与赋权环境不同的根本原因。不过，江南女性的进步，也并不等同于真正的解放。女性真正的解放，应该是女性社会属性与处境的全方位改变。

关键词 江南淮北 乡村危机 性别经济 道德危机

关于近代乡村危机，学界当前多从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等视角来考察，并已取得丰硕成果。^① 同时，近年来的性别史研究（特别是女性史

*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近代皖北社会与女性婚姻生活困境”（AHSKQ2015D74）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基金“性别·时代·道德：民国淮北女性婚姻生活的现实困境”（XJ201423）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讲师。

*** 宿州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① 20 世纪 30 年代学者对于中国乡村危机的研究与调查多陈述危机的表现，对其本相与深层致因的揭示却多未达旨要。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则相对深入，不再仅仅进行危机表现的陈述，而在于分析危机背后的动因。如马俊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论述了江南乡村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即资本主义工资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马俊亚：《工

研究)一改传统史学在讨论性别与危机议题时多将女性群体置于男权社会的主体框架中,过分强调女性处于被压迫与束缚层面的叙事方式,开始以女性自身为考察对象,转而关注与把握女性群体的主体性、参与性与能动性。本文从性别史角度切入,试图通过比较江南、淮北乡村女性主体在近代乡村危机中殊异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道德危机表现来审视两域女性行为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揭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

一 乡村危机下的江南与淮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认为中国出现了席卷全国的乡村危机。邓飞黄指出:“遭了八十多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中国农村经济,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万劫不复的境地了。”^①学者述及的乡村危机多集中在江南乡村。“江南为鱼米之乡,夙以富庶见称,乃近年以来,农村状况,一落千丈,其危机之严重,不亚于江北之灾区。”^②有人写道:“江苏农民,早已由天堂而入地狱。江苏最繁华区域之无锡,亦时时发生抢米风潮。”^③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也未能幸免,于1935年陷入危机。“苏州竟遭受了这六十年来所仅见底大旱荒的打击,整个的农村经济,宣告严重的破产。”^④

“乡村危机,即指中国乡村落后贫困下的存续危机,表现为乡村生产的迟滞发展及广大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及在此基础上整个农村的日益衰敝”,^⑤如果按此解读,那么淮北乡村则长期处于危机中,只是在二三十年

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用脚表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文史哲》2016年第5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事实与表述》,《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王先明通过考察分析,认为“城乡背离化”是导致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还有学者将乡村危机的深层原因归于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向玉成:《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解析——兼论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下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 ① 邓飞黄:《从农村破产到农村改造》,《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第1页。
- ② 《江南农村之危机》,《苏衡》第11~12期,1936年,第3页。
- ③ 青士:《我国农村破产之状态及其原因》,《北辰杂志》第4卷第10号,1932年12月20日,第6~7页。
- ④ 张溪愚:《农村破产声中的“天堂”》,《人言周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第215页。
- ⑤ 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代程度更剧。江南却是另一番图景。据时人表述,至 1934 年入夏前,苏州乡村乡民还依然能够自给自足地过着“优游的岁月”,即使处在“蚕荒”状态之下,“仍能勉力维持最低限度的生计”。^①显然,这种常态化的“优游岁月”,对大多淮北乡民而言,通常无法企及。

自宋朝以降,淮北地区便渐次挥别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璀璨历史,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至江南地区,至清代,淮北竟沦至“穷山恶水”之列。淮北乡村不仅自然生态遭遇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生态也由于人为因素不断恶化,令本就贫苦的乡村更显困窘。皖属太和 1937 年遭遇旱灾,导致“农村破产,十室九空,一般农民,饥寒交迫,不得不流离他乡,乞食求生。本县毗连之河南槐店集以待,灾情尤重,今日经过太境归信路上之灾民,每日有数百人之多”。^②

频仍的战乱、连年的水旱灾伤令“逃荒”和“跑反”成为淮北人生活之常态。《徐州府志》记载:“及今水归故道,洼地仍为水国。更兼运年灾浸,百姓逃亡,汪洋之洼,岂可恃为恒产哉?”^③丰县也“水伤禾,民多逃亡”。^④为了逃避水灾,一些有女儿的家庭甚至直接把男方居屋地势列为择偶的唯一标准。萧县李李云即是凭借家处“高台子”娶到了媳妇。^⑤明中后期之后,淮北经济衰变,文化凋敝,社会风尚随之发生严重畸变。曾经的诗书礼乐之乡逐渐沦为暴力丛生的野蛮之地。淮北籍女作家戴厚英写道:“淮河教会我的第一种能耐就是逃。土匪来了,逃。大水来了,逃。日本的汽油划子来了,逃……我从来不说‘逃’字这样低下的字眼,只说‘跑反’。”^⑥“跑反”一词后逐渐成为淮北人逃避人祸的专属称谓。

相较于淮北乡村处长危机与贫困中的“常态”,作为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江南,其乡村经济凋敝的“异态”则立刻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渲染。不可否认,无论是“常态”还是“异态”,20 世纪的这场乡村危机都已席卷全国,导致当时整个中国乡村的普遍贫困。如果单就乡村危机的浅层表现而论,则区域之别仅在程度不同,但若深入危机原因,两域则相去

① 张溪愚:《农村破产声中的“天堂”》,《人言周刊》第 2 卷第 11 期,1935 年,第 215 页。

② 《太和灾情严重》,《大公报》(上海)1937 年 6 月 18 日,第 10 版。

③ 吴世熊修、刘庠纂《徐州府志》卷 18,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第 17 页下。

④ 姚鸿杰纂修《丰县志》卷 16,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第 18 页下。

⑤ 据笔者对李李云夫妇访谈整理。李李云,男,1931 年生,萧县人;王爱莲,女,1931 年生,丰县人,1949 年成婚。

⑥ 戴厚英:《流泪的淮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 4 页。

甚远，由此引发的人的应对行为显然也不尽相同。

二 江南乡村危机中的女性与经济

学界多将近代江南的乡村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把现代工业打垮手工业列为乡村危机的原因之一。“他们对乡村遭遇危机的产业的描述，多着眼于乡村手工业和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的种植业。”^①薛暮桥认为：“都市工业品之侵入，实为农村贫困之最大原因。”它“使得家庭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破产，农民收入因此大减”，^②不得已出外谋生。当地知识分子的记载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在农村内自耕农以下，都纷纷向外谋工做，自耕农以上，也竭力向外谋生。”^③

但深究其因，江南乡村危机并非廉价的资本主义工业品对手工业制品打击的结果，而是较高的资本主义工厂工资对乡村劳动力吸引的结果。以苏南乡村土布业为例，“由于大工业提供了比土布业更高的收入，使原来织土布的主力军被吸纳到工业中来，许多地区逐步从‘副业主业化’过渡到‘工业主业化’”，^④直接导致家庭手织业的萎缩。时人的调查报告也证实：“因都市具有更吸引男女职工的势力，农民离村的运动日愈加剧。”^⑤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乡村女性离村入厂与乡村危机互为因果：乡村女性进入工厂既是江南乡村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也是危机的重要表现与结果之一。

较高的工资吸引更多乡村女性进入工厂工作。民国《上海县续志》载：“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工厂工作。”^⑥南汇县“各乡镇渐讲育蚕，近日工厂林立，妇女多务织袜、织巾”。^⑦1927年，宜兴地区“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⑧20世纪30年代，江阴“布厂很

① 马俊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事实与表述》，《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

② 余霖：《江南经济衰落的一个索引》，《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第178页。

③ 谈容：《当前江南农村之危机》，《时兆月报》第4期，1947年，第17页。

④ 参见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用脚表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文史哲》2016年第5期。

⑤ H. D. Lamson等：《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上海杨树浦附近四村五十农家之调查》，何学尼译，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第238页。

⑥ 吴馨修、姚文枏纂《上海县续志》卷8，上海南园戊午年（1918）刊本，第27页。

⑦ 严伟修、秦锡田纂《南汇县续志》卷20，1929年刻本，第9页上。

⑧ 徐方千、汪茂遂：《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第89页。

多, 厂中的工人, 妇女居十分之九”。^① 1934 年, 对上海周边乡村的调查报告显示, “临近乡村的工厂, 似乎多为极需要女工的纺织厂。有些女工, 不论在什么天时, 都要花费两小时或更多的时间跑路穿陌”,^② 乡村女性肩负村妇与女工的双重身份, 奔走于城乡之间, 换取经济回馈。

江南乡村女性进入工厂不仅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报酬, 更重要的是拓展了女性的生活与交往空间, 由狭隘的家内私领域进入相对宽广的公共空间,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她们既有的生活轨迹和方式、道德认知与评价体系。这背后隐含的是对儒家传统女性道德体系的挑战、打击甚至渐次摧毁。其最直接的表现之一, 便是对作为传统女性道德符号的“缠足”的致命打击: “因为工厂方面不需要缠足的女子, 所以女子缠足的陋习也渐次革除了。”^③

来自工业的收入成为苏南地区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相对丰厚的物质回馈直接刺激了以往人们对性别观念的认知, 同时也为女性生活的变化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契机。“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 因为它对家庭预算有直接的贡献。那些没有成年妇女的人家开始后悔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④ 显然, “半农半工”与之后成为“职业女工”的乡村妇女依仗“从工业方面获得新的生产能力, 因之增高了她们独立的地位与生活情况”。^⑤

一些苏南女工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和自我身体支配权, 原本严苛的女性道德因而频遭挑战。“多数女工染了粗鄙的谈笑态度, 她们因具有独立的观念, 故不尊重父母, 并厌恨父母的干涉”; “工厂内男女工人较易接近, 时常发生道德败坏的行为。”^⑥ 传统婚姻道德也未能幸免, 成为被挑战的“重灾区”。当有位女工的母亲提出要给她订婚时, “她坚决拒绝, 并云她不需要男子, 这时结婚实嫌过早了”。而母亲对女儿的选择则这样看待: “假如她喜欢这样做, 我是没有干涉她的权力,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⑦

虽然并非所有的乡村女性都会选择进入工厂, 但工业资本“入侵”的

① 钱笑予:《江阴妇女职业谈》,《妇女共鸣》第6卷第7期,1936年,第24页。

② 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55页。

③ 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1页。

④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12,第198页。

⑤ 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38页。

⑥ 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0页。

⑦ 李文海等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第261页。

大环境却为江南女性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多种途径，其带来的机会资本与生存资本远远高于淮北女性。进入工厂的女性凭其在工商业活动中的优势收入，为自己在家庭乃至社会中挣得了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同时，身体与思想的双重进步直接刺激与挑战了传统女性道德，这恰是女性解放的表征之一，完全有异于淮北女性的处境。

三 淮北乡村危机中的性别色彩与道德经济

近代淮北恶劣的社会生态使乡村遭受严重危机，贫穷、饥荒和濒临死亡的恐惧赋予危机某种性别特征：年轻女性成为家庭或自身的避险资产，以求保全家庭或求得自我生存。淮北乡村社会中，个人对家庭资源的获取，更多取决于自身的家庭地位、性别与年龄。在传统家庭权力体系中，女性并非毫无权力。恰恰相反，每个完整的单位家庭中皆存在一定的女性权力。美国学者卢蕙馨（Margery Wolf）将其定义为“母性家庭”（Uterine Family）。^① 这种女性权力在年轻女性成功诞下男性子嗣后逐渐壮大，尤其是在其完成由“儿媳”到“婆婆”的身份转变之后。显然，相对于母权，无论是年轻的女儿还是儿媳，地位低下的年轻女性均顺理成章地成为挽救家庭危机的牺牲品。

典妻、卖媳、鬻女是淮北家庭短期内极为“有效的”避险方式。平日地位低下的年轻女性在家遭遇饥荒与贫困之时，即刻成为“举足轻重”的有价物品。光绪年间，霍邱县民妇洪赵氏欲将儿媳洪陈氏改嫁，致使洪陈氏不甘失节服毒自尽。^② 即便是已经脱离了原生家庭的孀妇，有时也未能幸免于被母家典卖换财的命运。宿县丁维贞妻李氏，夫亡孀守，但咸丰十年（1860）时，“父艰于食”，欲将李氏改嫁以改善境况，李氏不从，遂自缢而亡。^③ 此类记载不绝于书。苏北乡村竟有出卖亲生女儿为娼的风气。^④ 《东方杂志》曾载文称：“大半贫农家庭不能维持生活，在江北素所通行的妇女贩卖，到现在，竟在百业萧条之中，耸立着繁荣的高塔。”^⑤

①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2-41.

② 《题报霍邱县民妇洪赵氏欲将孀媳改嫁未成致氏服毒身死拟杖徒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档案号：02-01-07-4270-023。

③ 丁逊之等：光绪《宿州志》卷27，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第24页上。

④ 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娼妓史资料》（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65页。

⑤ 罗琼：《江苏北部农村中的劳动妇女》，《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号，1935年7月，第109页。

更有甚者，淮北传统家庭中的强权者还直接将弱势女性视为充饥之物。赛珍珠小说中所反映的淮北流民逃荒的情景，带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他们逃荒时，家中不断有人饿死，有些人家因此开始吃人充饥。^①“类似‘攫遗骸而吮其髓，抢骷髅而盐其脑，至亲相杀，父子易食’的事情不可数计。”^② 1877 年赣榆县受灾，张维金、王德之妻均因家中乏食，杀死其女。^③ 这样灭绝人伦的惨剧在近代淮北的灾区不断上演。

嫁人为妾、为妓，是很多淮北女性面临饥荒时的应对选择。对传统女性道德的遵从与反叛，矛盾而又和谐地存在于淮北乡村社会中。很多流离失所的女性“于无可奈何情形之下……便有些出卖给有钱的老爷们做妾，或者跑到城镇里去卖淫”。^④

经济的困窘也催生了“半良家妇女”群体，她们游离于良家女与娼妓、道德的遵守和反叛之间，用最原始、最无奈的方式自发地诠释着自身的经济价值，令这一地区的灾祸呈现特殊的性别色彩。甚至，一些对“孝道”的坚守背后是“为娼为妓”的道德叛离。苏北有些“年轻妇女，为着不忍坐视年老的爹娘饿死，自愿卖身或‘出押’为娼，以尽孝道”。^⑤ 1935 年，一位外乡人在巡视淮北之后曾刊文载道：“我们如果巡视淮北一周，无论大小的城镇，大小的村集，首先接触视线的，便是涂粉抹红的妇女。其中有初期老妇，半老徐娘，及少妇，幼女，这都是出卖皮肉的娼妓。然而除了小部分的卖淫专家，其余多是家庭主妇，初期嫁人的新媳，或是许配了婆家的闺阁……这些半良家妇女，因为家庭生活的艰窘，才附带出卖皮肉，养活父母或儿女，不过这‘附带’正是度过‘专门’的桥梁啊！”^⑥ 这种现实逼迫下的矛盾与尴尬角色，换取了经济回馈，却丧失了道德价值。正如艾志端指出：“那些利用自身市场价值、通过允许家庭成员出售她们或卖身来换取实物的妇女，丧失了所有的道德价值，却在很多时候从饥荒中存活下来。那么，似乎可以看到，在灾难中一个人的市场价值上涨，同时他或她的道德价值下降。这种事件的反转，对于儒家家庭规则是一个明显的威胁。”^⑦ 此种对传统道德的威胁与挑战与女性进步毫无关联，

① [美]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大地》，王逢振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 47 页。

② 邢军纪：《黄河大决口》，解放军出版社，1996，第 219 页。

③ 《赣榆被灾情形照述》，《申报》1877 年 3 月 8 日，第 2 版。

④ 《沛县乡村妇女的生活》，《农林新报》第 13 卷第 33 期，1936 年，第 920 页。

⑤ 庆德苇：《苏北风土记》，《现代邮政》第 4 卷第 2 期，1949 年，第 12 页。

⑥ 纪旬：《淮北的社会情况》，《现代》第 6 卷第 4 期，1935 年，第 91 页。

⑦ [美] 艾志端：《铁泪图：19 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 217 页。

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低人一等。至于那些被典卖的女性，一次性的经济效益换来的仅仅是家庭的暂避劫难。而出售女性的父母公婆，则成为道德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与儒家道德体系的终极败坏者。可悲的是，这种道德败坏在淮北封建道德与礼俗的高压下，与女性自堕娼门遭受的道德谴责相比，无足轻重。

在淮北女性道德评价体系中，缠足不仅是女性彰显美丽、出身与财富的保障，也是自我价值与资本的重要依托。逃荒和跑反成为很多女性“解放”双足的推手，放足在迫使她们无奈放弃这种经济资本的同时，也严重地挑战了女性道德。但放足并未像在江南女性那里那样成为思想进步的催化剂，反而令淮北女性丧失了一种重要的性别资本，其背后隐藏的依然是思想顽固保守的实质。在淮北，承受着贫困高压的乡村女性在放足后，也多未能摆脱旧礼俗的歧视和摧残。更有人因未曾缠足而流露出遗憾的神情。^①显然，淮北很多女性“足的解放”无法促进其思想的进步。

当然，淮北并非没有乡村女性进入江南工厂务工，但不仅比例远低于江南，地位也相对低下。池子华、吕晓玲指出，近代“长三角打工妹的籍贯构成，以长三角本区域为主体，显示出打工妹空间运动鲜明的区域内部流动的特征”。^②即使进入工厂等公共空间，其工种、待遇也与来自江南的女工相差甚远。江南的打工者中呈现明显的地缘和人缘关系，地缘差异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工人的社会分层。^③民国时期的上海，“尽管来自江南、苏北和上海的女性可能同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但她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④“苏北人聚集的区域被认为是粗野与危险的”，^⑤所以苏北工人基本处于工人阶层的底层。与之相应，苏北女工通常被安置在技术要求较低的工种中从事劳动，平日更不免遭受歧视。

综上所述，淮北乡民在危机到来之时，多牺牲家庭内弱势女性的身体、生命以求得生存机会，令危机呈现性别经济的特征。且女性自身由于

① 据笔者对王荣兰的访谈整理。王荣兰，女，蕲县（属宿县）人，1926年生，1943年初婚，1949年再婚。

② 池子华、吕晓玲：《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籍贯构成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③ 详见马俊亚《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地缘矛盾与社会分层》，《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④ [美]艾米莉·洪尼格：《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韩慈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65页。

⑤ Emily Honig,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Subei People in Republican - Era Shanghai,” *Modern China*, Vol. 15, No. 3, Jul., 1989, p. 243.

传统观念、地缘关系、自身条件等多方的限制，更多倾向于表现为自发性的身体经济，但无论是以身体换取经济报酬，还是迫于形势放弃身体资本，这种身体与性别经济引发的女性道德危机，几乎与进步没有任何关系，更看不到解放的前景。

四 机会结构差异背后的社会根源

时人曾叹：“淮河以南，一切尚与江南无大悬殊，逾淮以北，则因地势迥异，而民众生活状况，其风俗习惯、社会组织，不同江南之处甚多。”^① 更有人进一步指出：“即如江南与江北，虽只一水之相隔，却有一千年历史的差异。”^② 这种差异，如前所述，在江南与淮北女性面对乡村危机时得到体现。

究其根本，社会生态变迁与农家经济结构的差异为女性缔造出的不同赋权环境与机会结构，是两地女性危机应对途径差异、生活质量与前景呈现云泥之别的根本原因。

据李伯重考证，江南农家地区在清中期之后正式形成“男耕女织”型主要劳动支配模式。纺织所得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点决定了即使是在工业化之前，江南女性也仍然可以通过出色的纺织技术成为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经济的“半边天”，获得一定的家庭地位。有些纺织技能较高的农妇，不仅可以养活家人，还可以支持子孙求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发家致富。^③

机遇是危机的另一个面相。恰是被归咎为江南乡村危机“罪魁祸首”的现代工业的兴起为女性创造了良好的赋权环境与多元的机会结构，使女性在家庭遭遇危机之时能进入公共空间，广泛参与社会性生产劳动，赢得新的自主性资源。随之而来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双重转变，稀释了传统女性道德的高压、松动了传统女性道德的紧密束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即使对于那些没有进入工厂的女性来说，新的经济格局也为其提供了获得新的自主性资源的可能，这意味着她们在解开裹脚布之后，有机会获得新的生存资本，进而赢得并提升自主权。

① 君左：《火车中之一瞥》，《申报》1927年7月9日，第9版。

②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27卷第6号，1930年3月25日，第71页。

③ 李伯重：《“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而淮北则恰恰相反，严峻的社会生态与单一的农家经济结构决定了女性单一的生活结构，扼杀了女性赋权的可能。

在江南农家经济结构从男耕女织发展到了高度商品化的“副业主业化时代”之时，淮北地区却从原来的男耕女织结构演变成了单一男耕的“残缺型商品经济”。^①至20世纪30年代，淮北部分地区如淮阴、徐州甚至已经成为与江南一些地区并列的土布产区，遗憾的是，“尽管农家所用的棉纱绝大部分靠市场供应，但大量依靠女性劳动的女织仅作为农家生活的自我补给，并不能看出自然经济瓦解，商品经济扩大的迹象”。^②农家经济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女性也没有脱离传统农家经济的藩篱与附属状态。

对于以农业为主的淮北乡村来说，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使底层家庭在匮乏的生存资料面前束手无策。此时，作为家庭成员的女性的“价值”便瞬间得以凸显。虽然法律上明文规定“典卖妻女”涉及违法，但现实的重击与求生的本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击败了法律、礼义与人伦，直接物化了家内女性成员。淮北女性以身体赚得经济收入，仅是生存危机下的“应急”措施，这与江南女性在技术与工业冲击下表现出的身体、生活、信仰上的改变与发展，及对传统女性道德的冲击程度相去甚远。

此外，妇女解放的启蒙思想、觉悟和女性生活结构、机会结构之间是相互验证、匹配与强化的过程。单一的思想启蒙与觉悟对女性解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若脱离实质上的生存、自主性资本而言，解放则意义不大。

在江南，女性放足后进入工厂，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挣得工资，获得实际上的报酬，改变家庭状况；另一方面，工厂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和操作方式迫使浸淫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已久的女性做出妥协与改变，逐渐自动地接受近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新的思想观念与女性赋权、地位提高、自主性获得之间相互匹配，相互强化，形成良好的循环。

反观淮北，新思想的输入与成长却备显艰难。淮北乡村普遍的圩寨化，^③从物质层面上斩断了新思想的输入渠道。据20世纪30年代参观过

①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79～380页。

② 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③ 马俊亚：《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徐海地区圩寨的人报告：“看过后的感想就是活现出《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与氛围。”^① 作为行政权力变体的淮北乡村大地主缺乏江南士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多拒绝新思想的传入。传统的社会格局鲜少赋予乡村女性新的生活机会和获得某种承认的可能，乡村女性无法获得多元的生活机会来应对家庭经济危机。这与江南相对良好的赋权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 语

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② 诚然，江南女性进入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生产为江南女性的解放赢得了更多可能，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江南女性因此得到解放。严格意义上，其身体解放和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距离真正的女性解放依然遥远。真正的女性解放，不能仅依据放足、就业等某些新旧事物的出现与消退来简单评判，也不能单纯地由女性是否具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简以断之，而应透过表象，深入本质进行多方面的综合分析考量，例如女性社会属性与处境的多维改变、女性思想的进步程度、社会赋权与机会结构的多元化等因素。对于淮北女性来说，其身处的特殊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态，从根本上扼杀了女性获得社会赋权与机会资本的可能。这是两域女性处境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道德层面而言，社会应为女性提供更自由平等的赋权氛围与道德评价体系，在此良好的自主空间中，女性自身应努力构建起独立的、合理的话语体系，同时完成、完善自身主体性建构与自我价值、认知的客观评价机制，使自身个性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女性的解放。

① 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东方杂志》第 27 卷第 6 号，1930 年 3 月 25 日，第 7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162 页。

【民国政治】

1927年蒋介石“驱鲍”过程中的心理困境及其应对*

赵晓红**

提 要 蒋介石早年崛起过程中，苏联顾问特别是鲍罗廷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中山舰事件后，蒋认为鲍表面上对他是妥协与支持，实际上却处处对其掣肘，从而感到困难重重，内心极度抑郁愤懑。蒋鲍双方终因“迁都之争”而矛盾升级并公开化。蒋因受到鲍的羞辱而决意“驱鲍”，却未能得到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支持。在此过程中，蒋将个人耻辱与民族荣辱相关联，从最初感情上的单纯驱鲍走向最终与苏联、中共完全决裂，企图以此来摆脱困境。

关键词 鲍罗廷 蒋介石 “迁都之争” 国共分裂

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往大陆论著多从鲍罗廷的角度分析其对蒋介石的态度及政策等方面的斗争和变化，^① 而台湾论著多从蒋介石的角度对于鲍罗廷的强势专权大肆挾伐。^② 在蒋介石日记公开以前，

*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资助项目（Y2014315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建设”（15ZDB048）阶段性成果之一。

** 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代表性论文有：段治文《试论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蒋介石策略的双向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郭盈宏《鲍罗廷与蒋介石在广东的崛起》，《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吴珍美《析1927年前后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争斗》，《史林》2006年第1期等。

② 代表性著作有：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66；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便有学者关注到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过程中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试图淡化以往研究中过分强调蒋介石个人权力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①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对于蒋鲍关系恶化的原因以及蒋驱鲍过程中内心复杂变化有了更深入的探析。^②例如陈红民等从蒋对鲍个人观感的变化,分析蒋鲍决裂的原因。李玉探讨了蒋介石“迁都”前后的复杂动态心理过程。银品则突破以往蒋鲍权势斗争的框架格局,从合作的角度,探讨蒋鲍二人合作的尺度问题。

笔者认为在蒋鲍关系互动中,对于蒋的心理困境与情感变化之关注与分析,仍有深入探讨空间。“性格决定命运说”虽有夸大之嫌,但在进行史学研究时亦不能忽视人物性格的重要性。蒋、鲍均属于个性特征非常鲜明的政治人物,双方的个性和情感变化及行为选择无疑会对历史走向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在蒋介石早年政治崛起过程中,鲍罗廷对其荣辱之影响,探析蒋因鲍的压制而引发的内心多重困境,并从蒋的个性和民族思想性方面,分析其由驱鲍走向与苏联、中共全面决裂的因由,理解蒋的思维模式和行事风格。

一 蒋介石的崛起与困境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后,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在国民党内获得重要职位。蒋作为强有力人物出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分不开。孙中山去世后,鲍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③鲍和中共领导人主张在军事上侧重扶植黄埔军校,采取“黄埔中心主义”,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能够迅速发展”。^④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案发生后,在鲍推动下形成了“汪蒋合作”格局。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中,蒋首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

① 代表性论文有: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王正华《国民政府北迁后蒋中正驱逐鲍罗廷之议》,《国史馆学术集刊》(台北)2002年第2期等。

② 代表性论文有:陈红民、夏思《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十三》,《世纪》2013年第2期;李玉《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银品《合作的尺度: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新探(1924~1927)》,《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1期等。

③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65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80,第53页。

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①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支持、扶助和信任蒋介石的鲍罗廷突然辞职回国。在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的接触过程中，蒋常因季的疑忌侮慢、专横等彻夜难眠，忧思抑郁不已。蒋由于误断汪精卫、季山嘉与中共联手倒蒋，发动中山舰事件。^②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妥协退让，协助蒋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但双方的裂痕并未得以弥补，反而日益加深。

蒋介石早在1923年访苏后，便对苏联颇有戒心，即使在蒋思想激进的早期，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共产党或俄人的戒备心理。^③在和季山嘉的相处中，蒋除了感觉自尊深受伤害外，也意识到不能让大权旁落到苏联顾问手中。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意见书，对苏联顾问权限做出明确规定：“不宜把持要职，与希图集中权力于顾问之举”；要求顾问“辞去行政官职权”，仅“以顾问之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之成功”。^④

中山舰事件之后，原来极受蒋介石尊崇的鲍罗廷已不再是什么“导师”，而只是“顾问”了。^⑤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⑥鲍为个性极强之人，权力重心的转移难免使其内心感到失落不快。鲍努力想使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使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重新执政。^⑦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此时离开苏联的支持，不管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很难成事。为了尽快善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与北伐的提案。党务案提出后，“各委员相顾惊惶”，蒋也觉得“余言过甚，终日心殊不安，恍惚非常”。^⑧根据鲍的观察，蒋提出“调整同共产党人关系”的决议案，虽缩小了共产党人在党内的权力，但其欲使军队保持平静的目的却适得其反。中派和右派继续要求蒋对共产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措施，左派和共产党则更怀疑蒋右倾。^⑨故而，鲍对此采取默认态度。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83~84页。

② 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③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12页。

④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1~12月）》（初稿），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68，第296页。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33页。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14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372页。

⑧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5日。

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82页。

为了转移矛盾和视线,蒋介石决定加快北伐的准备进程,以此摆脱困厄之局。在北伐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意见不尽一致,莫斯科也反对北伐。鲍罗廷不愿在北伐问题上激化与蒋的矛盾,故未坚决贯彻莫斯科的指示,而是采取表面上支持蒋北伐的方针政策。因为,当鲍 1926 年 4 月底回到广州时就发现,北伐已经准备就绪,如果反对北伐,则意味着所有苏联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与蒋为敌。且蒋在宣传中已将北伐解释为国民与军阀、革命与反革命、三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争。^①鲍意识到反对北伐势必被视为等同反蒋和反革命。另外,鲍断定蒋的北伐不会成功,因此决定在无实力的情况下,不同蒋及其政治方针做斗争,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反蒋,即等蒋在北伐上遭遇注定的失败,自然就起到了遏制和反蒋的作用。^②

从表面上看,在整理党务案和北伐这两大重要问题上,鲍罗廷对蒋介石均进行妥协,希望以此来弥补国共之间濒临破裂的关系,试图把蒋留在自己阵营内,利用蒋来反制右派。但实际上,中山舰事件后,鲍一直暗中对蒋处处掣肘,试图反蒋甚至倒蒋。

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虽然没有公开反蒋,但迎汪复职的空气非常浓厚。蒋得知后方有迎汪之谋后,认为是“倒蒋之本”,^③出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不得不做出违心之举,提议请汪速回。^④在军事上,蒋介石亦感到处处受掣肘。例如,正当江西前线需用军械之际,武汉联席会议却命广州兵工厂拆迁武汉,蒋认为此举欲断绝其军械供应之意极为明显。^⑤另外,鲍还利用唐生智来牵制蒋介石,蒋唐矛盾难以化解,蒋只好决定“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⑥在财政方面,以鲍为首的苏联顾问,掌握着国民革命军的军械供应和钱袋子,成为蒋的致命威胁。蒋常感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⑦除了军费缺乏,鲍罗廷、徐谦等还攻击蒋介石军饷不清楚,气得蒋特意在南昌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并直言预备着做史可法、文天祥、岳飞,随时牺牲报国。^⑧

①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讨伐吴佩孚宣言》,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30,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第 20~22 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 369 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26 年 8 月 20 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26 年 10 月 3 日、12 月 7 日。

⑤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 年 1~6 月)》(初稿),1927 年 1 月 1 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第 7 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26 年 9 月 14 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27 年 1 月 4 日。

⑧ 《汉赣党潮中之蒋介石》(续),《大公报》1927 年 3 月 23 日,第 3 版。

中山舰事件后，蒋认为鲍表面上对其继续扶持，暗中却反蒋、倒蒋。蒋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无不感受到难以言喻的无形压力与痛苦，蒋鲍之间矛盾隐患越来越深，处于一触即发之态势。双方最终围绕迁都武汉还是南昌问题，矛盾呈现公开化。

二 蒋介石受辱与驱鲍决心

在迁都武汉还是南昌的争议中，蒋介石为了探听武汉的虚实，于1927年1月11日由南昌经九江赴汉口。^①蒋到武汉后，国民政府为蒋召开了异常隆重的欢迎大会，表面上可谓给足了蒋面子，实则企图运用民众的力量迫使蒋“公开承认”国民政府须迁来武汉。^②在12日的欢迎晚宴上，蒋介石与鲍罗廷起了争执。鲍对蒋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件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③对于鲍的质疑抨击和极尽挖苦，蒋有着强烈的反应，“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辱，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中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④

1月19日，蒋介石回到江西九江，见到程潜时，直言“与鲍罗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⑤同日，蒋又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职务。^⑥27日，蒋与顾孟馥、何香凝、邓演达和戴季陶谈话，说：“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但蒋的提议并未得到回应，因为“彼等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晚上蒋与谭延闿、戴季陶谈至午夜，最后，蒋愿意妥协“移中央于武汉”，但前提是“去鲍尔廷”。^⑦

①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137页。

② 郑自来、徐莉君主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第12、379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71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2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9日。

⑥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217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7日。

1月29日上午,蒋就驱鲍问题再次与戴季陶、张静江和谭延闿商谈,结果“季怯而静硬组默”,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其“皆有病也”。^①由于得不到众人的理解,蒋感到异常苦闷和气愤,坚持认为“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②

1月31日,戴季陶又来劝蒋要忍耐,不要“去鲍”,并说“众意类此”。但蒋“力坚前议不为之动,并请其赴俄也”。^③同日,蒋“见英报挑拨余与苏联感情甚烈”,担心“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本决心急欲“去鲍”,见报后决定“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④2月6日,当宋子文和谭延闿转告蒋说鲍罗廷愿意“随营而不闻中央事”时,蒋仍“决欲其回俄也,但不使其伤感情而已”。^⑤

短短几日内,蒋介石态度反反复复转变如此之快,是蒋对“内”“外”谨慎权衡的结果,因蒋将驱鲍看作革命阵营内部的问题,英帝国主义才是一致对外的大敌。且蒋驱鲍本意乃对事不对人,蒋不希望因驱鲍导致与苏联关系的破裂。但蒋鲍之间裂痕已难以弥补,蒋驱鲍的决心虽有暂时放弃,但已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因为鲍的当面指责对蒋的冲击实在太。鲍的公开羞辱被蒋视为生平所受第一次奇耻大辱,几欲自杀。事实上,蒋长久对此事难以释怀。甚至于30多年后的1958年,蒋介石因在胡适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致祝贺演讲词,被胡适当场“纠正”,而视此为奇耻大辱,由此竟又联想到在武汉被鲍罗廷羞辱的情形,“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⑥在政坛上驰骋几十年的蒋介石,已经历各种惊涛骇浪,但让其感受到莫大耻辱的却唯此两件,可见鲍的讲话对于蒋内心的冲击和影响是何等巨大。

正当蒋初尝权势带来的尊荣滋味之时,却被鲍如此奚落,除了自尊心颇受伤害外,亦让站在权力巅峰的蒋难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感,由此萌发驱逐这个压在自己头上太上皇的想法并不难理解。此时蒋的权力基

①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0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日。

④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日。

⑤ 《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6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参见陈红民《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础并不稳固，这种不稳固又恰恰是来自苏联的影响力所致，蒋一直以来对此便非常不安，而鲍的当众训斥就成了引爆蒋脆弱神经的重要导火索。

三 蒋介石驱鲍的无奈与全面决裂

面对各方要求迁都武汉的压力，蒋介石被迫进行妥协。蒋做出所谓妥协后，武汉方面却围绕“独裁”“提高党权”等问题，继续不断对蒋进行攻击。获悉武汉方面激昂的党权运动后，蒋异常恼怒。针对武汉方面的攻讦，南昌方面则纷传武汉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借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① 2月21日，蒋在南昌发表公开演讲，否认武汉联席会议的合法性，进行反共宣传。

“迁都之争”越演越烈之时，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并于2月22、23日与蒋介石面谈。蒋努力向其辩明“冲突的根子在武昌”，“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有鲍来负”，因鲍近来“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的政策”，“这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弱小民族心目的威信”。蒋言明：“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且政府随时可迁往武汉，但前提是“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②

2月24日，蒋介石派陈公博赴武汉探询各方意见，25日，接陈电后，不胜愤恨。蒋认为“武汉来电皆是诈术，全为鲍尔廷一人所主使”，“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③ 2月26日，蒋决定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第三国际执行中央委员会，“请求撤回代表鲍罗廷”。这也是国民党首次对第三国际提出抗议性要求，但第三国际并无回电。中央政治会议遂再电促鲍罗廷自动离去，鲍亦置之不理。^④ 此时，蒋对第三国际仍抱有一丝希冀，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愿意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但该电报不知何故并未及时到达。^⑤ 猜疑心极强的蒋介石自然怀疑第三国际对其的态度与诚意，蒋认为第三国际不予答复，是因苏联眼中没有中国国民党，不配做其以平等对待之民族。^⑥

事实上，共产国际与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后以倒蒋为目的的运动方针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78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33~134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5日。

④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6月）》（初稿），1927年2月26日，第243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56页。

⑥ 《蒋介石与鲍罗廷》，《大公报》1927年5月10日，第2版。

并不一致，维经斯基代表团认为鲍的行动不仅违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而且严重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主张应该坚决地撤换他。^①但莫斯科拒绝了远东局关于解除鲍罗廷职务的声明。^②针对鲍的辞意，斯大林甚至对其做了安抚和高度评价。^③此后，共产国际针对蒋介石要求驱鲍和改变工作方针的最后通牒，给出的答复越来越激进，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的方针”，“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④强调“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⑤甚至向鲍罗廷询问，是否需要考虑向蒋提出“警告性的咨询”，并有“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想法。^⑥

2月28日，蒋介石提出“与各同志决议迁武汉及驱鲍之案”，这是蒋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驱鲍。一方面，蒋最初驱鲍带有较强的个人恩怨色彩，蒋将鲍个人行为与苏联和共产主义做了区分。蒋一直想让周围人和第三国际信服自己的说法，即他只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反对俄人中“坏人”鲍罗廷，驱鲍正是要维护苏联和第三国际的信誉，不使联俄政策破裂。但蒋的主张既未得到众人赞同，也未得到第三国际许可，让鲍自动离去的做法亦被鲍无视，蒋感到无助和无奈。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蒋感受到的压力和威胁来源已不仅仅是鲍罗廷个人，而是“共产党合国际全力以倒余，帝国主义亦和国际全力以谋余”。^⑦对此困境，蒋认为皆是拜鲍和中共所赐，在日记中痛骂“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⑧

蒋介石感受到的更大打击则是3月10日至17日在武汉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上蒋原来的职位均被撤销或代替，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总司令的权限，复由全会通过的条例加以限制。此外，为了改变蒋利用黄埔军校培植个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决议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此次会议无疑大大削弱了蒋的权力，张国焘认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⑨正是这种表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30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65、586页。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66～67页。

④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35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49页。

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50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9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0日。

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88页。

面上的胜利把蒋进一步推向分裂之路。蒋因二届三中全会所产生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实在太大了。^① 握有兵权的蒋介石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进行反击，并嘲讽对手“亡党亡国，在所不恤，而以必倒中正个人以为快，多见其不自量也”。^②

除了武汉方面的压迫，地方军阀、资本家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诱惑也是使蒋最终走向和苏联、中共分裂的重要原因。首先，到2月底，蒋介石已同沿海地区的银行资本家以及他们投靠的各列强达成了或近于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反共交易。江浙财团答应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条件是蒋反苏反共。^③ 其次，北方奉系军阀在日本唆使下也表示，只要蒋介石反共，南北和谈并非不可能之事。张作霖坚持先将俄人罢免，然后方可讨论和平。^④ 军阀孙传芳利用社会反对共产之心理，专攻击蒋介石“亲俄赤化”一点，对蒋个人亦谓只需要脱离苏联操纵，便可罢战言和。^⑤ 张、孙攻击蒋联俄、赤化，主要出于政治与宣传目的，但对蒋无疑有橄榄枝和刺激作用。最后，英、美、日等列强开始认识到蒋和苏联、中共之间的不同与裂痕，将其视为“稳健派”，力图把蒋从国共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与蒋接触频繁。到了3月，蒋反复要求尊重外国财产，并停止了一切反帝宣传。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感受到武汉方面的攻击与压迫日甚一日，而且蒋驱鲍的努力未能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并有被共产国际抛弃之疑。因此，蒋认为驱鲍已不能解决和苏联及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另外，蒋担心如若继续联俄联共，则会导致帝国主义、军阀等势力对其的攻击，最终导致其孤家寡人的命运。所以，蒋在探得江浙财团、青帮以及各列强意向之后，已不再单单驱逐俄人中的“坏人”鲍罗廷，而是转向与苏联、中共全面决裂，企图以此来摆脱困境。

余 论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下，蒋介石与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之间短暂的蜜月合作因中山舰事件而变得错综复杂。此后，鲍表面上支持蒋，暗

①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324～325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7日。
 ③ 苏智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④ 《蒋介石之辩明》，《大公报》1927年2月18日，第3版。
 ⑤ 《社评：孙蒋战事前途之推测》，《大公报》1926年10月3日，第1版。

中却进行各种反蒋甚至倒蒋运动，双方终因“迁都之争”而矛盾公开化。鲍的当面羞辱则成了蒋驱鲍的导火索，但蒋驱鲍的心路历程却也是困境重重。首先，中山舰事件后，蒋权力日隆，而以鲍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左派和与中共却不断试图稀释甚至解除蒋的权力。蒋对此十分恐慌，认为主要是鲍从中作祟，因此唯有驱鲍。其次，孙中山去世后，对于联俄联共政策态度本就不一的国民党走向公开分裂，再加上苏联有意加剧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国民党党务问题愈渐复杂。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其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① 蒋护党心切，认为只有驱鲍才能避免党政被鲍等把持。最后，蒋将个人的受辱与民族荣辱相关联。蒋决心驱鲍，认为只有驱鲍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党权，只有驱除俄人中的“坏人”才能贯彻共产国际的民族平等政策，获得民族自尊与独立。与此同时，蒋又不想因驱鲍造成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决裂。

蒋介石从最初单纯要求驱鲍，最终走向与苏联、中共的决裂，既有客观革命利益矛盾的必然性，亦有很多偶然因素和情感因素掺杂其中。正如陈公博回忆说，双方的分裂“与其说是具有理由，还不如说是激于意气”。^② 鲍罗廷和蒋介石均属于个性较强的人，二人关系日趋紧张的关键时刻，鲍却使蒋当众受平生奇耻大辱。对于苏联顾问来说，他们对蒋的个性并非毫无了解。在他们提交给莫斯科的各种报告中，除了认为“此人极端变化无常，十分孤僻”，“城府很深”“不露心迹”“天性多疑”以外，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蒋“虚荣心很强（强到病态的程度）”，“虚荣心强的吓人”或“虚荣心特别重”。换言之，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有着极强的个性和自尊心，必不容他人稍加轻视与傲慢。^③ 既然如此，鲍罗廷为何会继季山嘉之后重蹈覆辙，去触碰蒋的雷区呢？一方面，鲍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使蒋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④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是鲍逞一时之快，一纾半年多来之苦闷，却忽视了形势比人强。鲍事后感到后怕，他承认“我恐怕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之所以站起来反对蒋介石，是出于舆论的压力，但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⑤ 而蒋作为军人，具有的领袖魅

①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 113 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第 79 页。

③ 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第 79 页。

④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 161 页。

⑤ 《上海来信》，第 407 页，转引自〔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罗易赴华使命：1927 年的国共分裂》，王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第 50~51 页。

力是军人式的，注重威严，有一种霸气，对人要求效忠与绝对服从。身为党政军领袖，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别人对他的骄横跋扈。^① 蒋羞辱到几欲自杀，决心驱鲍，这是蒋对自己权位受到鲍威胁之后的直接反应，也是蒋意外成功赶走季山嘉后迭生铤而走险念想的续曲。

要理解蒋介石从驱鲍走向与苏联、中共分裂，还必须理解蒋的个人及民族自卑感带来的过分敏感和自尊，并由此在蒋心中所产生的英雄主义及革命情结，这样才能理解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蒋成长于甲午之战后中华民族跌入谷底时期，这一时期国人普遍既有民族自卑感，又有振兴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蒋在其日记及思想言论中经常显现英雄主义及革命情结，大有救中国舍我其谁之抱负。因此，当蒋感受到自身及所信仰的革命遭受苏联的压迫时，民族自卑感所发酵的过分敏感和自尊自强就开始彰显，与不能平等待我之苏联决裂乃迟早之事。另外，蒋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受人欺负的经历使其形成了自卑倔强、敏感多疑的性格。在个人和民族自卑感交织所引发的过分自尊与倔强情感支配下，蒋不仅将鲍的抨击视为个人的耻辱，而且将它和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相联系，将其升格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当蒋驱鲍之意得不到苏联支持时，便不惜与之决裂。

^① 陈三井：《蒋介石眼中的俄国顾问》，《近代中国与世界》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32页。

仪式展演与政治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双十节”与统治合法性建构

姜瑞学*

提 要 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节日或纪念日等时间体系是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重要对象。对时间、节日或纪念日及仪式的政治运作，能够重塑国家的象征符号，增强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国民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通过主导“双十节”的历史话语叙述及控制节日纪念中“党化”仪式的展演，不断进行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塑造。在参与节日纪念的活动中，民众客观上接受着“党国”意识的教育及三民主义理论的熏陶，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国民党对民众进行党化意识形态教育的统治目的。

关键词 双十节 党化仪式 政治宣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操控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传媒手段，极力推行“党化”政策，将三民主义理论通过各类宣传及教育手段覆盖到整个社会，以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其中通过对时间、节日或纪念日及仪式的政治运作，重塑民众的历史记忆，获取民间社会对其政权的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政治权力技术运作的重要手段。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专门设置了一系列的现代民族国家节日体系，不断建构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①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国民党对“双十节”的建构过

*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科技大学讲师。

① 关于民国时期利用现代节日体系强化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研究，最早是笔者发表的《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随后李学智《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考察了“双十节”期间北京的节日政治活动，展现了人们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

程及“双十节”的政治仪式功能，展现国民党如何利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节日体系将官方的辛亥革命史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连接起来，进而把国家的观念及党化意识形态传输给民间社会，从而实现巩固国民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目的，而通过分析民间社会对“双十节”的反应，又能折射出“双十节”纪念日政治宣教的效果。

一 孙中山对节日内涵的阐释与政治动员

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致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结束，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将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最能体现民国统治的合法性。通过“双十节”的设立，定期重温民国的开国历史，能够强化民众对国家起源的历史记忆，有效地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众联合起来，激起民众对国家的强烈感情，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事实上，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政权即转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为了获取各界的支持，袁世凯仍将辛亥革命纪念日作为北京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但是一直回避辛亥革命史的宣传。1912年9月29日，袁世凯签署大总统令，“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应举行之事如左：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同时，还规定“南京政府成立之日（阴历正月初一）暨北京政府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日（即阳历二月十二日）为纪念日，均放假休息”。^①民初，袁世凯出于巩固个人统治的需要，有选择地利

2005年第4期)通过制度时间与仪式操演的双重维度，考察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揭示纪念周制度所隐含的现代政治权力技术。胡俊修、李美佳《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纪念(1927~1937)》(《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通过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十年间“双十节”纪念主题和政治基调的变换，凸显了国民党不断增进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诉求。杨振东《普天同庆抑或塑造党国之民——1927年国民党人对“双十节”的重塑》(《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通过南北两个政权对1927年庆典的重视程度与庆典规模，透视两者之间权势的转移和正统的位移，考察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为挽救政权丧失的合法性而进行的努力。何卓恩、周游《“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通过分析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双十节”内涵的解释，揭示了节日叙事背后不同的政治暗示，最终国民党将“双十节”塑造成为佐证党国体制合法性的强势符号。此外，郭辉在《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一书中，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的纪念日体系纳入国家仪式的范畴，通过考察国家仪式操演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深入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家仪式建构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

^① 《九月二十九日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9月30日，第1版。

用辛亥革命在民国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暗含着对武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肯定,但是对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只字不提,无疑是对孙中山及同盟会所起历史作用的弱化。直到 1915 年袁世凯帝制被推翻以后,“双十节”作为国庆纪念日的历史功用,仅仅止于“使吾民得以及时行乐,而又可藉以唤起人民合群爱国之心”。^①通过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民初设立的“双十节”纪念日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使民众产生忠于国家的思想意识。

孙中山本人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政权把对“双十节”的纪念作为实现权力意愿的重要手段,利用“双十节”对抗北京政府统治、争取政治资源,不断凸显自己及其对国民革命政权的领导地位,启迪和引导民众对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民国”的认同。

孙中山对于国庆日的构想始于云南起义后,重在突出革命的内涵。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恢复共和的过程中,云南起义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孙中山主张以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孙中山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虽然“武昌起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但他认为,反对“家天下”的云南起义,更有纪念意义,因此,请“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继尧)暨起誓诸人以心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②后来,孙中山逐渐认识到武昌起义有鼓舞民众革命斗志、继续争取民主共和的作用,于是开始注重对武昌起义经过的介绍,不断赋予“双十节”新的历史内涵。1917 年 10 月 9 日,孙中山发布《纪念双十节布告》,称自己“受讨逆之任”,在南疆“缅怀先烈,亦欲与我国民饮水思源,知民国缔造之由来”,深知责任与使命,号召民众“于兹纪念大典,交相勸励,共纾卫国之忧,力荷建设之责,以保持此国庆至于无穷”。^③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肯定自己在武昌起义、革命建国中的地位与作用。1919 年“双十节”,孙中山又发表《八年今日》一文,回忆武昌起义经过,表达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现状的不满与愤慨,尖锐讽刺武人政客的祸国殃民,指出“革命之事业,

① 高劳:《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庆纪事》,《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6 号,1912 年 12 月 1 日,第 10 页。

② 《致黎元洪国务院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 3 卷,中华书局,1984,第 402 页。

③ 《纪念双十节布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 4 卷,中华书局,1985,第 206 页。

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希望“后起者”“继成大业”。^①

北伐时期，“双十节”的仪式更是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时机。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改组成功，革命形势高涨，孙中山以大元帅身份率领北伐军到达广东韶关。10月10日，韶关军民举行辛亥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纪念庆祝典礼，孙中山亲自参加，并回忆了武昌起义的情况，讲演“双十节”历史之经过，告诫大家，之所以仍是年年庆祝“双十节”，“就是因为他尚存有民国之名，留得此招牌，为吾人奋斗前进的一线生机”。^②据参加过这次“双十节”庆典的人回忆，孙中山在演说中预言正义在革命一边，民众在革命一边，北伐一定胜利，革命一定成功。他的讲话给与会军民以莫大的鼓舞，全场欢声雷动，口号震天。^③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政权，在“双十节”广泛宣传民主、共和与革命的思想，影响了民众的精神面貌，“南方当局，讨贼声威，震动寰宇。河源大捷后，东江余孽，指日肃清，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将与此国庆而祝捷焉”。^④

二 南京国民政府“双十节”的纪念仪式

“双十节”仪式所表达的政治文化意义具有现代国家认同的特性。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⑤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一切的行动指南。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更加注重通过主导“双十节”的仪式程序与仪规，实现“党国”意识的教化功能。

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在“双十节”的仪式活动中，有的仪式活动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明文规定，如悬挂党国旗；有的仪式活动并没有规定，但伴随着节日仪式活动的举行，逐渐成为节日仪式的常规。南京国民

① 《八年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132页。

② 《在韶关庆祝武昌起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12页。

③ 谢平难：《孙中山最后一次参加“双十节”》，武汉市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86，第71页。

④ 《庆祝国庆日之感想》，《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0日，第1版。

⑤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1页。

政府成立后，“双十节”的仪式日渐规范，并基本形成定制，成为各地“双十节”庆典的统一模式：

- 一、全体肃立
- 二、奏乐
- 三、唱党歌
- 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 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
- 六、静默
- 七、主席致开会辞
- 八、演说
- 九、呼口号
- 十、礼成。^①

“双十节”仪式中的每一仪节都有深刻的功能和内涵。节日中的“全体肃立”，使人们形成庄严肃穆的氛围，“是一种情绪唤起，让人们进入严肃的状态，从身体上让人达到紧张与兴奋，从而为仪式的下一步进行做准备”。^② 全体肃立，首先使人们从身体与精神上进入了一种情境当中，为接受国民党所主导的节日仪式熏陶准备了一种氛围。

唱党歌。国民党的党歌在 1929 年 1 月由国民党中常会第 190 次会议通过。^③ 其歌词完全是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直白说教与表达：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在党歌歌词中，重点强调的“三民主义”“主义是从”“必信必忠”等词语，蕴含着强烈的政治暗示，无疑会对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尊崇党旗、国旗是政治仪式的中心环节。1924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 80 号，颁布制定了党旗和国旗的尺度及式样，“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

① 《前日国庆纪念大会》，《申报》1930 年 10 月 12 日，第 13 版。

② 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 年第 4 期。

③ 《党歌》，《中央周刊》第 34 期，1929 年 1 月 28 日，第 24 页。

旗为国旗”。党旗和国旗是国民党及中华民国的象征符号。对党国旗行最敬礼，能够树立党国的威权，因为“党国旗的价值，大部分不在其组成形体的物质，而在于所附寄的中国国民革命史和所象征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党国旗的尊敬，不仅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旗帜下的一种义务，着实是人类一种高尚的天性。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发展我们的天性，就要把党国旗当作我中华民族的生命一样保重”。^① 在国民党的解释中，尊崇党旗和国旗关系着对国民革命史和三民主义的认同，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带有浓厚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色彩。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为了促进民众对孙中山的崇拜，实现三民主义的传输，“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及“恭读总理遗嘱”的礼节广泛渗透到了各种节日仪式当中，它也成为“双十节”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仪节。^②

如果说国民党利用“向总理遗像行最敬礼”及“恭读总理遗嘱”仪节宣传三民主义，还只是停留在象征仪式层面的话，那么，政治演说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向民众灌输三民主义思想的方式。这些政治演说使民众能够了解“党国”的现行政策与工作方向，对于宣传三民主义直接起到了政治说教的作用。蒋介石从1928年起几乎每年都要发表《中华民国国庆纪念告全国同胞书》，反复重申要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其他要员也经常结合党政工作的需要进行国庆的演说，这些致辞或演说一方面突显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促使民众不断认同国民党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借助“双十节”庆典的庄严性和神圣性，暗示了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崇高威严，具有强化国民党统治权威的功能。

在所有仪式中，呼口号是最具感染力的仪式行为，能够充分调动仪式参与者的情绪，并使其陷入精神狂热之中。国民党通过带动民众呼口号的形式，不断扩大其政治话语的传播，以达到影响民众生活的目的。如“庆祝伟大的革命双十节”“庆祝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庆祝三民主义的伟大胜利！”“努力实行总理的遗教！”“厉行革命的建设事业！”“三民主义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实行革命的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等。^③ 随着国内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口号的内容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双十节”的庆祝口号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重要手段，如“继续先烈

① 《党旗和国旗》（1929年10月10日），南昌各界庆祝“双十节”筹备委员会宣传部，1929，第31页。

② 详细的解释见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③ 《国庆纪念日的标语口号》，《中央周刊》第18期，1928年10月8日，第8页。

精神”“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维护国家生存完成总理遗志”“人人奋起共赴国难”。^① 国庆纪念日庆祝大会的口号极为简练，便于民众的诵读和记忆。保罗·康纳顿曾指出，仪式语言作为一种记忆手段，具有强大的力量。^② 通过呼口号，能够动员民众追随国民党，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完成现阶段的政治目标。

通过举行“双十节”的纪念仪式展演，国民党将自身、国家和民族三者置于共同的时间场域中，建立起过去与现代的历史联系，从而达到重塑民众集体记忆的目的。在这种营造的充满神圣感的节日仪式当中，民众被裹挟到其权力及合法性建构的历史体验中，不断完成着自身政治意识的“党化”过程。

三 国民党的政治宣传与合法性建构

1927 年，国民党完成北伐，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建立起了南京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操控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传媒手段，竭力利用“双十节”等纪念日进行宣传教育，建立起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与“双十节”历史的连接。

南京国民党政权通过在“双十节”回顾辛亥革命史略，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将国民党与辛亥革命建立起革命谱系，展现自身政治统治权力的合法来源。在《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中，国民党要求各级党部、行政机关及学校在宣传“双十节”时要讲述国庆纪念日史略：“民国纪元前一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吾党同志熊秉坤、蔡济民等奉总理命，在武汉首义，讨伐满清，各省同志纷起响应，不两月即光复十余省，推翻满清专制，创立中华民国。”^③ 通过叙述先烈建国的历史过程，国民党巧妙地向民众表明中华民国是由“吾党”所创立。在政治话语转换中，“双十节”由原先纪念革命先烈的历史被偷偷转换为纪念国民党建国的历史。

在国民党国庆纪念宣传大纲政治话语中，辛亥革命史的叙述着重突

① 《首都各界悬旗志庆 各界今晨举行纪念大会》，《中央日报》1937 年 10 月 10 日，第 4 版。

② [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 66 页。

③ 《国民党党部检送革命纪念日简明表等件》（1930 年 7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卷宗号：1307。

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历史作用。在话语宣传中，首先高度评价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国民党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于孙中山，是“总理二十余年积极奋斗的结果”。国民党称孙中山自中法战争之后，一直不断进行革命，领导兴中会、同盟会，发起多次起义以挽救中国：1900年惠州起义，1906年萍浏起义，1907年黄花岗之役、惠州之役、七月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的河口之役，1910年的广州起义及1911年的广州起义。大纲指出，正是这些革命实践使孙中山有足够的力量来呼吁民众追随他的民族革命思想，从而造成伟大的革命势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通过强调兴中会、同盟会等组织发起的一次次的革命起义与战役，把作为孙中山继承者的国民党置于辛亥革命及近代中国历史的核心位置上。其次，大纲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大纲指出，辛亥革命的成功，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使各民族都能在同一政治组织之下，以平等互助之精神，建立起一新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始得由牛马奴隶，进而为共和国的主人翁，而获得做人的地位。”同时，大纲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革命失败于忽视革命主义及方略，忽视民众的革命力量及党的本身不健全，突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遗教。最后，通过在国庆日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表述，将国民党的工作重点传达给民众。在大纲中，向民众传达国民党是国家建设的责任者的信息：“代表全面利益而奋斗的国民政府，更因以稳固其地位而设施及发展其党治的法治的民治的政治。”

在“双十节”的纪念中，国民党执行孙中山“遗教”继承人的角色，着重突出实施“三民主义”等政治纲领的话语宣传，规定“应努力训政工作，以荡涤旧污，促成宪治，实现三民主义”。^①在《中央周刊》的宣传标语中，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于整个的三民主义不能贯彻！”“辛亥革命失败于落空了的训政工作！”“惟有完成训政工作才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②“双十节”期间的《申报》、《中央日报》、各地《民国日报》都登载着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制定的宣传标语和口号，如“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不能厉行训政建设”。^③蒋介石在纪念1928年的“双十节”中认为，训政时期应本着“以党救国、

① 《国庆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刊》第70期，1929年10月10日，第4页。

② 《国庆纪念日的标语口号》，《中央周刊》第18期，1928年10月8日，第10页。

③ 《国庆日之首都大规模庆祝》，《申报》1929年10月10日，第15版。

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精神，“处处以党的力量为核心”，共建一个“新中华民国”。^① 国民党各要员也充分利用“双十节”展开训政宣传，不断将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孙科曾在演讲中说：“纪念‘双十节’的意义在于吾人此国庆声中，甚愿全国人民一致觉悟，誓死拥护国民政府；对于国政府训政时期之建设工作，尤当竭力促其完成，以达革命之终极目标。”^② 为了引导民众对训政工作的支持，国民党政治精英们宣传：“国民党集中一切政权，施行训政的工作，他的精神与目的，是以政权付诸国民为归宿。双十节的光荣抑或黯淡，全视吾们能否统一民众的意志与党的指导之下，及能否一致努力履行主义而定。”^③ 国民党希望通过“双十节”的宣传，使党员及民众确立共信互信的信念，顺利完成训政，“因为共信互信的确立，使党员的思想易于统一，党的力量易于集中，且使党的统一和发展，可期可待，党的使命即可完成”。^④

结 语

南京国民党政权利用民国建立过程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作为纪念日，对纪念日的时间及仪式进行统一规定，主导话语宣传、仪式展演，宣传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史，这不仅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而且通过其所表达的意识观念与思想情感，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起到了组织、教育、调整与维持的作用。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国家通过对时间和空间安排所进行的精确调配而实现对社会的监控。^⑤ 南京国民党政权正是通过“双十节”节日体系中历史知识谱系的建构，并通过仪式化的过程，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说教传输到民众当中去，引导民众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以及三民主义意识的熏陶，最终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纪念“双十节”的过程中，无论是辛亥革命历史话语的叙述，还是纪念仪式的展演，无不体现着现代政治权力操控的痕迹。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党政要员每年“双十节”期间发表大量的政治演说，包括蒋介石每年

① 蒋中正：《今后我们努力工作的两条路》，《国庆第二十五周年纪念刊》，出版者不详，1936，第53页。

② 孙科：《双十节意义之认识》，《中央周刊》第70期，1929年10月10日，第19页。

③ 许自诚：《吾们应当怎样纪念双十节》，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国庆纪念特刊》，1930，第85页。

④ 蒋中正：《今后我们努力工作的两条路》，《国庆第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第53页。

⑤ [美]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第57页。

在“双十节”当日的纪念讲话，都是根据自己的政治意图来选择、安排纪念话语，持续不断地对“双十节”赋予政治符号的意义，巩固、扩大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上的历史话语权。每年的“双十节”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邵元冲、叶楚伦等人都会撰文号召民众响应国民党的党化意识形态。1927年的“双十节”，叶楚伦在《民国日报》发表的社评就体现了这一点：“同胞们！忠实明白的同胞们！你们如其赞同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如其恐惧中国国民党的强暴腐败，更应该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华民国是你们的，中国国民党也是你们的，中国国民党民众化了，才挑得起这副重担；中国国民党民众化了，才不致强暴腐败。”^①部分知识精英积极参与建构民众对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认同，使民族国家的观念渗透在节日的庆祝中。如罗家伦在1929年清华大学庆祝国庆大会上，对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前途充满着希望：“过去十几年的困难问题，在无系统，凌乱混杂，没有统一的国家作系统的发展。而今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前途的希望正大。”^②蔡元培在1930年10月10日上海庆祝国庆节大会上，明白地表达了当年的庆祝价值所在：“军事结束后，无论政治、党务、社会，一切问题都有详尽计划，可以努力进行。……希望从今天起，不再有战事的继起，一致努力建设上的一切事业，一面并彻底把贪官污吏等扫除净尽。”^③知识精英对于国庆日与国家关系的建构，使民众对于国家有了深切的认识，知道国家的存亡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对国家的理想与信念也越发忠诚，正如李鼎铭所回忆：“今天是双十节31周年纪念。回忆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数十年，经过十次的起义，十次的失败，许多革命志士，英勇牺牲，前仆后继，不知掷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热血，才培植成这朵‘双十节’灿烂之花。”^④可见，“双十节”在强化人们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塑造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专家荐语：

姜瑞学同学的论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双十节”为主要考察对象，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技术的另一面，即通过主导“双十节”

① 叶楚伦：《双十节》，《民国日报》1927年10月10日，第4版。

② 罗家伦：《如何纪念国庆》，《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第61页。

③ 蔡元培：《今年庆祝国庆的新起义》，《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549页。

④ 李鼎铭：《纪念双十节》，《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页。

革命史叙述及仪式展演, 重塑国家象征符号与统治合法性的建构, 进而增强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这一选题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深化, 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论文以档案、报刊等资料为基础, 深入进行话语分析, 论证思路明晰, 结构严谨, 语言流畅, 达到了作者预设的研究目标, 特此推荐。

推荐专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蕴茜教授

张君勱与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成立及运作*

王尤清**

提 要 中国国家社会党是由张君勱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发起成立的政党，政治上提倡修正的民主政治，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与国共两党一样，中国国家社会党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机构，并以在野党的身份提出改造中国的现代化立国主张，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调和国共之争，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国社党虽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政党更替，达到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诉求，但作为当时民主、进步的力量，国社党对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和民主政治建设，仍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张君勱 中国国家社会党 民国政治

中国国家社会党（以下简称“国社党”）是由张君勱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发起成立的政党，政治上提倡修正的民主政治，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宣称秉承“国父遗训”，实行一党独裁。国民党的做法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反弹，张君勱及其同人不相信在一党专政下，国民党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在没有反对党，权力不存在竞争的体制中，不可能会有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故张君勱要组建政党，以制衡国民党一党独裁，发挥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张东荪在提到组建国社党的目的时也强调，组建国社党“纯是为了

* 本文系贵州财经大学 2013 年引进人才项目“张君勱与 1930 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的组建及其运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①此外，张君勱要践行民主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理想，也需要借助团体的力量。长期以来，国社党被淹没于国共两党分合和争斗的历史潮流中，较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即使偶有提及，也多是从中共统战史或革命同盟军的角度进行评述，将其看作“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充当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点缀品”。^②政党是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代表，任何政党都有其独立的利益和政治选择。因此，对于国社党成立及其政治运作，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评价。系统梳理国社党成立、发展和组织运作的历史，既可以考察当时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的理解程度，亦可审视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发展演进的轨迹。

一 张君勱与国社党的历史渊源

国社党成员俊生在梳理中国政党历史时，将自己的源流追溯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所从事的宪政运动。^③尽管这一说法有自我拔高的意味，但就其主要发起者与领导人张君勱、张东荪等人的经历和政治活动来看，却也并非虚言。张君勱 1906 年东渡日本留学，开始追随梁启超从事民主宪政运动，^④直到梁启超去世，基本参与了研究系的重要政治活动。虽然这些活动与国社党的成立没有直接关系，但张君勱在其间所形成的人际网络，无疑为国社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张君勱筹组国社党的酝酿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其“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⑤1922 年，张君勱与张东荪等人商讨组建政党问题，以为应首先创理想杂志，集合同志，进而组党。梁启超也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张君勱、丁文

①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岳麓书社，2010，第 7 页。

② 相关文章有：王玉祥《张君勱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探析》，《历史档案》1996 年第 2 期；尹涛《中国民主社会党的成立及特点》，《民国档案》2009 年第 2 期；魏万磊《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国社党的社会主义观》，《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

③ 俊生在《中国国家社会党》一文中写道：“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联，但未曾不可说是一脉相承。换句话说：中国目前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期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俊生：《中国国家社会党》，《再生》第 104 期，1945 年 12 月 5 日，第 23 页。

④ 程文熙：《张君勱先生年表长编》，朱传誉主编《张君勱传记资料》（2），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第 254 页。

⑤ 张君勱：《与溯初吾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 898 页。

江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此次组党虽未成，却未尝不是张君勱办政治大学的契机，也是成立民社党的一个远因”。^①

1923年，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的创办则为张君勱组建国社党的基础。其间，他不仅在经费筹措、学校选址以及课程设置等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心血，而且广邀学界名流任教和演讲，除其挚友张东荪外，诸如罗文干、潘光旦、金井羊、朱亦松等。^②张君勱对国立政治大学“投注了很大精力”进行经营和运作，^③其目的是培养具备宪政素质的政治人才，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政治大学的创办不仅为张君勱聚合了国社党的发起成员，而且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如冯今白、蒋匀田、王世宪等均成为张君勱的得力助手，以至于国社党与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为民主社会党后，他们被称为民社党内的“政大系”。^④

国立政治大学受到国民党查封停办后，张君勱避居上海租界，以张士林为笔名译述拉斯基的《政治典范》。拉斯基作为英国工党的著名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费边社成员，长期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不少中国留学生受业于其门下。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拉斯基指导的中国学生有钱昌照、陈源、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等；30年代师从拉斯基的有程沧波、龚祥瑞、邹文海和吴恩裕等。他们回国后多在教育界、新闻界、政界任事，并且围绕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等形成一个费边社会主义团体。^⑤罗隆基、王造时在政治理念上与张君勱较为相近，邹文海、费孝通留学期间对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兴趣浓厚，非常敬仰翻译拉斯基《政治典范》的张君勱，“而朱亦松和费孝通在国社党内自然也和张君勱构成党员与党魁的关系”。^⑥译介《政治典范》不但为张君勱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思考，还为国社党的成立聚集了一批人员。

青年党对张君勱组建国社党也起到很大的帮助，政治大学被关停后，张君勱在上海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其间，曾与“国内夙德”的胡石

① 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第51~52页。

② 程文熙：《君勱先生之言行》，朱传誉主编《张君勱传记资料》（7），第29页。

③ 李达生：《国土：张君勱先生》，朱传誉主编《张君勱传记资料》（7），第12页。

④ 《国民党中央联络处关于民社党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第375页。

⑤ 关于费边主义的论述，可参见刘是今《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与批评派初探》（上、下），《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2008年第1期。

⑥ 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72页。

青就政治主张交换看法。^① 李璜希望胡石青加入青年党阵营, 由于理念差异, 胡石青“旋晤张君劢, 所见亦微有同异”。^② 1929 年春, 李璜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知行学院, 邀请名流前来授课, 张君劢亦在被邀请之列。李璜与《新月》杂志社中的人权派关系密切, 罗隆基、梁实秋等人权派知识分子受邀到知行学院任教。李璜及其创办的知行学院对后来建国社党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和人权派知识分子起了桥梁和中介作用, 国社党成立时, 罗隆基、诸青来、罗文干等相率加入。

有研究者将以张君劢为中心的再生社知识分子分为五层关系: “门生、故旧、同乡、亲戚、一般朋友或同事。”^③ 其实这五层关系也体现在张君劢筹建国社党的人际网络中, 《再生》杂志是国社党的机关刊物, 虽然并非所有再生社学人都加入国社党, 但大多数人与国社党党员重合。综合起来, 国社党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国立政治大学的学生; 二是承续梁启超的研究系和康有为在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④ 三是来自“人权派”和青年党。

二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成立

1929 年 1 月, 梁启超去世, 张君劢、张东荪等继续进行组党活动。10 月, 张君劢赴德国耶拿大学任教, 张东荪仍留在国内筹划组党。1930 年秋, 张东荪受司徒雷登邀请赴燕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 先后与胡石青、徐君勉、汤住心、陈博生、罗文干、诸青来等商议建党事宜, 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宪政党”, 并起草党纲, 待张君劢回国后做最后决定。1931 年 9 月, 张君劢回国, 认为“宪政党”名称太旧, 遂改为“国家社会党”。^⑤ 国社党名称与希特勒的社会党相同, “国人每误认与德国希特勒政党的性质相同”, 国社党解释道: “希特勒所重在民族, 在日耳曼的血统, 照其愿意应

① 张君劢:《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第1403页。

② 郭豫才:《胡石青先生年谱》,《再生》第87期,1943年2月15日,第9页。

③ 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第71~73页。

④ 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以华侨作中坚”,长期以来主要在美国等地活动。康有为去世后,徐君勉继任宪政党主席。国社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徐君勉以个人身份参加,并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宪政党重要人物梁秋水也成为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

⑤ 程文熙:《张君劢先生年表长编》,朱传誉主编《张君劢传记资料》(2),第259页。

译为民族社会党，基本上与本党风马牛不相及。”^①“前者为社会主义，后者为法西斯主义，吾人不可以其名词相混淆，应以其性质而别异同。”^②为了避免让人误解，张君勱在《国家社会主义纲领》中也特别强调二者的不同。^③

1932年4月16日国家社会党成立于北平，^④由于“政府的压迫，所以一切的活动都是秘密的”。^⑤5月20日发起组织再生社，发行机关刊物——《再生》杂志，“在北平设总部，在天津设特别区委，在上海武汉等地设立分部。武汉由南庶熙负责，上海由王造时、刘荣石负责，张君勱往来平津鲁豫间，指挥一切”。1934年4月，国社党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国家社会党政纲》和《国家社会党宣言》，确立国社党的组织架构，选举张君勱及张东荪、胡石青、徐君勉、黄任之、罗隆基、汤芑铭、梁秋水、陆叙百、诸青来、胡子笏等11人为中央总务委员。张君勱兼总秘书，总揽党务，汤芑铭任组织部长，罗隆基任宣传部长，梁秋水任财务部长。政党的影响要通过有序的组织 and 运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国社党组织系统分为中央部、支部和分部三级。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为中央部总务委员会。中央部总务委员会设总秘书一人，执行总务委员会之议决，并分设文书、财政、组织、宣传四处，每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执行该党总章，筹划该党财政，以及决定该党对于政局之态度。^⑥1936年，国社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总务委员8人。国社党不设主席或委员长，只设总务主任兼总秘书一人作为最高领袖，此职务一直由张君勱担任。总务委员为张东荪、陆鼎揆、罗文干、罗隆基、诸青来、汤芑铭、卢韦昌。国社党的地方组织方面，除陕、甘等省外，均有省党部组织。

组织机构建立后，张君勱开始致力于党员发展和根据国内局势的变化进行政治运作。党员发展方面，1934年国社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北平约100人，山东140人，四川100人，上海50人，汉口50人，天津40人，各地约70人。^⑦为了宣传国社党的政治主张和加大党员的发展工作，

① 《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页。

② 骆明夫：《论中国国家社会党》，《更生评论》第3卷第5期，1938年5月20日，第17页。

③ 记者：《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再生》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15日，第26页。

④ 参见程文熙《张君勱先生年表长编》，朱传誉主编《张君勱传记资料》(2)，第260页。

⑤ 俊生：《中国国家社会党》，《再生》第104期，1945年12月5日，第23页。

⑥ 说文社编辑部：《国家社会党》，《党：中国各党各派现状》，说文社会，1947，第1、3页。

⑦ 卓希陶：《中国现有党派概况：国家社会党》，《胜流》第3卷第7期，1946年4月1日，第33页。

张君劢陆续到广州、太原、山东、北京等地巡回演讲，扩大国社党的影响力。并以《再生》杂志作为宣传阵地，发表《中华民族复兴之民族基础》《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文章，阐释国社党的政治理念、文化诉求和经济主张。1934年，国社党在香港创办《宇宙周刊》，与《再生》相呼应。^①到1938年，国社党总人数发展到1万人左右。^②这些党员多分布在张君劢、张东荪教授过的学生中，青年党党员亦有转入者，故时人说其代表大会等于学生在课堂里听讲。^③国社党活动的对象，也多属于上层政治人物，活动地以平津沪汉济蓉各地学校为主。^④

三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组织运作

政党政治得以存在的关键在于“合法反对”原则，即“反对的普遍认同，组织化的政党以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⑤国社党组织机构得以建立并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党员，已满足组织化的政党这一条件，其政治运作主要围绕着争取“反对的普遍认同”和“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两方面进行。

“反对的普遍认同”本在民国初年已经获得政治精英的认可，但国民党宣称秉承“国父遗训”，实行一党独裁。对于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所表达的呼声和制度要求，国民党认为：“其一即存心捣乱中央之反动派，其二即不明党治训政作用之教书先生，如胡适之之流也。”^⑥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谋求独裁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容许其他政治势力存在，尤其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而国社党的初衷就是要以反对党的身份出现，制衡国民党一党独裁，发挥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国社党实现“反对的普遍认同”，必须争取批评政府的权利和获取国民党对其合法身份的认可。

① 程文熙：《张君劢先生年表长编》，朱传誉主编《张君劢传记资料》（2），第260页。

② 卓希陶：《中国现有党派概况：国家社会党》，《胜流》第3卷第7期，1946年4月1日，第33页。

③ 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第78~79页。

④ 卓希陶：《中国现有党派概况：国家社会党》，《胜流》第3卷第7期，1946年4月1日，第33页。

⑤ Richard Hofstadter,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 8.

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审查全国报纸杂志刊物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档案，档案号：718-925。

国社党成立后，张君劢便以《再生》杂生为舆论阵地发表《国民党党政之新歧路》《法治与独裁》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和独裁政策。张君劢既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也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张君劢的领导下，国社党对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都进行批判：“以性质论，国民党腐化，共产党恶化，青年党顽固化。……以主义论，三民主义混，共产主义激，国家主义旧。”“外强不可靠，政府不可靠，在朝有势的国民党不可靠，在野的共产党不可靠，可靠者，惟有中国国社党！”^① 国社党既反对共产党政策主张，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因此在受到共产党人批判的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打压，机关刊物《再生》杂志被国民党列为“反动刊物”查禁，甚至张君劢的译著也被“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而焚烧之”。^②

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刻，张君劢也并非完全将国社党推到国民党的对立面。对秉承自由主义理念的张君劢及其同人而言，尽管国民政府并非理想政府，但从稳定中国内乱的大局考虑，国民政府仍然获得他们的相对认同。国民党虽然独裁专制，但其政纲规定最后依然要过渡到宪政，国民政府具有进行宪政改造的可能性。组建国社党，是张君劢及其同人希望通过宪政改造现政府的一种方案。国社党成立后，在国共这样以军队作为后盾的强势政党面前，生存空间十分有限，寻求与国共两党建立联系，使国社党的合法性获得认同，也即实现“反对的普遍认同”是张君劢及其同人要达到的首要目标。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的入侵，国社党主张中华民族必须自立自强，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收回东北失地。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张君劢翻译了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演讲——《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并于《再生》杂志连载。此外，从1933年起，张君劢先后在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上发表《民族复兴运动》《中国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国哲学之创造》等文章，并于1935年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以提高民族自信，坚定抵抗日本入侵的决心。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在各方压力之下改变对内对外政策，解除党禁，提出与各党派共商抗日大计。国社党的合法身份得到国民党的

① 慈生：《论中国各党派》，读者文摘出版社，1946，第40页。

② 张君劢：《廿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再生》第108期，1946年4月15日，第5页。

承认, 国社党争取“反对的普遍认同”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张君劢领导的国社党进行政治运作要达到的下一步目标就是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因为“政权和平更替是政党运作的动力与目标所在, 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又一标志, 它表现为执政党与反对党都接受这样一个原则: 无论谁执政, 在一定时候都必须按规则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政治对手, 由此保证政党间轮流、公平地分享政治权力, 在权力更替中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①

1937 年 7 月, 蒋介石邀请各党派人士到庐山会谈, 张君劢、张东荪作为国社党代表参加会议, 并一致认为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刻, “民族生存之重要, 超过一切, 必先有民族, 方可谈到其他, 在精诚团结声浪中, 在野人士, 对政府应表示信任, 发挥善意”。^② 1938 年 4 月, 张君劢致信国民党, 阐述国社党成立的目的、宗旨和主张, 表示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 拥护国民党抗战建国的政策。同时希望国民党“在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 对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同年 12 月张君劢以调和国共分歧的立场致信中共, 表示认同中共对抗战形势的分析, 但主张“军队唯有属于国家, 而不可属于一党”, 建议中共“取消特区”, 希望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③ 在这些问题上国社党与共产党未能达成一致, 但并未妨碍双方建立联系。1938 年底, 张东荪、叶笃义代表国社党到武汉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进行会谈, 并建立两党高层之间的联系。

参加国民参政会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是张君劢率领国社党在抗战期间进行政治运作的主要活动。1938 年 7 月 6 日, 张君劢率张东荪、罗隆基、胡石青、梁实秋、罗文干等国家社会党骨干成员参加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张君劢被选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 并与罗隆基和胡石青一起被选为大会常驻委员会委员。1938 年 10 月, 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召开, 张君劢作为常驻代表提出《刷新政本以利抗战案》。1939 年 9 月, 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 张君劢与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党治, 实施宪政。^④ 经过激烈讨论, 大会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 大会指定张君劢、黄炎培、周览

① 王建华:《夭折的合法反对》,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第 3~4 页。

② 《庐山谈话进行顺利》,《国闻周报》第 14 卷第 29 期, 1937 年 7 月 26 日, 第 49 页。

③ 《中国民主社会党》, 第 79~85 页。

④ 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上), 重庆出版社, 1985, 第 70、180、325、575 页。

为召集人。不久，张君劢主持召开了两次宪政期成会会议，详细讨论宪法制定和宪政实施的具体问题。

除了上述活动外，针对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破坏民主和加强独裁统治的做法，张君劢利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与中间党派领导人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于1941年3月举行秘密集会，商讨成立民主政治同盟。并于19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中国民主政团章程》，推举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梁漱溟为中央常委。^① 宣告包括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张君劢率领国社党积极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特别是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1年底，国民党冠以张君劢指使西南联大“莫须有”罪名，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长达两年之久。在被国民党软禁关押期间，张君劢依然在积极地宣传民主宪政思想，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

四 张君劢与国社党的理论纲领

国社党的理论和纲领主要体现在《我们所要说的话》和《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篇文章中。《我们所要说的话》长三万余言，署名“记者”发表于《再生》杂志创刊号，实由张君劢、张东荪和胡石青三人共同起草，张东荪执笔完成，这篇文章全面阐述了国社党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的主张，并提出了98条纲领。在《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张君劢则将这些主张系统化。

国社党“以建立国家之新制度，开拓社会之新局面为宗旨”，所谓新制度即“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② 国社党的政纲和主张也围绕“绝对的爱国主义”和“渐进的社会主义”展开。关于“绝对的爱国主义”，张君劢将其概括为五点：“（一）人民之所以爱国，不是为自国家手中得到利益；（二）即在国破家亡中，不特无好处可得，反而有害处可受，而爱国之心应仍旧丝毫不减；（三）不因强者战胜之故，轻易受人威胁而背叛其祖国；（四）在国破家亡后之爱国心，即为民族复兴之根据；

^① 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第376页。

^② 《国家社会党》，《党：中国各党各派现状》，第4页。

(五) 所以爱国, 不是为求国家之酬报, 乃是行其心之所安。”^① 关于“渐进的社会主义”, 即主张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反对暴力革命, 提倡以和平缓进手段实行计划经济, 对工业加以管理, 在农业方面化佃农为自耕农。国社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当取法苏俄之计划经济, 而务免其经过之牺牲, 当采用美国之统制方法而务弃其枝节之不屑。”^② 在《国家社会主义纲领》中, 国社党提出“以国家力量使民族有一体之自觉; 社会尽协合之机能; 个人得自由之发展”, 即国家社会主义, 这也是国社党改造国家计划的最高原则。^③ 在绝对的爱国主义和渐进的社会主义理念下, 国社党的政治纲领可概括为: 国家民族本位, 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

处于内忧外患时期的知识分子, 在思考解决社会问题和国家出路时, 普遍带有民族主义倾向, 张君勱及其创建的国社党也同样如此。在其纲领性文献《我们所要说的话》中, 国社党强调: “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与之相抗, 无论是以往的历史, 抑是目前的现象, 凡民族利害达到一高度, 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日本人压迫我们到这种地步, 虽平日在对抗中的资本家与劳工, 平日在仇视中的人民与军队, 亦却不由得联合一气, 从事于抵抗。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 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联合。”以苏俄为例, 认为其成功之处, “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④

在文化教育上, 国社党提出: 发扬民族文化, 普及国民教育; 增进人民生产能力; 厉行公民训练; 养成共同生活之道德习惯; 提高贡献于人类之学术研究; 保障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并使人民不因财产限制而失其受教育之平等机会。国社党认为, “文化中之第一事, 为思想问题”, 欲求思想自由之实现, 宜行下列各事: 第一, 大学教育, 应超于党派政治之外; 第二, 大学教授, 须享受严格之保障; 第三, 为言论出版之自由。如果政府诚能奉公守法, 自然不以人民之批评为惧。坐言之人民才有起而行的机会, 如此, 自然能去除专发漫骂或不负责任之言论。^⑤

在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 加强政府的权力和提高运作效率是当

① 张君勱:《绝对的爱国主义》,《路向》第6卷第4期,1938年3月1日,第88页。

② 《国家社会党》,《党:中国各党各派现状》,第4页。

③ 记者:《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再生》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15日,第2页。

④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4~5页。

⑤ 记者:《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再生》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15日,第17页。

务之急，但给政府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不可有亏于公平与自由”，因此，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达成平衡尤为重要。国家层面“力求效能增进”，社会层面“确立平等基础”，而个人则要“保持个性自由”。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 with 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①

为了进一步具体化上述主张，张君劢还先后发表《法制与独裁》《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就“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做出系统阐述。《我们所要说的话》和《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两文，可以说是中国国家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其后《再生》的中心理论，与‘国社党’以迄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之党纲，都以上述两篇文章为依据”。^②

结 语

组建国社党是张君劢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也是他企图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政治尝试。在张君劢的运作下，国社党以“民族一体、社会公道和个人自由为三大基本事项”，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国方案：国家层面，取欧美各国之长而调和之；政治方面，主张“权力集中与个人自由之调和”；经济方面，强调“私有财产与社会公道之调和”；文化方面，提倡“维持固有道德与吸收世界新潮之长”。^③虽然国社党的成立并非张君劢一人的功劳，但其作为领军人物的作用却不可否认。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张君劢留学日本德国，具有深厚的学理素养，熟悉民主政治运作程序。另一方面，张君劢在之前的政治和教育活动中积累了相应的人脉基础，如政闻社、共和建设讨论会、松社、讲学社等研究系的相关活动中，均有张君劢的身影；通过创办国立政治学院，又培养了蒋匀田、王世宪、孙宝毅、冯今白等党员骨干，牟宗三也对其执弟子礼。此外，张君劢提出“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通过“社会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经济制度，解决私人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问题。这与罗隆基的“实行专家

① 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第49页。

② 李日章：《张君劢年表》，朱传誉主编《张君劢传记资料》(3)，第29页。

③ 记者：《国家社会主义纲领》，《再生》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15日，第26、28页。

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与张东荪的“学术独立与言论自由”“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没有冲突。^① 所以才会有人认为，国社党的成立，“在中国政治上，和文化思想界，实有莫大之意义，及深刻之影响，因张君劢等在国内学术界既负时望，高瞻远瞩”。^② 国社党虽未成为左右政局的力量，但它提出以“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立国的理念，却与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影响着当时社会变迁和政局走向。张君劢提倡和平改良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作为社会上民主、进步的力量，对揭露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造和民主政治的建设，仍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①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第214～215页。

② 骆明夫：《论中国国家社会党》，《更生评论》第3卷第5期，1938年5月20日，第17页。

民国法官制度研究的检视与拓新

李凤鸣*

提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经历了从纯粹批判走向学术理性的历程。近年来，关于民国法官选任、管理和惩戒制度的研究，在问题、方法与材料方面，皆有推进学术成长的成果。但是，其中的多数研究还局限于“规则叙构”这条主线。这一研究领域的拓新，可从义理诠释、资料拓深和突破“制度域”方面着力，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制度研究。

关键词 民国 法官制度 法律史

在古代中国，除中央和宋代以后在地方最高衙门设置有专职法司外，其他衙门只将司法作为衙门总揽的政务之一。即便是专职法司，其司法权力也是附属性的，在本质上与盐务衙门并无区别。因此，中国古代并无职业化的法官，也无法官制度。清末变法之后，司法权开始从一统化的治权中分离，现代法官制度也渐次建立。民国承其余绪开始全面地推进和实践，法官制度建设颇多开拓之举，引起学界的关注。近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不足量的问题。在司法改革的新时期，很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学术检省。

一 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清末司法改革中，已经有现代法官制度的筹划，但由于清廷迅即覆亡，很多制度还没来得及付诸实践。但是，移植西法的帷幕一旦被拉开，就无法再回到黑幕里，法官制度建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民国时期的法官

*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制度改革即处于这样的政改列车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法律转型的艰难,法学研究也没有形成开放和繁荣的气象,特别是对民国法制的研究,因为与新中国法律话语存在难以调适的差异,人们对其关注甚少,故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关的研究还存在以批判为特色的非学理性特征。

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拓展,对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也渐趋多元化,但由于研究偏好的惯性,有关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在法律史学甚至法学研究都处于“幼稚”的情势下,也难免零落之窘境。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史学逐渐成长为独立学科以及专门史研究的兴起,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才开始从差强人意走向细化和深化,不再局限于司法制度史或政治制度史组成部分的述要而形成独立的研究域。^①这种独立的研究域又不断分解形成子项域而作为研究主题,使法官制度的研究不断拓新,法官选任制度即系其子项域之一种。

法官选任包括法官资格考试和任用制度,也许是受到当时司法考试制度改革的影响,学界的着眼点多聚焦于法官资格考试制度。对此问题,毕连芳研究近代中国法官制度的专著中有专章介绍,在《中国近代法官制度》一书中,作者结合其时的法令,对考试机构、考试资格、考试程序进行了梳理,简明扼要,线索明晰,读来有获取新知之愉悦。^②如果说此为整个民国时期法官选任之概览的话,《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则属于民国法官制度史之“断代”研究,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的考试规范和考试实效进行了独立时段的考察,着力甚多。^③

上述两书为研究法官制度的专著,有关法官考试的研究成果还有专研的论文。在这些专文中,胡震的《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研究》是一篇硕士论文,作为专门研究,时间较早,有研究域拓新的意义。该文在分析本制度的内涵及生长环境的基础上,考察了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的模式设计,并通过个案解读,分析了其时考试制度的局限及其借鉴意义,历史叙事与法理解释兼顾,颇值一观。^④在此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胡氏经过修饰整合,发表了《民国前期(1912~1936)司法官考试的模型设计》一文,着眼于

① 如张晋藩《中国司法制度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中即有关于司法官选任培训等相关制度的介绍,袁继成等《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也有关联性的内容,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即是研究法官制度的专著。

② 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第63~85页。

③ 毕连芳:《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73~94页。

④ 胡震:《民国司法官考试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3。

1912~1936年这一特殊时段，对上文的主题进行了选择性延伸，使主题尤为突出，更显细致。^①

在纵跨民国的史作之外，还有一系列专注于“断代”研究的专文。毕连芳《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也是针对法官考试的专文，该文梳理了清末、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法官考试制度的沿革史，并就其机构、程序、功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较之其上书，显示了专文研讨所应当体现的深化和系统化的特色。^② 桂万先等的《北洋政府司法官考试制度评析》也是侧重“断代”研究的专文，虽然研究的主题与前文相类，但其侧重点在于以考试资格、考试内容以及考试机构的史事重建为基础，分析其历史意义，体现了对史事进行“法律史解释”的特点。^③ 此外，代娜的《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制度对司法考试的借鉴》专文，着眼于史鉴，通过史事梳理和比较，总结当前中国司法考试改革的不足，并提出对策性建议，不无新见。^④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法官制度，如赵惠升《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官制度》以及王福永《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制度》中皆有涉及，^⑤ 因法官考试只系全文之略节，此不赘。

法官任用制度的专文较少，毕氏前著《中国近代法官制度》中，有任用制度专节，分别探讨和评述了法官的任命主体、任职资格、任用程序等问题。^⑥ 在其著《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中，对法官任用标准、任用程序、迁调与晋升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视，线索清朗。^⑦ 谢冬慧《民国后期法官任用制度》是探讨法官任用问题的专文，该文通过对任用过程中各类“经验”的综理，强调其时“经验”对于法官职业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当前不应忽视的问题。^⑧

法官任职回避制度也是任用中的重要环节，此类专文有李凤鸣《民国法官回避的制度检视》，该文从晚清法官制度变革前后的法官回避制度谈

-
- ① 胡震：《民国前期（1912~1936）司法官考试的模型设计》，《法学》2005年第12期。
 ② 毕连芳：《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
 ③ 桂万先、施卫中：《北洋政府司法官考试制度评析》，《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④ 代娜：《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考试制度对司法考试的借鉴》，《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⑤ 赵惠升：《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官制度》，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王福永：《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官制度》，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还可参见高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官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1。
 ⑥ 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第110~128页。
 ⑦ 毕连芳：《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第149~162页。
 ⑧ 谢冬慧：《民国后期法官任用制度》，《中国法学》（英文版）2016年第6期。

起,探讨了法官任职回避和职务回避两种类型,并结合时人的评论对回避制度的利弊进行了分类研究,较有学理价值。^①此外,侯欣一教授《地方经验与法官任职地域回避:以晚清和民国为时间段的思考》一文,从制度和理念出发,探讨其时回避制度对于当前学理和实践的启示,着力甚深,理论厚实,值得体味。^②

二 法官管理制度研究

法官管理制度包括职业养成与培训、职务工作分配、职业保障、考核、职业道德塑造等保障和促进法官职务正当履行的各类措施。这些措施立足于从积极方面来强化法官管理,推进法官的职业能力。

关于职业养成与培训,专文探讨的成果有俞江的《司法储才馆初考》和李启成的《司法讲习所考论:中国近代法官培训制度的产生》等。前文对司法储才馆的设立过程、司法人员学习与考试制度以及储才馆的维持与解散等史事,钩沉发微,用功极著。^③后文从司法讲习所筹设之议争、司法讲习所的运作、法官培训制度的确立、讲习所的裁撤及恢复余波等方面进行史事重理,再着力于评价讲习所与近代法官培训制度的利弊及其意义,层层推进,启人思考。^④此外,前述毕连芳两著中对司法讲习所和司法储才馆也有专节介绍,^⑤如《中国近代法官制度》中关于法官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模式等史事述介以及对培训制度的评价,立证有力,持论中肯。

法官的职务工作如何分配,体现了法官职业的科学化和法治化。诸如案件如何分配、司法长官与普通法官之间的职务关系、案件流程管理、法官职务回避等,皆与司法之正义相关。也许是因资料利用的困难或研究旨趣的独特性,笔者尚未检索到足量的与此类相关的专门研究成果。少数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法官职务回避问题较值得关注。如前揭《民国法官回避的制度检视》中,对相关的法令及司法解释进行了梳理,对法律文本的疏解也较为细致。毕连芳的专文《中国近代的法官回避制度》,从程序正义

① 李凤鸣:《民国法官回避的制度检视》,《民国研究》2008年冬季号,总第13、14辑,第178~188页。

② 侯欣一:《地方经验与法官任职地域回避:以晚清和民国为时间段的思考》,《法学》2009年第12期。

③ 俞江:《司法储才馆初考》,《清华法学》第4辑,2004。

④ 李启成:《司法讲习所考论:中国近代法官培训制度的产生》,《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

⑤ 分别参见《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第86~109页)和《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第95~121页)。

的角度对法官回避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立意颇新。^①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任职保障和物质保障，关于任职保障，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有专节探讨，该著从任职保障的理论认知、制度设计、实况剖析及其受挫根源等方面进行层层检视，细密有致。^② 毕著《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中，也从设想与变异的角度，疏析了法官职业保障的制度及其实施问题。^③ 毕著两书对于法官的物质保障问题也本其一贯之研究方法进行了剖析，如关于立法、法官生存状态、保障经费以及保障之制度性欠缺等问题，皆从法律文本梳理进之于实证分析，兼顾对“静态法”与“动态法”进行综合审视，以尽可能展现法律及其社会实践的真貌。

在专文研究中，毕著《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群体的物质待遇分析》，从立法、实况和后果三个层面，着重从法律的效果出发，探讨法官的物质保障问题，殊多新意。^④ 葛峰《民国时期法官经济待遇研究》立足于历史纵面，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初期、抗战时期、抗战之后等时段，以翔实的数据分析法官物质待遇的实况，并进而剖析其特点及其意义，资料扎实，持论可靠，视野宏大，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⑤ 此外，立足于基层法官的研究，如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选题与方法皆有独到之处，颇多新见。^⑥ 再如江照信《由司法革命到法官罢工：民国司法进程问题（1912～1921）》，是一篇立论高远之长文，其中也有涉及法官待遇问题之检视。^⑦

在法官考绩及其道德塑造的专文研究中，毕连芳《北京政府时期法官考绩制度初探》和《北洋政府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制度化设计》两文，从史事及其意义与评价三层面展开论述，有读史与反省之实践意义。^⑧ 再如毕著《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的“隔离带”》也阐述了法官职业伦理的基本问题。^⑨

① 毕连芳：《中国近代的法官回避制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② 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第209～230页。

③ 毕连芳：《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第224～236页。

④ 毕连芳：《北洋政府时期法官群体的物质待遇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⑤ 葛峰：《民国时期法官经济待遇研究》，《东南法学》第6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第185～198页。

⑥ 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学术界》2010年第1期。

⑦ 江照信：《由司法革命到法官罢工：民国司法进程问题（1912～1921）》，《北大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74～197页。

⑧ 分别参见《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及《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⑨ 毕连芳：《试析民国时期法官与律师的“隔离带”》，《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三 法官惩戒制度研究及其他

如果说法官管理制度主要立足于积极方面的保障和推进,法官惩戒制度则立足于消极方面的惩罚与追责。当然,惩戒法治化相对于古代中国的司法官责任追究模式,则又在惩戒中寓以保护之意,因为非依法惩戒则不得减损法官的基本权利,也是法官惩戒的立法意旨。

惩戒制度因是法官制度中的子项制度,研究专文尚不多见,主要见于研究法官制度的具体章节和专研法官惩戒制度的著作中。如毕著《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中,即涉有惩戒问题。^①在《中国近代法官制度》中,亦有专节探讨,梳理了惩戒机构、事由、程序、措施等问题,并立足于规则与史事进行了中肯的评价。^②再如杨艳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官奖惩制度研究》一文,也从规则及其局限和原理等方面,展开了有意义的探讨。^③

李凤鸣《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转型:1901~1949》是探讨近代中国法官惩戒的专著,^④因为晚清法官惩戒制度变革并未有效和全面地付诸实践,故其书的主体部分仍是民国法官惩戒制度之研究。该书以历史过程的纵向为切面,梳理了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制度的历史变迁,从立法、法官惩戒事件和惩戒观念与功效等层次入手,扩大“惩戒”之内涵,将法官因违法而应承担的刑事、行政与惩戒处分进行综合研究,期以从宏大的视野来审视法官惩戒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发生发展及变迁。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从法律文本着手,通过整理各类法官惩戒的案件,探讨各个时期法官惩戒制度的原理与利弊,并在此基础上推绎法官惩戒的实践功效,期以更全面地了解法官惩戒制度的社会意义与法律意义。在内容和方法上,有将本选题推向深入研究的拓新之处。

至于研究专文,如李凤鸣《中国法官惩戒近代化的路径》一文,将法官惩戒立法专门化、惩戒事由理性化、惩戒主体司法化以及惩戒程序法治化,视为法官惩戒近代化的基本标准,有较强的说理性。^⑤李著《南京国

① 毕连芳:《北京民国政府司法官制度研究》,第186~195页。

② 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第146~163页。

③ 杨艳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官奖惩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6。

④ 李凤鸣:《中国法官惩戒的现代化转型:1901~1949》,法律出版社,2016。本书系作者于2010年4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增改而成。

⑤ 李凤鸣:《中国法官惩戒近代化的路径》,《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一文，着眼于惩戒程序，也是从小处入手的探讨，视野颇新。^①

除上述法官制度的专门研究外，选题立足于法官的其他问题的研究，也可能与法官制度相关。如关于审判独立的研究，无疑攸关法官制度建设的成效。此方面的论著以李超的博士论文《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以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最有代表性。该文以法院和法官选任的变迁为主线，围绕审判独立的理念、制度与实践展开，揭示了法院、法官的现代化变革对审判独立的意义，是一篇史事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佳作。^② 夏锦文、秦策《民国时期司法独立的矛盾分析》是一篇较早涉及此问题的专文，该文从司法独立的名与实、司法独立的制约因素以及评价与启示等方面展开，说理透辟，启人深省。^③ 此外，毕连芳《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研究》从观念、实践及其障碍出发，持论有据，也是其近代中国法官制度系列研究中的力作。^④

再如一些立足于独特视角的论作，也不失新见。张熙照《民国初年法官制度改革刍议》即以法官制度改革为视角，从法官的选任和操守方面讨论其与司法独立的关联。^⑤ 施玮《法官制度近代化研究》以近代化为纲，以各类新式法令为目，展现了法官制度近代化的一般模式。这些研究，丰富了法官制度研究的视野。^⑥

余 论

综上所述，对于民国法官制度的研究，以制度和规则研究为选题和方法的论作是其中的主体，其基本特点与较早的专文《近代中国法官制度》多有相通之处。^⑦ 虽然也不乏一些选题独特的专文，如郭志祥《民初法官素养论略》、侯欣一《中国近代史的法官职业》、李在全《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以及毕连芳等《中国近

① 李凤鸣：《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② 李超：《清末民初的审判独立研究：以法院设置与法官选任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4。

③ 夏锦文、秦策：《民国时期司法独立的矛盾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④ 毕连芳：《民国前期法官独立审判制度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⑤ 张熙照：《民国初年法官制度改革刍议》，《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⑥ 施玮：《法官制度近代化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⑦ 马志刚：《近代中国法官制度》，《研究生法学》1999年第2期。

代法官的职业使命探析》等,^① 或从选题, 或从方法上, 突破了制度研究就制度而审视制度的单一特点, 但是, 毕竟尚属少数, 与法官制度应有的学术价值很不相称。因此, 将来的研究,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选题应突破“制度域”。综上选题可见, 无论是对法官制度的综合研究, 还是对构成法官制度整体的子项制度的分支研究, 其立足点皆在于制度叙事和评价。制度在本质上是规则的有机化, 因此, 上述研究多是规则建构, 就制度而言制度, 对于制度与经济、社会和文化乃至法官个案的关系, 未能足够关注。当然, 一个新拓的领域, 其制度研究一开始总是离不开规则建构, 但随着研究的推进, 其触角必须伸展到更多的领域, 以避免制度研究的刚性及其浅表化。

(2) 资料拓深和方法多元化。制度由规则建构以形成有机体, 因此法官制度的研究在当前也多立足于规则的再述, 也就是说侧重于对各类法律文本的探讨, 对于档案、报刊资料、日记、学术论著、案件等着力不足。如笔者研究近代法官惩戒制度, 对于监察院的立案调查等原始资料以及惩戒机关审理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 因为资料管理的原因, 就未能着力使用, 而这些反映原生性和动态的资料, 对于制度研究的深化却是不可或缺的。在研究方法上, 制度建构及其评价是当前研究的一般进路, 因此, 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统计学研究、比较研究等, 还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3) 拓展理论深度。制度研究虽然离不开规则建构, 但是理解制度的精髓离不开对制度原理的探索, 这既包括制度本身的原理, 也包括形成此制度的社会、文化、政治特别是权力构成等原理。就法官制度而言, 规则本身的法理及形成本规则的政治、权力、社会原理等, 也是理解制度本身的钥匙, 当前对法官制度的研究, 长于规则之叙事, 而弱于规则之解释, 这也是制度研究拓新的方向。

^① 分别参见《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法学》2006年第10期、《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福建论坛》2015年第8期。

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 研究回顾与展望^{*}

奚庆庆^{**}

提 要 迄今关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已取得较大进步：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视角已较为多元化；国内学界注重大量利用外文文献档案来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某些个案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在研究时段上较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研究内容上偏向于聚焦官方及政府间互动，资料来源上多是运用英美官方外交档案。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欲推进该问题的研究，需要在进一步占有多方文献的基础上，从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出发，开拓研究领域，充实研究内容，注重基本史实的重建和结论的创新。

关键词 战后初期 英国对华政策 中国共产党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拉开序幕。作为冷战在中国的反映，国共内战爆发，中国政权更迭。内战期间，位居西方在华利益之首的英国，密切关注中国国内的发展形势，并适时地调整对华政策。大体而言，战后英国对国民政府的政策，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从战后初期的保持中立，到内战前期两害相权后的“暗中相助”，再到最后不得不接受战争现实而选择最终抛弃。与之相应，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则经历这样的演变过程：从私人关系的欣赏与钦佩，到确定中共性质后的暗中“反共”，再到接受战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英国对中国台湾政策的演变研究（1945～1958）”（15CZS054）阶段性成果。

**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现实后努力与中共谋求和好与合作。可见,战后初期,基于形势不同,英国对国民政府和中共的政策也不同。作为中国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共得到英国较多关注,在此基础上,英国形成了相应的政策。

对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相关档案解密之前,国外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国门的打开,国内部分学者走出国门,尤其是一些留学英美的学者利用相关外交档案已经解密的便利,开始较多关注战后中英关系及中美关系,这些学者遂成为中国学者中研究中英关系的主力军,更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直接以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为议题展开,这显然是学者们在充分意识到研究该议题的重要价值后所做出的倾向性选择。殊不知,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以英国对中共政策的变化为研究视角,深挖英国对中共政策转变的原因、实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捋清东亚格局转型的关键时期英国、美国及苏联在中国内战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是准确把握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以及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个理想切入点和重要突破口。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学界在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做扼要回顾与述评,并就未来研究提出部分意见和建议,以便为后来者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国外学界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中英关系史、英美对华关系史以及英美在亚洲地区冷战史的著作之中。代表性成果有 Aron Shai, *Britain and China, 1941 - 1947: Imperial Momentum*,^① 该著在考察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7 年《胡伯备忘录》出台前后的中英关系时,论及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Brian Porter,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A Study of British Attitudes, 1945 - 1954*,^② 该著全面展示和深刻分析了二战结束至日内瓦会议结束期间英国政策、议会辩论以及公众舆论等对共产主义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态度,英国对国共两党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新中国政权的立场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Edwin W. Martin, *Divided Counsel: The Anglo - 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③ 该著着重比较中共自 1948 年 11

① Aron Shai, *Britain and China, 1941 - 1947: Imperial Momentu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② Brian Porter,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A Study of British Attitudes, 1945 - 195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③ Edwin W. Martin, *Divided Counsel: The Anglo - 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中文译本参见 [美] 爱德温·W. 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月占领沈阳到介入朝鲜战争、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期间美英对中共政权的不同政策及行动，并分析了英美之间分歧的动因及影响。Victors Kaufman, *Argument and Accord: Anglo -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China, 1948 - 1972*,^① 该书论述了 1948 ~ 1972 年英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以及英国首相的个人因素在英国制定对中共和对台湾政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Peter Lowe, *Containing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Japan, China and Korea, 1948 - 1953*,^② 该著在第二部分论及英国对华政策时，论述了国民党的失败、对中共政府的承认及台湾的命运、经济制裁和贸易等问题。

概括而言，国外学界关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视角较为多元化，但仍有稍许缺憾：一是仅在考察远东地区冷战、中英关系及英美特殊关系时对此略有涉及，而鲜有论著对该问题做专门探讨；二是大多强调战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对美国的依附性及其表现出的“不作为”，而较少关注到英国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例如，面对英美对华政策发生分歧时，英国究竟能否撇开美国执行独立决策？以布拉福德·珀金斯为代表的大多数英美学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英美关系的特性是“虽然英国取得了部分影响力，但是美国不允许他国，甚至与其有着共同见解的其他国来决定重大决策”。^③

国内学术界真正意义上开始专门从事该问题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一些留学英美的华人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到 90 年代不断推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大量利用外文文献档案来分析英国对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属于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内学界的许多中英关系史研究专著对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都有所涉及，但这类著作重在长时段勾勒中英之间的交往及互动，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只占其极少一部分。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本，一本是冯仲平的《英国政府的中国政策：1945 ~ 1950》，^④ 一本是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

① Victors Kaufman, *Argument and Accord: Anglo -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China, 1948 - 1972*, Ann Arbor: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Peter Lowe, *Containing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Japan, China and Korea, 1948 - 1953*,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Bradford Perkins, "Unequal Partners: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Great Britain," W. Roger Louis and Hedley Bull,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 47.

④ Zhong - Ping Fe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1945 - 1950*, Keele: Ryburn Publishing,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英关系》。^① 这两本著作在运用解密的英国官方和私人档案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战后初期在中国政局急剧变化之际，中英关系曲折、复杂、微妙的发展历程，其中部分章节涉及英国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评价以及对国共斗争的态度、政策等。上述著作的重要特点，一是运用了较为丰富的英文文献，二是对于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虽仅限于宏观上的勾勒，但针对某些重要的个案问题，作者也进行了深刻论证，且不乏精彩之笔。另外，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王为民的《百年中英关系》，以及陈乐民的《战后英国外交史》^② 等有关中英关系史的著作也对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的政策有所涉及，但在一手档案文献的运用上略显不足。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拉开序幕，英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研究美苏冷战离不开对英国因素的考察。因此，国内部分研究美苏冷战的学者，在考察战后英美在远东的特殊关系时有意将英美对中共的政策加以比较研究，但这类著作意在考察冷战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英国只是作为作者论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参照，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更是此类著作的冰山一角。例如，相蓝欣的《重塑远东帝国：英美在中国（1945～1950）》，^③ 比较系统地分析了1945～1950年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于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英美和中共的关系，作者在深入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结论：1949～1950年，华盛顿意在通过不承认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而伦敦却早已经预料到这种方法完全无效。^④ 徐友珍的《分歧与协调：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⑤ 以英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为透视视角，通过对相关个案问题的全方位动态分析，凸显美英在对华政策上的互动以及英美对华关系的特性。关于英共关系，作者主要论及新中国成立前后，英美在承认新中国政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这类论著尽管偏重于述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但在说明问题的过程中多数均涉及英国对华或者是对中

① 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② 具体参见：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③ Lanxin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 - 1950*,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④ Lanxin Xiang, *Recasting the Imperial Far East: Britain and America in China, 1945 - 1950*, pp. 242 - 243.

⑤ 徐友珍：《分歧与协调：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共政策，不少论著不乏深刻见解，这对研究战后英共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英关系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承认新中国问题、香港问题、“长江事件”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等。因此，一段时间内国内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瞄准战后中英关系中的这些重大问题，相继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也部分触及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谦平的《论“紫石英”号事件》以及《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①直接以战后英国和中共的关系为主题而展开，其分析深刻，见解独到，结论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而且都是建立在非常翔实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类著作大部分集中论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个案问题，除此之外少有涉及。

由上可知，目前国内史学界对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成果，研究时段上较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研究内容上偏向于聚焦官方及政府间互动，资料来源上多是运用英美官方外交档案成篇。此外，在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结论上国内学者也有几点共识：一是普遍认为早在1948年年底，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与中共政权建立联系，英国在对中共新政权的外交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基本上执行着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二是多数学者也都注意到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变化中所考虑的一些基本因素，诸如竭力恢复并维护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渴望持续拥有香港、力图离间中苏关系等。

整体而言，迄今为止关于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进步，某些个案问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毋庸讳言，不少领域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正如2002年陈谦平教授在述评近十年来的中英关系研究时所说：“从总体上看，战时中英关系研究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还不多，对战时中英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②这虽然是针对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研究所说，但如今看来，同样适用于目前状态下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就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未来方向提出几点思考。

首先，研究时段要前后有所延伸，研究内容上不仅要注重官方的政治交往，也要注重民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还应注重英共双方间著名外

^① 具体参见：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陈谦平《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陈谦平：《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交官的私人往来及其影响。

早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就开始了对中共的深入研究和初步接触。例如英国人威廉·邦得 (William Band) 和林迈可 (Michael Lindsay) 都曾到过和在延安解放区工作和生活过。他们曾向英国人大量报道他们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这些报道引起了英国驻华大使及英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也成为促使英国政府去研究中共，愿意和中共进行交往的原动力。同样，国共内战前期，英国基于对中共性质的重新解读，其对中共的政策又与战时发生变化。内战结束后，英国虽然法律上承认新中国政权，又鉴于国际局势及美国因素的影响，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共执行“骑墙”政策。显然，除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和中共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和接触之外，二战期间、国共内战前期以及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后英国和中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是中英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因此，今后的研究中对此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经过百余年的殖民积累，英国在华利益庞大，中英之间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既有官方的经济交往，也有民间的经济往来。英国在华的投资遍及各个领域，以英国在华企业为例，英美烟公司 (the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的卷烟厂及其经销机构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中国最大的煤矿开采公司开滦矿务局 (the 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英国享有 50% 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亚细亚石油公司 (the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的经销代理机构也遍布全中国，主要经营与中国间的煤、汽油贸易。文化方面，早在 1943 年，有“当代利玛窦”之称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就曾为中英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可见，战后英国和中共的交往不仅有官方联系，还有私人 and 民间的交往；不仅是政治交往，更有经济、文化、外交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往来，今后的研究中，对于非官方的经济、文化及社会交往须予以重视。

此外，战后初期在英国与中共的接触与交往过程中，既出现了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著名英国驻华外交官，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Seymour)、史谛文等，也有英国人所尊重的中共著名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他们之间既有正式的官方接触也有私人的交往和友谊，甚至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对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态度以及对中共政策的制定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毛泽东、周恩来有意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之间的交往以及对英国驻华大使馆所做的统战工作就部分促进了战后初期英共关系的改善。再如，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薛穆通过对中共及延安边区政府细心而周密的观察，对中共的印象有所改观，他对于中共的良好印象，又促使他在向英

国政府的汇报中敢于直言批评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共行径，并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可见，优秀外交官的个人魅力对于中英关系的走向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

其次，要加强发掘、整理及利用与战后英共关系研究相关的一切史料。众所周知，“论从史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本源，它对历史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档案和文献资料的丰富是英共关系研究走向繁盛的前提和基础。就目前而言，关于战后英共关系的专门性史料并不多见，多是散见于所涉各国的官方和私人文件、外交备忘录、总统及首相备忘录、日记及回忆录等，这是今后从事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学者应当注意之处。具体而言，笔者以为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注重搜集整理英、美、苏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所涉一切官方档案。关于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探讨涉及两方四国：国民政府和中共两方，以及中、美、英以及苏联四国。战后初期，围绕着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国、共、美、英、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并深刻影响着战后英共关系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因此研究战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离不开对美国、苏联因素的关注和考察。具体到史料利用上来说，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英美原始档案，还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充分发掘中国大陆及台湾所收藏的史料文献，甚至是苏联档案文献。据笔者了解，英美方面业已编辑出版的相关文献有：《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系列（*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件》系列（*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系列（*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等。这些文件卷帙浩繁、内容庞大，很多皆涉及战后中英关系或英国与中共的关系，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许多重点高校的图书馆都有影印本，对此应注意利用。已经开放但未刊的数字化档案也有许多，英国方面如亚当·马修公司所开发的“档案直接”（Archives Direct）系列所包含的英国档案数据库：英国外交文件系列中关于中国的子数据库（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 - 1980）、英国外交部机密印件（Confidential Print）系列以及专题文件系列，如“麦克米伦内阁文件”（Macmillan Cabinet Papers, 1957 - 1963）。美国方面有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文件系列（President Truman's Office Files, 1945 - 1953）、美国国务院核心机密文件系列（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中关于远东及中国系列等，中国国家图书馆、相关高校图书馆以及部分学术研究中心也都根据研究所需有所选择地进行了购买，对此应予以充分利用。此外，英国内阁档

案系列、英国国防部档案系列、英国殖民部档案系列、美国国会记录系列等，都与该主题的研究密切相关，上述部分档案已经公开，但尚未完全数字化，需要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加以获取并利用。另外，还有许多已刊未刊档案散见于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高校及科研院所图书馆，鉴于语言或开放程度不足等方面的因素，上述相关档案利用严重不足，对此我们必须克服困难，通过多种途径，尽快予以挖掘利用。

另一方面，要注意搜集、整理并利用所涉私人文献，比如总统、首相或相关外交官的备忘录、日记、回忆录、年谱等。战后英国与中共的交往与互动所牵涉的著名人物众多，如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艾德礼，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贝文，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史谛文等，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杜鲁门，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艾奇逊、杜勒斯等，苏联方面有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斯大林，外长莫洛托夫等，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有时任“总统”的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外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郑天锡等，中共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杰出的领导人或生活、工作在那个年代，或直接参与政策的筹谋和制定，或是对政策的执行、时局的发展存在重要的影响。他们大都有文集、日记、回忆录或者年谱问世，比如《丘吉尔回忆录》、《艾登回忆录》、《杜鲁门回忆录》、《艾奇逊回忆录》、《杜勒斯言论选辑》、《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薛穆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及日记、《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年谱》等，这些史料部分已刊，对于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应予以重视并充分利用。

最后，应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及基本史实的重建。战后初期英国对中共的政策牵涉冷战的大背景以及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所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不应以个人的政治主观性或者较重的民族主义来做出有失客观的价值判断，而应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冷静考察，从不同视角出发，尽量避免传统的所谓“英帝国主义”视角，依据不同研究方法深刻揭示复杂历史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这有助于英共关系研究的深入。以中英关系史上著名的“长江事件”为例，多年来，史学界的传统看法是：它是英帝国主义执行传统“炮舰政策”而意在干涉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但是针对该事件，陈谦平教授避免从个人的主观臆断及传统的民族主义出发而妄下定论，在查阅了多方的档案文献后，最终将历史真相予以还原：英国军舰是在事先遭到待命渡江的人民解放军炮击后才开始开火，英舰并没有故意先炮击人民解放军，当伤痕累累的英

舰仓皇而逃时，实际上标志着英国在华“炮舰政策”的终结。可见，在占有多方史料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出发，加强对重要史实的梳理与重建，也是深化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研究的重要一举。

总之，战后英国对中共政策的研究，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已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欲使其研究推向前进，笔者以为，需要在进一步占有多方文献的基础上，从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出发，开拓研究领域，充实研究内容，注重基本史实的重建和结论的创新，这是我们后辈学者所应努力的方向。

【专论】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再审视

吴梓明*

提 要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逐渐扩展成为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破裂，国内原有的13所教会大学亦逐渐地消失了。从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致力开创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工作开始，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教育意义尤显。本文提出应从以下几个新课题探究：（一）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二）教会大学的华人校长研究；（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四）宗教教育的现代化。

关键词 教会大学 国学研究 华人校长 抗战时期 宗教教育

一 引言

1985年初章开沅教授担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回国访问他，他们两位都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学生——刘是燕京大学、章是金陵大学的学生。^①在谈话间，刘教授突然提及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必要性及迫切性，并且对章教授说：“我看你就是带头研究的最适合的人选……第一，你原来是教会大学的学生，现在

* 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① 章教授曾在南京金陵大学修读历史（1946~1949），是贝德士（M. Searle Bates）教授的学生；刘教授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就读于燕京大学，是洪煨莲（William Hung，洪业）教授的学生。

的工作单位前身也是教会大学，对教会大学有较多亲身的体验。第二，你现在是大学校长，对学校有总体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于研究教会大学。第三，特别是作为历史学者，你既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更有责任来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这块空缺。”^①章教授于是接受了这个挑战，开始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他从湖北省档案馆找回华中大学的历史档案，将之搬回华中师范大学档案史室内，并着手推动其他学者关注及开始研究其他教会大学的历史和档案。1989年5月，第一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②在会议上，章教授提出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并建议将教会大学放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畴内进行探究。^③他亦从美国耶鲁大学档案中，寻获贝德士的手稿及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重新发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历史新意义。^④

二 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自武汉会议后，一批年青学者开始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不断地发掘有关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新课题。譬如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⑤、史静寰的《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⑥、马敏的《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⑦、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⑧及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⑨等。另一本属于专论的著述是高时

① 有关他们的对话，可参见章开沅《章序》，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1998，第xiii页。

② 参见章开沅、林蔚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③ 参见 Zhang Kai Yuan & Ng Tze Ming Peter,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 the Chinese Experience,”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Vol. 15, March 1993, pp. 118 – 128.

④ 譬如章开沅《贝德士与金陵大学》，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第533~640页；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27页；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汤美如主编、章开沅编译《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

⑤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⑥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天津出版社，1991。

⑦ 马敏：《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第74~110页。

⑧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⑨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将教会大学的历史重新放回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范畴内做研究，在近代教育史研究中也是极具创意的。^①

1994 年 3 月，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办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上，学者们更为教会大学研究寻觅了新的研究课题，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角色。学者们共同合作出版了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共有七辑，以七个新颖的课题开展研究，分别是：

1.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2.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3.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4. 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
5. 吴梓明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
6.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
7.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②

三 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

在教会大学的再审视中，学者们发现原来教会大学也是随着中国的处境、社会文化和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国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视。一般的看法认为，教会大学的使命是为传播基督教，它必不会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若是说教会大学是代表西方文化的教育，则教会大学必定不会重视国学研究。不过，在《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一书中，作者发现大部分的中国教会大学均是愈来愈重视国学研究与教育的。^③许多教会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纷纷设立了

①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高教授是福建师范大学有名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专家，2015 年 12 月 27 日离世，享年 104 岁，本文的撰写亦特别为纪念他对中国教会学校史研究所付出的努力。

② 该套丛书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在 1996~2003 年陆续出版了。这些年轻学者今日均已成为有名的教授，譬如陶飞亚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新宪是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徐以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朱峰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家峰、刘天路均是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③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国学研究所或中国文化研究所，譬如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金陵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等。^① 明显的，他们都十分关注国学教育及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和哲学等方面的教育和研究上。^② 他们也曾在中国国学教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并且有相当的成就。就以燕京大学而言，哈佛燕京学社曾为国学研究筹募了不少资金，足以凝聚大批国学精英，如陈垣、许地山、冯友兰、顾颉刚、周作人、郑振声、俞平伯等。燕京大学主办的《燕京年报》《史学年报》，更使燕大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上均享有很崇高的声誉，可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媲美。^③ 换言之，在国学研究的课题上，我们亦可审视到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确是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而不断改变，也是愈来愈变得“中国化”。

四 教会大学的华人校长研究

在教会大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愈来愈发现当中也有不少属于中国的元素，尤其是须向中国政府注册后，教会大学必须由华人担任校长之职，其中出现了不少华人校长教育家，如陈裕光、吴贻芳、韦卓民、钟荣光等。^④ 华人校长的身份比较特别，他们均须面对至少三方面的冲击。其一是他们身为华人信徒，必须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案。究竟他们如何能在持定“中国人身份”的同时，也能坚守其“基督徒的身份”呢？其二是身为基督徒教育工作者，他们必须面对教育工作给予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他们究竟是如何处理“对教育专业的委身”与“对基督教信仰的委身”二者带来的冲突问题呢？其三是他们身为华人校长，必须面对“为教会/差会服务”与“为国家社会服务”之间的冲突问题，他们究竟是如何面对中国政府与基督教会或差会给他们的压力的呢？事实上，华人校长的研究更能帮助学者重新思考教会大学的特性，它并不完全是属于西方的东西，

① 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章开沅、林蔚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38～163页。

② 亦可参阅文兆坚《金陵大学之史学研究（1924～1945）》，硕士学位论文，香港浸会大学，2004。

③ 参见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104～148页；又Leung Yuen Sang（梁元生），“Chinese Studies at Christian Colleges in Modern China - From Periphery to Core,” Ng, Tze Ming Peter et al.,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 - 1950*, Lewisto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 pp. 129 - 153。

④ 参见吴梓明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第61～92、147～168、192～204页。

也包含着很重要的中国的元素,并且是愈来愈“中国化”“本土化”的。因此,我们更加需要为教会大学重新定位,唯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做探究,才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历程。^①

五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

抗日战争对中国造成很大的破坏,当整个中国(国家与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时,教会大学到底该站在哪一边,能否与国家及人民共生、共存、共患难呢?这是对教会大学教育考验的最好时刻。《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一书正是以这个课题做个案研究,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与国家的关系。^②

章开沅教授 1991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有关贝德士的档案文献,返回中国后,他不断地推崇这位金陵大学的教授是他的恩师。^③原来贝德士不仅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贝德士留守南京校园,担负起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他开放了金陵大学校园作为安全区,进行救济难民的工作。后来,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担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指证日本军兵所犯的罪行。章教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中找到很多贝德士的手稿后,便决心为恩师梳理这段历史。他撰写了几本书,譬如《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④还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研究员马莎·斯莱莉(Martha Smalley)合作,编辑出版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⑤另外,南京大学出版社也于 1999 年 9 月出版了章教授负责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⑥一书。章教授也因此成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由此确立了

① 参见吴梓明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第 27 页。

②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③ 章教授说自己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亦是从贝德士文献研究开始的,参见章开沅《贝德士与金陵大学》,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533~640 页;《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第 1~27 页。

④ 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汤美如主编、章开沅编译《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

⑤ Martha Smalley,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New Haven: Yale Divinity School, 1997.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aper, No. 9)

⑥ 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他在“贝德士文献研究”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这也证明了从事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有助于重新诠释近代中国历史，继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

事实上，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确是值得再仔细地审视和研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中也详细地介绍了在八年抗战期间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与救国、救灾、救亡及其他战时社会服务等工作。^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师生，包括一批传教士教育家曾献出他们的生命，来拯救和保护南京的市民。^② 除了金陵大学的贝德士教授外，另一位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是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的系主任华群女士（Minnie Vautrin，明妮·魏特琳，1886～1941）。华群女士是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12年来到中国安徽，见到中国女子多不识字，便决心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后来她返回美国进修教育，1917年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师范毕业，1919年应聘来到金陵女子大学，在教育系奠定了金女大的教育理念基础，提倡“厚生精神”和“爱的教育”。华群女士不仅提倡爱的教育，也在中国活现出爱的教育来。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为了保护南京的妇孺，自愿留守校园，并开放校园收留了过万名的难民，像母鸡照顾小鸡一样地保护南京市民的生命不被日本军兵杀戮。南京市民感恩她，尊称她为“活菩萨”，为了纪念她，现在不仅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也为她立像纪念。^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所保留的华群女士的历史印证，也证实了教会大学师生们在抗战期间所表达的服务和牺牲精神是被中国人民与政府肯定的。

六 宗教教育的现代化

20世纪20年代先后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等，国民政府也要求教会大学必须向政府申请立案，并须附加“不得

① 参见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第85～113、139～187页。

② 参见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第85～113页。

③ 参见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第100～113页。在网上仍可以看到一位难民的女儿忆述母亲在安全区遇到华女士的情况。难民们都敬重她，称她是“活菩萨”。参见《感恩华小姐》，《新视界》，<http://www.worldjournal.com/3381885/article>。

以传教为目的,也不能将宗教科目列入主修科,必须改为选修科”等条文。^① 过往学者均认为这样的改变必然导致教会大学宗教教育的世俗化或逐渐消亡,^②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教会大学校长的反应是十分积极的,譬如陈裕光认为,“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③ 司徒雷登也坦然承认:“由于教会学校实行圣经课必修和强迫参加宗教仪式已经多年……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强迫方式所产生的恶果。事实上,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这种强迫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反感,而他们的反叛,进一步刺激其他人对基督教的攻击。燕大所采取的方法,就是要避免这样的问题,使基督教影响渗透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基督教信仰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④ 他更明确地指出燕京大学所奉行的“自由选修宗教课程”政策不仅是为响应政府的要求,事实上,它也是最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及最有效果的教学途径。^⑤

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的洪业教授也承认“自由选择”对宗教教育的成效尤为重要。^⑥ 他认为在燕京大学教授宗教课程的目的就是要“栽培学生养成欣赏宗教的习惯”。^⑦ “老师必须致力引发学生对宗教产生兴趣、帮助学生思考及明了宗教的概念和行为、培养学生欣赏宗教的态度及乐意认同合理的价值或行为判断的标准。”^⑧ 因此他也赞同教学的过程必须在一个“自由探究”(free enquiry)的气氛下进行。司徒雷登更进一步指出:“政府立案和其他微妙的力量已结束了教会大学那种沉寂的离群索居的状态,把它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外国传教组织卷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激流

① 参阅 Frank Rawlinson ed., *China Christian Yearbook, 192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26, pp. 227 - 228.

② 譬如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 - 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 8;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 - Western Relations, 1916 - 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5 - 96.

③ 吴梓明编《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第 23 页。

④ “Reports of President John L.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Peking University,” March 1925 & April 22, 1926, UBCHEA Archives: 299 - 4658; 315 - 4818.

⑤ “Yenching University - Its Religious Ideals and Service,” UBCHEA Archives: 310 - 4769.

⑥ William Hung, “The Aim, Content and Method of a College Course on Reli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inling College, Feb. 1924,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VII, No. 3, July 1924, pp. 268 - 281.

⑦ William Hung, “The Aim, Content and Method of a College Course on Reli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inling College, Feb. 1924,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VII, No. 3, July 1924, p. 270.

⑧ William Hung, “The Aim, Content and Method of a College Course on Reli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inling College, Feb. 1924, *Educational Review*, Vol. XVII, No. 3, July 1924, pp. 270 - 271.

中。”^①事实上，教会大学积极面对政府的要求，并努力改善及提升宗教教育的“教育化”功能，促进宗教教育的现代化。^②

以燕京大学的宗教课程改革为例，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 燕大的宗教教育是逐渐地由向学生灌输有关圣经或神学的教义，转向着重从较广阔的层面研究基督教，并且是侧重于教育性及学术性的研究。譬如：圣经研究着重“新、旧约文学”“希伯来民族的历史与文学”“圣经与现代人生活”“圣经与现代社会问题”等的探究。燕大还开设有“中国古诗中的宗教观念”等课程，将宗教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进一步探究世俗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开辟了“中国宗教与文学”的学科探究。^③

(2) 燕大的宗教课程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开始为学生介绍不同的宗教传统，譬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宗教比较”^④及“中国宗教研究”^⑤等，也包括“印度哲学”“老子、墨子的哲学”等课程。虽然当年的课程或许还未达到今日宗教对谈的水平，但教授们能采取这样开放的态度，让学生可以更广泛地认识，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探究不同的宗教传统，已经很不简单了。

(3) 燕大宗教系所提供的课程中亦有如“宗教史”^⑥“宗教哲学”^⑦“宗教心理学”^⑧等，尝试应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宗教，帮助学生从跨学科和多角度去分析及研究人类的宗教活动。

(4) 燕大也开设了如“基督教与现代文明”“今日世界中的基督教会”“当今社会问题与基督教伦理”等课程，把宗教放置于当时社会的处境中来考察。这样把宗教思想与现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对学生来说，宗教研究便更富时代感及具当代意义了。简而言之，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并没有因立案的问题而缩减它在大学提供宗教教育的功能，相反，它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p. 95-96.

② 吴梓明：《从神学教育到宗教教育——燕京大学宗教教育的考察》，《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56~81页。

③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 The School of Religion Catalogue, 1925-26*, April 1925, UBCHEA: 315-4818.

④ 该课程着重比较古代及现代不同宗教的源起，尤其注重有关中国古代宗教的探究。

⑤ 该科注明包括“景教”和“道教”的研究。

⑥ “宗教史”一科，英文是“History of Religions”，研究的范围并不限于一个宗教的历史。课程简章中亦说明着重探究宗教的源起、世界各大宗教的发展及如何成为现代的宗教，并论及近代科学与哲学思潮对宗教思想的影响等。

⑦ 课程简章中指出该科较全面地探讨理性、知识与信仰的哲学基础，并涉及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不同论证。

⑧ 课程简章中亦指出该科从近代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的心灵活动及宗教本质，并探讨有关宗教现象、灵魂动作的心理解说等。

却是持续不断地拓展它的课程,从以神学为主导的宗教教育转向以“教育化”“学术化”研究为主导的宗教教育。这样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宗教教育现代化”的历程。^①

宗教课程由主修转变为选修,不仅是一个正常的教育化、现代化的过程,它的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更是间接地帮助了宗教教育成为大学教育中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②纵观西方欧美国家宗教教育的现代化历程,多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③但是教会大学的宗教教育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却早了 40 年,这也正是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处境和社会因素使然。

七 结论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不与世界的历史文化潮流重新接轨,更将会在世界潮流的演变中扮演主导性或是更具影响力的角色。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能够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历史研究亦必然如此,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的大学教育必须面向世界,与世界及历史的潮流接轨。教会大学在中国只有半个世纪或 60 年的历史,其间却经历了不少社会的动荡,包括 20 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20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30~40 年代的抗日战争、随后的国共内战及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等。多年来的战乱无疑阻碍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正常发展,现在是再审视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历史的时候,应该将它放回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范畴中,重新寻找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

① 参阅吴梓明《宗教教育的世俗化与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个案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Peter Tze Ming Ng,“Secularization or Modernization: Teach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Since 1920s,”*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Vol. 5, No. 1, January 1999, pp. 1-17。

② 吴梓明、伍德荣:《我们所认识燕京大学的博雅教育》,《燕大校友通讯》第70期,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2014,第49~58页。

③ Edwin Cox, *Changing Aims in Religious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Ninian Smart, *Secular Education and the Logic of Relig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8; Philip Phenix, “Transcendence and the Curriculum,” W. Pinar ed., *Curriculum Theorizing: the Reconceptualists*, Berkeley: McCutchan, 1975, pp. 323-337。

近七十年来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 比较研究评析

赵晓阳*

提 要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而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也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入的交流。本文从五个方面，即基督宗教与儒学、基督宗教与佛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与民间宗教、基督宗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和交流，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基督宗教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说明宗教和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了解是何等重要。

关键词 基督宗教 中国宗教 宗教文明

基督宗教来华时，面对的是一个与西方文明迥异、传承数千年之久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佛道为辅翼的超稳定结构，对外来文明有着顽强的拒斥力。“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艰难的传教区”，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儒佛道为主要信仰的中国宗教和文化，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切使得任何外来宗教都必须谨慎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关系。

一般来讲，当两种甚至多种异质文化相遇的时候，起初都会出现相互排斥甚至互相打击的现象，随着交流的逐渐深入，双方都会逐渐认识到并认同彼此的互补性。当然，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交流的理想状态是双方的融会贯通，但这种理想的境界是要经过种种历史磨难才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可能达到的。

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当代世界的热门话题。所谓对话,是在两方或者更多方之间进行的互动性交流。从全世界的和平来讲,“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著名汉学家、宗教学家孔汉思语)。来华的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传教士,只要具备一定的学识和学术能力,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阅读、诠释中国经典和文化,关注的焦点常常是其中的宗教因素——上帝、鬼神、祖先崇拜、宗教仪式、天的属性,等等;提出的问题也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色彩——中国人的信仰是一神教、多神教、自然宗教,还是无神论?上帝与诸神是主从关系还是平等关系?上帝是真神、唯一之神,还是多神之一?祖先崇拜是不是偶像崇拜?但传教士汉学中体现的文化殖民心态,以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强力介入,则需要我们反思与警醒。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是经济,而是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则最能体现宗教的全球化进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基督教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环节,在华基督教向穆斯林传教即是基督教向伊斯兰教进行传播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考虑各类宗教相遇后的冲突与和谐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全球化的背景和要素。

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三种外来宗教,经历了伴随文化、经济、军事三种方式传播的过程,因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时间最长,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经长时期的传承交流、相互吸收和影响,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伊斯兰教则主要在西北的省区约 10 个民族中流行,影响次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短,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宗教凭借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扩张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任何外来宗教文化,如果不注意传入地的本土化要求,其结果必然要被完全排拒于传入地的文化之外。前两种外来宗教都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注意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并深入民众的生活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间较短,这方面尚存不足。三种外来宗教也都具有共同的世俗化趋势,注意与本土世俗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办学校、医院、商业机构等,让宗教理念进入民众的世俗生活,以达到传教的目的。而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文化本身的博大、包容和吸纳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西学东渐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光谱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明清之际基督教的传入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起源。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正是对这一源头进行追溯的思想史专著。

其特点在于，并不去深究天主教耶稣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传播史，而是将视角转向中国人对这种外来宗教的反应。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力图探究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17世纪中国人的反应，表现了他们与西方人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的哪些基本差异？作者并非单纯罗列中西方思想体系的区别，而是在着墨于历史中的吊诡细节后，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乱的历史细节后的思想成因。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传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它是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领域极有价值的参考书。^①

秦家懿和孔汉思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是用学术眼光来看待中西宗教和文化之间问题的研究专著，讨论了中国宗教——儒学、道教、佛教的产生、理论、现状和前途，从现代基督教神学观点出发来分析它们的特点，特别是将之同西方基督教进行比较，要阐明的是：远东的第三大宗教河系应当出自中国，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学宗教。^②

一 基督宗教与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基督宗教对中国儒学的态度和认识是非常复杂的。尽管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基督宗教，并最终达到以西方基督宗教“归化”和改变中国的文化、官员、士绅、民众，必须对其所顶礼膜拜的儒家学说采取了解、认识，并适当宽容的政策。儒学和儒家经典在传统中国的至尊地位，也使得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的关怀常常聚集在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上。

对基督宗教与儒教之间关系的讨论，最早可见1962年陈申如的文章。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其认为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实行勾结，由此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基督教思想和儒教思想也就逐渐从矛盾、斗争转至相互妥协。近代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儒教思想关系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思想上从斗争至勾结的过程，基督教同儒教思想

①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②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7。

开始了新的汇合,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①

董丛林的《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最早涉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专著。孙尚扬的《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和冲突的关键做了重点阐发,是此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很有新意。^②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要求传教士本人实现文化转换,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依据中国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以文化调和为主向,“合儒辟佛”的传教策略,其具体体现则是《天主实义》。利玛窦把天主教学说以儒生可以接受的形式重新包装,对基督教信仰做出一种调和的解释,证明古儒典籍之上帝即基督教之天主,以证明基督宗教是真正值得中国尊奉的宗教。这些非常宽容的宗教思想,体现了他相当宽容的世界性文化视野,而不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或基督宗教基要主义的偏见上,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③

杨廷筠、徐光启和李之藻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作为儒生官员,在信仰天主教后,其对儒学的认识特别引人注目。杨廷筠的耶儒融合思想是希望引入天主教思想来弥补儒家的不足,在他著名的“性修理论”中,将儒家的修行方法和理论,与天主教的天堂地狱和人与神的追求,进行了绝妙的融合。^④ 张晓林分析了杨廷筠在天主教的启发下,逐渐形成的儒家一神论的神哲学体系,而这种哲学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方面异于传统儒家道德理性,另一方面异于传统佛道价值观的宗教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文化新的理论向度和价值向度。^⑤

还有学者讨论了这些儒家基督徒信仰天主教的原因,多与明末众人对佛教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兴趣有关。佛教对宋明儒学的侵入,使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到秦汉之前的儒家才可能保存“经学”之一脉,而天主教恰好就是秦汉之前的儒家。^⑥ 袁邦建通过对中国籍耶稣会士黄伯禄的《训真辨妄》的分析,指出 19 世纪中期后,传教士中出现“援儒入耶”思

① 陈申如:《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儒教的关系》,《山东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

②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92;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

③ 陈戎女:《耶儒之间的文化转换:利玛窦〈天主实义〉分析》,《中国文化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④ 杨秀:《明末儒家基督徒杨廷筠之耶儒融合思想探析》,《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24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 187~196 页。

⑤ 张晓林:《杨廷筠与儒家道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⑥ 肖清和:《清初儒家基督徒刘凝思想简论》,《史林》2011 年第 4 期。

潮并不是偶然性的历史现象。^①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合儒”“补儒”“批儒”“代儒”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西教士对儒学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判之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意义。^②姚兴富的《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是研究基督教与儒学对话与融合的专著。大量利用了《教会新报》的资料，比较重视思想和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和探讨。^③

赵毅通过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加耶稣”的基督教观，叙述了传教士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传教士深知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而采取这样的策略和方法，通达变而不失根本，将孔子作为“特殊的导师”来尊敬，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同时紧握“上帝”和“灵魂”这两个最重要的基督教观念。^④

在一片赞扬之词外，有学者也提醒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由此产生的中国知识与殖民欲望、传教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称为“传教士东方主义”。在有关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与态度方面，传教士们始终从基督教的立场与视角来审视甚至审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他思想。在传教使命和心态的影响下，传教士对儒家文化的理解都带有强烈的批评和解构的意味。理雅各于1861年出版的《中庸》译本，并非要向西方传播儒家之道，而是要将这一中国圣书去经典化。他的翻译是基于基督教信仰对儒家经典与文化的审判，终其一生，他从未放弃以基督教取代儒教的信念。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19世纪儒家经典英译的主体，也是西方世界孔子与儒经形象的主要制造者。^⑤

《论语》是儒学经典，更多受到基督宗教和学者的关注。杨平概述了从明末天主教至清末的新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历史，指出其动机是要

-
- ① 袁邦建：《耶儒对话与传教策略：〈训真辨妄〉探析》，《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孙邦华：《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王辉：《新教传教士译者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认识》，《孔子研究》2011年第5期。
 ③ 姚兴富：《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④ 赵毅：《丁韪良的“孔子加耶稣”》，《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⑤ 王辉：《理雅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东方主义》，《孔子研究》2008年第5期。

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找出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基督教和儒教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以耶稣代替孔子。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也对儒学做了“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极力论证中国的古老历史是圣经传统的一支。这些都是基督教优越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映。^①

王立新还对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进行了考察。19 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一战的影响下,主流的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与欣赏,这种思想最终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②

二 基督宗教与佛教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必然发生相互激荡。从宗教的观点而言,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两者若想在抽象的理念信仰之外融入生活,它们势必是文化,必然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抽象的信仰理念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当地世俗化。

佛教和基督宗教作为两大外来宗教,在近代以前就在中国本土短暂相遇过,即早在唐朝的景教与佛教的相遇。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二者之间并未来得及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对话就失之交臂。佛教本是外来宗教,但经过汉唐以来千余年的发展,已经深深浸透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再次相遇和冲突,实际上成了西方外来宗教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

佛教与基督宗教的对话,自唐代即已开始,初入中国的景教曾大量借用佛教用语翻译自己的经典,其对话形式主要表现为佛教的宽容接引和景教的谦卑依附。景教参与佛教译经事业、借用佛教术语介绍景教教义、借鉴佛教的伦理道德学说和标志符号来宣传景教信仰。而景教这种过分注重本土化的实践和理念,成为它在唐朝传播最终失败的原因,即过分注重本

① 杨平:《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评析》,《中国文化研究》2010 年冬之卷; 丁小英:《苏慧廉英译〈论语〉中宗教思想的体现》,《宜宾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0 期。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历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土化甚至完全佛教化，从而失去其原来应该具有的景教色彩。^①

元代由于本民族的多神信仰传统，其统治者对宗教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对宗教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无论是佛教，还是被称为“也里可温”的基督宗教，都获得了较自由的发展。也里可温教主要在蒙古统治者上层中流传，对汉语思想没有形成全面实质性的影响。随着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快速发展，已经取得重要地位的佛教便对也里可温教采取了排挤的策略。这或可成为也里可温教消灭的原因之一。^② 总体来讲，关于元代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至今仍然很缺乏。

明末清初，在汉文化语境下，天主教耶稣会和佛教之间围绕着宇宙观或生成论、人生观或价值观、解脱观或救赎论，围绕着基督教创世神学和佛教宇宙生成论展开了争论，都注意到了对方的理论存在，但都认为对方剽窃自己的理论，从而希望将对方重新纳入自己的体系。利玛窦主要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而展开对佛教的批判，他对佛教的批判触及了佛教的一些核心教义和宗教行为，但其中有曲解，且独断性成分居多。此种批判一方面为一些士大夫反思和批判传统中国文化和宗教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他们能较轻易地克服改宗的心理障碍，最终弃佛归耶；另一方面则激起了一些佞佛的士大夫和名僧们的反击，人为地设置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障碍。利玛窦与晚明佛教三位大师紫柏、云栖、憨山的交往与争论，都说明中西两大宗教相遇后，各自为护教而出现了冲突。^③

天主教入华后激烈排佛，目的在于取代佛教地位，并借助排佛达到批儒的目的。其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对于本体论和神人关系的不同见解，以及对于轮回观念的不同认识等方面。天主教以佛教为批判对象，也与明代佛教自身的衰落有着巨大的关系。在整个天主教与佛教的争论之中，基本上佛教处于被动的地位。虽然天主教一直处于上风，但并不意味着胜利，且天主教士多少在上风中失去了理性，忽略了佛教已经成为广大中国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民间具有很大的无形的号召力。耶稣会只注重与官方士人的适应和融通，将重点放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而忽略甚至排斥代表民间力量

① 虞恕：《“入华”与“融华”：比较景教与佛教东渐来华的不同遭遇》，《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于晓兰：《元代佛教与基督教关系考》，《学术交流》2011年第2期。

③ 孙尚扬：《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对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林建曾：《基督教与佛教在华关系的发展变化》，《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2期；洪修平：《从佛教的中国化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戴继诚：《利玛窦与晚明佛教三大师》，《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2期。

的佛教,这一做法或许可能是其最终未能融入中国文化的的原因之一。^①

晚清以后,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传教士的目光必须投向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重大的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对中国的佛教经典进行了翻译和了解,如何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编辑佛教词典,进行佛经的英译,目的在于言说“自我”,宣扬基督教自身的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这些相对自由派的传教士关注其他宗教现象的发生,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他们的成功译介也促使他们成为欧洲最早的汉学家,获得了欧洲名校的汉学教授席位。^②

民国年间,自《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非基督教运动”后,基督宗教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态度更谨慎和分化。有学者指出,虽然民国时期佛教与基督教基本上和平相处、各求发展,但两教之间还是多有交涉,关于两教之间的关系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③

民国时期,中国佛教进入改革发展阶段,社会影响力也波及到其他各种宗教。挪威传教士艾香德来到中国后,受佛教影响,积极学习佛经,深入寺庙与佛教徒进行交流。他以较为开放的胸怀倡导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宗教对话与宗教联合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值得关注和提倡的文化现象,被越来越多的宗教团体认同与接受,已成为世界宗教发展中的一种方向。^④

近现代中国的佛教学者如何响应由西方传入的现代科学?这与他们对基督宗教的响应又有何关系?而这些响应对于学界对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又有何意义?赖品超以章太炎及太虚法师这样的佛教学者为个案,在回应传教士传入的西方现代科学方面,指出前者基本上是以中国视域为本位,而后者更倾向于采取全球的视角。文化上的全球化,不仅对个别的宗教传统构成挑战,也提供机遇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得以更新,这不仅

① 马晓英:《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4期;陈朝娟:《从明末清初佛教的复兴看近代佛耶对话:从佛教界对基督教的态度谈起》,《理论界》2007年第5期。

② 李新德:《“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4期;李新德:《李提摩太与佛教典籍英译》,《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1期。

③ 李少兵:《民国时期佛教与基督教思潮关系考》,《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④ 孙亦平:《艾香德牧师与中国佛教:民国时期宗教对话的一个案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

有助于不同传统的全球化，更可促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以至于多元文化的建立。^①

三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在中国都属于外来宗教，两教之间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教义教理上都有很强的渊源关系。它们都在唐代传入中国，在元代，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在中国有了接触。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了碰撞，虽然曾有一些问题，但一直都还处于总体和谐相处的状态下。在其相遇过程中，基督宗教一方一直都处于主动和强势的地位，而伊斯兰教处于相对被动，有所积极反应的状态下。

从总体来讲，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两教之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冲突碰撞，但一直处于还算和睦的状态下。比较两教的传播史，伊斯兰教的传播历史幸运很多，自传入中国后，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这与其始终在个别民族中传播有关，同时也使其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基督宗教曾四次进入中国，前两次完全没落，第三次在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入，也曾遇到过巨大的挫折。^②

有学者研究了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两个外来宗教在华传播方式的不同与产生的效果差异之间的关系。李林研讨了两教之间不同的传播方式，为其在中国的扎根带来的不同效果。伊斯兰教采用的是“载体移植”（历史学家白寿彝语），通过迁移到中国的外来穆斯林融入中国社会，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穆斯林产生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这个过程致使围绕民族和地区而发展的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则在很早就已经出现，并伴随着其民族和宗教的发展而发展。基督宗教的传播方式则截然不同，主要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来华传教”，虽然这些传教士有许多中国信徒和士人的帮助和协调，但其本土化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知程度，甚至取决于他们的数量以及他们在中国停留时间的长短。他们希望通过“走上层路线”来赢得支持，而经常忘记了普通信徒的本土化需求。外来宗教融入中国社会应该是个双向的过程，它既包括外来宗教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主动适应，也应包

① 赖品超：《从文化全球化看中国佛教对现代科学及基督宗教的回应》，《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② 陆芸：《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接触、碰撞和冲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括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以及中国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包容。^①

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长期对立的历史背景,再次入华的天主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呈现某种对立的复杂性,但这些问题都遮蔽在天主教与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后,没有那么引人注目。甚至在著名的明末清初的“礼仪之争”中,钦天监中天主教徒与回族天文学家之间也曾发生过“小问题”,但没有大爆发,并且不是以宗教性的面目出现的。^②

一些两教之间交往和关系的个案研究引人注目。明末清初穆斯林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交往成为研究主题。姚继德根据一些穆斯林文献,研究了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与天主教传教士古若望之间的交往,以及马联元与基督教传教士冯德善的交往对话,赞扬了两代穆斯林学者在对话中所体现出来的平等博大、和平共存的文化对话观,并指出这是云南伊斯兰教学派素来注重回儒贯通、经书并授、学术研究与经堂教育并行的结果。^③

新教来华传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存在一个庞大而又独特的穆斯林群体,并对其历史与现状做了诸多调查研究。刘家峰从宗教相遇与对话的视角出发,把晚清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认知做了史实上的梳理与分析。这一时期是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期。传教士、穆斯林在相互认知方面尽管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偏见或误解,在交往对话中有时也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并没有升级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④

有学者利用传教士的英文资料,研究基督宗教如何看待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两教之间的对比研究。马景以《中华归主》为中心对伊斯兰教的传入、穆斯林人口、穆斯林的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穆斯林的职业构成、宗教职业者阿訇也进行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都是为了向穆斯林宣传福音而进行的基础性工作。^⑤《教务杂志》是由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近

① 李林:《“处境之辩”与“本色之难”:本土化视域中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伊斯兰文化》2012年第1期。

② 许淑杰:《明清之际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姚继德:《“回耶”对话的一次实践:马德新〈据理质证〉及其文明对话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④ 刘家峰:《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刘家峰:《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回顾与前瞻》,《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3期。

⑤ 马景:《民国初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与研究:以〈中华归主〉为例探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百年的英文期刊，代表了主流教会和传教士的思想和见识。通过这些英文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传教士如何“发现”穆斯林，以及其对穆斯林的传教方针策略的制定，而其中内地会成为对中国穆斯林传教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组织，最后深入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①

对中国穆斯林传教最为积极的是内地会，其传教士安献令在1921年出版了经社会调查和研究而形成的《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教》（*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一书，这是最早出版的西文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必读书目。该书突出了穆斯林和汉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历史阴影，站在基督教优越论的立场上，立意是如何向穆斯林宣传基督教，宣传仁慈上帝的基督教会战胜“佩带宝剑”的伊斯兰教。该书这种不合理观点对西方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②刘继华依据西方基督教差会的英文资料，对长期在西北传教的内地会传教士濮司满和濮马可进行了介绍，他们对介绍甘肃穆斯林的情况起到了很大作用。^③王建平还出版了篇幅不长的著述，详细介绍了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档案，以及毕敬士所拍摄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多幅照片。^④

另有学者利用穆斯林的资料，考察了马德新、马联元、杨敬修等穆斯林学者关于基督教的评论，提示了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观察外教的基本思路。^⑤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将传教对象指向了云南回族后，云南回族积极地回应，其中马联元《辨理明证语录》一书较为典型。马联元认为真宰（真主、上帝）是永恒的实在、是无始无终的，而万物是有始有终的，强调了真主独一的本体。耶稣是伊斯兰教所承认的一位大圣人，既不是天之子，也不是天主。《辨理明证语录》于1899年刊刻以后，受到穆斯林知识分子和阿訇的欢迎。1935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河南召开的夏季基督教传教大会上，该书被传教士当作重点进行讨论。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

① 徐炳三：《从〈教务杂志〉看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马景：《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③ 刘继华：《基督教内地会濮氏父子在近代西北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述论》，《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王建平：《近代上海伊斯兰教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王建平：《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考察纪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⑤ 杨晓春：《〈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许淑杰、于鹏翔：《早期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的态度》，《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20 年代以后, 致力于向中国穆斯林传教的部分传教士逐渐放弃了基督教优越论的思想, 主动与中国穆斯林进行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 并着手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考察与现状调查, 而这些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也就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手资料。^①

总体来讲, 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这说明学者们已经从宗教本质的角度来关注考察两教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而非仅从民族、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些研究都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还需要从基督教传教学、伊斯兰教护教学、宗教文明对话、文化交涉、宗教相遇冲突的历史经验等多重视角进行研究, 强调全球史观对理解近代中国这两大宗教关系的重要性。

四 基督宗教与民间宗教

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各地不同的民间传统信仰与西方制度化的基督宗教相遇, 必然产生冲突与矛盾、互动与融会。民间信仰在维系农民生活理想、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仅在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及缓解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战略意义, 而且对于遏制海外势力的宗教渗透具有明显的作用。其融会与互动则体现在“民俗的兼容”“价值伦理的比附”“信众的流动”等方面。

从某种角度来讲,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可以说是一部基督教会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历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国内外学界视角向民间社会的转移, 基督宗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逐渐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可以说, 这是学界在拓宽宗教比较研究的范围上, 迈出的重要一步。赵世瑜力图从明末以来民教之间的习俗冲突, 特别是基督教和寺庙宫观发生的冲突, 去寻找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主线。^②

1992 年, 陈支平、李少明最早涉及基督教与民间宗教的研究, 以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 较详细地描述了当代基督教徒的信仰意识与民风乡俗相互糅合的主要原因。如教徒的结婚仪式, 大多在沿袭民间传统节俗的基础上, 点缀一些基督教的礼节。这一方面是为了顾全乡里邻居之间的人情面子; 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自身宗教意识低下, 在强大的民间传统文

① 马景、王建斌:《清末民初云南回族社会对基督教传播的认知与回应: 马联元〈辨理明证语录〉及其影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② 赵世瑜:《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冲突》,《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

化面前，无法找到一种独立的仪式来突出其宗教色彩。^①

除在偶像崇拜与祖先供奉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与冲突以外，两者为争夺信众和主导地位而发生的宣传战也是重要表现。在融合过程中，还存在“教籍多元”的现象，即某人的信仰存在儒释道兼容，民间宗教与基督教兼容的现象，因此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仍是当地的重要基石，而且可能是遏制外来宗教的重要基石。^②

张先清选取明末在福建长期活动的艾儒略辟中国民间信仰的言论为研究个案，指出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接触，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冲突展现的一个侧面。艾儒略对民间信仰采取了灵活的适应策略，对民间信仰没有生硬地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在坚持天主教义理的原则上做出必要的让步，允许教徒祭祀祖宗等，这样无疑减少了其传教的阻力。^③

范正义认为，在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的发展都很强势的地区，基督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共处关系，受到基督教的“全球地域化”特征的强烈影响。基督教“地域化”后出现的民间信仰化趋势，使得基督教日益被接纳为乡土社会的组成要素；而基督教的“全球化”特征，又使得它与乡土社会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④

传教士是如何看待中国民间宗教的？在他们留下的资料中应该有所反映。《华西教会新闻》（1889~1943）是由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新教差会主办的英文月刊，曾发表一些关于中国西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等内容，各地传教士和西方读者由此了解到中国西南的宗教信仰，也为西南宗教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也可知传教士们所持有的基督教立场使他们在对待异质文化时产生的偏见。这些都基于他们的传教士使命，即改变中国人信仰模式的使命。他们认为，中国宗教具有天然的“落后性”，中国人需要更正确、更高明的“真理基督教”来引导，以此激发其他传教士的使命感，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基督教传播的实践和方法的探讨中。^⑤

① 陈支平、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② 刘志军：《传统信仰与基督宗教的冲突与融合：张店镇个案研究》，《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庄勇：《民间信仰遏制外来宗教渗透的个案研究》，《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

③ 张先清：《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范正义：《当前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共处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以闽南H县J镇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

⑤ 白晓云：《传教士对中国西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考察：以〈华西教会新闻〉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

五 基督宗教与道教

在中国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相遇对话中,主要侧重的是与儒家或佛教之间的对话,对道教文化和思想很不重视,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理解道教。这与近代以来,道教逐渐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所疏远和排斥有重要关系,基本上只有社会下层还在延续着道教的思想和文化,道教基本处于民间化、民俗化的状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加之,中国传统道教信仰组织非常松散,道教被认为已经不太能构成基督教传播的障碍。因此,基督宗教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研究上也不为学者所重视,成果很少。

李新德关注了新教传教士对道教的诠释,说明早期传教士更多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之迷信与偶像崇拜的一面,到了晚清,传教士们开始涉及作为宗教的道教理论体系,主要关心道教对中国人的心智产生了什么影响,道教经典中是否存在对真神上帝的认知。他们虽然承认道教中也有真理,但认为这是为基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基督教远优于道教,唯有基督教才能成全道教、才能“拯救”中国,试图援耶入道、以耶释道。^①

陈焕强研究了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的道教观,认为明末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补儒易佛”的策略,促使了天主教徒亦将道教视作对立面。出于护教心理,中国天主教徒严厉抨击佛道二教,甚至较传教士的态度更为激烈,其中不乏像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这样的名教徒。^②

还有学者从教义教理和宗教比较的角度,将道教与基督宗教进行了比较。查常平对初期道教和基督宗教进行比较,指出道教以现世的肉体生命长生不朽为修炼目标,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基督宗教则以承受超验精神生命的永生和对上帝之国的超验性期盼为信仰目标,而具有超越性。^③李枫从宗教的道德功能入手,比较了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和拥有大量信众的外来宗教基督宗教之间的异同。^④毛丽娅从生态学角度,比较了两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即道教的“洞天福地”和基督宗教的“新天新

-
- ① 李新德:《晚清新教传教士对道教文化的诠释》,《基督教文化学刊》第31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第98~127页。
② 陈焕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的道教观探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③ 查常平:《初期道教的现世性与基督教的超越性:从信仰方式及其内容方面审视》,《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④ 李枫:《宗教的道德功能刍议》,《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地”，作为神圣空间，道观多位于现实的名山胜境，是修仙得道之地，也是实在的生存场所，基督宗教则与末世论有密切关系，只能随着基督的“临在”才能完成。^① 傅凤英从内修角度比较两教，基督宗教灵修的目的是建立健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道教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内在体验。^②

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必须面对中国广大民众的道教信仰问题。传教士认为道教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容易遵从利玛窦提出的“补儒易佛老”的传教策略，因此采取了“耶稣或老子”的对话模式，民国著名基督徒张亦镜则主张“耶稣加老子”，说明皈依基督并非背叛道教或老子，从而消弭基督教与道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他这种道教基督教化的观点却难以被道教徒接受。^③

余 论

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播历程，说明了中西两大文明在相遇时产生的各类问题和挑战。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各派别传教士在不同时期进入中国以后，都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为了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与精髓，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皇帝、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及其原因，许多传教士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国的同时，传教士也开始把中国著名经典著作译介到西方，著书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开始了一个“中学西传”过程，“中学西传”为西方思想文化学者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传教士所见甚至“制造”的种种“中国形象”，可以作为我们反思自身时，颇为有益的“第三只眼”，不无借鉴作用。但传教士汉学中体现的文化殖民心态，以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强力介入，则需要我们时时反思与警醒。这是传教士汉学研究多年以来成为研究热点的首要前提之一，大陆地区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参与者越来越多，研究兴趣越发浓厚。

① 毛丽娅：《终极追求与理想环境：道教“洞天福地”与基督宗教“新天新地”之比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② 傅凤英：《灵修和性命双修：试比较基督宗教与道教内丹的内炼思想》，《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范大明：《耶老对话：张亦镜的道教观》，《船山学刊》2012年第3期。

【学科探索】

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田永秀**

提 要 加强中国铁路史研究是中国作为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时代要求。中国铁路史研究当以中国铁路及其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需求与铁路载运能力之间的双向互动为研究主线，应重点着眼于铁路自身，研究铁路自身的发展史，同时加强中国现代铁路史研究，关注中国铁路技术的演进和发展历程。各高校及研究机构应团结协作，组建一支文、理、工相结合的铁路史研究队伍，多学科交叉，深入推进中国铁路史研究。

关键词 中国铁路 铁路强国 铁路现代化

一 加强中国铁路史研究是时代要求

铁路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其普遍意义自不待言。自1863年英、法、美领事照会中国正式提出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以来，中国铁路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梳理中国铁路发展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是历史研究的当然要求。同时，加强中国铁路史研究是当今中国作为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时代要求，这就是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特殊意义。

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研究者立足现时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自己

* 此文系四川省高水平科研团队“铁路与西南社会变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文中很多观点都是与团队成员张雪永、崔罡等一起商讨的结果，在此一一致谢。

** 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铁路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心教授。

的研究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新的观察、描述和分析。因此,不同时代,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侧重可能不同。曾经占据此前研究中心的话题,由于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变化和研究成果的大量累积,会退居其次。同时新问题的涌现,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在此研究接力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全貌逐步清晰和完整。众所周知,铁路是随着西方列强的步伐进入中国的。铁路修建之初,路权及围绕铁路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外交涉是困扰早期铁路决策者和参与者的重要问题,因此也在长时期内构成了中国铁路史研究的中心问题,^①并在“革命史观”框架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面临着“民族独立”后如何“富强”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对铁路的研究自然转向铁路对于经济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并在此后逐步成为研究的主流。而在此期间,铁路向自身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建设更多的铁路”转向“建设更多更好的铁路”,一直贯穿中国铁路发展的“现代化的追求”成为实在的“现代化的要求”,并开始转化为现实。高铁的筹建,普通铁路的大幅提速,重载铁路的技术改造,让在西方已经步入“夕阳产业”行列的铁路在中国再度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高铁成了中国响当当的技术名片,正在走向世界,影响着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世界格局。如何全面、深入、细致、准确地描述中国铁路历史发展及转变过程,是对铁路史研究新的时代要求。

带着这样的要求重新审视中国铁路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长期被遮蔽和边缘化了。我们长期关注的,或者是与铁路有关但非铁路自身核心属性的各种问题,或者把铁路仅仅当成一个既成事实而径直讨论其外部效应,而铁路作为现代交通体系中最为自成一体的复杂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其运转特点和规律是什么,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演变成了它所呈现的时态,并最终发展到今天的状态,我们所知不多。总的来看,既有的相关研究要么是粗线条的,要么是表面的,要么是静态的,远远无法满足巨大的时代研究需求。

因此,从中国作为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现状出发,中国铁路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内容之一。

二 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对象与主线

铁路是近代文明成果之一,是一种载运量大、快速而便捷的交通方

^① 如著名学者宓汝成所言:“铁路的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我国近代铁路史的核心问题。”(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3,第3页)

式。通常而言,铁路被视为现成的铁轨或铁轨上奔驰的列车,即将铁路理解为某种单纯技术手段;铁路史则被理解为线路史或筑路史,也会被理解为经济或社会现象中的变量。这种理解并不全面。铁路的实质应当是为满足社会需求的轨道载运能力。它的核心职能是载运,它的附属职能则有教育、卫生、环境等,它的外部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

中国铁路史研究当以中国铁路及其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需求与铁路载运能力之间的双向互动为研究主线,全景展示中国铁路发展的曲折历程,梳理总结中国铁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具体而言,凡涉及铁路决策规划、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线路建设、客货运营、技术革新与产业制造等重要领域的现代化历程,以及铁路对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影响,都属于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当然内容。

铁路史研究应以铁路自身的发展为主,以铁路的外部效应为辅。铁路自身的发展历程,是铁路史研究的主干和基础,这是铁路史研究的“本体”。就核心业务而言,中国铁路是由规划决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线路建设、客货运营、技术研发与产业制造等各个小系统构成的大系统。这几个小系统既互相依存,又相对独立,均有自己的演进和发展规律。除了核心业务外,还有两个部分也属于铁路“本体”研究内容。其一,铁路的直接影响。铁路建设完成之后,以其固有的客货运输方式对沿线地区产生的直接影响,也应归属于“铁路自身”范围。其二,铁路的一些附属功能。中国铁路有一个特点,即铁路系统自成一个小社会,有比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自铁路产生不久,即拥有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卫生、体育、警察等附属机构,1949年以后更是拥有自己的司法部门。这些机构都是为铁路修筑和运营服务的,如铁路卫生、警察、司法等是为铁路正常运营而设立的,而铁路教育则是为了培养铁路人才以及解决铁路职工子女就学就业问题而设立的。这个庞大系统的强化和固化,固然和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相关,但更多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和铁路自身规律及发展路径所致,亦非中国所独有。这部分附属机构也应归属“铁路自身”范围。

中国铁路的发展体现在量和质两方面。一方面是量的增加,体现在铁路通车线路和里程及覆盖区域的增加,铁路载运量以及所有交通方式中占比的上升,铁路运输利用率的增高。另一方面则是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火车速度的提高、路网的形成以及服务质量的改善等。火车速度不是单纯的快慢问题,体现的是火车技术的集成创新,包括线路建筑、机车制造、路控、安全以及管理水平等,这就是铁路技术和管理的现代化。路网

的形成,则更充分体现了铁路的规模效应,能更充分发挥铁路的载运能力。路网不仅指铁路与铁路之间形成网状互通,而且指铁路与其他交通方式乃至城市交通的有效对接。此二者是“硬”的方面。服务质量则是铁路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设施,所提供服务的舒适度、便捷度等。服务质量的改善是铁路发展质量提升“软”的方面。

铁路的外部效应也是铁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铁路的外部效应,指的是铁路的衍生效应,如铁路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人口流动、城市兴衰、社会结构乃至民风民俗、思想观念的影响等。铁路的外部效应也是值得考察的重要方面,但不属于中国铁路的“本体”。

铁路在社会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社会若干系统中的一个系统。从铁路的规划、决策、融资、修筑、运营、管理等全过程来看,社会需求是铁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铁路技术则是其必要条件。这个双向互动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行为的结果。必须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把握铁路,方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唯有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评价铁路,方能真正彰显其价值。可量化的数据分析固然十分重要,但观念变迁、社会认同等无法量化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中国铁路史研究不应简单地依时、依地、依线进行静态阐述,而应将铁路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既关注铁路系统自身的发展变化,又关注铁路系统与外界密切的互动关系。铁路史不仅要研究铁路线路建设史,也要研究国家社会对铁路的需求,铁路的规划决策,更要研究铁路建成通车后运营的历史,还要研究铁路网的构建及其功能的发挥,深入探索铁路各子系统的演进与互动。铁路的社会影响分析,也不仅限于铁路建成后的社会影响。一般而言,铁路是一项巨型工程,因此从铁路筹划开始,其修筑过程往往已经开始对地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不仅要研究铁路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推动,也要研究铁路对政治认同、民族融合、边疆稳定、国家安全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

三 目前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倾向和研究建议

就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铁路史的研究状况而言,^① 大约有以下几种倾向。

^① 具体研究动态见崔罡、崔啸晨《中国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 对铁路社会史研究比较多,对铁路自身发展研究不足。铁路自进入中国以来,确实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引起了学者的重点关注。但对铁路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筑路史和单条线路研究领域,对于铁路建成后的营运情况,研究不充分。

(2) 对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比较多,对现代铁路史研究比较少。在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方面,朱丛兵教授、马陵合教授、江沛教授、李占才教授等著著名学者成果丰硕。但学术界对现代铁路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发展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1949 年以前的时期,占中国铁路发展历程一半以上时间,但就里程而言,只有 26000 公里,仅占现运营里程 1/5 左右,而且技术水准低,运行速度慢,管理水平也不高。1949 年以后的 60 多年,整体上呈现发展加快的趋势,以 1999 年中国的高速试验线——秦沈客专动工为界,前后两段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1999 年后,以高速铁路建设为标志的中国铁路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现代化水平快速提高,铁路的运行速度和载运能力,都有了飞跃发展。到 2013 年底,中国铁路营运里程突破了 10 万公里,其中时速 120 公里及以上线路超过 4 万公里,时速 160 公里线路超过 2 万公里,高速铁路(时速 250 公里以上)突破 1 万公里,在建规模 1.2 万公里。全国铁路复线率达到 45.1%,电气化率达到了 52.4%。^①到 2016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2.4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 2.2 万公里以上。^②预计到 2020 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将达 12 万公里以上,快速客运网基本覆盖中国各省省会及 50 万以上人口城市。^③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但关于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中国铁路发展历程,除了原铁道部史志中心编撰了诸如《新中国铁路五十年:1949~1999》之类的著作外,鲜有学者研究。现代中国铁路史研究与中国铁路发展状况完全不对称。

(3) 对铁路技术史的系统研究非常薄弱。铁路是土木建筑、机械、电气、通信、管理等多种技术的集成创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和革新是铁路发展的关键变量。现有的铁路技术专门史虽然不少,但是历史学者却极少进行铁路技术史的研究。近年来南京大学李玉教授从“速度与社会发展”角度来理解铁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当属一种可贵的探索。而一些

① 陆娅楠:《全国铁路里程突破十万公里》,《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

② 《2016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2.4 万公里高铁达 2.2 万公里》(2017 年 1 月 3 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3/c_129430123.htm。

③ 《中国铁路总里程突破 10 万公里》(2013 年 12 月 28 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12/28/c_118747143.htm。

非历史学者的技术史研究，一方面过细，往往仅关注某项铁路技术领域，如通信、桥隧、机车等，没有从整体的高度去关注铁路技术集成创新演进；另一方面则记述过粗，未能阐明技术发展内在脉络，对技术创新的规律、经验及社会价值亦未做深入的分析与评估。近代以来，中国铁路技术走完了技术输入—自主创新—技术输出的全过程，这是后现代化国家技术强国之路的缩影。目前学术界既没有对这条技术发展道路的全景概括与研究，也没有对这条道路的各个关节点进行深挖。对于铁路技术的输入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斌在德国铁路技术输入中国方面做了可喜的研究。^①可是，对于铁路技术原发国——英国的铁路技术以及后来美国、苏联铁路技术又是怎样输入中国等，几乎没有研究。对铁路技术输入的途径和媒介也没有分析，对于中国铁路技术输入的一些关键性人物或团体，如对外国来华人员——德国人包尔（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科教习）、英国人金达（唐胥铁路主持人，北洋官铁路局总工程师）、苏联专家等，对中国留学生群体（如詹天佑及后来唐山铁道学院的大批留学归来教师），都未曾从铁路技术输入角度进行过研究。中国在学习外国铁路技术过程中如何消化吸收再一步一步地创新，中国铁路技术创新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等，也未曾获得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中国铁路技术及铁路制品何时开始对外输出，输出的规模、途径以及其间遇到的问题及解决之道等，也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有鉴于此，在中国铁路史研究方面，笔者有两点建议。

（1）在中国铁路史研究内容方面，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就中国铁路史研究的横切面而言，重点着眼于铁路自身，研究铁路自身的发展史。以中国铁路自身发展为基本视角，观察和描述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铁路系统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运行特点、发展规律，观察和描述铁路的规划决策、线路建设、客货运营、技术研发与产业制造等各子系统之间如何互相作用、互相配合，推动中国铁路发展变化，旁及铁路发展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二是就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纵向而言，要加强对现代中国铁路史的研究，贯通中国铁路史研究。收集整理1949年以后中国铁路发展历史资料，研究中国从没有铁路到铁路大国和铁路强国的发展历程、成就，分析中国铁路建设模式的内在逻辑，以及铁路的巨大社会影响，总结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在加强现代铁路史研究的基础上，有效贯通中国铁路史研究，构建中国铁路

^① 王斌：《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通史。三是加强中国铁路技术史研究。铁路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产物，而技术不断创新让铁路发展具有了质的提升。因此，铁路技术史是研究铁路发展史的基础。研究中国铁路技术的输入—自主创新—输出的发展历程，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铁路技术发展历程，总结经验。

(2) 各高校、科研院所铁路史研究学者应加强合作，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建，探索建设一支文、理、工相结合的铁路史研究队伍。如前所述，铁路是一个涉及面广的复杂系统，不仅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等息息相关，而且和国家政治、对外交往、社会变迁、文化传播等也存在紧密关联。就学科性质而言，铁路史既具有历史学的一般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既属于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又具有技术史、社会史的性质；既是一门专史，又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与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通信工程、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鉴于铁路史的上述特点，铁路史研究既需要历史学者，也要吸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理、工、管等学科的学者参与。在研究方法上，在使用历史学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兼采上述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真正将中国铁路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地方视野与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取向

马陵合*

提 要 在研究铁路史时，如何合理地确立地方史或区域史的考察视角，是值得探讨和重视的问题。基于其产业特性，铁路与行政体制的关联应密切一些。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研究铁路发展的历程，既要显示地方史研究中所必要的空间定位，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地方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成为现代交通体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制度性因素，需要从铁路路线规划、投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展现行政区划所造成的地理区位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产业行政政策的政治性影响。

关键词 地方视野 区域史 铁路史 研究取向

一 铁路史研究中的“地方”

关于区域史与地方史的区别，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使用的时候也没有很清晰的界限。^①有学者认为，区域在社会史的层面上，已然成为一种研究的范式，是一种分析的工具。在使用区域这一概念的时候，不一定会联想到有固定边界、很确定、很僵硬的一个地域。把“区域”理解为一个分析的工具，其实就是要把“区域”跟“人”联系在一起，“区域”就不是地理的概念，而变成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有关的考察维度。^②尽管目前区域史研究中，学者也常常关注到地理单元的界限，但并未将研究纳入历史地理学的范围，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形态，其重要关注点

*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① 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② 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山西省历史学会编印《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

是“区域”的社会史意义。关于这种研究是否能归入严格的地方史,并没有形成共识。^①相对而言,当以行政区划界定的空间为研究对象时,地方史或许是更为可行的概念。本文指称的地方,只是相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治理上的层级概念。与其相关的研究,自然与政治权力构成层次有关。当地方成为地方政府的代名词,以地方为维度考察某种历史现象时,实际就是考察不同类型地方政府所辖的地理空间内的与地方行政权力有关的历史现象,其研究基点应该是不同层次地方政府是否拥有相关治理的权力,其价值在于分析这种权力的流变与其他层次(主要包括中央政府、铁路企业)的权力配置问题。在以铁路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及收益为主要内涵的近代铁路产业发展中,地方与铁路的关系无疑是这种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管理体制演进中不可或缺的视角。在研究铁路管理体制时,我们不能笼统、不区分层次地探讨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地方视野下的制度史考察,是研究政府产业管理职能和政治治理结构变化的必要构成部分。在近代国家体制转型过程中,地方应是介于国家民族、社会组织之间中观性的结构层次,具有沟通上下的功能。同时,它所承担的治理功能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无疑是现代国家结构形成的核心机制,也是历史演进的触发点之一。究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历程而言,其管理体制的变化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勾连在一起的。地方视野应成为考察铁路管理体制中权力的生成与配置必不可少的研究角度。

在以空间为基础的铁路史研究中,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自然具有整体性意义,更能显现近代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层次性。近代地方政府对于铁路这样具有特殊技术品性的行业如何行使管理职能,自然应成为更为明确的研究目标。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应是中央与地方之间铁路管理权限如何从模糊走向清晰。地方大员在早期的铁路建设及与此相关的对外交涉中担当了主要的角色,随着现代产业管理体制逐步成型,铁路自主化程度

① 区域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区域是空间的特化,即将地域空间的一部分赋予特定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特征。这种特化使得一个空间范围在地理学性质上区别于另一个空间范围,它们分别都成为区域。区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地区或地方的抽象。区域具有两个本质的性质。第一个是整体性,是指区域有一致特性或对某种地理过程有一致的相应特征,这种一致性是由区域内部单元的紧密联系造成的。整体性不等于均质性,一致性也是相对而言的。一般地讲,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区域划分,区域的某些界限有统计上的一致特性。区域的第二个基本性质是区域的结构性。区域的构成单元(可能是地理的局域,如城乡,也可能是非地理的产业)按一定的联系产生结构。区域结构包括:资源环境结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区域经济系统、中心—腹地结构,以及人口结构、文化结构、地缘结构等。

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作用在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铁路领域不断趋于弱化，其所获得的只是有限的制度性分权。

二 铁路史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与功能

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研究铁路发展的历程，要体现铁路史的自身内涵，突出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的独特性，既要显示地方史研究中所必要的空间定位，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在铁路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从铁路路线规划、投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展现行政区划所造成的地理区位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产业行政政策的政治性影响，才能明确地方发展史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究此而言，至少包含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铁路交通自身的特性出发，做更为基础的研究，而不能急于表达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思考。要根据交通的特性，研究交通线网和枢纽的地域结构、类型及规律，研究铁路路线规划和功能定位、铁路修筑的资金来源、铁路通行条件和通过能力（涉及道路布设技术、路况及道路环境各方面），这才是展现铁路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特定基础。这与专业交通运输地理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交通运输地理研究的是交通运输的生产力地域组合，但是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所关注地方视野下的一些要素，也需要加以重视，如研究交通线网、商业都会和港市的结构与类型，找出交通运输业对沿线城镇、人口、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和演变规律。^① 这些因素被纳入地方视野后才会为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赋予更多实质性内涵。

一个省区的交通史研究首先在于充分运用历史交通地理的基本方法，建立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② 然而，又不能完全拘泥于交通工具本身，应有所拓展，但这种拓展应尽量限定在可测度的范围内。如铁路对货物流向或货物运输速度、运输成本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于生产企业乃至地方经济的影响则难以准确描述和定量分析。对铁路与经济的关系一定要予以充分关注，并需要剖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但这方面不能成为交通史研究的重点。

反映铁路这种现代交通方式的自身特性，可能要借助一些铁路自身

^① 侯甬坚：《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方法与途径》，《经济地理》1987年第4期。

^② 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葛剑雄、华林甫主编《历史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4页。

的指标性概念。尽管我们可能做不到对这些指标的数理模型分析,但至少应达到一个量化的目标。这些铁路专用概念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1) 铁路网密度。一般是指一定面积或一定数量人口(千人或万人)分摊的铁路线长度。研究铁路网的地理分布,线网密度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指标。(2) 牵引定数。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区段规定每一机车牵引的吨数。这是铁路的运输能力和通过能力的最基本数据。铁路建成后,牵引定数不足,则须进行铁路技术改造。(3) 运输密度。指一定时期内,某种运输方式的某一段运输线路上,平均每公里线路所承担的货物(旅客)周转量(运输量)。在铁路运输中,新线设计、旧线技术改造、运输设备和运输组织的设置等,都以运输密度为重要依据。它是考核运输线路能力的利用程度和运输部门运输工作强度的指标,可以反映运输能力与运量之间的适应程度。(4) 铁路的基本技术标准。包括轨距、轨重、路基标准、桥梁建筑标准、最小曲线半径、最大坡度等。这些基本的标准是准确把握某条铁路的基础。

作为史学研究的构成部分,铁路史首先应充分还原铁路发展的历程。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铁路路线确定和资金筹措。近代铁路投资主体逐步由国外投资者变成中国各级政府和华资银行,其中最具价值的问题是中央或地方独立地进行投资,还是选择双方合作的模式进行共同投资。(2) 铁路的修筑过程,包括建筑过程中路线的变更、建筑者的构成。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国有铁路建筑支持与否。(3) 铁路的运营,应主要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关铁路政策为中心。如近代的铁路运价政策、税收政策等。其中铁路收益的分配是解读双方政策倾向的核心指标。(4) 铁路修筑和运营所受到的外部干扰,如战争对铁路建设与运营的影响。如津浦南段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是战争频发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应关注铁路影响下军运、作战方式的改变对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影响。

第二,突出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力量在以国有化为主导的铁路网建构中的作用。自清末以来,铁路问题虽然有着复杂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背景,但又与军权、财权问题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所差异,它更多与地方性的外交体制、新式产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政治转型与外交体制造成地方督抚在铁路问题上的突出地位。但是,中央与地方并没有明显存在直接的冲突与矛盾。督抚与早期铁路的关系并不完全以地方利益为中心,地方督抚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更多的时候是代表中央政府;他们成为主角是晚清外交体制的产物,因为铁路事务与对外交涉往往难分彼此。早期的铁路

管理体制中，地方督抚貌似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这只是集权在上、事务在下的对外交涉体制在铁路问题上的体现而已。地方官僚在行使一元化权力的过程中，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有排他性的权力，因而，不可避免地呈现地方分权的趋势，进而言之，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在铁路建设与运营过程中日益凸显。

无论是地方督抚，还是民间的绅商，均无法提供足够的筑路资本，因而就产权归属而言，地方并不足以成为近代铁路的主体，其交通行政管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尽管他们往往被赋予对辖区内铁路的管理权，但是他们真正能为地方谋取利益的空间是不大的。但是，在铁路修筑过程中及开始运营后，地方政府则会显示更为重要的影响力。如在征地问题上，地方政府常常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并不完全顺从中央政府和外国投资方的意旨。建成运行后，一方面，地方督抚积极地利用铁路发展地方经济，包括在铁路沿线城镇自开商埠。铁路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倾向密切相关。如山东济南、周村等城镇的快速发展，显然与袁世凯、周馥等历任山东巡抚积极作为有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将铁路视为新的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主要表现为自晚清以来铁路货捐制度的推广。外国投资者对此颇有微词，但他们只能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胶济铁路等他们直接投资的铁路上拒绝这种制度，在只提供借款的铁路上，他们基本上无能为力。相比较而言，更多的矛盾是中央与地方在铁路货捐问题上的冲突与调适。在20世纪30年代“裁厘改统”前，中央政府财政部仅能直接控制津浦铁路的铁路货捐，其他铁路的铁路货捐收入基本由沿线各省分享。当然，自清末以来，地方政府就不断受到中央政府要求裁撤的压力。

中央与地方在铁路问题上互动关系的变动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铁路管理体制和政策。1903年，商部成立后，既欲集中铁路管理权，又试图以地方为基础、利用地方性商绅资本加快铁路建设速度，并以此摆脱列强财政控制，却使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处于显性的紧张状态，地方督抚以铁路所包含的地方利益作为抵制中央管控的砝码。中央与地方在铁路问题上的关系由原来的界限不清的状态转而成为有着多种内涵的对抗状态。从总体政治格局而言，则反映了铁路问题成为清末新政时期已开始初步顺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不协调部分，呈现与大趋势相悖的某种扭曲形态。这种复杂状态，主要还是出于地方官僚之间的实力失衡，张之洞、袁世凯这样位高权重、对地方控制力强的封疆大吏，已不再追求对其直接管辖地区铁路的掌控，而是透过他们的关系网络谋求在铁路管理上的全国

性权力。最为典型的表现是袁世凯对邮传部的暗中操纵。对于其他权力并不特别稳定的地方大员来说,则需要在中央政府集权化的铁路政策与地方商民的地方性路网的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实际上,因为没有明确的地方性铁路行政管理权,地方官员往往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在清末最后几年,没有哪种管理体制改革像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那样引起地方的普遍反弹,其背后应是地方政府与地方绅民在对抗中央高度集中化铁路管理体制中的联合,他们标榜维护地方整体利益,因而,这种反弹与对抗所引发的社会波动必然具有极大的冲击力。虽然保路运动没有直接推动铁路管理体制本身的变革,而是导致反清运动的全面爆发,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治权力结构更迭逐步完成,针对铁路国有化体制的缺陷,中央政府开始建立更加有效能的铁路产业管理体制。

相对于晚清而言,民国时期铁路管理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已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铁路产业行政管理机构,这种机构与现代国家体制具有同步性。铁路管理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无论是民初的交通部,还是后期的铁道部,业已在技术、人才、规划、运营等各个方面形成与集权式管理相匹配的控制力量。民国时期的铁路虽然没有像晚清那样成为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敏感焦点,但是同样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息息相关,铁路问题仍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型的一种载体。民国时期铁路管理体制能否实现统一,更多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否全面地消除地方实力派对地方的控制力。民国时期在一些半独立的区域内,铁路俨然成为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晴雨表,最为典型的是东北、山西和广东。这些区域具有半独立性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将对铁路的控制,以及从铁路运营获得财政收益作为与中央对抗的主要内容,但随着地方独立性下降,铁路的相关体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东北交通委员会在易帜后职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广东省则在 1929 年以后完全放弃对粤汉、广三、广九铁路的控制权。同样是省营铁路,阎锡山的同蒲铁路则因山西与中央关系而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直到抗战时期,中央也一直无法染指这条铁路。浙江省的杭江铁路运营后不久,即被纳入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浙赣铁路之中。这与浙江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密不无关系。

三 地方视野下铁路史的整体性书写

铁路作为大规模货物与人口远距离运输的交通方式,缩短了空间距离,打破了自然地理对人们的阻隔,使得远距离行动成为可能,使得一个

国家的官僚机构与行政命令得以遍及边界内的各个角落。所以，涂尔干与韦伯才会提出，一套标准而遍及国家疆域各个角落的行政系统和暴力系统的建立，是铁路线和新式交通对现代政治的最大贡献。^①有学者甚至将铁路视为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促动因素。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铁路是否具有如此强大的政治功能，尚待进一步研究。实际上，更具操作性的是，在研究近代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权能划分的复杂进程时，铁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具有深刻而丰富历史内涵的观察面相。是铁路的政治性、军事性功能，还是铁路自身的产业特性，促成近代中央专管的集权化的管理体系，应是考察铁路体制的两个基本角度。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政治性的评判或许更具深意，也是铁路史的整体性书写所必需的。

首先，我们应从政治权力构成的角度观察地方政府在近代中国铁路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铁路的公共性决定了地方政府有义务参与铁路建设，它是政府政治经济职能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近代，地方政府在铁路建设中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势。在前期，外国势力的介入以及铁路的国防、经济价值，直接影响了铁路建设与运营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近代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列强是地方控制铁路的外部支持力量；控制铁路则是地方割据的基础和内容。近代铁路建设资金主要依赖外债，其信用保证源于中央政府，铁路因产权关系自然成为国营企业。但是，因列强的介入，地方与中央呈现更为复杂的关系。一是地方实力派与地方政府在铁路管理体制中并非二位一体，二者是分离的。受近代外交体制的影响，地方实力派成为外债交涉和铁路控制的主角，却无法使地方政府获得铁路管理的制度化权力。二是地方对铁路的控制程度受列强对华侵略方式的影响。在列强势力范围政策影响下，地方大员往往借助铁路督办大臣的身份代表中央与列强交涉，其间地方利益只是其目标的附属部分，相反，他们更多地要相应承担铁路征地、保护铁路安全等职责，扩大地方政府经济权限和增进经济发展也并非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重“交涉”而轻“商务”。三是地方自办铁路常常体现整体的民族国家利益。清末各省铁路公司的兴起是对列强攫取中国路权的回应。东北交通委员会所筑之路既受制于满铁，也削弱了满铁对东北铁路网的控制，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铁路网络。西南的铁路建设也明显存在排除列强控制的因素，但是，区域内部政治结构不稳定和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机制，导致西南地区铁路网建设规划多多，却大都

^① [法] 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王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7～13页。

流于空谈,建设速度缓慢。即便在抗战时期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战局的变幻也造成铁路要不半途夭折,要不事倍功半。地方政府基于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力图获得区域性铁路的主导权。地方利益的诉求使得铁路管理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之间存在差异,与之并存的是,因政治独立程度、与地方社会力量的结合程度、地方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在铁路问题上与中央的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

在民国后期,随着交通产业管理体制的完善及中央集权形态的强化,地方政府的铁路建设诉求促使中央给予地方一定的制度化权力。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规范地方修筑和管理铁路的《公营铁道条例》。全面抗战前,还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合作筑路的新模式,先后设立浙赣、川黔、湘桂等由铁道部、相关省政府、华资银行合资的特许铁路股份公司,并建成浙赣铁路、湘桂铁路等。在这种部省合作模式中,铁道部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在铁路货捐和铁路征地问题上,不断通过制度化的设计,调整与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其次,应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审视中央与地方铁路交通行政管理权力分配的政治意义及其舆论背景。铁路线的延伸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延伸,铁路的贯通打破地方的封闭、分离特征,将地方整合进国家的版图与控制范围内。铁路线标定了现代国家的疆界和躯干,政治、经济控制延伸到国家的各个角落,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在追求铁路系统的整体性和集权性过程中,显然有着不同的外部舆论环境。简而言之,早期的统一路权是为了实现针对列强控制铁路的“救国”目标,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冲突矛盾常常与中外关系纠缠在一起。随着铁路自主化程度不断提高,以中央为核心的铁路专管体系则更为直接地成为削弱地方对抗势力的“统一”的工具。“救国”与“统一”,作为近代中国的政治性功能,始终是相伴而生、并行不悖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影响力度的轻重之别。

政府在铁路规划、建设和运营中担当主导性的角色。同时,近代中国的铁路在公共政策、外交和私人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铁路长期以来成为政治变动的反映,也是重要影响因素,铁路事业的推进及所遇到的障碍,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国家成长、演进抑或受阻的参照。清末的铁路建设始终受到地方主义与收回利权运动的双重影响,对铁路修建权的争夺加剧了地方的分裂态势。一战爆发前,几条铁路干线基本完成通车,干线的增多及延伸既纾解了中央政权局促的财政困境,也增强了军阀集团控制其地盘的能力,军阀兼并战争及地盘争夺也主要围绕着铁路线展开;南京

政府时期，政府着手铁路整理与统一管理，消除晚清以来铁路分线管理造成的权力分割，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增强。铁路本身是统一化的力量，但铁路的权属关系决定了其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有不同的功用，形成不同的权力关系。^① 以近代铁路来观察近代中国权力结构（央地关系）的变化和集权化国家的成长，可以视为以结构性的视角研究国家转型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一次理论探索。

^① Ralph William Huenemann, *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 1876 - 1937*,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82, p. 167.

【书评】

再现思想的纵深与互动

——读郭双林《“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

余 露*

郭双林教授积20年之功，在多项具体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甲寅派”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①充分利用报刊等多种原始资料，在历史时空中集中展示了章士钊及其同人在甲寅系列刊物时期有关政治、文化、教育等思想主张的渊源、指向和表现，以及与反对者的论争，并透过诸如教育改革的实践情况，检视部分主张的实际效果。该书选题重要，取径高明，功夫扎实，关怀深远，不仅丰富和澄清了对相关具体问题的认识，还相当程度上展现了研究近代思潮的正当取径，并能引起对中西、新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关系的深沉思考，堪称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力作。

对此，后学在细读之后，本着学术讨论的精神，秉持书评更应该是说事而非评书的原则，力戒以自我为准绳，步步为营指陈他人的歪风，尽量从所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所体现的方法和带来的启示等角度，略陈个人的读后感，就教于方家，旨在借助这一相对成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彰显近代思想文化的中西新旧问题的重要性。

一 调和中西与新旧：历史中的甲寅派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引起中国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

① 人民出版社，2015，以下提到该书简称郭书，正文中只注明页码。

内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系列变化，而这种种变化，又常常是充满紧张的。早在1901年，就有人提出“茫茫大千，争竞之舞台而已”，并分为“虚力之争竞”和“实力之争竞”两种，进而论道：“返观诸今，曰中曰西，曰黄曰白，曰英曰俄，曰德曰法，曰日曰美，其尤近者，曰新曰旧，皆争竞最剧之时也。”^①从原有文化本位天下体系中高下有别的华夷，到以国家实力为基准的势均力敌的中西，继而在新旧的名目下，混中外为一体，统摄于进化观之下，既是近代中国安放自我与认识他人，思考未来发展道路的总体脉络，也是衍生一系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根源。新与旧的矛盾可谓其中的一大枢机，前者常常对应激进，后者常常对应保守。

但激进与保守的二元结构并不足以展现历史本身的丰富，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相当的中间地带，某些著名人物的主张可以相当典型地体现这一点，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郭双林教授早年的研究成果已经注意到，在章氏思想的形成期，即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在立宪与革命的问题上，他就已经显示出积极介绍西方政治理论，热心指导国内政治发展的鲜明个性和只忠于学理而不厚此薄彼的书生特征，理想成分偏重，现实成效欠佳。^②章士钊介于激进的革命和保守的立宪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已经提示长期以来“激进—保守”这一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乃至其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范式”的不足。早年的研究，加上长期的关注，郭书就此谈起，提出在二者之外还有“调和”，从而形成“激进—调和—保守”的大致走向或基本格局（第1~2页）。对章士钊及甲寅派的关注，一开始就站在这样的高度，体现了整体的眼光。

在矛盾突出、急剧变革的时代，温和的思想常常很难引起注意，或者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近代中国一路向西，制度设置和知识体系均试图“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传统成为负面的资源和去除的对象，破旧立新的强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思想传承的必要性和对民族本位的平情的理解和应有的坚持。背后起作用的，则是一元化的进化观，以为人类社会都可以并且应该按照一定的模式和等级由下而上递进，对这一进程稍持异议，便被斥为不识“世界大势”。虽然代表保守的力量从未停止发声，“执拗的低音”（王汎森教授借用丸山真男语）一直不绝于耳，新与旧的分际也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而常常会互相纠缠和渗透，^③但这更

① 《说败》，《清议报》第87册，1901年8月5日，“本馆论说”。

② 郭双林：《在立宪与革命之间——试论武昌起义前后章士钊的政治思想》，《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③ 近年来罗志田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越来越说明这一点。

多是就具体问题而言。总体上,“新”(或曰“激进”)的方向仍是主流,主张新旧调和本身就是一路趋新的时代产物,但即便如此,调和还是常常被否定,被激进的人们认为是拖后腿,颇有几分不耐烦。

新旧之间的冲突,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甲午战败的震荡,戊戌维新的夭折,庚子西狩的大变,再到清末新政的开启,趋新已经成为朝野最大的共识。民国成立,又为“新”的合理性和实效性提供了某种印证,在走向新世界的欢欣鼓舞中,以主张调和著称的章士钊,被当时的对手方和后来的叙述者视为保守甚至反动,可他终究也只是试图在新旧之间进行调和,却从未对“新”本身有何根本的消解。

新旧调和是一个系统的大问题,章士钊及其同仁是针对什么而发,调和的依据是什么,方法怎样,在哪些具体问题上有何表现,反响如何?对这些问题,郭书先因后创,从梳理关于甲寅派的学术前史入手,在肯定贡献和进展的同时,指出以下不足:对前后甲寅分辨不清;对甲寅作者群从成员到表现上的认识均较为粗疏,时有遗漏含糊;对章士钊本人思想的纵深挖掘不够,不免大而化之。对这些不足,郭书都有较为成功的处理和解决。

知人论世,郭书从梳理章士钊的生平开始,理清其交游的轨迹,注重其思想演化的大关节,从本人、时人(包括朋友和政敌)、后人的多重角度,对章氏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勾勒,当然,紧扣的还是其思想主张。接着,郭书依次论述了甲寅系列杂志,即《甲寅月刊》《甲寅日刊》《甲寅周刊》的作者和发行情况,以及各自的特色和宗旨,并着眼于领袖人物章士钊思想变化的过程、编辑队伍的不同,尤其是思想主张的前后关系,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厘清“前甲寅”和“后甲寅”(以及相应的“前期甲寅派”和“后期甲寅派”),充分重视《甲寅日刊》的存在并将其和《甲寅月刊》一起归入“前甲寅时期”,而将《甲寅周刊》归入“后甲寅时期”,前期的重点是政治调和,后期则是文化保守(第74~95页)。这一成果补充和澄清了前人研究的缺漏和不足,深化了对章士钊和甲寅系列杂志的认识。^①

有此牢固基础,郭书第二、三章集中论述前期甲寅派的政治调和论以及与新思潮阵营的“新旧调和”之争。这两章可以说是全书最核心也最见

^① 这一成果是郭双林教授多年研究成果的累积,此前曾以《前后“甲寅派”考》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其后续有推进,如对“前后甲寅”分法的追溯从1930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提前到1925年吴稚晖《友丧》。

功力的部分，如第二章对关键概念“调和”的含义，以及各人运用时的具体所指及其思想渊源，均有相当深入的分析。一是关于调和。从“调”与“和”两个字及“调和”一词的古代含义说起，主要表示调整与和谐，对象则包括器物、身心、自然、人事，乃至万物。古代含义长期相对稳定，延续至近代，到甲寅派诸人开始赋予其新含义。章士钊的“调和”重在“发见新旧之媒，使之接钩”，即寻找新旧之间的共同性；李剑农提出“调和者，新旧蜕嬗、群体进化之象”；李大钊则从东西文化差异方面指出东洋人的调和以不牺牲他人而归而先谋保存其自我；高一涵则强调调和对立双方时，需要有一绝无成见的第三者居间“取两造差异之实质，斟酌而权衡之”。各方互有异同，但一度都是鉴于“冲突轧轹之象日烈”，才“创为调和立国之论，意在申明政力向背之理，冀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定之限度以相抗立”。二是概括前期甲寅派“政治调和论”的主要内容为相抵、有容、相让。三是揭示调和论的思想渊源主要是英美自由主义，并对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的调和思想有所借鉴，针对的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三章则对当时从北大扩大到全社会的新旧冲突，以及章士钊力图调和新旧的努力与反响有充分挖掘。后几章讨论以农立国论、对代议制的批评、文白之争、教育改革等问题，可以看作在调和与保守的宗旨下，在具体问题上的表现，同样能够注意到各主张和措施的出发点、理路、对象以及效果和反响，体现了一定的纵深。

二 报刊与近代思想的历史

郭书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长期研究积淀的学养和见识之外，也与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分不开。该书明确指出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从原始资料入手，通过编排‘甲寅派’思想资料长编，去发现当时人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去发现‘甲寅派’特别是章士钊的基本主张，然后再将这些具体主张，放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放到一战前后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放到民国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背景下，对‘甲寅派’的思想进行分析评价”（第30~31页）。就此，已经可以感受到“非碎无以立通”^①的贯通境界。

取法上还须落到实处。具体而言，郭书赖以编排资料长编的主要材料

^① 相关论述参见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就是报刊。近代报刊浩如烟海，是区别于古代史的重大史料特色。对报刊的使用，学界或有不同看法，以为不如档案等所谓一手资料来得切实，这种看法其实不无隔阂，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在于材料与问题的配合。^①报刊是近代思想传播和争鸣的集中场合，定期甚至逐日的发表，更强化了时间性的存在，运用得当可以即时观察各方思想交锋的你来我往和彼此之间的异同。何况，注重报刊并不是只用报刊，更不是只使用一种报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导致甲寅派先行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运用报刊资料，未能在时间序列上充分呈现各方的思想互动，有时不免抽离具体时空，单纯做思辨性的主观分析、推演和连接。

就郭书而言，尤其可见报刊使用得当的良好效果。甲寅系列杂志名噪一时，章士钊对此极为珍视，在某种程度上甲寅系列杂志和章士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本人及其同人的许多思想借以发表，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思想发表场地。对此，郭书在详细梳理甲寅系列杂志的创办、编辑和发行情况后，还特意于第一章第二节第三部分以“机关刊物还是同人杂志”为题，从经费来源、依托的政治力量和主要的思想倾向等方面进行讨论，指出月刊主要是欧事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周刊则执政府的背景最浓，日刊最有资格被称为同人报刊。尽管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的三分法或有未尽之处，但这一努力却充分体现作者对报刊材料的高度敏感。这种敏感有利于深入言论的背后，追究事实上的关联。

另外，新思潮或曰新文化诸人陈独秀、胡适、蒋梦麟等，亦常常以《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等刊物为阵地，再加上各个刊物人员和支持者的背景，刊物本身就是思想群体的某种象征。当然，以论争故，各方都会不时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形成交锋。正是报刊这一载体，让各人的思想有集中的发表和讨论渠道，让时人可以快速感知，也让后人得以在时间的序列中考察各方互动的过程。对此，郭书的工作做得相当细致，不仅充分利用前人已经注意但运用不够的报刊，还对前人注意甚少的《帝国日报》上章士钊的文字有所用力。更深层面上，这种细致不仅仅是对思想内容的思辨性分析，更多的还是对立论者的言说对象和彼此之间你来我往的仔细追踪，正是在看似细碎的具体论列中，印证了作者“有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正隐藏于这些冗碎的细节之中”（第439页）的信念，回归历史研究首先应该是叙事而非议论的正道（思想文化史亦不例

^①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13～122页。

外),从而达到“活”的、“立体”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境界。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由于数据库的长足发展,不少人对用检索的方式利用报刊更加疑虑。其实,检索不是不可用,而是如何用的问题。如果没有经过通读的阶段,径直用主观的想象选定若干关键词开始检索,当然后患无穷。因为这样一来,从问题意识到论说框架都是主观认定而与史实错位甚至脱离。即便就检索词本身而言,也常常因为整体了解不够导致预设过于狭窄从而产生重大偏差,不能展示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或者造成错觉。同时,检索运用得当,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扩张材料,还能顺藤摸瓜,进一步凸显联系。就实践的过程而言,检验着作者的功力;就实践的成果而言,则往往考验读者的眼力。是否仅靠关键词检索而来,效果必然大不相同,识者自能分辨。换言之,数据库的发展,方便了学人对资料的获得,却没有降低研究的难度,相反,因为人人都可以检索,疏漏难逃众人之眼,对研究者的挑战反而更大。郭书长于对相关主张背景渊源的挖掘,敏于对思想互动的捕捉,能够在立体和流动之中考察章士钊及甲寅派的思想流变,当然不是仅仅依靠检索可以做到的。

三 “甲寅”与“派”

古往今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形成了许多“派”,大体以褒扬为主,凸显群体尤其是代表人物的地位。不过这些所谓“派”,大多是后来的指认,并非当时的自称,由此就有一个学术视差的问题。仔细分辨,或能安放更加得当。

不同于一味的激进和坚决的保守,主张调和的章士钊及其同人,确实是相对而言的另一种存在。甲寅派的名字,从他们的生前到身后,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郭书对此有过一番追溯,指出:最早使用“甲寅派”这个称呼的是胡适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分别前后甲寅的则是吴稚晖1925年的《友丧》(第11、75页)。就此而言,胡适的指称重心在文学,而非整个政治与社会思想,至于吴稚晖,则是明显的贬斥,而非一般称派的褒扬。文学之一端,以及对立面的贬斥概括,与甲寅之作为派,不能说毫无关系,似亦不能完全等同,或许还存在一个本事与反响的关系。并且,章士钊1922年之前已经有诸多思想发表,与新思潮一派已经有过论争,而此时尚未见到“派”的名称。分辨前后甲寅是郭书的一大贡献,那么,对甲寅派这一指认的从无到有,各人的指向、含义若有更深入的探究,当能更进一步。

另外,不难发现,一方面,在具体问题的论争上,新文化诸人或许有一个“我们新文化”的共同认知,^①章士钊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们,是否有这样一个认知,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甲寅派?另一方面,反对者辩论的矛头所向常常只是章士钊一人,很多时候可以说是章士钊一人在舌战群儒。在同人之间,章氏也是非常突出的,他的书生意气的确相当明显,面对现实政治甚至带有几分天真,调和与保守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但又十分坚定,这使得他在当时就显得颇为另类,甚至被讥为“疯了”。他人或前后有变化,或具体问题上异同,在调和等主张上的深度与力度均不能与章士钊相提并论,比如李大钊、高一涵等人与章士钊的分道扬镳。这也折射出调和这一第三者在近代的寂寥,趋新求变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传统文化资源越来越被不假思索地加以摒弃,似乎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差距就是本国文化应当变革乃至抛弃的不容置疑的理由,已经无暇去平心考量那些流传数千年不曾中绝的文化资源的合理性,已经无心去反思欧美两三百年的局部经验和规则惯例是否真的可以作为全人类共同遵循的必然性。而后来的研究者,又常常难逃以成败论英雄的偏蔽,依据新文化运动一路凯歌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整个社会文化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不断坐实此前趋新求变的合理性。实则文化的物事,不同于实用的技术或物品,不能完全从实用的角度评定优劣乃至确定取舍。内化的超越当然是前进的阶梯,取代式的抛弃则往往会丢掉许多本不该遗忘的血脉精魂,于本国是数典忘祖的遗憾,于世界则是千人一面的缺陷,既是民族性的悲剧,也伤害了世界性本应具备的丰富与多元。假使章士钊和甲寅系列的同人真的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派”,也许不至于如此。

过于强调“派”,或许还会掩盖相近者内部的差异,弱化核心主张在“派”的谱系之外的各方联系。郭书已经提到,调和一派从洋务运动时即有表现,并非自章士钊始,与章氏大体同时,还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的调和。郭书指出,前期甲寅派不仅思想上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其论说的对象也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对这一前人注意不多的情况,郭书能够敏锐捕捉,不过在分析个别文本、罗列双方来往的大体情形之外,呈现似乎尚有不足。尤其是点出“这次论战是继清末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论战后的又一次论战,并开启了后来东西文化论战的先河”(第 133

^①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日益张大,陈独秀等人开始大张旗鼓为新文化运动正名,积极主动地掌握相关话语权,越来越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代言人自居与自期,可参见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页), 却不见下文, 让人对这一重大关节甚是期待。与此相关, 对于甲寅派与《新青年》乃至新文化运动缘起的研究, 虽有杨琥等人的研究在前, 若能充分吸收, 连贯起来, 或许能够在更深的层面纵观甲寅派在近代思想变迁中的分量。

还有章士钊的那位伯兄兼挚友, 并对他产生切实影响的章太炎, 早年曾是革命的先锋, 后期则被视为拉车向后的代表。章氏强调尊重传统政法美俗, 而不能空悬理想, 强要建设所谓完美的社会, 并提出新的“齐物”思想, 主张文化的相对主义,^① 都可嗅到“调和”的气味。在具体问题上, 章太炎对代议制和进化论也有相当的反思。那么, 关于这些倾向是否影响到章士钊, 或者章士钊的调和与章太炎的相对, 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作为读者, 也是希望进一步了解的。当然, 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 通常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而越是成熟而有价值的研究, 越能同时衍生多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以上这些好奇心未能满足的地方, 更多还是更进一步的期待, 而非研究本身的不足。

总体而言, 郭书是作者长期关注、持续努力、不断进步的成果, 在激进和保守之外, 注意到调和与保守一路, 并有实在而深入的分析, 堪称实在的贡献。若在“派”的问题上处理更加妥当, 对各家思想的评价更能超越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所显示的“话语权势”, 则不仅在激进与保守二者之外加上调和一路, 还能更上一层楼, 达到“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高妙境界。

^①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第108~175页。

《东北流通券：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1945～1948）》评介

王春林*

东北流通券是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发行的临时性地区货币，该举措涉及战时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外交等错综复杂的局势，并对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接收与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主要金融政策，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始末是国民党经略东北的重要层面，其意义不亚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但限于资料等问题，既往学界关于战后东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鲜有涉及，对东北流通券问题更缺乏较系统的专题性研究。^① 陈昶安《东北流通券：战后区域性的货币措施（1945～1948）》（以下简称《流通券》）由台北“国史馆”2014年出版。陈昶安曾获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该书即根据其学位论文修订而成。该书是“台湾学界第一本研究东北流通券的学术性专书”（“推荐序”，第3页），也是迄今海内外第一部全面探讨东北流通券问题的专著。鉴于该研究的开拓意义，笔者不揣浅陋，谨将拜读体会赘述于后，以为介绍。

*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① 参见高纯淑《战后中国政府接收东北之经纬》，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1993；〔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东北文献杂志社，2000；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探讨（1945～1949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一 一项跨领域的研究

东北流通券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过程中发行的区域性货币，它涉及收兑东北旧有货币以及与法币汇兑等问题。但它绝不是单纯的金融或经济问题，而是国共争夺东北大背景下的一个方面。因此，该书主要可以归入金融史，亦涉及经济史、政治史、外交史等跨领域研究。作者将东北流通券的发行过程置于国民党接收以及国共争夺的时空背景下考察，既可以对该问题做系统、深入的探讨，又能透过金融与经济视角折射战后国民党经略东北的成败得失。

《流通券》一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交代研究动机、研究回顾、史料与方法以及章节架构。第二章“流通券的发行与旧货币的收兑”，主要探讨流通券发行前的东北货币概况，发行决策的酝酿，发行与流通，旧货币的收兑与新货币的挑战。第三章“流通券与法币的汇兑”，主要考察汇兑办法的施行，汇兑比率的订定，关内外汇款出入概况。第四章“流通券的管制与终止发行”，主要讨论流通券的增发与通货膨胀的关联，各界撤废流通券的呼声，法币出关与流通券的收兑。第五章“结论”，概述了东北流通券流通始末，分析了流通券失败的原因，并提出继续研究之空间。

《流通券》主要探讨的是战后国民政府的货币接收与国共内战中的货币战。作者的导师胡平生曾指出该研究存在4点困难：其一，无专著可供参考；其二，资料零散，不易搜集，尤其是台湾地区所藏资料甚少；其三，须参阅日文论著；其四，问题复杂，难以把握（“推荐序”，第2页）。笔者拟透过作者对这些困难的克服情况来管窥其著书的功力与理路。

第一，作者通过东北流通券的发行、管制与终止的态势探讨其发行过程以及各方的考量，并详细考察了流通券对旧货币的收兑，流通券对法币的汇兑，以及与中共的货币战等问题。这是按照货币发行和流通的规律进行探讨的经济史路数。其研究虽无依傍，亦可谓中规中矩。

第二，史料方面，作者对相关档案、回忆录与报刊的搜集可谓用力甚勤，虽未尽全面，但亦可称丰富。作者主要使用了台北“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未刊档案以及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的部分已刊档案。同时，作者使用了当事人熊式辉、张嘉璈、陈诚、何廉、武田英克等人的回忆录或文史资料。另外，作者还广泛搜集并使用了战后东北的相关报纸、刊物中的相关记述或评论。

第三,作者征引的日文论著达 23 种,英文论著 4 种,这使其对日本和美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了基本了解,该书的学术视野因而较为开阔。

第四,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和流通涉及国、共、苏、日、满等势力以及国民政府各部门、相关地方当局、军公教人员,乃至普通民众,作者条分缕析,将国民政府与各方的交涉、斗争,其内部的分歧、矛盾与解决,各界人士对流通券态度的变化,做了较细致的梳理,其研究严谨,分析细密,结论持平。一言以蔽之,作者克服了很多困难,较好地完成了这项研究。

此外,在研究思路,该书将东北流通券置于几个视角和维度上进行考察:其一为“中苏东北交涉”,这是东北流通券发行的背景;其二为“中央与东北”,这涉及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决策与执行机制;其三为“东北与平津”,这涉及东北流通券与法币的汇兑以及两地局势的比较;其四为“国共内战”,这也是东北流通券发行的背景和主要影响因素;其五为“国家与社会”,这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东北流通券政策的认识差异。这些视角在考察东北流通券发行的不同阶段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中苏东北交涉”与流通券发行前期态势密切相关,而“中央与东北”、“国共内战”、“东北与平津”以及“国家与社会”等视角则几乎与流通券发行的整个过程息息相关。

二 从东北流通券看接收与内战

东北流通券从研讨、发行到管制、废止,始终牵涉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多个部门。《流通券》一书指出了流通券政策在行政院、财政部、东北行营、中央银行以及四联总处等部门间的多头管理、政策分歧与拖沓低效,甚至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内部亦存在不同意见(第 33、68~80 页)。“东北行营”1946 年 8 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简称东北行辕)。东北流通券政策的拖沓低效集中体现在流通券与法币汇率的确定与订定上,不仅程序烦琐,迁延日久,最后仍然留给投机者以套利空间(第 123~137 页)。此外,国民政府不能及时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而其经费下拨的程序亦颇为烦琐,某些规定又容易导致货币增发(第 160~161 页)。但该书对国民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未做进一步探讨,事实上这根源于彼时国民政府应对战后变局与中共挑战的体制性的缺陷。^① 相较之下,彼时中

^① 参阅汪朝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 年第 6 期。

共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则更加高效有力。

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流通券政策的“立意良善”与“现实”困境，最初的制度设计与接收后的局势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府与各相关部门只能就原有设计做些修补，但于事无补。作为区域性的货币措施，因为东北接收不利而未达到预期效果（第163页），该政策遂成为整个东北接收失败的一部分。作者还形象地指出东北流通券是一项“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政策（第96、196页）。苏军不配合与中共的竞争是国民政府在东北面临的两大困难，也是流通券发行与流通的现实环境（第6页）。中共在这场货币战中充分利用了与苏方的友好关系，而苏军对中共则多有帮助（第82～83页）。邓野曾对于彼时国、共、苏三方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过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处于弱势，苏军进入东北后则对国共两党采取了双重标准，而国民政府方面一直对苏方“经济合作”的要求是较为排拒的。^①

东北流通券政策的民望似乎很低，在该政策推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政界批评与民众疑虑，最后又在东北民众反对声浪中被废止（第84～86、183～193页）。东北行营对流通券政策的坚持有地方当局对问题的直接体认与判断，但这种坚持却逐渐演变出“僵化”的意味，军事形势的恶化使流通券的预期构想无法实现，而弊端则暴露无遗。同时，在收兑苏军票、抵制中共东北银行券、打击黑市和投机以及实行流通券管制等措施的操作上，东北行营、四联总处等机构明显有躁切、失信、应对乏术等问题（第99～109、138～157、164～167页）。

作者将东北流通券失败的责任主要归于国民政府，“流通券失败最大的原因在于国府以政策管制人民，却无法管制住自身的行为，加上时有接收官员的贪污腐化情事传出”。概言之，其一为不断增发钞券，其二为无法彻底稽查执行（第199页）。东北当局无法恢复接收后的产业，不得不以增发纸币维持开支，结果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第171、197页）。这显然是饮鸩止渴。胡素珊就指出，通胀财政政策和放任经济恶化是战后国民政府对全国经济的对策，经济的急剧恶化动摇了各界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进而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②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东北流通券的不断增发以及国民政府对流通券弊端的漠视。在胡素珊笔下，东北接收中

① 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第101～150、232～258、326～331、339～348页。

② 参见〔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12～156页。

的混乱与腐败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她也直接批评了国府增发东北流通券及其处理汇率问题的无能。^①

作者在该书末尾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东北流通券与台币的比较研究，台湾的经验与“满洲国”的币制改革的关系。其中，东北流通券与台币是战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地区时采取的相似的货币措施，东北流通券与满银券则是在东北地区先后发行并具有承接性质的两种货币（第 200 ~ 201 页）。日本在伪满成功推行满银券反衬了东北流通券发行之种种不足，尽管满银券亦存在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第 47 ~ 57 页）。这些方向是拓展该研究的有力的着眼点，而比较研究的思路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争夺是内战中最为复杂的部分。因为苏联和美国的介入，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决策、执行与效果都甚为复杂，而两党力量的发展态势也随之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苏联是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关键，国民政府对战后接收东北有一套完整的预案，其中就包括“牺牲外蒙换取东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在实际接收中，苏军将“友好、同盟”都给予了中共一方，国民党从进入、交涉到接收、内战可谓困难重重。东北流通券政策是建立在顺利接收东北以及日伪产业能很快投入生产的预想下的，但苏军占领东北后，中共的力量很快亦进入东北，苏军一方面扶植中共，另一方面将日伪的机器设备搬运回国，同时要求同国府进行经济合作。^② 因此，不仅国民政府预期的行政权、工业、金融的接收大为缩水，还平添了苏军票的负担以及中共力量的竞争，东北流通券发行的基础与环境完全恶化。

战后，使用法币的平津地区的通货膨胀渐趋猛烈，东北流通券的大量涌入被认为是重要原因。受通货膨胀影响，平津地区复员进度缓慢，公务人员生活恶化，工商业萎缩。^③ 与之相比，在“关外大打”的内战背景下，东北流通券因为须收兑满银券、苏军票、盖印法币等货币以及面临中共的货币战，其发行的艰难与失败实在情理之中。反观内战并不激烈的平津地区，其经济与交通事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虽存在混乱等问题，却有些成效。^④ 而国

① 参见〔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7~28、200~205页。

② 参见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第74~103页。

③ 参见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第252~258页。

④ 参见林桶法《从接收到沦陷：战后平津地区接收工作之检讨》，第119~181页。

共双方的货币战与政治、军事的对峙是密切关联的竞争领域（第105～110页）。^① 作者认为流通券“发行是建立在政府的威信与人民的信心上”，“要如何稳定币值与物价成为接收的当务之急”（第59、67页）。但这些都取决于政权的巩固或稳定与否。战局影响着国民政府货币在东北地区的流通态势（第94～97页），事实上东北的方方面面都受制于战场形势（第154～155页）。这容易得出“军事失败导致接收失败”的结论。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发端于在东北的失败，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党务、经济、教育均乏善可陈。但军事决定论似乎影响较大，至少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受国共战局的影响甚大。而在蒋介石对大陆失败的自我检讨中，军事居首，其次为党务，再次为教育。^② 然而在抗战后期国民党与中共的党务与军事力量已经呈现迥然不同的走势，易劳逸的《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一书即主要致力于探究国民党失败的根源。他在该书结论中总结道：“俄国对东北的占领至多是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根本原因在更深处，在于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内在的结构虚弱，在于对日战争的削弱作用。作为这两个因素的结果，到1945年，国民党人的运动已完全衰弱。它的弱点在它的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有限性、行政机构的腐败和缺乏效率、几个派别之间的自我毁灭的倾轧、军队的普遍的无能和士气低落中得到充分体现。考虑到这种全面的瓦解，国民党政权似乎极不可能巩固它对国家的有效统治，甚至连对东北的全面控制也不可能做到。”^③ 显然，战后国民政府在东北接收中遭遇了困境，其应对也左支右绌，但如军事失败等只是近因，不应过于放大。

三 改进之空间

其一，史料缺憾。该书使用的档案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档案、“财政部”档案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为主，辅以蒋经国、陈诚等人与四联总处等部门的档案资料。这使得该研究可以对围绕流通券政策的制定、执行与应变过程中国民政府上层互动态势做出清晰的勾勒。但该书未能使用辽宁省档案

① 参见朱建华主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512～514页。

② 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第304～342页。

③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第289页。

馆所藏的“东北行辕”等机构的档案与吉林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因此缺乏地方当局推行流通券政策的效果与考量的第一手资料，稍显不足。

其二，部分章节略嫌薄弱。该书“满银券收兑”部分较薄弱，仅列出收兑方法，具体收兑情形则缺失，或为缺少资料故（第 97~99 页）。而从“民众呼吁法币出关”到流通券终止部分有些平铺直叙，发明较少。结论部分则未能对东北流通券问题在国民政府经营东北成败中的角色做出分析、评价，对流通券与国民党失败的关联也未做深入探讨。此外，作者曾提到，中共夺取东北后以“东北银行券”收兑东北流通券、苏军票等货币，中共这一措置与东北流通券的发行过程有相近之处，探讨两者的异同应该也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

其三，相关图片的缺失。首先，该书主要探讨东北流通券的发行始末，但未能将流通券或其兑换所之照片或样图刊列，略感遗憾。其次，该书中附有东北九省地图，但热河亦为流通券使用地区（第 94~97 页），再考虑到华北和东北的紧密联系，该图似应增加热河、平津地区以及中东、北宁等主要铁路线。此外，如能添加几幅东北国共两党对峙态势演变图，当能使读者有更强烈的历史感。

其四，文字上的缺憾。首先，部分文字有明显错误。如第 106 页正文第 7 行“共军在则在北满地区”，第 1 个“在”字应为笔误。第 160 页注释 1 第 4 行“其中提到亦财政方面东北因为使用流通券”，“亦”应为笔误。第 181 页注释 58 第 5 行“各军政机关及不对难免乘机套汇”，“不对”应为“部队”的笔误。第 199 页注释 3 第 5 行“又有多有变革”，第 1 个“有”字应为笔误。其次，征引书目信息不全。如第 206 页的第 4 本书只有作者和出版社，却没有书名，笔者据相关信息判断，该书应为《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第 165 页引用时亦漏列了书名）。第 209 页最后一本书为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其出版社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者漏写了“文献”二字（第 25 页引用时亦漏写“文献”二字）。最后，个别史料引用过多，缺乏剪裁，使某些文字略嫌啰唆。以上为拜读中所发现之文字瑕疵，此为难免之事。笔者无意炫耀自己的高明，而只希望有益于读者与作者。

但瑕不掩瑜，该书对东北流通券发行过程做了细致梳理，并透过流通券的发行过程来探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以及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态势，弥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因此，该书不失为一部填补空白的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从档案到历史：富含开创性和思想性的史料集

——评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

杨向昆*

2017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谦平编的《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作者陈谦平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系、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格林乃尔学院历史系、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系进修或合作研究。陈教授的研究兴趣专注于中华民国史，综其研究特色大略有二，第一，重大的选题，国际化的视野，强烈的人文关怀。陈教授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清末和民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实际上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①因此其研究视野宏阔，选题立意高远，研究领域涵盖中华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关系等多方面。^②第二，研究扎实，史料全面，种类多元，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张立杰；《“板凳十年冷”——陈谦平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

② 陈谦平教授的主要代表作有：《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三联书店，2003；《中华民国史新论：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三联书店，2003等。主要代表论文有：《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1943年的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论“紫英石”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抗战初期的中德钨砂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济南惨案与蒋介石绕道北伐之决策》，《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开罗会议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述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尤其注重利用档案史料。陈教授一向主张在民国史研究中“应该先扎扎实实地在实证研究上下一番功夫，在挖掘史料上花费更多的力气”。^①《汇编》就是陈教授对翁文灏档案史料的编排和整理。

《汇编》的资料整理主要围绕抗战时期的翁文灏展开，这些史料“几乎全部来自台北‘国史馆’所藏的国民政府档案，收录的主要是1937年以后翁文灏同蒋介石来往电文，包括签呈、电报等重要档案”。^②全面呈现了翁文灏在战时经济、外贸、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事迹，既具有开创性，又富含思想性，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

一 关于战时的翁文灏

翁文灏是中华民国史上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1912年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致力于开创中国的地质学事业，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率领中国地质学家取得了‘北京人’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科学成果”，^③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翁文灏逐渐由一位科学家转变为政治人物，“他先是于1932年末应蒋介石之邀担任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委员长蒋介石），1935年末又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秘书长，兼资源委员会秘书长”。^④全面抗战爆发后，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原行政院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处长，负责主持工厂内迁、抗战大后方经济行政及工矿业生产，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及工业化发展的领军人物，1945年5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5月担任行政院长。他经历过民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国民政府许多重要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人。《汇编》用档案资料重现了翁文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许多重大事件参与者的历史。

关于翁文灏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相当多的学术成果。资料整理方面，

① 张立杰：《“板凳十年冷”——陈谦平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

② 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代序”，第5页。

③ 李学通：《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编写说明”，第1页。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学通先后整理出版的《翁文灏年谱》和《翁文灏日记》，前者以编年体的范式，广泛征用谱主著作、日记、书信，档案、报纸杂志，已出版的史料集、回忆录等，较翔实地记述了谱主一生的科学与政治活动，以展示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后者收录了翁文灏1936~1942年期间每日亲笔所写日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诸多领域，涉及的人物既有蒋介石、孔祥熙、张群、戴笠等党政要员，胡适、竺可桢、李四光等教育科技界名人学者，也有许多工商界企业家及专业技术人员，如卢作孚、吴蕴初、孙越崎、黄汲清等”。^①另外，翁文灏的一些文集也相继出版。^②台湾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程玉凤、程玉凰主编的《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料初编》和《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赴美实习史料——民国三十一年会派》，^③薛月顺主编的《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电业部分》和《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光复初期的台湾建设》。^④这四本书都是以资源委员会某一方面的史料为主题，对人物关照不足。

专著方面，李学通的《书生从政——翁文灏》和戴光中的《书生本色——翁文灏传》，^⑤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翁氏一生经历和重要史事。李学通的《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⑥则系统梳理了翁文灏的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分析其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的实际影响及其历史局限性。薛毅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⑦对翁文灏主管的资源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文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论述翁文灏的从政经历、教育经历，工业建设、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等几个方面。尽管目前关于翁文灏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抗战时期和翁文灏相关的很多关键性问题语焉不详。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核心史料，而《汇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
- ① 《翁文灏日记》，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中华书局，2010，“整理说明”，第2页。
- ② 相关文集有：李学通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中华书局，2009；翁心钧《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
- ③ 程玉凤、程玉凰主编《资源委员会档案资料初编》（上、下册），台北，“国史馆”，1984；《资源委员会技术人员赴美实习史料——民国三十一年会派》（3册），台北，“国史馆”，1988。
- ④ 薛月顺主编《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电业部分》，台北，“国史馆”，1992；《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光复初期的台湾建设》，台北，“国史馆”，1993。
- ⑤ 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戴光中：《书生本色——翁文灏传》，杭州出版社，2006。
- ⑥ 李学通：《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 ⑦ 薛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二 《汇编》的开创性与思想性

《汇编》内容共五章，另有代序和后记。虽然是史料集，却富含开创性和思想性。首先，序言的书写独具一格。不论是史料集，还是研究专著，序言一般都是将研究或编纂的缘起、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陈述清楚。《汇编》不同，陈教授洋洋洒洒近 3 万字，借助档案史料，从投笔从政、玉门油矿的开发与建设、战时矿产产销、为国诤言、平价购销处舞弊案、空油桶调拨案等几个方面，既为我们勾勒出翁文灏铁骨诤言、一心报国的形象，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时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和经济境况。扎实的史料、严谨客观的论述、广阔视野，一方面让我们领略到了陈教授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于无形中彰显了本史料集的价值。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序言，因此作者称为代序，却在论述中体现了序言应有的要素，别具一格。

其次，本书继承了南大学派一脉相承的实证主义。南大史学研究向来有重史料的传统，但又不同于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历史即是史科学”的观点，而是注重对史料的搜集、考证、选择和分析。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南大老一辈学者陈恭禄先生就提出：“史料选集性质的史书选录史料的三个标准——一曰信，二曰要，三曰新，自为不易之论。”^①原历史系主任蒋孟引先生为写其博士论文《第二次鸦片战争史》，“在（英国）档案馆硬泡了三年”，^②几乎翻遍了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史料。而《汇编》正是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践行，本书“所选辑史料，除一件是来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外，其余全部来自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③这些档案史料皆是陈恭禄先生所提倡的原料（最初的史料），即由此以上不能再追溯材料的来源，可信度非常高。为了获取这些史料，陈教授从 2010 年到 2014 年，几乎每年都要去台北“国史馆”查阅，前后复印档案资料达 100 万字之多。这些档案资料在国内都是首次公开，之前出版的翁文灏相关的史料集中鲜有涉及，可谓非常之新。

最后，至于“要”则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本书在史料的甄选和体例编排方面，既有整体史观的视野，内容涉及政治、经济、财政、外交、教

① 陈恭禄：《评〈太平天国杂记〉》，《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1 期，1935 年，第 211 页。

② 钱乘旦：《英国史研究的奠基人——蒋孟引先生》，《世界历史》1995 年第 1 期。

③ 陈谦平编《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上），“凡例”，第 1 页。

育、科技等各方面，呈现立体化全方位的战时中国；又有所侧重，在时间上选取翁文灏事业的高潮期1936~1947年，内容上突出翁文灏在战时工矿建设、战时贸易与财政金融、复原计划与战后接收三个方面的贡献。综观全书，第一章主要是战前与德国、苏联商贸，与欧美外交，以及经济建设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史料。第二章的史料主要反映战时工矿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建设计划与实施，战时矿业开采、管理、运储，机器、航空、电力、化学工业的迁建，外资的吸引与利用，战时生产局运作情形等。第三章主要是战时中德、中苏、中英、中美的金融与经贸，战时物价管制与物资管理，战时新疆金融、财政与经济等方面的资料。第四章主要是反映战时政治、行政、科技、教育等相关事宜的资料。第五章主要是战后接收方面的资料，包括最高经济委员会筹设事项，东北工业状况调查，沦陷区资产的接收与处置，战后日本赔偿交涉，战后中美合作等方面。每一章节都按时间顺序编排，同时为避免一维性叙述忽视共时性空间的弊端，章节下分很多专题，兼顾了时间与空间的多元化事实存在，更好地呈现了战时中国复杂的情况。

三 拓展抗战史研究的新空间

《汇编》虽然是以翁文灏为中心，但是由于抗战前后翁文灏在国民政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汇编》以第一视角为我们呈现了原汁原味的战时中国生态，特别是经济领域。因此《汇编》的出版，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其一，为工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档案资料。关于抗战时期的工业研究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守广的《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①一书。然而该书主要运用重庆档案馆档案、报刊史料和一部分已出版的资料汇编，对于《汇编》中的档案资料却鲜有运用，这就使得抗战时期工业的很多问题尚未涉及。《汇编》中有大量涉及国防工业建设计划与实施、西南西北诸省矿业开发、资源委员会下属重要企业、战时生产局的档案资料，对于研究这些问题都大有裨益。陈教授即利用此档案研究翁文灏与战时玉门石油开发问题。^②

其二，促进战时对外经贸问题深入研究。抗战前后中国经济基础薄

^① 张守广：《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重庆出版社，2012。

^② 陈谦平：《翁文灏与战时玉门油矿的开发》，《历史教学》2016年第11期。

弱,许多重要战略物资都需要进口,国内生产远不足以支持现代化的战争。抗战初期中德中苏经贸合作,后期中英中美经贸合作,对支持中国长期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对外经贸最大的特点是易货贸易,即中国政府“应允在未来时期输出一定数量之物资,因而取得对方借款,将来即以此输出物资偿债”。^①《汇编》中大量的档案资料可以补充,甚至纠正以往关于这种易货贸易谈判、洽定、办理、还款诸事宜的认识。

其三,为了解战时国民政府复杂的政治生态提供案例。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国民政府败退大陆的原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其实国民政府诸多乱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呈现出来,《汇编》中关于国民政府内部贪腐舞弊问题、战时物价管制与物资管理问题的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管窥战时国民政府复杂政治生态的史事。本书的代序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范例,陈教授以小见大,通过分析平价购销处舞弊案和空油桶调拨案,一方面呈现了翁文灏在艰难的战时工作中公忠报国、不同流合污的形象,另一方面证实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钩心斗角和贪污腐化问题。

其四,重新认识国民政府战后接收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国民政府的战后接收常常被定性为劫收,加剧了社会矛盾、党派斗争和政府腐败,是国统区经济崩溃的催化剂。如美国学者胡素珊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②一书就认为由于接收人员的腐败、接收机构的混乱等原因,政府声望在战后接收时期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害。而对于复原筹备工作、战后工业调查、接收方案制定、具体接收事宜,战后工矿业建设、农产品外销等事宜却很少有人做出客观精准的分析。毕竟,战后接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各种问题很多,但不能一概而论。《汇编》中相关档案资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基础。

其五,加深翁文灏与重要人物关系问题研究。前文我们已经说到目前关于翁文灏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翁文灏与重要人物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作为地质学家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幕僚,翁文灏与学术界和政界许多要员都有密切来往。《汇编》中有大量关于翁文灏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陈布雷、盛世才等国民政府要员来往的电文,特别是翁文灏与蒋介石的关系颇值得研究。大量的档案资料显示,在

① 吴大明:《中国贸易年鉴》,中国贸易年鉴社,1948,第26页。

②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启蒙编译所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蒋与翁的关系中，既有蒋固执己见的一面，也有蒋对翁极其信任和支持的一面。

当然，《汇编》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对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请愿事件，战时新疆的财政、经济问题，战时西藏事务，行政机构改革等问题，《汇编》中均提供有重要的档案史料。

四 档案文献的合理利用问题

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做“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史料整理工作。陈教授历时6年，奔波于海峡两岸，整理出80余万字的档案史料汇编，显得弥足珍贵。《汇编》既继承了以往资料汇编的优良传统，同时在序言书写、史料甄选、编排体例方面又别具一格，富有开创性和思想性。史料集整理出版的最终目的是方便大家的研究和利用。纵观全书，《汇编》为翁文灏研究和抗战史研究拓展了极大的空间，提供了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材料。然而，在利用《汇编》时，还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目前任何档案资料，非常完善的极少，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档，或者事后保管不善遗失的现象非常普遍，更何况《汇编》是经过拣选整理的档案。因此，在利用《汇编》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不同类型的史料，相互印证，“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①这样既可以认识历史的全貌，又能避免对史料的误解。

其次，档案资料，未必全是信史。中文档案资料，以章程、草案、规划、会议决议居多，而对于实际效果的报告却非常有限。即使有相当一部分报告或某某情形的档案，瞒报、谎报、夸大政绩、隐瞒问题的现象亦屡见不鲜，甚至政治中常有的密谋、幕后的交易和暗箱运作，常常在档案中被有意隐去。因此，在运用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最后，《汇编》的档案文献主要来源于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对大陆档案馆所藏翁文灏的档案资料并没有收录，实为本书美中不足。2008年2月，翁文灏儿子翁心钧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捐赠了一批翁文灏的档案资料，总计91卷，^②除了《翁文灏日记》于2010年整理出

^①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35页。

^② 保管处特藏组：《翁文灏个人档案资料》，《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

版以外，翁文灏与张治中、任鸿隽、余湛邦等往来信函还很少被学界利用。另外，重庆档案馆还藏有 180 卷资源委员会的档案，^① 相当一部分与翁文灏相关。因此，在翁文灏的相关研究中，还需要查阅大陆档案馆的相关档案。

^① 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编委会编《全国民国档案通览》第 2 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第 330 页。

新史料、新契机、新视野：《刘国钧日记 1945》 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赵 伟**

企业家研究是企业史领域的重要内容。纵观既往，曾有过繁荣，近几年则总体趋冷，研究成果的分量及深度也不平衡，张謇和卢作孚的研究受到突出关注，^① 刘国钧、荣氏兄弟、范旭东、刘鸿生等企业家的研究也有较多成果。

究其缘由，与企业家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有很大关系。之前的繁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为民营企业发展借鉴需要，近代企业家研究刚刚被重视起来，表层史料唾手可得。当研究向纵深推进时，缺少对深层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使许多企业家的研究停滞不前。张謇和卢作孚研究得以持续，且研究面向较广，质量也较高，与多年扎实的史料挖掘整理功夫有关，其丰富程度毋庸发凡举例。21 世纪初，对于荣氏兄弟，尤其是对荣德生的研究成果斐然，也是得益于“乐农史料”的系列出版。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一体化战略研究（1895 ~ 1937）”（15FJL016）资助。

**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① 著作方面有分量的成果：张謇研究有章开沅《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虞和平《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謇与南通区域早期现代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马斌主编《张謇实业与教育思想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等；卢作孚研究有凌耀伦《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周凝华、田海蓝《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吴洪成《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的事业与思想》（重庆出版社，2006），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等。

刘国钧先生是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从学徒到店主,再由工场主成为企业家。抗战前,他所创办的大成企业拥有 4 家大型工厂,注册资本从最初的 50 万元增至 400 万元,成为一个纺织染联营的企业集团。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称赞道:“大成这样八年增加八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是一个罕见的奇迹。”^①刘先生成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鹤立商界的近代企业家典型。不过,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单薄的研究现状不甚相符。^②如今,《刘国钧日记 1945》的出版将成为逐步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开始。

一 新史料:《刘国钧日记 1945》述评

《刘国钧日记 1945》是根据刘国钧嫡孙刘学进先生所藏日记手稿原件的 1945 年内容,经常州大学葛吉霞和江苏科技大学钟树杰两位老师点校,今年 3 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分点校和印影前后两部分,以方便对照阅读。从印影页可以看出,日记的部分字体较为难认,且有许多地方以苏州码计数,还夹杂着一些方言习惯用词,点校难度可见一斑。日记点校部分对于刘先生记录的人名做了详细介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此外还对机器、单位、地名等用词的旧称做了今解,可见功夫扎实。

这本日记是刘先生在美国考察时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① 胡毓奇:《民族纺织业中一个成功企业——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分析》,《常州纺织史料》第 11 辑,1987 年油印本,第 48 页。
- ② 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研究成果主要有:史全生《刘国钧经营大成公司的特点》(《刘国钧文集·附录》,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论刘国钧的经营理念》(《扬州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赵伟《纵向一体化:近代中国后发小资本进入棉纺织业的成功战略——以大成纺织染集团为例》(《兰州学刊》2011 年第 2 期)、《论近代中国后发棉纺织小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战略——以常州广益布厂为例》(《贵州文史丛刊》2011 年第 1 期)和《往返延伸与单向推进:拓展纵向链条的两种战略路径——近代常州大成厂和无锡庆丰厂纺织染联营的比较》(《上海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0 期),葛吉霞《民国企业家刘国钧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常州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下民国“大成奇迹”研究》(《兰州学刊》2011 年第 7 期)和《外融内生:对民国时期大成纺织染集团的融资模式考察》(《上海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2 期),仝群旺《民国纺织大王刘国钧的管人之道》(《企业管理》2015 年第 8 期),司马周《刘国钧的大成纺织染公司商标文化内涵深析》(《档案与建设》2017 年第 5 期)等;另有 3 篇硕士学位论文,钟树杰《主导行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大成集团研究》(苏州大学,2004)、金明《近代大成企业集团职工培训研究》(苏州大学,2012)和庄旭《抗战期间的大成纺织染公司》(南京师范大学,2013)。迄今尚无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出版。

第一，参观纺织企业。

这是刘国钧先生赴美考察的主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日记中记录参观的纱厂至少有十五六家之多。刘先生每到一处纱厂，并不是走马观花。日记记录显示，他把所参观的车间内的机器布置、用工人数、运行状况、生产流程等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可见认真细致程度之高。其他如印染、毛纺、针织、织绸等纺织行业的生产，甚至美国的棉花种植情况，他都有关注。

在美参观时，不仅是生产细节，关于企业战略，刘先生也有注意和思考。他看到美国人很少买零剪布，“均买做成衣”，认为企业发展应该“工商兼营联贸到底”，“从买花至做成衣服，使直接到人民身上为止”。^①这实际上是有意将大成的纺织染联营再前向整合，直至服装制造业。关于美国企业界此类一体化战略，如“工商连合工商”、“制造厂统制”、商业“统制工厂”等现象，刘先生颇为在意，并深感赞叹。

第二，会面谈话交际。

在美国参观企业的同时，刘国钧也多次与各方面人士会面交流。如与当时中国商界巨擘陈光甫会面，后者在美国成立的世界公司掌握着中美交易的信息和资源，与化工之父范旭东会谈，双方交流了经营企业的心得，与加拿大捐客谈购买纱厂机器事宜，同时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表张文潜博弈竞购，交谈要点内容都有记录。此外，他还与在银行界和政界都有经历的张嘉璈、原无锡永泰丝厂企业主薛寿萱、荣氏集团代表荣德馨、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等诸多人士会面。

第三，运筹战后计划。

在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频繁地参观和社交，其实是在学习经验，看清方向，寻找商机，并购纱厂，订购机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战后“扩展企业的计划”。^②事实上，刘国钧在日记中的多处地方，大篇幅地记录了他对于战后自身企业发展的规划，内容十分详细，涉及工厂规模、设厂地点、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资本筹措等诸多方面。这应该是刘先生在参观和交流之后，随即思考，然后形成的想法。

第四，考察社会生活。

考察之余，刘国钧还在日记中多处地方记录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情况。

① 刘国钧：《刘国钧日记1945》，葛吉霞、钟树杰点校，凤凰出版社，2017，第4页。

② 刘国钧：《自述》，李文瑞主编《刘国钧文集·传记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3页。

最多的是关于美国工人及职员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家庭生活、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话题，由此还谈到了他对于劳资关系的一些看法。还有一些地方则记录了他对美国百姓衣、食、住、行及文化生活的观感。

此外，日记中还记载了刘先生所关注的二战进展及国际国内政治的信息。

研究近代企业家很难深入探讨其思想内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企业家真实原始想法的记录文字。近代企业家有写日记习惯的原本就不多，现已出版的张謇《柳西草堂日记》文字较为简略，无法形成对主人公的丰满刻画；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及其续编则是每年一记，皆为事后补记，内容是否有遗漏，或记忆偏差，或不够完整，尚未可知，也无法反映当事人即时的思考和想法。《刘国钧日记 1945》则“原生态性明显”，^① 它的出版可谓在企业家史料方面的一项突破。

二 新契机：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研究

就目前已有成果的数量及质量而言，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的研究水平在整个企业史领域处在中等层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发现，对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的研究应该转换角度，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去考察。这就需要有雄厚的史料作为基础，而在刘国钧先生诞辰 130 周年之际，《刘国钧日记 1945》的出版完全可以成为此项研究获得更大发展的重要机缘。

首要的是启动全面系统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

现有已整理的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料主要集中于 2001 年出版的《刘国钧文集》(6 册，70 万字)和 2011 年出版的《大成公司档案史料文献》(1 册，印影)，而张謇及大生企业已整理出版的资料，主要有《张謇全集》(8 册，400 万字)和《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点校，7 册，280 万字)，荣氏兄弟及企业的已整理史料主要有《荣家企业史料》(2 册，110 万字)、《乐农史料选编》(5 册，170 万字)及《荣宗敬平生史料选编》(1 册，40 万字)，规模相去甚远。

这并非由于留存资料数量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此次出版的《刘国钧日记 1945》仅仅是 1945 年的内容，据刘氏后人介绍，保存的日记总共有数十本，并且还有大量信函等其他资料。常州档案馆藏有大批大成印染

^① 李玉：《〈刘国钧日记〉值得重视》，《团结报》2017 年 6 月 1 日，第 7 版。

公司档案资料，包括会议记录、书信函札、规章制度等，已出版的只是一小部分，且是影印，非点校。抗战时期，大成企业主要分成两部分，重庆的大明染织厂和上海租界的安达公司，相关的档案资料还需要挖掘搜集。此外，报刊方面，大成公司创办的《励进月刊》，以及民国旧报刊中相关的文字内容都可作为整理的来源。

全面的史料整理是提升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研究水平的先决条件，《刘国钧日记 1945》的顺利出版是坚实的第一步。

其次是多面向地深入研究刘国钧。

企业家不仅是企业经营者，更是历史时代社会的突出个体。企业家的研究不可囿于单纯的企业经营历史，应注重全面的思想观念、行为功绩、社会关系、个性特点等内容的考察。《刘国钧日记 1945》的多样化内容，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满的企业家形象，刘国钧研究可以有多种面向。同时，以往对企业家的论述很少做有效的比较研究，进行特征分析。从日记反映的情况来看，刘国钧的企业家风格与张謇、荣氏兄弟等大相径庭。他作为一个大企业的经营者，不仅思考战略性的大问题，还非常关注与生产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匠型企业家，这与刘先生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可以做深入研究。这也正符合当下国家所提倡的工匠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是重新认识大成企业的历史地位。

大成企业最引人注目的成绩便是实现了纺织染联营，在当时“为数甚少”。^①在美考察的日记中，刘国钧曾多次表现出对纵向一体化的关注和认同，想必战后大成依旧会继续向产业链的纵深扩张。对此，以往的研究也多有论述，却仅止于此。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如果说荣氏申新系统是第一阶段横向扩张的最大成功者，那么大成集团则是第二阶段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典范，8年8倍的资本增长也预示着第二代新兴企业集团的出现。大成在战略发展上的成功给企业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方面带来了怎样的变革，相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后是发现纺织科技史研究的线索。

作为工匠型企业家的刘国钧对生产机械有着独特的偏好。在日记中，他经常会记录纺织机器的价格、数量、种类、结构、功能、性能等，甚至是零件的尺寸，有些地方还特地做草图以明示。近代中国纺织科技史是研究薄弱的领域，这样细致的材料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印《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8编工业，1933，第39页。

三 新视野：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研究

20 世纪是工业化的时代，是工业文明逐渐形成，并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以往把工业文明理解为西方主导下的文明形态，也主要以西方话语体系来表述，其实世界工业文明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共性，也有特性。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之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来看，我国实际上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业文明。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近代企业家及企业是开拓者。刘国钧及大成企业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工业文明的新视域下对此进行研究将会有新的认识。

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看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中的人文关怀。

工业文明的主角是工人，对工人的人文关怀是工业文明一个重要方面。据大成企业高管朱希武回忆，大成工人的工资待遇较同业略高，职员年终还有分红，企业有保健所，职员住房有“房贴”，子女学费可以报销。^①这使得员工对大成企业很有归属感。与西方残酷的资本积累不同，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特点是民族企业在积累阶段对工人的福利待遇有一定重视。刘国钧在日记中称：“我办工厂视为社会事业，向重工人福利，深怕不能得人谅解。”^②其原因是否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家族和地缘观念，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看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中的工匠精神。

工业时代表现出的是专业性、技术性、实干性、严谨性的社会风貌，以及对工作和事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踏实耐心、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内涵在刘国钧身上都有具体的体现。1934 年，他去日本考察，购回旧的八色印花机，一开始无法运转，他亲自上阵，与两个从上海日商内外棉厂挖来的印花挡车工和调浆工，以及本厂几个工人，经过七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试产成功。^③刘先生是近代中国工匠型企业家的代表。在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宏大视野下，在工业生产中形成的企业家个性风格，作为一种时代的先声精神，通过企业成功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近代社会

① 朱希武：《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第 219、220 页。

② 刘国钧：《刘国钧日记 1945》，第 3 页。

③ 巢福偕：《实业家刘国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00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 273、274 页。

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塑造工业文明的力量之一。

从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看中国近代工业文明中的民族责任。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主义。企业界的经济思想往往会“从企业经营的个体层面提升到国家及民族的整体高度”。^①这反映了近代中国企业家对时代境遇的应对，也是民族责任的体现。刘国钧始终把日本企业作为大成纺织染公司的榜样和对手。他认为“日本人用贬低纱价、抬高布价的办法，是欺侮中国厂没有染色设备”，^②这不仅仅是企业竞争，更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利权之争。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推动了刘国钧加快实施纺织染联营的步伐。结果，“外人对着这个管理得法，基础稳固的大成，还不是眼看着他繁荣吗？”^③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这份责任担当，促进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形成，也内化为其重要的内涵之一。

综上所述，《刘国钧日记 1945》内容真实原始，信息量丰富，是研究企业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以此为基础，我们期待刘国钧日记的全套整理出版，进而对刘国钧及大成企业史料进行全面的整理。如果可以成行，将极大地拓展刘国钧及大成企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近代工业史，乃至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都会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也将会有助于充实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研究。

① 赵伟：《论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事业集合”思想》，《江海学刊》2016年第6期。

② 刘国钧：《自述》，李文瑞主编《刘国钧文集·传记卷》，第23页。

③ 吴景超：《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商务印书馆，1943，第170页。

美国驻华使馆 1935 年 12 月政治报告*

高萍萍** 译 以 清*** 审校

I. 摘要

出于日方压力和地方野心势力的促动，经过日本军方和以何应钦将军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的谈判，冀察政务委员会于 12 月 18 日成立。委员会人事安排并不预示着华北的未来一片光明，日本军方似乎只是把委员会作为让华北更加自治的一步。学生们则广泛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早已成为日本军方工具的汉奸李守信，开始在察哈尔东部行动，公然妄图把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①进一步导致行政权力集中在蒋介石将军手中，汪精卫集团和国民党的权力受到削弱。国民政府做出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行政任命就是蒋介石将军出任行政院长。国民政府通过 11 月 3 日的货币法令，成功维持财务状况。在“剿共”方面没有重要进展。

II. 外交关系

A. 与美国的关系

无内容报告。

* 本译文为 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二：美国使领馆报告中的中国抗战史料”（16KZD01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副研究馆员。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① 译者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等 9 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将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政治会议改名为政治委员会。

B.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1. 日本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就职典礼，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生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不满国民政府 11 月 3 日颁布的货币法令，日本军方的活动加速。而中国当局通过外交谈判澄清中日关系的提议，则是 12 月期间重要的进展。

a. 冀察政务委员会

谈判的过程

宋哲元将军和土肥原少将之间关于华北自治的谈判从 11 月 25 日开始后，已持续至 12 月，宋将军企图下野，以避免中日关系决裂。然而，要达成协议须等待蒋介石将军派遣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的到来，他参加谈判的目的在于：（1）使华北问题的解决尽可能有利于国民政府；（2）在河北和察哈尔保留一定的影响；（3）让宋将军对国民政府保持一定的忠诚。

12 月 3 日，何应钦将军来到北平。（12 月 5 日起，宋将军避匿颐和园超过一个多星期，从而把责任交给何将军，以免被人责难，直到达成协议）为协助何应钦将军，同时抵达北平的还有福建省主席陈仪将军，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将军，前北平公安局局长，最近被任命为厦门市长的余晋龢将军和时任北宁铁路局局长的殷同先生，他们都被认为忠于蒋介石。陈仪将军和殷同先生取道天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和其他官员协商，而何将军则取道保定，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将军交换意见。（然而，从那时起，商震将军不再是自治问题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被国民政府 12 月 12 日的一纸调令调至河南省任政府主席，以便接替他的宋将军扩充实力）

中日之间的各色谈判对解决华北局势的影响尚不明确。尽管何应钦将军抵达北平时只有一个模糊的计划，但在他抵达后的几天内，日本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就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建立一个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12 月 11 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加以批准，并任命宋将军为该委员会委员长，其他 16 人为该委员会委员。他们中间，有 3 名前奉系人员、3 名旧直系人员、6 名前西北军成员（包括宋将军在内）、3 位明显和安福系有联系的人物和 2 位无派系的银行家。（本报告第 7 部分叙及他们的名字）鉴于他们先前在政府中的表现，观察员不看好由他们组成的这个管理机构。

这一法令颁布后，由蒋介石派遣的那些中国官员回到了中国中部。然而，土肥原少将直到 12 月 26 日才离开华北前往满洲。何应钦将军及其同

僚们的离开使人顿感,从此华北事务将由当地的中国军队、形形色色的本地扈从,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日本人做主。

日方对中国谈判代表施压

很明显,虽然日本军方最初希望华北五省自治,但谈判最终以至少在冀、察两省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政权而结束。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不满意国民政府派遣何应钦将军到北平介入华北政局。可想而知,土肥原少将将与何应钦将军没有太多会晤。(显然,萧振瀛先生作为宋哲元军事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将继续成为中日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同时,日本在 11 月下旬发起的旨在对中国进行武力恐吓的军事准备一直没有减弱,直到 12 月 11 日大体达成协议,才开始撤减长城南部的军事力量。(关于山海关及其北部附近的军事形势,有冲突报道)为吓唬中国谈判代表,12 月上旬,日本的飞机在北平和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频繁出动,这样的施压在被认为不再必要时结束。此外,有一架以前属于日本军方,但后来据称属于非军事区的殷汝耕政权的英式飞机,经常在北平上空飞行,偶尔投放宣传小册子。一个日本人驾驶着它,机翼上的日本徽章被涂抹掉。

日本军方对新委员会的态度

有证据表明,日本军方很不满意新的委员会,因为他们没有从中获得所期望的自治程度和控制范围。然而,他们当时同意成立委员会也是有原因的,其中包括:(1)他们自信,该委员会一旦形成,其自治性可以增加;(2)他们相信,11月25日殷汝耕在非军事区成立的自治政权将会不断发展,使控制有效扩大到其他省份;(3)日本当局某些人认为平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国际形势,是可取的,这种信念也许某种程度上被国务卿和英国外交大臣在12月5日发表的有关远东的言论所强化;(4)部分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处理华北事务所产生的不满,导致日本军方内部的分歧加大;(5)他们意识到只有突发事件才能使宋哲元将军和其他华北领导人产生他们想要的改变。据一位在场的中国官员表示,问题的解决不仅通过与日本军方的谈判,也通过东京和南京之间的对话,对话使日本政府尽量克制,默认了新委员会的成立。

新委员会的进展

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这个月的剩余时间里,它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某种程度的自治,也可能会令日本满意。如果宋将军和委员会要继续执政,这样的发展是必要的。根据一些知情人士的消息,他们受到日本军方的警告,限于三个月之内,满足日本的愿望。12月26日,一反以前经由国民政府批准的惯例,宋将军任命陈觉生先生为北宁铁

路局局长、张维藩将军为平绥铁路局局长，这被视为委员会将最终接管在冀、察两省原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部门，尤其是财税机关的一系列行为的第一步。（陈觉生先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据称他已与土肥原少将有多年密切的关系。张维藩将军曾是宋将军的参谋长）12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任命。

新委员会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关系

尽管有报道说，冀北非军事区殷汝耕新政权在12月干涉邮政，并且至少试图从穿越该区的北宁铁路获得收入，但仍无法获得该政权干扰财政的确切信息。宋将军和他的政权想要限制殷汝耕的任何措施都不成功。12月15日，位于非军事区外的重要港口塘沽被殷汝耕的200名保安队成员占领，而宋却无能为力，就说明了这一点。殷政权控制的整个四个区域，部分在非军事区内，部分在非军事区外。没有消息说殷的人干涉了塘沽海关。然而，有可靠的报告称，该地区的违法活动在继续增加，特别是对于中国富人的绑架。（同时，据了解，殷汝耕偶尔会访问他在北平的住所；他的飞机使用北平机场）

12月25日，殷汝耕将其政权名称由“委员会”改为“政府”，并自称“政务长官”，此举大概是由于日本的怂恿，其意图在于：（1）显示较高程度的自治；（2）制造被宋将军政权吸收的困难，除非后者达到相当程度的自治；（3）增加利用殷政权向南延伸“满洲国”势力的可能性。

b. 学生反对自治和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

12月期间，中国几个城市出现学生示威游行，明显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示威游行开始于北平，由反对自治的北平知识界的主流人物发起，这从11月24日发表的反对任何自治的联合宣言就可看出。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导致日本官员指控他们积极煽动示威。但是，这样的指控，似乎是毫无根据的。证据表明，自治活动受到某些日本人的煽动，一些所谓“汉奸”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也足以引起学生的愤怒。指控共产党煽动游行示威，显然是基于一些散布激进思想的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占主导地位。警方采取了措施，除导致一些人受伤外，死亡人数或拘留人数都没有被证实。

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2月16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同时爆发了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罢课。游行很快扩散到其他城市。12月12日广东几千名学生游行，18日天津游行学生达五六千名。同日，南京行政院前集结了两千到三千名学生。12月19日，上海发生三千到四千名学生的游行，有几百名学生于12月23日占领了火车北站，最后控制了两列火

车,准备发往南京,但是被当局阻止,因而没有到达目的地。12月20日,武昌几千名学生游行;其他几个城市也发生类似的游行。这种形势直到12月23日蒋介石向教育界领袖和学生代表发出邀请,请他们于1月15日在南京与他会面才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日本各级官员则以口头方式表示日方的不满。

c. 中日外交谈判提议

12月27日,国民政府指示驻东京大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根本调整中日关系”,从而消除“自奉天事变^①以来中日关系的极度混乱状况”。这一提议可能是希望能够推迟那些似乎不可避免的時刻的到来——国民政府或者屈服于日本,或者对之武力抵抗。推测国民政府这一提议是因为日方强烈坚持中日关系应得到改善,也是因为中日关系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国内形势,华北从国民政府分离出去的脚步越来越紧,反对向日本妥协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的声势来源于:(1)学生的游行示威;(2)也可能是12月26日的暗杀,由一个或几个陌生人刺杀了最近活跃在中日事务中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唐有壬先生;^②(3)12月26日续范亭——一位知名度相对不高的将军的一次无效尝试,为抗议政府的亲日政策,在南京中山陵前自杀明志。不过,无论是在东京的当局准备全部或部分接受旨在限制日本在亚洲的推进计划的要求,还是国民政府提出的那些对话或谈判条件,几乎都改变不了关东军的计划。

d. 日本在察哈尔省内的扩张

12月9日,汉奸李守信率部两三千人袭击了察哈尔省东部多伦南部的沽源(据说12月30日占领)。李守信可能是被日本军方利用来扩展他们在仍属于中国的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权力,属于被雇佣的。据了解,在与察哈尔省中方权威的对话过程中,(日方)此前曾设下一个诱饵,即因解决1925年6月5日发生在张家口附近的一桩小事件,于当年6月27日达成过协议条款。李守信获“满洲国”军队的支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察东蒙古领导人德穆楚克栋鲁普(中文名周希贤)及其军队的支持。鉴于德王的声望,日本已在秋天将长城以北察哈尔的控制权交于他。作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内蒙古最强大的蒙古人亲王如果不情愿,会影响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进程,日本军方会不耐烦而诉诸军事行动。

^① 译者注:即九一八事变。

^② 译者注: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上海寓所被“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成员暗杀身亡。

日本军方也可能认为，没有军事行动无法消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对该省蒙古人的影响。

e. 两个外蒙古——“满洲国”边界事件

外蒙古代表因 11 月满洲里会议的终止及“满洲国”代表因未满足日本的愿望都感到一股挫败感。12 月 19 日及 24 日，日本及“满洲国”的部队同外蒙古士兵在贝尔湖西南发生的两次交战又加剧了这种感觉，他们每一方都宣称交战发生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

Ⅲ. 内部政治活动

A. 国民政府的政治变化，第五届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民党于 11 月举行了两个影响相对较小的会议之后，于 12 月（2 日至 7 日）举行了五届一中全会。它的重要性在于选出新的政府首脑，其人事任命的重要影响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 蒋介石将军力量增加

蒋介石将军接替汪精卫先生成为行政院长，从而将政府的行政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权力比以前更大。虽然这个位置使他加强了对国内政治局势的控制，但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他的立场更加不稳定。蒋介石成为行政院长后，至少暂时放弃了在中日关系中逃避责任的政策，即远离南京，前去“围剿”共产党。作为行政院长，他一定会直接面对日本——这是日本方面长期的一种渴望——而他和日本之间唯一的缓冲是新任外交部部长张群，而张群的影响力又不足以使他发挥好这个角色的作用。

2. 汪精卫先生集团影响减少

汪精卫失去行政院长一职，他的追随者占据的重要职位的数量减少，以及 11 月 1 日遇刺导致他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使得汪先生集团的政治影响显著下降。

3. 国民党力量的削弱

任命两名无党派人士（银行家）担任内阁职务，被认为进一步削弱了几年来一直发展的国民党势力，但同时，蒋介石的力量却在增长。这两项任命是吴鼎昌先生担任实业部部长和张嘉璈先生担任铁道部部长，这两个职位之前一直是由汪先生的追随者们所担任的。虽然这两位无党派部长的任命，以及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给人以政府引入非政治性元素的表象，但实际上这种印象是靠不住的。吴和张都与所谓亲日派官员紧密结盟，且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4. 与西南可能的和解

胡汉民先生是西南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官，授命国民政府的第一重要职位。他是否会接受这一职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仍有疑问。因此，国民政府和西南地区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过有传言，西南的文职领导人（特别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比军事领导人更倾向于相信国民政府的保证（据说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从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也有传言说，在广东和广西的军事领导人之间，以及广西的军事领导人内部，在认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区之间的合作程度上的分歧也在不断增加。

B. “剿共”运动

1. (红军) 在四川和陕西省的行动

12月，四川、陕西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刘湘将军的川军能够重新占领四川西部的大川（Tachwan）、天全（Tienchuan）和荣经（Jungking）等地，但这显然可能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军队主动向西南更远的地方撤退。

2. (红军) 挺进贵州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贺龙和萧克所部中共军队突然进军湖南中部，12月又挺进贵州，余部可能留在了湖南西北部。主力分两路或三路，沿着几个山谷，迅速向西移动，中途夺占了一些城镇，月底占领贵州东部的镇远（Chenyuan）、玉屏（Yuping）、岑巩（Tsingki）等地。同时，湘军跟踪追击，桂军三个师也进至黔东南。然而，桂系军队主要在于防御而非进攻，也不排除在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扩大广西对贵州的政治影响力。

IV. 司法和法律事务

无内容报告。

V. 商业、经济和金融活动

A. 币制改革

11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货币法令，成功维持了它的财政状况，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按照银元当日的汇率来维持货币兑换，尽管出现了一些法币被大量销售的情况。

1. 外资银行的态度

外国银行继续拒绝向中国中央银行交出他们的库存白银换纸币。然

而，银价的明显下跌使他们原有市场价和名义价的差别，将令他们遭受重大损失的观点受到削弱。与此同时，政府银行金库中剩余白银的市值下降，这导致该国货币的实际支付能力弱化。

2. 减少白银走私

然而，全球银价下跌，有助于阻止中国的白银走私，因为白银溢价有所下降。日本官方在遏制日本和韩国走私活动方面的合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3. 美国购买白银

12 月下旬，大量的白银被出售和运输到美国，是众所周知的事。这一方面被认为是已经获得美国一定程度合作的有利迹象，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售银的直接目的和其币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模糊不清，从而导致对中国金融业界富有经验的人士焦虑上升。

B. 1935 年的海关收入

与 1934 年相比，1935 年中国海关的收入下降了约 19000000 法币。进口贸易的下降在上年 12 月最为明显，因此观察人士预期 1936 年贸易额将进一步减少。与前一年相比，1935 年上海的海关税收下降了 26000000 法币，而其他港口的税收则增加了。另外，本年度的走私商品，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则有明显的增长，这可能佐证中国在 1935 年的实际对外贸易额接近 1934 年的水平。

某些令人担心的因素继续存在，其中包括：（1）上海的经济状况明显继续恶化；（2）有证据表明中国人的购买力仍在下降；（3）如此之大的贸易逆差难以改善，将会危及金融结构的稳定性；（4）是否应修订有利于日本商品和不利于别国商品进口的关税税率，或者由于“满洲国”和在河北北部非军事区的“殷汝耕政府”达成的“贸易协定”，华北市场是否应该实行近乎无限制的贸易。这些令人不安的元素将会对中国外贸经济产生影响。

C. 转口税和出口关税

尽管有相反的报告，1936 年 1 月 1 日，财政部仍不顾反对意见，宣布由于“准备不充分”，取消转口关税和削减出口关税的计划暂缓实施。

D. 火柴垄断计划

在上海的中、日火柴制造商在垄断火柴生产和销售方面取得了进展。

VI. 毒品

（参考 1935 年 12 月领事馆政治报告中的关于这一内容的专项）

Ⅶ. 中国政府人员的重要变化

A. 国内

1. 国民政府

(国民党) 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胡汉民先生于 12 月 7 日被任命为主席, 蒋介石将军被任命为副主席。在胡先生缺席的情况下, 主席的职责移交给了蒋将军。

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委员会

汪精卫先生于 12 月 7 日被任命为主席, 但由于他的病情, 他的职责移交给新任副主席蒋介石将军。

行政院

蒋介石将军于 12 月 7 日被任命为院长。

内政部

前驻日大使蒋作宾将军于 12 月 12 日被任命为部长。他在日本接受过教育。

外交部

张群先生于 12 月 12 日被任命为部长。他曾是湖北省政府的主席, 是新政学系的主要成员, 是蒋介石将军的忠实追随者, 并在日本接受过教育。

实业部

吴鼎昌先生于 12 月 12 日被任命为部长。他是盐业银行的负责人, 并于 1917 ~ 1920 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他是一名无党派人士, 在日本接受过教育。

铁道部

张嘉璈先生于 12 月 12 日被任命为部长。他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是一名无党派人士, 曾在日本接受教育。

军事委员会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控制晋绥两省军事的阎锡山将军, 和前西北军领导人冯玉祥元帅于 12 月 18 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 冀察政务委员会

12 月 11 日, 国民政府通过法令, 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其成员任命如下:

宋哲元将军, 任委员会委员长, 他属于前西北军, 是河北省最有

权力的军事领导人；

万福麟将军，东北系；

刘哲，东北系，张作霖元帅麾下的教育部长（1927）；

胡毓坤，东北系；

李廷玉将军，旧直系，吴佩孚元帅麾下的江西防务委员（Defense Commissioner）^①（1923 ~ 1924）；

贾德耀将军，旧直系，段祺瑞元帅的国务总理（1926）；

高凌蔚，旧直系，曹锟的国务总理（1923 ~ 1924）；

萧振瀛，前西北军，之前在叛徒石友三帐下，现在是宋将军和日本谈判的首席代表；

秦德纯将军，前西北军，任北平市长，原宋将军麾下参谋长；

张自忠将军，前西北军，任察哈尔省主席及宋哲元将军麾下师长；

门致中将军，前西北军，原宋哲元将军麾下师长；

石敬亭将军，前西北军，原宋哲元将军麾下师长；

王揖唐，原安福系，活跃在中日事务中，之前与现已经倒闭的中华汇业银行有联系；

王克敏，与安福系有联系，曹锟的财政部长（1924）；

程克，原安福系，因被日人看重，1935 年任过短期天津市长；

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

冷家骥，农业银行行长，前北平商会会长。

3. 北宁铁路

12 月 26 日，陈觉生先生被宋哲元将军任命为北宁铁路局局长，国民政府于 12 月 28 日批准了此项任命。

4. 平绥铁路

12 月 26 日，张维藩将军被宋哲元将军任命为平绥铁路局局长，国民政府于 12 月 28 日批准了此项任命。

B. 各省

1. 察哈尔省

12 月 12 日，张自忠将军，宋哲元将军麾下的一名师长，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取代被任命为天津市长的萧振瀛。萧从未就任察省主席

^① 译者注：疑为“江西军务帮办”。

职务，张曾在萧缺席的情况下代理主席。

2. 河北省

12月12日，商震将军由河北省政府主席调任河南省，他的调任从河北政治形势而言，消除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他取代了曾被任命河南和安徽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

3. 湖北省

12月17日，杨永泰先生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接替张群将军。杨先生曾任蒋介石将军在重庆的行营秘书长，是蒋的忠实支持者，也是新政学系的一位首脑。

C. 各市

12月12日，萧振瀛由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调任天津市市长，大概是出于他是宋哲元将军和日本人谈判的首席代表的原因。

VIII. 杂项

无内容报告。

稿 约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创办 20 余年来，在国内外民国史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与学术效应，现为 CSSCI 来源集刊。

为适应民国史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本刊现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半年出版一辑。本刊主要刊载关于 1949 年前之中华民国时期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注重实证，提倡探索。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赐稿。

来稿要求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本刊采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投稿格式和注释体例，请各位作者投稿前务必参照改妥，并校订无讹，否则恕不受理。

由于人力所限，对于来稿不能一一回复。作者自投稿之日起一个月未接到本刊备用通知者，请自行处理。本刊对决定采用的稿件，有权进行修改、删节。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凡向本刊投稿者皆被认定遵守上述约定。

本刊专用电子邮箱：minguoyanjiu06@sina.com

电话（兼传真）：025 - 83594638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民国研究》编辑部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现为CSSCI来源集刊。创办20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影响。

本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力争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是本刊对来稿的基本要求。本辑的“抗日战争”“经济与社会”“民国政治”“专论”“学科探索”“书评”“史料视窗”较有特色，相关论文堪供学术界参考，其他文章亦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邮发代号2-2998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上架建议：民国史



定价：59.00元